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1

先秦两汉卷

肖东发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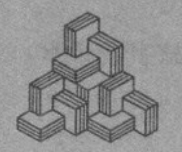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8-1783-7
9 787506 817837 >
定价：58.00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1

先秦两汉卷

肖东发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肖东发等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3－7

Ⅰ．中…　Ⅱ．肖…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秦汉时代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4432号

责任编辑／侯仰军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7.75　彩页4
字　数／394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总 序

柳 斌 杰

中国出版，源远流长；中国图书，博大精深；中国典籍，为世所罕见，亦是举世公认。中国出版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一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中国出版无愧是这一发展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见证，同时也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创造的一部分——一个值得人类骄傲、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中国是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图书出版的历史。三千多年来，中国不仅先后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出版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造纸术、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还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丰富贡献了300多万种图书，贡献了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杂志、报纸、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使出版

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数量巨大的出版物的出版、流通在积累文化历史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

从中国文明史来看，中国出版起到了记录历史文明和推动文明发展的双重作用。

1. 中国出版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历史，形成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伟大文化成果。

中国是历史悠久而又有着丰富文明遗产的伟大国家。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数千年没有中断而一直绵延到今天，此种文明景观之形成，是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出版物，它们是中国文化经过积累、筛选、整理之后存留下来的物质形态之一，是物化了的中华文化宝藏，是文化创造的伟大成果。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为两点：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断裂现象；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数千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经典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集中保存在历代图书典籍的记载中。甲骨卜辞、金石铭刻的主要内容即是有关史事的表述。《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修史范例，上起黄帝，下讫汉武，要事均列其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首尾相衔，且自共和元年（前841年）始至当代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形成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的长河。

2. 中国出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增强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

以《史记》开其端绪的“二十四史”以及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史、子、集等图书典籍，记载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从远古以至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进程，在传承文明、积累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巩固多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仅就这两点来看，中国出版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版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份遗产的主要载体就是书，正如《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中国出版史所蕴涵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仍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价值，因为它有利于当前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确有借鉴作用。

尽管历史已经逝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关的记载和著述中，从历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和丰富信息中，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去体味无数前人的社会实践和伟大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出版史可以让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实，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的结合上，焕发出更大的激情、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和创造力量。

中国出版承载了太多的优秀历史传统，其中以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文化积累三方面尤为重要，它们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仍具有活力。中国出版史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会以鲜活的历史激发今人和后人的不尽的思考，让我们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顺应时势，把握机遇，创造崭新业绩，推动历史进步。

——中国出版史所记录的众多人物的言行，向后人提供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 的标尺。

【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中国出版史所总结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启迪心智、增长智慧的源泉。

——中国出版史所描述的种种制度模式和思想模式，给后人提供了现实选择的历史参考。

在这方面，中国出版史实在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藏。

四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中国出版史就是出版行业的教科书。中国是出版的泱泱大国，需要总结丰富复杂的中国出版历史实践活动，以从中寻找发展规律，为当代出版事业提供借鉴。中国以往的出版历史，正是现今中国出版的起点。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进步。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21世纪，批判地借鉴西方出版业的积极成果，固然是发展中国出版的重要条件；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出版的优秀遗产，更是发展当代中国出版事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出版的历史表明：出版业的发展，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中国的出版事业起源早，成果多，在编辑思想、编辑方

法、出版技术、发行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出版活动中，还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编辑家、出版家、经营家和技术专家，他们为民族进步、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总结中国出版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探寻出版事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无疑将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

出版业过去的发展历程，正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基石。这就是面向过去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对于今日中国出版之价值所在。

五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出版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属于专题史，它以中国历代出版活动及出版人物为研究对象，充分运用文献典籍、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钩沉稽玄，探幽发微，考镜源流，传承文明，力求翔实而又清晰地展现中国出版滥觞、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它不仅对于当前的出版事业有借鉴意义，而且在加深和拓展“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和阐述方面，也起着其他论著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出版史也是出版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出版发展过程的学问。学科的主体包括对历代出版成就的展示、对出版历史的疏理、对出版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出版历史规律的探讨。研究中国出版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对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推动我国当代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1]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出版史又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主要是靠书刊保存、流传下来的。中国出

版通史的酝酿、探讨、研究，离不开全部的文化背景，而文化史的研究也离不开中国出版史研究，离不开历代留存下来的丰富图籍。中国出版史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史的基础学科。把中国出版与整个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科学的。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出版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版史，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出版史的研究，从搜集史料入手，展示各民族的出版成就，反映少数民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特殊作用，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开展得较早，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一直不够系统，并且往往处于分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合力，有分量的出版史研究著作不多见。改革开放给中国出版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出版通史》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和"十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历经8年编撰完成，即将出版，填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我相信《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必将对我国出版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以及印刷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出版学史学学科建设也是一个实际的推动。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编辑家、出版家，创造出了数不胜数、承载积累、传承文明重任的优秀出版物，在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出版技术、发行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不仅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为世界出版事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中国出版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梳理中国出版事业的源流、演变及其发展脉络，对于探索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展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促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

与中国出版实践活动的悠久历史相比，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繁荣阶段（1980—）。前50年多为考据之作，资料搜集虽丰，但理论阐述不足，其成果只能称之为史料集，上升不到发展史；中间30年呈不均衡发展状态，前期稳步成长，后期萧条

冷寂，内地停滞不前之时，港台有所收获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繁荣阶段，高潮迭起，佳作频出，中国学术界推出多部有分量的力作，国际上出版印刷史研究也日趋活跃。

在19世纪以前，一些关于图书印刷、校勘、贸易活动的记载，多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专门论述出版历史的著作尚未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藏书、刻书的滥觞之作有两部：一是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1897年)，二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11年)。此后的中国图书出版史和印刷史研究者，大都遵循这两部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不断突破和创新。20世纪20年代前后，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年)，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叶长青的《闽本考》，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年）等一批论著，分别就出版事业的某一时段、某一地区、某一形制或某一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证。这些著述书证详明，立论谨严，学术性大为增强。缺点是不够全面系统，甚至没有明确提出出版史的概念。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发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文，开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之先河。1946年8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应算作我国最早正式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专著，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全书仅不到5万字。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取得喜人的成就。张静庐历时近20年苦心发掘、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本《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有关出版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为出版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张

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在广泛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这一阶段，海外学者的出版史研究亦颇可观。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名誉教授钱存训《书于竹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一书于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填补了两方面的空白：一是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出版史；二是以海外学者用英文写作，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及其对世界文化史的贡献。

总体而言，这30年的出版史研究工作虽有发展，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完整系统的中国出版史学科体系尚未建立。

从1980年起至今，出版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研究范围不断开拓，诸多空白得到填补；2. 研究方法多有创新，内容体例各有所长；3. 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提供多处发表阵地；4. 研究层次不断加深，纠正不少谬误成说；5. 研究目的日益明确，探讨规律继承传统；6.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海外学者投身其中。

取得上述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和政府的重视，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出版史料收集工作的组织和引导，使研究工作进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出版局（1987年更名为新闻出版署）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有26个省市的新闻出版局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网络，制订了《征集规划》，拟订了征集选题，征集和整

理了一批资料，完成了一批编写任务。浙江、河北、江苏、广东、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史料；湖北、上海、山西、山东等地还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史志，形成了系列成果，如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北京出版史志》等等；一些出版机构也参与到出版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中，如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华书店总店等机构的店史、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上海新闻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季刊《出版史料》以及继之而起的开明书店编辑出版的季刊《出版史料》，作为出版史研究的专业期刊，始终发挥其信息量大、传播快捷的媒体优势，发掘并公布了一大批近现代出版家、出版物以及出版机构等方面的最新资料，为出版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多年来，有一批热心的老出版人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出版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如北京的戴文葆的历代编辑家研究、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方厚枢的中国当代出版史研究，等等，都有独到见解和突出贡献。上海的宋原放、吉少甫还撰写有中国出版史的通史性著作。

再次，高等院校集中了一批出版史研究力量，如北京大学的刘国钧、郑如斯、肖东发、王余光，武汉大学的谢灼华、曹之，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南大学的宋应离，等等，很早就开始研究书史、出版史、印刷史。1985年以来，许多高校相继开办编辑出版专业及图书发行专业，推动了作为该专业核心基础课程的出版史教材的编写，许多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即是在教材基础上逐步完善成形的。

此外，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等文化单位以及新闻单位、历史研究部门的史学工作者，如国家

图书馆卓有成就的张秀民、李致忠，中国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潘吉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史金波等，也涉足出版史，从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出版学术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出版史研究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领军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相继推出《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等三部论文集，还编辑出版了《出版史研究》辑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致力于出版史资料的积累和学术交流的推动，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在出版史领域，港台和海外学术界亦积极参与，并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和重要成果，如钱存训、李书华、屈万里、昌彼得、吴哲夫、潘美月等，不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颇多建树，而且培养了一批不同国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出版史研究输送了新军。近20余年来，在海外召开的有关中国出版印刷史的学术研讨会，也反映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的热情与成就。如1988年在美国圣迭戈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专门设立以“纸和印刷”为主题的分会。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2000年在纽约举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展览及在圣迭戈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期间，均举办了关于中国印刷史专题的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在韩国，1997、1999、2000年连续召开中、日、韩、德等国学者参加的有关金属活字及印刷图书文化起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交流活动表明，中国出版印刷史的研究不仅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而且也得到国际上热心中国文化

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总体上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有分量的出版史研究著作不多，全面系统的通史性专著尚未出现。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本书力图汇集前人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填补这一出版史研究的空白。既反映新时代的特色和水平，注意充分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有所发展，有自己的观点；既避免“以论代史”空洞无物，又防止“以史代论”堆砌史料，做到“史论结合”；既防止以偏概全，在没有掌握主要史料的情况下即做结论，又防止面面俱到，主次不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同时，努力做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正确。

二、出版的概念与出版的起源

什么叫做出版？这是研究出版学、出版史首先要接触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首先要明确的重要概念。

“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较晚，大约于19世纪初期开始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出版”一词属于外来词，与国外关于出版的涵义相差不大。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1971年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中规定，“出版”为“可供阅读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以有形的形式复制并向公众普遍发行的行为”。

以上各种定义，虽然在字面上稍有差异，但对出版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要素的认识却比较接近。总之，“出版”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素：(1) 有反映人类文化知识和

思想、情感的作品；(2) 进行一定的编创工作；(3) 运用复制技术，将作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4) 通过发行出售或者其他办法进行传播。简言之，所谓“出版”，就是将知识、思想或其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公众传播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整的出版活动应该包括编著作品、加工复制、广泛传播三方面的内容，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本质上讲，出版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传播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积累功能。

关于出版的起源，是出版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先秦说、汉代说、隋唐说三种。众所周知，出版活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阶段，是从一种朦胧的、原始的、范围与作用有限的活动形态逐渐演变为一种有意识的、系统的、范围与作用日渐可观的活动形态的过程。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是粗糙的、散乱的，原始的出版活动与现代出版活动注定在外在形式与工作流程上多不相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技术、范围、载体、作用的差异虽然存在，但是不会导致出版活动本质的变化——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成果的编辑、物化与传播过程。

出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产生需要一定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大致说来，出版的产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其一是文字产生并相对稳定，有记录的需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系统的、稳定的文字的产生是出版产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稳定的文字使得知识的传播

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出版的文化保存与传播功能得以实现，而记录的需要则是出版活动产生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其二是有整治并保存文化载体的技术。文字必须附着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可以流传并发挥作用，精神成果的物化离不开整治载体的必需技术，这是最基本的技术要求。

其三是有相对成熟的复制技术。

其四是有初步的编辑行为。不经编辑加工的文字材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物，出版活动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编辑活动的出现与早期编辑标准的形成。

其五是有保存或传播的愿望。保存或传播文化成果的愿望是推动出版产生的内在动力，出版行为在精神层面上实际上源自这种愿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出版活动应该从有简牍和帛书的先秦时代说起。

出版起源之时比之于出版成熟之际主要有以下区别：

1. 出版活动集中程度不同。出版起源之时，出版的各个环节之间是一种松散的联系，专业出版机构还没有出现，一次完整的出版活动所需要的时间比较漫长。出版活动成熟时，各个环节的联系紧密，系统性增强，专门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员出现，各项生产要素集中，效率不断提高。

2. 出版活动的性质不同。出版活动产生之初，主要是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存在的，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贵族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出版活动中的经济色彩淡薄。出版成熟以后，图书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商品属性成为经济社会出版活动的属性之一。

3. 受众范围与社会作用不同。由于文化的垄断、传播技术的落后，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面向的主要是贵族子弟。随

着“学术下移”，其影响逐渐波及社会中下层，并为出版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以至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社会的进步以及出版活动本身的发展使得出版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国家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复制技术与载体形式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版活动所使用的载体与出版物的复制技术也日趋进步。从最初的甲骨、金石、竹木、缣帛到后来的纸张，从最初的手工抄写到雕版印刷再到活字印刷以至现在的激光照排、网络出版，出版活动中的技术因素不断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出版活动。但不管技术与载体如何变化，出版活动的本质与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即：它始终是人类精神成果的编辑、物化与传播。

三、本书的研究内容

从“出版”的概念考察，人类出版实践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英国的G.昂温等人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写的《世界出版史》一文中说：“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如今，众所周知，出版依赖于三大文明，即文字、纸张和印刷术，以及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普及。”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史就是以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中国出版史是研究我国历史上出版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既有专业系统性，又有综合系统性。其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上

出版活动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具体地说，研究并叙述出版事业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记述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记述各类型重要典籍编纂出版的过程，揭示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揭示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因此举凡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行、典藏保护、流通利用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都是出版史的研究内容。

作为一部通史，《中国出版通史》涵盖以下基本内容：

1. 出版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时代特点、学术思潮、文化政策；

2. 出版业概貌，包括各历史阶段的概况及定性与定量分析；

3. 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包括管理机构及制度（有关著作权、出版、流通等法规，审查制度与禁书）、政府出版机构、民间出版机构、官修私撰的编撰和校勘整理活动；

4. 出版地区，包括对各个历史时期出版中心移动及其原因的分析，各地出版特色的区域性分析；

5. 出版人物和社团，包括编辑家、出版家与发行家、刻书家（印刷术发明前有以抄书为业的书佣和经生，印刷术发明后有私人刻书家、书坊刻书世家及刻工）、出版群体、出版社团及文化团体；

6. 重要出版物，包括各个时期出版物的类型分析、选题

分析、畅销书现象和机制分析；

7. 形式制度和装帧设计，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复制技术（刻画、抄写、印刷、光电新技术）、书籍制度（简策、卷轴、册页）、装帧设计（字体、字号、版式、结构、封面、扉页、插图）及其流变；

8. 流通与经营，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流通渠道（聚书地、市场、读者）、版本记录（题记、牌记等）、经销策略（定价、稿酬、印数）、作伪与粗制滥造（制假、剽窃）的分析；

9. 中外出版交流，包括各个时期中外出版物交流、版权交流、技术交流（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的外传）的概况；

10. 总体特点的分析及影响，包括各个时期的编辑思想及实践、出版策略、出版研究及成果等方面的特点、优良传统及经验教训、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当然，中国出版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出版活动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因有革，体现出独特的演进轨迹和发展面貌。这就决定了每一时期的出版史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深入研究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的基础上"通古今之变"，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五、本书的基本思路

中国出版从产生到发展有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这既便于科学研究，也是历史真实的写照；既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中国出版历史的发展脉络，也便于从宏观上总结中国出版历史的文化特征。中国出版史既然是史，就不能脱离一般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分支，必然要受到通史分期的制约。尽管作为一门专史，有其特殊性，但还不足以打破通史朝代的划分，另立标志。

此外，由于出版活动与出版技术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出版史的分期还必须考虑到造纸术、印刷术等与出版事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情况。本书在考虑到出版实践活动的自身特点、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影响出版事业的科技因素的同时，兼顾研究撰写的惯例，将全书分为9卷，按朝代次序分别为：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包括港、澳、台地区）。

作为一个集体参与的系统工程，本书各卷既独立成书，又注意整体的协调与联系。各卷章节的设计大体一致，内容相互衔接，同时尽可能避免交叉与重复。在专题史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书力图突出一个“通”字，注重时代精神对出版活动的整体影响和整合作用，注重出版内外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平衡的发展，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在其中贯穿以下基本观点：

1.“以史为鉴”的学术追求。本书把出版史的研究放在当代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当代出版业，根据中国出版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各种出版活动都予以关注和研究；既注重研究政治、经济、科技等诸方面对出版历史的影响，也研究出版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力图探寻并揭示中国出版事业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实现“以史为鉴”的社会价值。

2. 世界史的眼光。本书力求充分研究中国出版史对世界出版史和文明史的促进作用，研究出版、印刷、造纸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出版物的对外交流及其影响；同时也注意研究国外出版技术、出版物在中国出版史上的作用，使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兼具世界出版史的功用。

3.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观点。本书在每卷均设专

章，全面反映各少数民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巨大作用和伟大贡献以及港澳台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力图使本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完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出版通史”。

4. 大出版的视野。本书不仅力图反映由编辑、印刷、管理、发行、版权及书籍装帧等图书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关注文字、复制技术、载体的发明、发展对出版事业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将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多种出版形式的发展史纳入研究的视野，同时，对以前研究相对薄弱的版权保护、经营管理、出版教育等问题，也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以开辟出版史研究的新领域，拓宽出版史的对象和范围。

5.“史从考出、论从史出”的史料学观点。本书各卷在中国出版史史料发掘方面用功尤深，考证、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史料。这些新史料和新发现，对于拓展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文化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6. 加强学科建设的努力。本书以历史的客观性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中国出版史上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总结性研究，并力图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将出版活动放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社会史的视野，从出版的角度，对中华文明发展史进行全面的解读，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各个出版史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所独有的学术风格，以初步确立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出版活动的萌芽

（远古至公元前1600年夏亡）

出版是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不同的古代文明孕育了不同的出版历史活动，出版是古代人类传播活动日益高级化和复杂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不同的出版历史活动又促进了各自文明的发展，出版作为高级阶段的传播形式不断地推动文明的进步与流传。中国古代出版历史活动就是在中华文明形成以后开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中华古代文明沃土的滋润和早期中国传播活动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版活动不可能发芽、成长和结果。追溯中国古代出版活动的起源，必须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传播活动的发展说起。

在出版活动产生以前，人类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和简单的符号记录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保存，但是由于口头语言和原始符号记录受到时间、空间和内容的限制，人类的许多早期活动资料很难保存下来。而早期的出版活动产生以后，人类文明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出版活动的萌芽和出现，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从此以后，出版活动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大发展。

公元前2070年建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汉字逐渐成形并开始走向系统化，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水

平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文字和原始文献的出现，为早期的出版活动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同传播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的文明成果也往往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介来实现的。人类的传播方式与技术是不断发展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高级化和复杂化，这就使得文明和传播方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自人类开始文明发展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信息交流，就开始建立人际关系，也就开始有了最初的传播活动。传播技术也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媒介，因为媒介往往决定了传播的形式。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成长的摇篮之一，在华夏大地上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数百万年前的早期原始人类到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为中国历史上的史前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和初起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中国早期文明部落和国度里，人们的传播需求不断增强、传播的能力和手段也不断发达，文明和传播活动的双重发展使得原始的出版活动应运而生。

距今300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的造山运动，奠定了中国大陆相对封闭、西高东低的地貌特征，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立性。

一、世界文明曙光中的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的曙光是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绽放的，多元化是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早期的文明几乎都产生在大河流域：有的河在泛滥之后，留下肥沃的土壤滋养植物生长；有的河被人类驯服，洪水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听从人的指挥去灌溉农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些早期的人类与河流不同的关系派生出文明的独特性格，从而也就决定了传播方式的独特性，并最终造就出

风格各异的出版形态。

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被称为“新月沃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我们现在已知的第一个文明。他们建立的文明是城市文明，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每个城邦属于一个神，祭司是神的代表传达神的旨意。最初正是这些苏美尔的祭司以及城市的商人们出于宗教、商业和政治活动的需要，开始刻画一些图案作为记号，后来这些图案抽象成符号，形成了文字体系。[1] 两河流域的书写材料正是取自“新月沃地”的黏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用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在泥板上刻压，形成楔形文字。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中后期，以经验知识和文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泥版书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泥版书已经属于书籍的范畴，并开始形成泥版书的抄写复制和收藏制度，原始的出版活动由此诞生。正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南端创造着自己的文明之时，在北非的尼罗河畔另一朵文明奇葩开始绽开，这就是古埃及文明。与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在埃及，最早的书面语言是可认知对象的图形。涅伽达文化初期（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墓葬遗址中就出现了大量标志财产权的陶片符号[2]。而埃及完全不同于图形表达的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这种纸用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沼泽植物制作而成。莎草纸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成为公元1世纪前西方出版活动的主要书籍载体，为古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出版不仅本身就是文明成熟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体现，反过来又成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对文明的起源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尼罗河、两河流域一路往东越过伊朗高原就进入现在所谓的远东地区，这里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孕育了人类另一个最悠久的古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中华

【1】沈坚:《文明的历程》,1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刘文鹏:《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文明在许多方面与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似，比如都从事农业活动，都有自己的文字系统，都摸索出自己的历法，发展了贸易，建立了城市，有成熟的政府管理机构。不过，它们又有各自的不同和特点。距今300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的造山运动，奠定了东亚大陆相对封闭、西高东低的地貌特征，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原生性和独立性。中华文明从最早的时候到现在保持一种不间断的连续性。如此长期的历史延续性造成的观念、思维方式、习俗和传统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在至今仍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同时，也造就和孕育了辉煌灿烂而独具特色的出版历史。

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要从史前时代说起。我们习惯上将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叫做“史前时代”（prehistoric age），人类活动的极大部分时间处于这个阶段。这个时代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那个时代任何人的姓名，不知道那个时代实际发生了哪些事件，甚至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讲何种语言，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然而，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那些石器、壁画、陶罐、刀具，甚至是遗骸都已经显露出了文明的因素。对这些遗存的释读，使我们知道了中国史前时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宛如文明时代到来前的喷薄出的曙光。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时间的漫长，而在于在这一时代，中国的早期文化经历了许多关键的进步：工具的使用、语言的产生、艺术的萌芽、农业的发明、社会组织的出现……当最终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城市后，中国跨入了文明的殿堂。

中国的早期人类从人猿相揖别，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从距今200多万年前到距今1万年左右，是我国史前时代的旧石器时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陆续出土的大量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粗疏地显现了我们祖先由蒙昧向文明逐渐演进的轨迹。继云南元谋人之后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安徽和县人、辽宁金牛山人、

陕西大荔人以及稍晚的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内蒙古河套人、台湾左镇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等。当时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及全国，从时间顺序上也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使用打制的简单石器，已经会使用火，并能控制火和保存火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旧石器晚期的人类还以石、兽牙、鱼骨为原料做装饰品，说明他们已经具有初步的审美意识。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为原始群形式。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前后持续了五六千年之久，已发现的文化遗址有7 000 多处，遍及全国各省区。这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人的活动范围比旧石器时代要广阔得多。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有了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定居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代替了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群。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在南方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北方的代表性文化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南方的代表性文化为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距今 5000 至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揭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因为正是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文明主要标志的文字、金属工具、城市、礼仪性建筑等因素已出现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首先，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和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出土的黑陶罐等出土物上都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以前简单刻画符号的原始文字。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些成熟的多字刻文的发现，可以证明当时已存在用来记录语句乃至故事的文字，为此，我们称中国的良渚、龙山时代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1] 学界通常把冶金术的发明看成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大标志。第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铜器冶炼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区域广大，东起山东，西达甘、青，北抵内蒙，南至湖北，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 25 处。第三，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文明社会到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18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争夺人口和财富的战争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这一时期黄河和长江流域发掘已知的城市多达二十多座，可以说“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在中国的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已陆续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状况同文献记载中夏代之前颛顼—尧—舜—禹时期‘万国’并存的传说有吻合的一面”[1]。第四，礼仪性建筑的建造。文明起源的标志不仅包括物质层次，还包括制度和精神层次的内容，包括当时人们的信仰、习俗与理性思维形态等[2]。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等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信仰、礼制等方面的思维形态已初步达到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所以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3]。这一时期的发明创制和文化成就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6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晁福林:《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3】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确凿的商代以前的文字材料，关于夏朝的历史多少还有些传说的成分，然近几十年来，在传说的夏王朝活动区域，考古发现了许多与古文献记载相符的文化遗存，夏朝的历史得到印证。我们有理由肯定，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初步形成。夏朝的历史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约四五百年，考古发现中的二里头文化便是夏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夏朝的历史，后人有零星记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可以认为这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状态。夏的统治者也从“伯”（如伯禹）的称谓转向“后”（如后启)，后期出现“王”的称谓。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夏礼为荣。相传夏朝还曾经出现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

还听过。他曾“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也有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据传说，造车、造酒等技术也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1]。从这些典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朝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所具有的文明成就。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的萌芽发展，以第一个早期国家的确立为标志得以正式形成。

[1] 沈坚：《文明的历程》，2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早期传播活动

如上所述，世界不同地区的古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以书籍文献为主要载体的原始出版活动。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成熟和发展，必然需要有更高级的传播方式与其相适应，作为其交流、散布和延续的主要手段。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的出版活动都是其早期传播活动不断高级化和复杂化的结果。探究出版的萌芽就有必要回顾和梳理出版活动出现以前的人类传播方式，因为这些早期传播活动包含了出版的许多基本因素，不同文明的原始传播方式孕育了不同特色的出版。

所以说，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各种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是出版得以萌芽和产生的基础。广义的传播在自然界的动物群体中就已经广泛存在，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掌握了更为复杂和有效的交流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活动和行为都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符号进行，有些符号和媒介可以通过实物的方式留存至今并被考古发现，为我们所认知，但更多的传播方式，如以肢体动作和声音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则很难被保存下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遗存对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情况加以认识，因为人的任何活动都会作用于实践，留下“物”的遗迹。透过这些遗迹，并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对出版活动产生以前的人类传播活动获得大体的认识。

传播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行为，传播活动的历史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当人类需要进行劳动生产和组织交流等高层次的实践活动时，就对传播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中华文明起

源时期的人类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明起源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并呈现出从身体媒介（人体系统）向体外媒介（实物系统）发展的重要特征。人类最初的信息交流是对直接刺激产生的反射，人们对猎物的反应、对环境的反应、对人们之间的神态的交流、呼声、手势、面目表情（喜怒哀乐）等，都在向他人传递着某种动作和神态，这种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初级语言。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首先出现的是手势语言，然后出现口头语言。手势语言是借助手指伸屈或挥动手臂的不同姿势动作，来表达一定思想。肢体语言的发展就是舞蹈的产生，原始的舞蹈来源于生产生活中的肢体传播活动。我国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国的舞蹈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距今5000多年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盆内壁上部绘有三组舞蹈画面，图中的人手拉着手，头侧的发辫摆向一致，构成了一幅整齐划一颇富韵律的集体舞蹈图。[1]

【1】王真:《关于马家窑时期原始舞蹈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

但是手势和肢体语言的局限性还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传达复杂的信息时，于是就出现了口头语言，即通过一定的音节来指代事物，表达思想感情。语言的诞生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里程碑意义，虽然还没有文字的出现，但人类拥有了思维的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语言的产生最大的意义还在于人类开始采用抽象的符号传播信息，只要把声音符号转变为对应的文字符号，原始形态的出版活动便萌芽了。由于当时声音无法保存，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口头传播的发展状况很难有迹可寻，但口语传播的内容却可以通过人的记忆得以储存，并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事实上中华文明起源中口头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有两个间接的考察对象，那就是神话传说和文字系统。生活在文字传播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口语传播在人类传播方式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在口语传播时代，从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到田间地头的生产生活经验，人类的许多记忆和精神文化成果都是通过口头语言得以传播的。

尽管语言的出现能够记录和描写在时间上延展的过程、事件，但“事实上，即使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口语也并不是唯一的传播手段。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大的环境空间，人类不断地发明和采用了一些早期的体外化媒介，例如用约定的实物来传递和交流信息，利用结绳或图形符号来记录重要的事件或生产和交易情况，利用擂鼓或燃放烟火以及这些信号的接力传递等保持远距离联络。”[1] 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明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明和发展，这些手势、口语和信号也更加完善和丰富多采。我国新石器考古大量地发现陶器装饰画和岩画就是非语言媒介传播的主要证据。在半坡遗址出土的绘有“人面鱼纹图”的彩陶盆，就可能包含祈求捕捞丰盛或标识月相的天文学意义。岩画在我国的南北十多个省市均有发现，主要内容有狩猎、舞蹈、祈祷、祭祀、农作物及各种动物。时代最早属旧石器时代末期，最晚的进入青铜时代，如著名的内蒙古阴山岩刻和连云港市将军崖岩刻画都是距今6000年到3000年的作品。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原始的宗教活动是出版萌芽时期文献记录的主要内容，同样在出版萌芽以前就已经开始影响早期的传播活动了。因为不论是祭祀、占卜还是图腾崇拜都是为了进行人与天神、祖先的对话，这种特殊的传播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早期传播活动的发展。从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出土发现来看，众多契刻、绘画和舞蹈、音乐等传播方式都以农事崇拜、祭天祭祖为主要目的和内容。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原始的宗教信仰就已经显露出了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例如在泛神论方面，“中国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对神灵非常敬畏，而且只要人们认为这是神灵，则一律不排斥，成为敬畏的对象。比如后来中国道释儒的结合，也是这种泛神的表现。应该说，这一特点在中华文明形成之时已露端倪”。[2] 这一特点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先民广泛地开展与宗教有关的信息传播活动。从早期的神话传说、岩刻陶绘上的图腾崇拜到龟甲兽骨上的

[2]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3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原始汉字符号，都体现了原始宗教崇拜活动对传播发展和出版起源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人类传播活动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早期传播活动的一些发展规律。首先是媒介的原生性很强。无论是时间媒介还是空间媒介，无论是这些媒介的取材还是制作，都与自然关系密切。比如作为时间媒介的岩画。人们把所要传播的内容刻绘在岩壁上，虽然不便携带，但可以克服时间障碍，与口传时代的其他媒介相比，用岩画来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确定性。其次是传播活动的媒介融合趋势。最初的媒介总是纯粹单一的视觉媒介和听觉媒介，而后来出现的出版传播方式，则既融合了以刻画为代表的时间媒介的特性，又具有空间媒介便携易移动的特征。因此，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特别是传播活动的愈发频繁和复杂化，不论是文字和书籍载体还是传播的需求和范围等出版产生所必需的条件都逐渐成熟，出版活动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形成确立应势而出。

第二节　汉字的产生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1] 文字的产生也是出版活动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原始人类在语言产生以前，也许会做手势，会通过眼神和叫声表达一定的情感，传递特有的信息，但是因为没有语言，没有书写符号，人类早期的诸多事件无法传播于后世，只能通过集体无意识传递人类某些朦胧的、零碎的共有记忆和经验。缺乏有效的传媒使得人类早期的生活记录几近空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文字以其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书写符号的出现直接

【1】〔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汉译本。

为编辑活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改变了人类历史。所以，研究中国出版史，首先要从汉字的产生讲起。

汉字的产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前，大体经历了“有声无言”、“有言无文”两个时期。在语言和实物的基础上，又经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阶段，方才产生汉字。

一、汉字的产生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为了帮助记忆、记录与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通过远古的传说，我们知道在汉字形成以前，我国有结绳记事、契刻、图画等记事方式。这些方式为汉字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1. 结绳记事。就是用绳子打成结来帮助记忆。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利用过的一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周易·系辞下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1] 明确指出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通过结绳帮助记忆。《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用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说：“古者无文言，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绳之大小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见，我们的祖先确实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直至现代，结绳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使用，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起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日本人、埃及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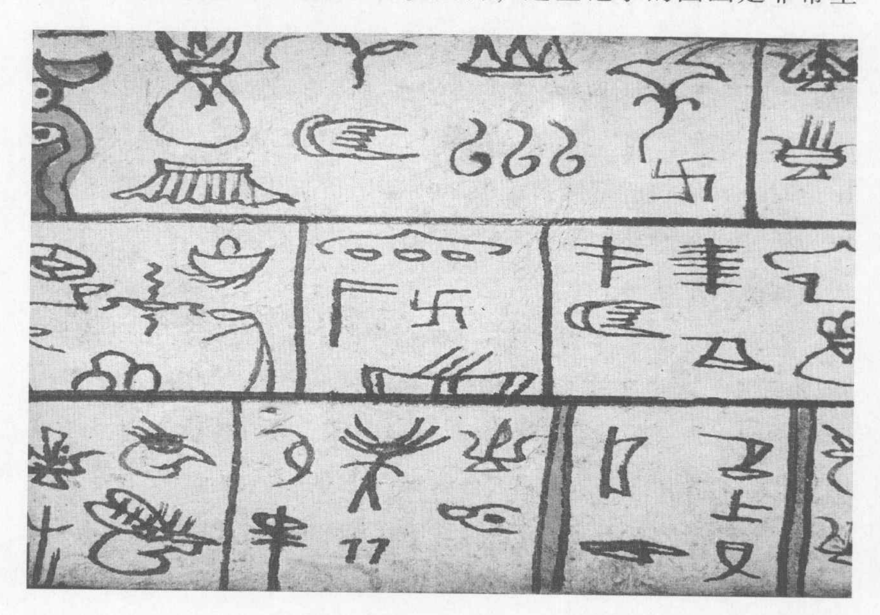
【1】周振甫:《周易译注》,2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 契刻。就是在竹、木、陶等材料上刻各种记号用以记事，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时双方订约时，把两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刻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是说在结绳记事之后，由八卦、书契代替结

绳之政，然后文籍产生了。有些学者认为，八卦就是古代刻木记事的一种形式，其时在结绳之后，文字创立之前。《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书契的情况，说这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这种方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深浅表示事情的大小。据说每年吃新米的时候，召集全村老小一起尝新，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基本是备忘用的，留下的只是代表一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所以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某一部分用之既久，约定俗成，让更多的人都能理解后，便可演变为指事文字。

3. 图画。是对文字形成最有影响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的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



东巴文经书

动、逼真的，使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一头鹿。有时，还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时间长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了，只要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的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成事物的一般意义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这样一来，图画就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

我国很多古书上都记载有“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这可能反映了“图”与“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对文字形成最有影响的，可能是图画符号（也有人称为图画文字）。我国许多民族的文字中仍保存着图画记事的痕迹。如云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经典——“东巴经”中就有不少图形，“东巴”（巫师）看了就能颂出长篇的诗句，讲出动人的故事。国外也有一些民族长期用图画符号记事，如美拉尼西亚人、北美印第安人和西伯尼亚诸部族等。1849 年，印第安人德拉瓦尔族曾送交美国总统一幅请愿书，请求允许他们七个氏族由苏必利尔湖迁徙到相邻的另一个湖旁。这幅请愿书就是用图画符号书写的，七个氏族由各自的图腾形象代表着：一个是鹤，三个是貉，一个是熊，一个是人鱼，最后一个是海狗兽。鹤被画在最前面，它是领导氏族的标志，每个图腾的眼和心都和请愿者鹤的眼和心连接在一起，这表示大家的意愿是一致的，下面画着他们要迁往的湖。

图画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可能转变为象形文字。由图画符号演变为象形文字，有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1] 这就是原始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前，

【1】唐兰：《中国文字学》，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在甘肃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中发现四个与甲骨文的“马”、“日”、“人”、“鸟”十分接近的象形符号，其所在古文化堆积层距今约7000年。可也有的学者认为，这四个形体画的成分太多，写的成分太少，可视为象形文字的先驱，还不能称之为象形文字。当象形符号有了固定的形、音、义，就意味着它已成了真正的文字。

4. 仓颉造字的传说。我国古代的结绳、契刻和图画符号等记事方法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流传甚久的仓颉造字的传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世本·作篇》说：“黄帝使仓颉作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李斯的《仓颉篇》、《淮南子》、《论衡》等书中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说得最为具体的当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

>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仓颉画像



这段文字是汉代人对传说中的仓颉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受何启示而创造文字的描述，还回答了他发明文字的方法和步骤，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字”、“书”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及所下的定义，同时也说明了文字产生后的意义和作用。

但这毕竟是历史传说，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它是原始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发明的，不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之内由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很长时

间内，由许多人逐渐创造积累起来的。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荀子·解蔽》中所言较为接近现实，即“古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1]。荀子认为古时候琢磨、草创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颉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级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规范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传说中的仓颉书

章太炎《造字缘起说》指出：

> 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损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2]

所谓“下笔不容增损”云云，或许过分，但他强调仓颉在汉字规范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在仓颉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文字。他的职务均记载为“黄帝的史官”。按此说，“仓颉造字”当在公元前26世纪的黄帝时期，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这一时期，原始汉字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唐兰认为：“我们所见

【1】王先谦:《荀子集解》,4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到的商代文字，只是近古期，离文字初发生时，已经很遥远了。”又说：汉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1]。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唐兰:《中国文字学》,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二、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

探讨汉字产生的时代，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裘锡圭认为：“已发现的可能跟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上所刻划、描画的符号。这些符号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形体比较简单，大都是几何形符号，见于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偶尔也见于骨器和石器上。第二类是像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见于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这类符号似乎不如前一类使用的普遍。”[2]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20世纪50—60年代，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些陶器上发现了110多个形状简单但很有规则的刻符。在其不远的临潼姜寨也发现了130余个形状极为相似、略为复杂的刻符，另外在甘肃、青海、浙江也续有发现。有人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与制陶工艺有关的记事符号。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时代距今已有六七千年之久。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3]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汉字就有近6000年的历史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陶器刻符意义不明，尚难断定它就是文字，还是看做刻画符号更为妥当。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也撰文说：“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的口沿外，往往刻划着简单的文字。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4] 裘锡圭认为：“已发现的半坡类型符号，绝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个部位上，规律性很强。有些符号不但重复出现在很多个器物上，而且还出现在不同的遗址里。看来，这种符号，至少是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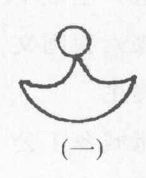
[3]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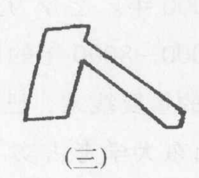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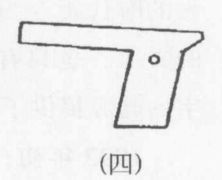
[4] 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经比较固定地用来表示某些意义了。除了用作个人或集体的标记之外，这种符号也有可能用来表示其他意义。”[1]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195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出土的陶尊上刻有四个象形文字，这是得到多数学者公认的远古文字。出现陶器符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


(一)

(二)

(三)

(四)

大汶口陶尊上的刻画符号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个为“旦”字，第三个为“锛”字，第四个为“斧”字。唐兰认为第一个为“炅”字，第二个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个为“斤”字，第四个为“戌”字和“戊”字 (古为一字)。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志”。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和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专家们推断，这种远古文字已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在此之前还应有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1987年，文物工作者又在大汶口文化区山东莒县发现16个古文字，刻在10口大陶尊上。这些有字陶尊经测定距今5000年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有5000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一批刻画文字。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000~4400年，其地点在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范围之内，因此，有的学者释读后，认为是夏代的文字。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遗址，出土了一批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甲骨文献。字体小如蝇头，笔画细若蚊足，刀法朴拙，字迹清晰。文字行笔先后顺序和重叠关系清晰可辨，不同于线条简单的记事符号。在被清理出的十余个单体字

中，可释义的有“人”、“万”、“大”、“元”等字，据放射性碳十四法测定时代比殷墟甲骨早1200年以上，即距今4500—5000年间，在黄帝时代和夏代初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黄帝之史仓颉”造字的远古传说，反映了汉文字萌芽时期的特征。

1988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了一批甲骨，其上所刻的符号，个别的形体与河南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似应一脉相承，据碳十四法测定，并以树轮校正，这批甲骨的时代距今约8000年。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也只有7000—8000年的历史。这次发现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2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灰坑中发现一件刻字陶片，有文字5行11字，笔画流畅，排列有规则，相互联系紧密，刻写也有章法，已经脱离了刻画符号和图画文字阶段。据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专家鉴定，距今4200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随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在湖北宜昌中堡岛又取得震惊考古界的新发现。1993年11月15日，杨家湾遗址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发掘出带刻画符号的陶片8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900±260年—公元前3380±145年，距今约6000年，与西安半坡陶符年代大致相当。

贾湖甲骨刻契符号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文字的萌芽状态。河南安阳殷商文化的甲骨文字是数以千计的成体系的文字的成熟阶段。两者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形成阶段。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址均出现了向殷墟甲骨文靠拢的陶文，甚至二里冈遗址还出土了三件有字的兽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这样脉络就理清了，殷商甲骨文不是中国文字的源而是一个流。

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有关汉字起源的时代脉络将会逐步清晰明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正是我国文字由萌芽向成形实现质的飞跃的时期。不仅黄河中游有西安西郊花园村骨刻文字，黄河下游有大汶

口文化陶器文字，青海、甘肃有齐家文化，在长江下游还有良渚文化圈的陶文、玉器上的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相同的字，或在不同载体上，或在不同地域共同使用，如“戊”、“炅”、“山”、“封”、“皇”等字，都出于两地以上，笔画结构，惊人相似，至于“五”、“七”、“十”、“廿”等数目字，使用范围更广。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汉字产生距今至少有4500年的历史。

三、汉字书写工具的出现

考古发现也说明，在汉字产生之前，书写汉字的工具就已产生。清朝人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说：“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简。”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西安半坡陶文中的好几种图案，如人面纹、游鱼图案、米字形纹饰，是用笔或类似的工具描绘上去的，其笔触清晰可见。1959年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有契刻和书写两种，说明当时已经使用笔和契刻类的书写工具了。只是当时的书写工具可能是极其简陋的。如元代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说的那样，上古人们“以竹梃点漆而书”。即用小木棍或小竹棍蘸上颜料书写。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至少在商朝就已具备雏形了。距今六七千年的陶文，也有不少是契刻上去的。据推测，当时使用的契刻工具可能是用玉石或动物的牙齿制作的。由于当时陶文使用的不是很频繁，这些工具是否是专门用来契刻的，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书写工具的出现和丰富，为汉字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并在以后的文献著录和复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汉字的产生当在龙山文化晚期，即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汉字的产生，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字的出现和汉字书写工具的具备，为此后的著述、编辑、出版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第三节　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现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夏王朝共历17君，延续471年。由于流传至今的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过。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也是可信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说明，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夏王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天的河南和山西等地。农业在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夏人还制定出适合农业发展需要的历书——夏历，它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我国至今使用的农历还称为夏历。夏代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比起原始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夏代是中国出版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汉字已经开始形成体系，原始的图书典籍开始出现，已经初步具备了出版活动的部分要素。

所谓原始的图书典籍是指正式图书产生以前的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文书材料。它们虽然不是正式的图书，但又确是当时人某种活动的忠实记录，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显现，已经具备了图书的某些因素，也可以说是早期出版物的萌芽状态。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诒徵认为，在后世文献中，仍可考证出夏代文献的存在。他指出：

> 孔子能言夏礼，墨子多用夏政。箕子尝陈《鸿范》，魏绛实见《夏训》。《孝经》本于夏法，《汉志》亦载《夏

龟》。《七月》、《公刘》之诗，多述夏代社会礼俗，可与《夏小正》参证。《小戴记》、《王制》、《内则》、《祭义》、《明堂位》诸篇，凡言三代典制者，往往举夏后氏之制为首。是夏之文献虽荒落，然亦未尝不可征考其万一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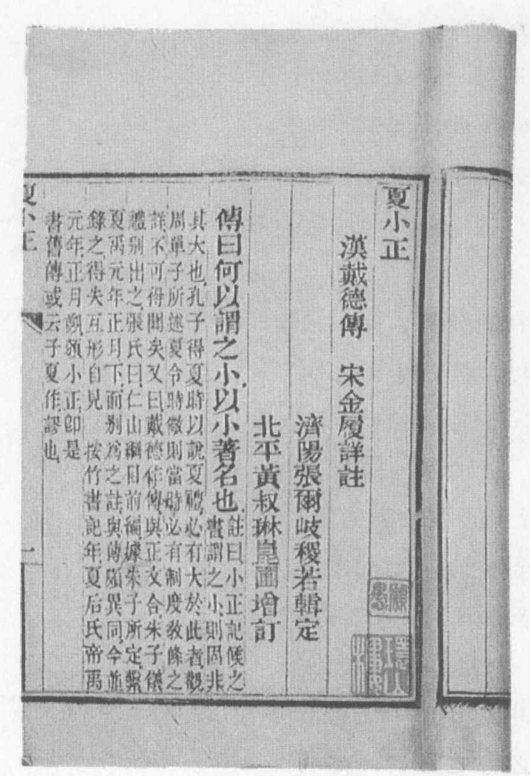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7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这一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其他文献判断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如下：

(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竹书纪年》中之《夏记》记载了“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四百七十一年”的帝王世系，迁都八次，建都城七座，先后为阳城、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一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经济、文化、天文的资料，因《竹书纪年》中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相符，成为后世史家研究夏王朝必备之史料。尽管《史记》与《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生活在距今4000年左右。

(2)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说明夏商更迭之际，已有典册。

(3) 据古籍记载，夏代典籍有《夏书》、《夏时》等。《左传》、《国语》、《墨子》等多次提到《夏书》并引其文，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食记载，可见《夏书》在


夏小正
漢戴德傳　宋金履詳註
濟陽張爾岐稷若輯定
北平黃叔琳崑圃增訂
傳曰何以謂之小以小著名也
註曰小正記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也孔子得夏時以說夏禮必有大於此者觀周單子得所述夏令時徵則當時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聞矣又曰戴德傳與正文合朱子儀禮别出之張氏曰仁山編目前編據朱子所定繫夏禹元年正月下而别為之註與傳顛異同今並錄之得失互形自見　按竹書記年夏后氏帝禹元年正月頒[illegible]小正即是書舊傳或云子夏作謬也
夏小正　一

《夏小正》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春秋战国时还流行于官府诸子之中，可惜今已亡佚，只有《甘誓》篇被认定为夏代留存下来的文献。我们可以从后世典籍中，间接了解一些夏代文献的名称，如《孟子·梁惠王下》提到《夏谚》。《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记：夏禹时作乐《箫韶》，启时作《甘誓》，太康时作《五子之歌》，仲康时作《胤征》等。

(4) 夏代已总结出天文历法和农业知识。上古时期，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12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还懂得了19年置7个闰月。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不同于殷历和周历。《夏小正》虽是周代流行的一本古农书，但其中也包含着夏代在农牧业生产中积累的一些天象和物候资料。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1]。我们至今所使用的农历，基本上是夏历。

(5) 有关夏末地震和陨石的文字记录。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末年有文献记录的旁证。

(6) 夏末有太史和典籍等有文献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夏王朝不但有图法，即图书法令，而且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收藏、保管这些图书典籍的官员——太史令，终古捧出政府要典，对昏聩的夏桀哭谏，桀王执迷不悟，更加残暴淫乱。于是太史令终古投奔商王。《吕氏春秋》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市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

千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不会毫无根据。

在《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穆天子传》、《礼记》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夏王朝的资料，例如《周礼注疏·冬官考工记·匠人》中有关于夏代宗庙建筑的记载："夏后氏世堂，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房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堂者，宗庙也。"据此可知后人对夏王朝有宗庙及其建筑结构和规模的推断。

《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著《史通》时，也把这段史料作为夏王朝有书有史的论据。

于省吾经过对甲骨文的详细考释，曾得出结论："甲骨文祀典中的庙号，二示以前均无可考，而自二示和二示以后的先王和先妣的庙号则尚为完备，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缘故。"[1] 于省吾把我国从原始的简单文字记事进入到成文记事，即书籍产生的年代进一步加以明确："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2] 上述文献均为夏代已有图书文献的旁证。上节所提到的，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甲骨文献，说明在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文献的存在。根据文字发展的延续性，我们可以推论，夏代有文献的存在是合理的。另外，殷商时期数以万计的甲骨以及成规模有系统发展成熟的甲骨文本身就可以说明，商代文献已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形成如此规模，所以又可成为夏代有文献的旁证。再考虑到夏朝已有国家，已有宗庙建筑——藏书处所，已有了早期学校教育——编辑使用图书的需求，我们说夏代末年是我国原始文献产生的萌芽阶段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这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1】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2】同上。

第二章 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前771年）

从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建立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周文明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上古文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原始的编辑出版活动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汉字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出现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玉石刻辞等原始的图书典籍。也有可能出现竹木文书。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发现，编辑的某些规则已经被运用于其间。甲骨文格式的固定与习刻的发现也是原始编辑活动存在的有力物证。史官是这一时期编辑活动的主体，他们掌握着文字，并且通过文字与上帝鬼神沟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和政治权利。这一时期的文字载体有甲骨、玉石、青铜器等等。原始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具有某些较为明显的特点，并对后世的编辑出版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商朝和西周的概况

一、商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后人把它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自天乙（汤）至帝辛（纣），

共传17世31王，前后共555年。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它为以后我国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朝最初建都亳（今山东省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才将国都确定下来。因此商也被称为殷。商朝势力最大的时候，东到大海，西达陕西西部，东北到辽宁，南到长江流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商国家权力掌握于商王之手。王位世代相传，采用兄终弟及制，无弟然后传子，晚商时期完全确立起父死子继制。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材料证实，商王对国家大事的决策，事先都必须向鬼神占问。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田有比较整齐的规划，作物种类有黍、粟、稻、麦，发明了中耕；有蚕桑经营，纺织业有所发展；可以使用多种谷类酿造酒。商代除有六畜外，还驯养了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畜牧业相当发达。

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工艺水平较高，特别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商朝人已经发明了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绮和刺绣，丝织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由于交换的发达，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国家。由于商王朝商业的发达，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很多。

商代的甲骨文证明，商代的文字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

字方法，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现在所知的甲骨文单字已经超过5 000字，其中有1 500多字可以解读。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商代的天文历法比夏代进步，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并用年终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火星、彗星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证明商人已经有了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商代的音乐成就很大，出现了专习音乐、舞蹈的乐人，乐器的制作水平也大大提高；雕塑艺术在商代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许多青铜器上面装饰有绚丽的花纹。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商代文明在古代世界有特殊的地位：商朝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商朝的青铜器制造和青铜器艺术具有独特的风格，铸造技术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商朝的文字在当时世界是先进的，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空间最广的一种文字；在天文历法方面，商代居当时世界前列。

二、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定都镐京。周朝共有37代天子，历791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秦国灭掉。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周朝为西周，此后为东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共历275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西周文明对中国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人们通常将西周与商代的文明并称“商周文明”。

西周鼎盛时期，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燕、辽东，东边到达大海，西边直抵甘、青。其地域范围超过了商

朝，成为空前广大的奴隶制国家。

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

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统治制度的核心。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把爵位、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诸侯时，要举行封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要定期朝见周天子，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天子作战，有保卫王室的义务。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这就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的贵族等级制。

为了维系封建制度，西周还形成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规定从天子到士各级贵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并建立以全国最高宗主——周天子为核心的层层藩屏。

此外，周公还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自觉维护周王朝的统治。

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制度相配合的有“井田制”。“井田制”是周朝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西周，全国土地均属周王室所有。天子将王畿外的土地分给诸侯作封国，诸侯又分地给卿大夫作采邑，士则从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级贵族对于自己的土地，只自留一部分，称公田，其余则交给庶民耕种，称私田。庶民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后才能回私田劳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地租制度。

西周时期的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技术在这一时期大幅度提高。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田间管理水平也达到了新水平。农作物品种增加，包括黍、稷、粟、麦、粱、稻、菽、桑、瓜、果等。

西周的手工业，有属于封建领主的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

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西周青铜器的类别和数量比商代更多。陶器已向瓷器过渡。漆器制作逐渐普遍，颜色鲜艳，花纹精美。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

西周时，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垄断，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商贸的品种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异等。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

西周的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迟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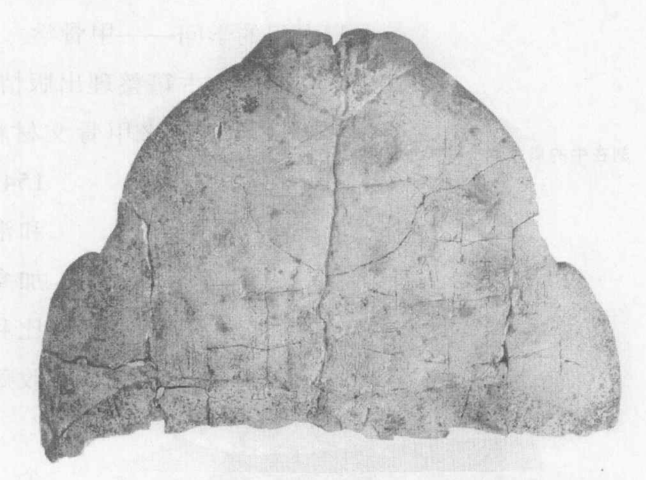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西周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五行观念是我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此外，《周易》关于阴阳转化和八卦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周易》本来是关于占卜的记录，但它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含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因素。这些萌芽的科学思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和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 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周代“学在官府”，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贵族子弟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当然是假托，但在西周时期开始萌芽了这一算法，则是可能的。

第二节　商周时期的原始图书典籍

商周时期，人们开始在甲骨、青铜、玉石乃至竹木上书写文字，记载知识，从而形成了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玉石刻辞、竹木简牍等文献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文献形式只能算是一种文书档案，还不是正式的图书典籍。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些文书档案的内容、形式和传播目的来看，它们已经具备了正式图书的某些性质，后世的图书典籍就是在这些文书档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原始图书典籍。



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一、甲骨文书

(一) 殷墟甲骨与西周甲骨

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甲骨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字载体。甲骨文按其产生的时代可分为两大类：殷商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

殷商甲骨发现于殷都废墟（今河南安阳小屯），故也称殷墟

甲骨。其内容主要是殷王朝的占卜记录，故又称殷墟卜辞、甲骨刻辞、殷墟书契等。目前所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大多为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之间（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遗物。

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王懿荣发现的。他是我国第一个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人。此后，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陆续收藏并开始进行研究。在安阳地区对甲骨文组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先后获得数万片甲骨。1949年后，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自甲骨文被发现后，众多的学者通过对甲骨的搜集、缀合，围绕甲骨文的著录、考释、分期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此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根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4年第129期发表的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国内外现总共藏甲骨154 604片，分别藏于中国内地、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韩国也有收藏。

刻在牛的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约有5 000多个，已经识别的有1 700多字，约占总数的1/3。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基本词汇、基本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假借也都很清楚。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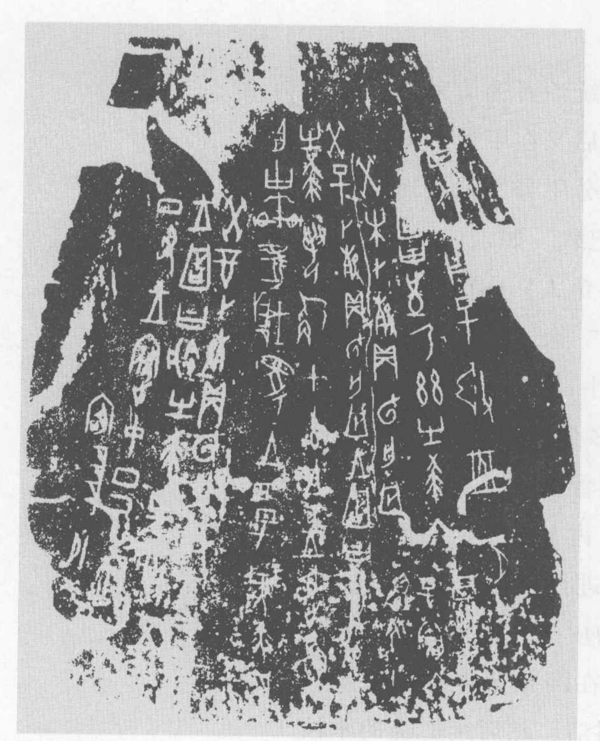
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殷商甲骨文是商朝的文化产物。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凡行事以前往往会使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大部分甲骨文就是当时的卜辞记录。关于龟卜之事，先秦典籍已有记载。如《诗·大雅·绵》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周礼·春官·龟人》亦称："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除了卜辞之外，甲骨文还有记事的刻辞。记事刻辞，有的与卜辞有关，有的没有关系。如记载战争中俘虏数字、田猎收获多少、封赏和祭祀情况，就同占卜无关。单独的记事刻辞多刻在兽骨上。

占卜在商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占卜有一定的程式。卜前先要做好各种准备，要对龟甲、兽骨进行整治。整治的方法是：刮去龟的腹肠成为壳，或刮去骨上的皮肉只存肩胛骨，然后在甲骨反面有规律地钻成一个个圆孔，在圆孔旁再凿成梭形凹槽。占卜时，将所要问的事项先向神灵讲清，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在圆孔中央或凹槽旁边灼烫。甲骨一受热烤，就会在正面出现各种不同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就是卜兆。卜人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横斜来判断吉凶。占卜以后把占卜的时间、卜人名字、问卜的事情，以及占卜的结果、占卜的应验等刻在卜兆的附近，叫做卜辞。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大约由四个部分构成：1. 叙辞。或称序辞、述辞、前辞，记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2. 命辞。记要卜问之事；3. 占辞。记占卜结果；4. 验辞。占卜之后记下应验的事实。但多数卜辞常有省略。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朱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部分甲骨中间钻孔，串联成册，有次序地保管收藏，这就是所谓的"龟策"。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书按照内容将甲骨文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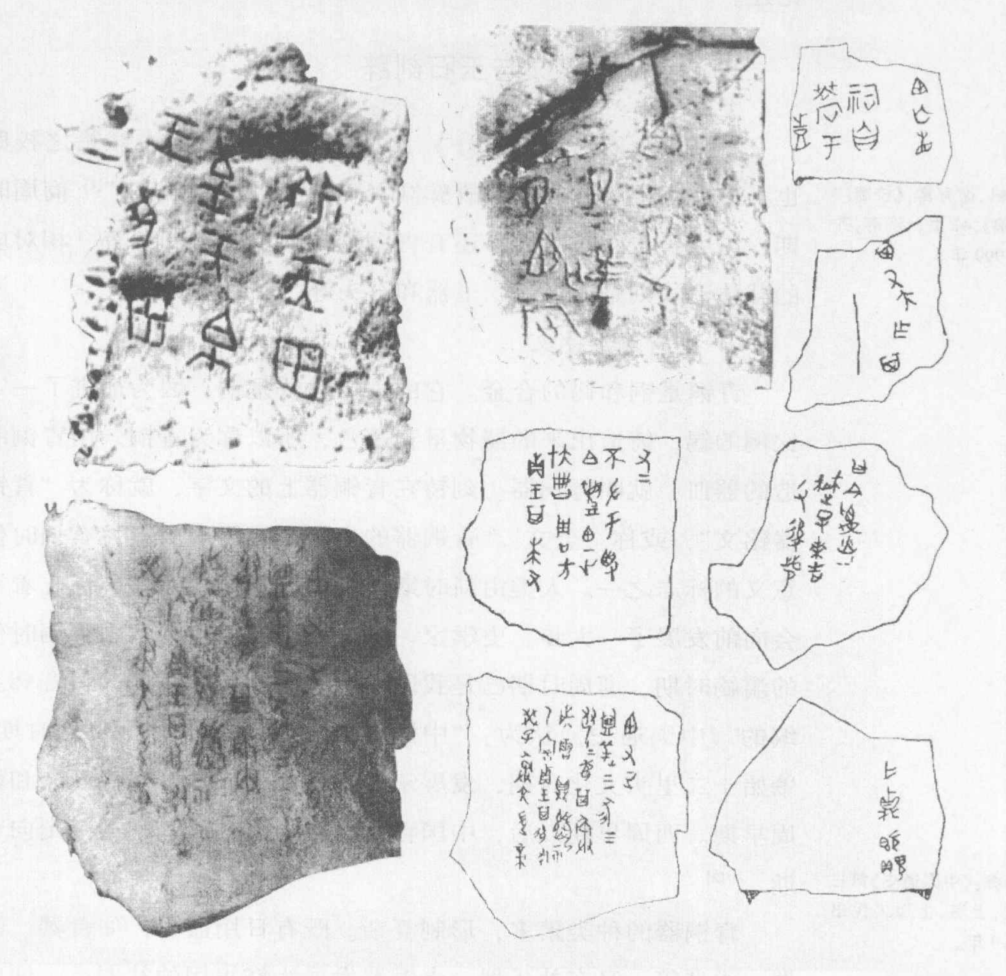


甲骨文拓片

四大类，即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其他。四大类下再细分为22小类：1. 奴隶和平民；2. 奴隶主贵族；3. 官吏；4. 军队、刑法、监狱；5. 战争；6. 方域；7. 贡纳；8. 农业；9. 渔猎、畜牧；10. 手工业；11. 商业、交通；12. 天文、历法；13. 气象；14. 建筑；15. 疾病；16. 生育；17. 鬼神崇拜；18. 祭祀；19. 吉凶梦幻；20. 卜法；21. 文字；22. 其他。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阔。所以甲骨文是研究殷商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

商代以后，西周继续保持用甲骨占卜的习俗。在周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占卜的记载。1954年，在山西省洪赵县（今洪洞县）坊堆村第一次发现两块西周甲骨实物，其中一块上刻有八个字。此后，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河南洛阳等地均有零星发现。其中以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为最多，一次出土17 000多片。其中带字甲骨289片，共计903字，另有合文12个。后来在周原地区的扶风齐家遗址又发现6片，共102字。据《科技日报》2004年5月27日报道，考古工作者于2004年3月至5月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附近发现西周时期的甲骨700余片，其中有刻辞者82片。经初步清理，已发现可辨识文字350字，其中属首次发现的“周公”字样出现了5次，最多的一块卜甲上发现36字。

从1977年陕西岐山发现的甲骨来看，文字一般都很小而且字迹纤细，具有颇高的微雕技巧；从甲骨钻凿形态看，西周甲骨多施以方凿，排列整齐而且密集。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西周甲骨的特征。西周甲骨的不断发现，正如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一样，对西周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原西周甲骨文

商周时期的甲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书档案，不同于后世的图书。但是从其记载的内容和装订的形式来看，它们已经具备了正式图书的部分要素。这表现在：(1) 有被传播的知识信息；(2) 有用来记录知识的信息符号；(3) 有记载文字、图像信号的物质载体；(4) 甲骨文的“书写”有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原始图书典籍。在对甲骨的整治、书写、收藏和验证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编辑要素，可以将其看成是正式图书出现之前的文书档案编辑工作，所以我们称之为原始的编辑活动。关于这一点，将会在下文中详细

论述。

二、青铜器铭文与玉石刻辞

罗振玉《愙斋集古录序》云："金石文字者，古载籍之权舆也。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器文字，三代之载籍也。"[1] 商周时期，与甲骨文同时的文字还有青铜器铭文和玉石刻辞等，相对应的载体形式则是青铜器、玉器和石头等。

【1】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41 页，济南，齐鲁书社，1999 年。

（一）青铜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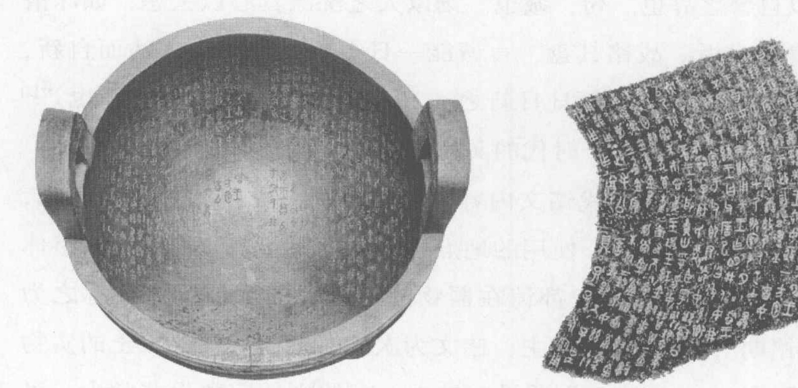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称为"青铜器铭文"，或称"金文"。青铜器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之一。人类由新时期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标志着社会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史学家一般认为夏商之际为我国青铜时代的滥觞时期，商周时期已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中国青铜时代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肇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发展于商代前期，成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以后，中国青铜时代似乎又从盛期逐渐走向衰期。"[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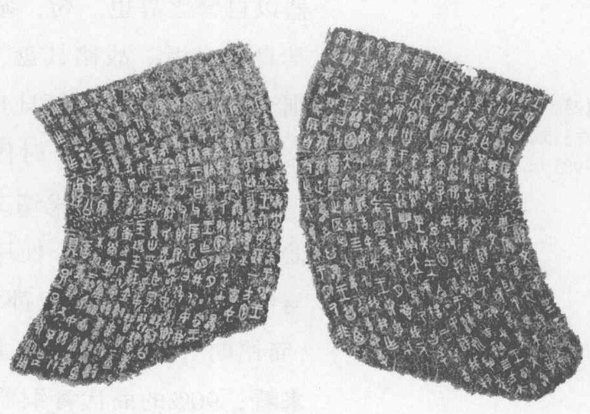
【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6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形制复杂。既有日用器物，如食器、酒器、水器等，又有礼乐器。青铜器发展为祭祀用的礼器后，便成了建邦立国的"重器"，是权威的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标志。由于青铜器受到如此的重视，所以一般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留念的，便铸一件器物，将文件或事情记载在上面，让后世子孙永久保存。铸造在上面的文字便成为铭文。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发现和著录的铭文数以万计，从商朝一直到汉朝都有发现，其中不少是长篇铭文。商朝晚期的金文，铭文大多简短，最长的不超过50字，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西周早期的金文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用来记载重大的

历史事件，例如周康王时期的小盂鼎，有400多字。现存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共497字。可以释读的商周时期的金文约有1 800多字，不可释读的约1 200字。铭文一般都是范铸于青铜器上面的，晚期也有刻画在上面的。铭文字体大小一般为2厘米见方，也有大一点的，还有椭圆形的。铭文的书款字体还保留了商朝后期笔画首尾常作尖细状而中间部分用粗笔波磔体的特点。铭文的排列大都自右而左、自上而下。





毛公鼎铭文及其拓片

青铜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周王室和各个诸侯国的记事文书，比甲骨文要丰富，涉及社会的许多方面。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祭祀典礼：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铸器并作记载于器物上。

(2) 征伐纪功：战争之后的纪功留念。这类内容的铭文以西周时为多。

(3) 赏赐锡命：这类铭文较多。统治者对功臣、贵族、亲属等进行封赏，受封人作器以纪念，并将受封之事和被封赐之物的名称记载于器物上。

(4) 书约文件：有关法律条文、誓约、文辞或合同、券书、协定等类文件，刻器以作证。

(5) 训诰：统治阶级把其对臣民的训诰记载于器物之上。

(6) 颂扬祖先：作器记载祖先的圣事、美德，以为后世子孙

的荣耀。

从使用的程度看，使用的范围比甲骨文要开放一些，特别是一些刑律、制度、诏令方面的内容，传播范围较广。有些铜器铭文起教化、训诫的作用，正如钱穆所说："古代的彝器，多作宗庙祭祀之用，又多加上铭文，大半是既可作历史纪念而同时又寓有人生大义的格言和训词。"[1] 如《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注曰："盘，沐浴之盘也。铭，铭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涤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2] 这些铭文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反映。

【1】钱穆:《中国文化历史导论》,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总体而言，商代铭文内容比较简单，主要包括器主的族氏，器物的名称和用途、使用的地点等等，图案纹饰装饰性强，字体与甲骨文相似，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的部位，有人称之为"简铭期"，是以器物为主、铭文为次的时期。从发掘出土的实物来看，90%的商代青铜器没有铭文，有铭文的字数也非常少，可见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重在实用而非主要的文字载体，正如郭沫若在《古代铭刻汇考·周代彝铭进化观》一文中所说：殷商"铸器之意，本在服用。"[3] 但是也有例外，如上海博物馆藏的清宫旧藏传世的商末帝乙、帝辛时的"小臣缶方鼎"内面有铭文4行计22字，记录了商代小臣缶受商王赏赐的史实，是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3】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10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较长，具有记事的作用了，所谓"因文而作器，借器以传文"。周初的不少铭文记载了战争，著名的有《大盂鼎》、《令簋》等，中期的铭文代表有《墙盘》、《大克鼎》，晚期铭文的代表是属于"西周四宝"中的三件：《散氏盘》、《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另一个是中期的《大克鼎》)。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器是西周政治权力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着爵位的上下和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例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列鼎制度。"鼎"是国之重器，是王权的代名

大盂鼎铭文拓片

词。到现在还在使用的词汇比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定鼎”、“三足鼎立”等等都是青铜时代留下的文化痕迹。

与甲骨文相比，青铜器铭文的篇幅大为增加，记事内容更为丰富，用途也更为广泛，部分铭文已是有意识地要人阅读，因而传播范围更为广泛。所以说，青铜器铭文所起的书籍作用更加明显。程千帆、徐有富就说：

> 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

如果用这种标准衡量青铜器铭文，其中一部分记载财产、疆界等，显然是档案资料，而另一部分已经具备了书的形制。[1]

[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4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

从这个意义上讲，青铜器铭文更应该被称为原始的图书典籍了。

(二) 玉石刻辞

金石并称。我国将石头作为文字载体的历史也是非常早的。玉石刻辞在商周时期也有发现。《墨子·明鬼篇》中就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石头易得，又不会"腐蠹"，可以长久保存，所以在石头上刻字也很

石鼓原物及其拓片





流行。《管子》说，春秋时期，管仲曾经在泰山见到过70多种封禅石刻。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春秋时期的石鼓文，唐朝出土于陕西凤翔县。石鼓呈圆柱形，故曰“碣”，内容是有关秦王田猎的诗句，所以叫做“猎碣”。石鼓文共700余字，后因自然与人为的损害，剥蚀严重，字迹漫漶，其中一石鼓文字已经荡然无存。石鼓上目前仅存300余字。石鼓文中的一首田猎诗歌，起首是：“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驹。”不少学者据此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代（前827—前782年）之物。此外还有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玉石刻辞。由此可以推断，在商周时期，亦当有一定的玉石刻辞。依内容和传播目的来看，也可将其称为原始的图书典籍。

三、竹木简牍的出现及影响

（一）简牍的产生年代

在商周时期，除了甲骨、青铜器、玉石等文字载体之外，还可能有竹木简牍。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竹木简牍是战国时代的实物，但是我们推测与殷墟甲骨同时甚至更早的夏代也有竹木简牍，只不过早已朽烂难以见到罢了。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里提出一个观点：“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他还说：“简牍之用，始于何时，迄于何代，则无界限可言。”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据的：

首先，甲骨文以及金文中即有作为当时书籍的“册”字，象征着一捆竹简。它有时加一个“示”旁，便有用作祭祀之意。甲骨文中有“工典”一辞，指的是贡献典册于神主之前，而举行祭祀。何谓册？《说文解字·册部》谓：“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复云：“古文册从竹。”何谓典？《说文解字·丌部》云：“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典为大册，而册与策通。典、册都从“竹”，说明在甲骨文的使用年代，竹简同样

通行于世。甲骨文里与竹有关的字很多，例如“西”就像一张竹席，本意就是竹席；“宿”字是一个人在“西”旁边，是休息的意思。在《尚书》中明确提出殷先人时即有册有典。

《诗经·小雅·出车》载：“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这篇诗写于周宣王时期（前827—前782年），说明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简书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另一旁证就是此时已出现最早的教科书——《史籀篇》。经考证周宣王的史官名留，之所以把留改为籀，即在人名上加上“竹”和“手”，就是着重说明史官之职是写字于竹简。史籀还被认为是大篆的创造者，他编写了一本蒙童课本用于教育。课文用龟册、玉册刻写显然不合适，故以价廉易得、便于书写的竹木简册流传。时代比孔子略晚的墨子在其著作《尚贤》、《明鬼》等篇中多次提到“书之竹帛”，其前文强调的是“古者圣王，即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简册的使用已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所以他认定是三代圣王使用的古已有之之物；二是说明简策也用于记录古代帝王的训诰、祝祷和法律。所以后世策封还用金玉之册。写在简上的法律文书亦称“范”。简的另一个用途是将文字写刻于简上再一分为二，以作为某种凭证，称作“符”，到春秋战国时改用别的材料甚至精制成虎形，其名称还没有改变，称“虎符”。

武王克商后，为打消商朝旧臣的不满与怨恨，援引史实以作前例，《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就是说，当初商朝推翻夏朝的时候，就有史官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在“册”与“典”上面，而不是记录在甲骨版片上面。显然，不仅在周代，殷初夏末的史官们似乎已经用简牍来记录史实了。

《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能言夏礼、殷礼，是因为有遗留下来的文献，杞、宋不足征，是由于文献不足，可见孔子见到过夏朝与商朝的史料。

《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以知道夏、商的礼，并断言百世之后，周礼同样会为后世"可知"，是因为有文献典籍的缘故。所传典籍很有可能是以简牍的形式流传的，因为孔子从来没有提起过甲骨文，他所得到的信息最可能是从简牍而来。如果夏代、商代只用甲骨而不用简牍，那么流传下来的史料应该是记录在甲骨上，周代的史书对此一定会有记载，孔子也应该会注意到的。孔子没有提及甲骨，是因为他没有见到过，或是他见到的史料里也没有记载的缘故。

其次，有关竹简保存方法的记载，直到汉代才见于典籍。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可见，杀青是简牍防腐的主要技术手段，到了汉代才逐步完善。由此可以想见，汉代以前的简牍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大部分都没有传诸后世。2002年6月，湘西里耶出土了2万多枚秦代竹简和10多枚战国时期楚国的竹简。战国竹简已经无一完整（可能是因为此时保存竹简的技术尚没有出现），而秦简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是，秦简的完整不是由于当时防腐技术的先进，而是偶然因素造成的。里耶秦简当时并未采取任何特殊的防腐技术，之所以保存2 000多年不腐烂，主要是因为一号井内填满淤泥，深埋地底，隔离空气效果好，外界的有机物和细菌不能侵入。这些淤泥将简牍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还原环境，而不是氧化环境，因而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有关人士推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了焚书坑儒，这些木牍与竹简就是被抛进一号井焚烧的，由于井中缺氧火未燃起，就被掩埋了。也有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边远地区没有完全响应"号召"，里耶就是其中之一。尔后，当听到京官来"督查"时，怕背上违背朝纲的罪名，慌乱中，把秦统一后的"新书"也丢进去了，悄悄地盖着井盖焚烧，却没烧着，因为所发掘的文物相当凌乱，呈

下抛形状，那些兵器也是未上缴铸铜钱的“失散物”。

即使在现代，竹简的保存也并非易事。据媒体报道，对已经出土的里耶简牍来说，清洗只是最初的步骤，清洗工作之后还必须使用药水进行浸泡，防止简牍霉变和遭受虫蛀，现在简牍都是浸泡在蒸馏水中，几乎成黑色。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裴安平介绍说，脱色就是要使它的颜色还原，要把氧化的外表的外层膜还原成原来的状况，而要长久地保存这些简牍，最重要的还是对简牍进行脱水。目前，竹木简脱水是世界性的高科技难题，因为木简中的水分会随着时间温度的变化蒸发跑掉，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胞皮。为了防止它变化，不让它变成这种状况，我们就要用其他的化学物质，蒸发了多少水分，就用化学物质填充多少进去。据专家介绍，当时的木牍与竹简保存的方法是放置于枯井里。

第三，从文字产生过程看，竹木在文字产生以前就一直是负载信息的载体，文字发明以后，人们没有理由舍弃竹木不去使用，却去使用难得、昂贵的龟甲、兽骨。根据《尚书·商书》的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次迁徙的地址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大体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今天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部、北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这一范围。盘庚（商朝第20王）迁殷后国势强大，到武丁（商朝第23王）以前，其疆域已经北到易水，南达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脉，东到大海。据专家测算，商朝时，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今天高出大约2度，冬季则高出3到5度，相当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从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大象等喜暖动物的遗骸来看，这种气候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当时河南的淇水流域和陕西的渭水流域都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今天河南博爱一带仍然以产竹著名。可以说，商朝的疆域内竹子茂盛，商朝人使用竹子作为文字载体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龟甲主要是从南方进贡过来的，数量不能够保证。

第四，按照简易性原则，甲骨的制作明显比简牍要烦琐得

多，并且甲骨数量有限，而竹木几乎唾手可得，人们没有理由舍易求难。

第五，从记录内容来看。李学勤说："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这点是很重要的，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唯一文体，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今天仍然如此。"[1] 甲骨文记录的大多是占卜的内容，表现了商朝统治者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与依赖。龟甲是进贡而来的珍品，竹木则随处可得，所以史官就会把他们认为重要的卜辞记录在珍贵的甲骨上，而其他人则只有把其他内容的材料记录在普通的简牍上。也就是说，简牍与甲骨在文字记录方面的分工是不同的，甲骨是官用的材料，简牍则是平民使用的材料。所以，甲骨的保护就受到极大的重视，并且形成了特定的制度，而简牍的保存就不那么被注意了。

【1】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167 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年。

考古发现的一些甲骨镶嵌有宝石或其他装饰品，说明甲骨并非是完全符合实用目的的，它有一定的象征性，可能是当时地位与权势的象征。甲骨文记录内容的狭窄，说明其使用范围的有限。而迄今出土简牍的记录内容则丰富多彩，文体与甲骨文截然不同。

另外，虽然商民族打败了夏民族，但是商朝的文明程度不一定就高于夏朝，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环境。历史上，文明落后者打败文化发达者的例子实在不少。所以，夏朝可能就使用简牍了，但是接替它的商朝却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习惯与文明，在贵族阶层拒绝使用外来的东西而坚持使用甲骨。

我们不能因为至今没有夏商时代的简牍发现，就认定竹木之用晚于甲骨、金石。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竹木使用之早。文字产生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契刻，即人们把需要记忆的数字、信息用刀刻在木棍和木片上。文字发明后，人们自然也会利用满山遍野、随手可得的竹片、木板做书写材料。

(二) 简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竹木简牍流行的时间长达数千年，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

籍制度，因此其影响也极为深刻和长远。与甲骨、金石相比，竹木的优点十分明显：一是取材容易，满山遍野，价廉易得；二是整治刮削工艺简单，方便书写修改；三是可连缀成册，使容量加大，可以书写长篇宏论，既便于文化普及又利于学术发展，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

直到今天，图书的计量单位仍称"册"，文章的计量单位仍称"篇"，许多从竹从片从木的字都与书籍有关，如籍、簿、笔、符、笺、笈、籀、版、牒、牍、本、札、检、楬、檄、椠。还有不少词汇和成语也反映了竹木简牍的深远影响，如尺牍、三尺法、版图、检署、杀青、汗青及罄竹难书、入木三分、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连篇累牍、断简残篇、韦编三绝、怀铅提椠等。在从古至今的出版印刷史上，由"版"和"本"组成的词汇更是举不胜举。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书籍都是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行文格式就是来源于简策。备用的简放在左侧，左手拿来，右手书写，写好的简顺手推向右侧，因而形成从右到左的编纂顺序，相沿成习。发展到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以后，还要在纸上打出宽窄与竹简差不多的行格。另外，像"赘简"之制与今天的衬页和环衬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与竹简相关的是笔墨的出现。《庄子·田子方》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可见这个时候笔墨已很常见，成为日用品，在此前的商代应该有笔墨出现了。"最初的笔，虽不知其制造方法，但墨笔早在春秋以前就有。《管子·霸形》：'于是令百宦有司，削方墨笔。'《韩诗外传》也有'墨笔操牍'的说法。晋荀勖整理汲冢书竹简，在《穆天子传序》中说：'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可见先秦简牍已用笔墨。"[1] 其实，已经发现的甲骨文，有不少就是用墨书写的。代表笔字的"聿"，已经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

【1】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三节　原始编辑活动的出现

传播媒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必需工具。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对社会信息的交流与分享，而这种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符号、通过有形的形式得以实现。编辑活动正是对符号的组织、建构，对无形精神文明的“有形化”活动。编辑活动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编辑”的原始意义是收集简册并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编连成书。编辑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在古代常常是著作方式的一种，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等原始的图书典籍。在这些原始图书典籍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凝结了人们的编辑活动。只不过这种活动还不是后世正式的编辑活动，而是一种编辑活动的原始形态，所以我们称之为原始的编辑活动。编辑与出版活动紧密相连，有了原始的编辑活动，就有了原始的出版活动。

一、原始编辑活动出现于商周时期

以下几方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编辑活动：

（一）大多数甲骨文是先写后刻的，刻写的过程其实就是编辑排版的过程。

虽然我们现在发现的绝大多数甲骨文都是契刻而成的，但在有些龟甲的内面，却发现了以笔蘸朱砂或墨写成的文字。根据钱存训先生的统计，这样的例子至少有20个。1929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殷墟发掘出三片兽骨，上面有未契刻完毕的书写文字。这个发现说明，甲骨文极有可能是先以笔墨书写、“排版”并核对无误后，才加以契刻的。此外经过学者的考证，毛笔的应用是在商周时代以前。“商代的卜辞，看得出是先用毛笔写好，再刻在甲骨上的。有几片公元前1400—1200年间的牛骨上，更有以毛笔和墨

汁书写而未契刻的文字”[1]。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表示“笔”的象形字很清楚地显示在右手握着一管饱蘸墨汁或笔毛分散的笔。用毛笔事先在即将契刻的甲骨上书写、排版，是编辑组织活动的具体体现，在本质上与今天的编辑活动并无区别。

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使用显微摄影方法对甲骨文刻痕进行了研究，根据笔画的交叉与重叠确定其书写顺序，结果发现甲骨文在契刻过程中屡屡“违反”文字结构，甚至连贞人的名字都缺乏惯用笔顺，从而认定主持宗教仪式的贞人自己并不契刻卜辞，而是由专门人员按照底本在甲骨版片上重新排版、书写然后契刻的。甲骨文写作（著述）与契刻的分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编辑活动的存在。

（二）甲骨文已经有了基本的编排原则。

王振铎、王刘纯经过分析、考证后认为：“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和契刻，已经十分注意版面的编排，其编排的基本规则是对称交流，既可上下对，也可左右对，还可内外对，又可交叉对。……这种对称的编码规则是同殷商人阴阳相对、相反相成的思想观念和二进位的数理逻辑思维方式分不开的。……甲骨文版面的审美性与其编辑思维的科学性是一致的。……中国的编辑出版史应该从甲骨文化时代开始讲起。”[2]

（三）“习刻”的发现也证明了编辑活动的存在。“习刻”指的是在编辑过程中，因刻写错误而遗弃的甲骨，或是原始编辑练习契刻、排版的遗物。曾经有不少的习刻被发现。另外还发现了一片刻有两个干支表的甲骨，上面的干支表刻写得干净漂亮，下面的则歪歪扭扭，显然是师傅在教徒弟甲骨的刻画技法。

（四）甲骨文的内容丰富，并不局限于卜辞。

甲骨文大致分为两类：贞卜文和记事文，贞卜文占多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的甲骨文。况且，卜辞本身也是需要编辑的。卜辞以外的甲骨类型多种多样，前面已经谈及的有历书、地图、家谱等等。这里谈谈甲骨文中具有文学性的几段文字。

【1】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112 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年。

【2】王振铎、王刘纯：《由甲骨版本探编辑出版之源》，《编辑之友》2001 年第 3 期。

汉朝诗歌《江南可采莲》这样写道：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甲骨文中同样有如此优美动人的篇章：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由此可见，甲骨文已经颇注重语句的表达，即书写内容的形式美，一些文字已经颇具文学意味，突破了单一的实用目的。

通过编辑的组织活动，甲骨文这一原始的图书典籍在形式上也趋于稳定。甲骨文内容的相对狭窄说明了编辑选择活动的存在，因为当时的龟甲主要是各小国从南方进贡而来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统统加以记录。这种选择亦与当时人们对鬼神的敬畏、对人鬼交通的重视有关。

二、商周时期原始编辑活动的程序

尽管目前见不到商周时期的竹木简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近百年来发现的甲骨文史料，来分析在商代便已产生的原始编辑活动。探讨最原始的编辑出版工作，可从它是怎样生产制作的，原始的文献编辑出版活动包括哪些内容，是如何进行的等方面入手。

（一）材料加工

殷墟出土的龟甲经动物学家鉴定，不是人工饲养的乌龟，而是产于我国江湖中的胶龟和陆地龟，还有产于我国近海中与马来半岛海龟同种的海龟。也就是说，大龟甲是专门进贡给商王作占

卜用的，在刻辞中“氐（致）龟”就是进贡龟甲的记载。我国自古就传说龟“通神灵”，能活“千年”，称之为“神龟”、“灵龟”。商王朝统治者最为迷信，所以大量使用龟甲做占卜材料。

占卜的龟甲和兽骨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呢？据《周礼·龟人》、《史记·龟策列传》等文献，结合龟甲实物可知：首先要将龟的头、脚、内脏剔除，然后将甲壳从背甲和腹甲联合处（称甲桥）锯开，使平整部分留在腹甲上，将凸出部分锉平，最后刮去表面的鳞片和胶质。背甲是拱形的，表面又凸凹不平，作占卜用必须从中锯开，并将中脊凸起部分锯去，在甲片的中部钻一孔。整治后的背甲形状像鞋底。

用牛的肩胛骨占卜，首先将皮肉剥去剔除洗清，然后将骨的顶端从反面锯去一部分，最后还要将反面凸出的骨脊刮平，使整个骨面平整以便于使用存放。

甲骨经过一番砍、削、锯、锉、磨等整治后，就可以在反面进行凿钻。首先用青铜凿子凿出一个个长约一厘米左右、口宽底窄梭形的斜槽。在紧靠槽边处再钻出一个个比槽稍小的圆穴。凿钻都不能穿透骨面，只作到距骨面最薄处。排列整齐而有规律，数目根据甲骨大小和需要来定。目前出土的最大的一块龟腹甲，长43厘米、宽35厘米，有凿钻加工的200多个槽穴。

经过凿钻的甲骨由掌握占卜的史官贞人保存，需要占卜时取出，用火炷烧灼钻穴，根据卜兆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横斜来判断凶吉。占卜以后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名字、卜问的事情及占卜的结果、占卜的应验与否等刻到卜兆旁边。多数甲骨文字是用刀刻成的，有些卜字则用锥状工具划成。有的史官在刻写细小文字时，先在甲骨上涂色，以便字画的观察与掌握，刻后擦拭。有的字画内填入颜色，十分醒目。有的甲骨文甚至镶嵌绿松石作为艺术装饰，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豪华精装本。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中，还发现不少甲骨文是用朱笔书写的。在此之前的1932年第7次发掘中，曾出土一片字陶，上有一墨书“祀”字，锋芒毕露，证明殷代已有毛笔。这从甲骨文中有“聿”字或以聿

为偏旁的字也可以得到证明。

（二）编次成册

卜辞如果一块甲骨容纳不下，可以刻在若干块甲骨上，1973年在安阳小屯南地就发现过这种成套甲骨。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在127号坑中，发现有许多背甲被加工成有孔的椭圆片。加工后的鞋底形背甲为什么要在中间钻出一个圆孔呢？有人断定就是用来穿编绳的。发掘出的龟片长短不等，穿上编绳后，从侧面看去，与甲骨文的"册"字十分相似。

至今在甲骨文中收集到的"册"字写法共有58种，基本笔画不外横二竖三、横二竖四、横二竖五。竖有多种，横都是二，说明两编不变，恰与成套甲骨的形式吻合。在127号坑内曾出土一块卜甲，记有"三册、册凡三"字样，表明这套甲骨共9块，分三册编集在一起。董作宾也曾在一梢上有孔的甲骨尾尖，发现"册六"，另一甲尾尖有"编六"二字。这些实物都有力地证明了编辑工作至迟在殷代已经开始。

甲骨卜辞中有册有典，《尚书》中也提到"殷先人有册有典"，有人认为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形式的体制，它们的区别与史官职掌有关系。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典为大册，而册与策通。典可能是同一类册的集合，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总集一类的书籍形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

（三）集中典藏

根据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可以认定甲骨有固定的收藏处所，不仅十分集中而且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收藏，是为王室服务的。尽管在河南郑州、洛阳也曾发现过带字甲骨，但仅一二片，远不能与安阳小屯的殷墟相比。西周甲骨也集中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前期的政治中心周原。其他几处恐为方国贵族使用遗物。

在1928年前安阳小屯村民私掘阶段，常有一坑数筐或数车甲骨的成批发现。到科学发掘后，甲骨的储藏情况就清楚了。以

1936年发掘的殷墟127号坑为例，该坑为圆形，口径1.8米，底径1.4米，坑上口距地面为1.7米，坑底距地面约6米。从坑口以下0.5米到2.1米约1.6米的厚度，储存甲骨17 000多片，显然是殷人有意识存放甲骨的档案库。1973年在小屯南地、1990年9月在小屯北地以及1977年在周原，甲骨都是成坑集中发现的。根据建筑地基和柱下石础等判断，这些坑穴基本都在王室宗庙宫室附近，有些甚至在遗址圈内，属于宗庙的一部分。卜辞中也有“大甲宗卜”、“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大庚宗卜”、“祖乙宗卜”等记载。这些卜辞中的“宗”，即宗庙。大甲、父丁、大庚、祖乙为商王庙号，“大甲宗卜”即在大甲宗庙占卜。这与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周礼·春官·龟人》载：“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史记·龟策列传》：“高庙有龟室。”刘宝楠注《论语·公冶长》云：“凡卜皆在庙，故藏龟亦于庙。”可见商、周王室在宗庙占卜之后，所刻卜辞也藏在宗庙的“龟室”之中。

（四）分类管理

殷商史官对甲骨文的管理是很有条理的，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严格的制度。主要表现在分类方面。

1. 甲骨与其他文献严格分开。虽然殷商除甲骨文外，还有其他类型文献，但除偶然发现一块玉版外，从没有泥陶、竹木简牍、帛书或其他文字载体羼入。

2. 甲骨在地下埋藏可分为四类情况，即储存——有意识地保存甲骨；埋藏——大量甲骨集中一处深埋；散佚——散落遗失的零星甲骨；废弃——一些习刻、仿刻的文字或废卜辞甲骨与陶片、兽骨、人骨、灰烬等混在一起。

3. 储存和埋藏的甲骨中，刻辞的甲骨与备用的甲骨是分开的，龟甲和兽骨不相混杂，而备用的甲骨又区别为原料和成品分开储藏。

4. 刻辞甲骨，除废弃者外，甲与骨分别以时代为序。同一时期的刻辞存放的地区也比较集中。

5. 从刻辞内容看，一类是记事刻辞，占少数，一类是卜辞，占绝大多数。有些刻辞内容较多，需用几块龟甲才能刻完，形成了成套甲骨。成套甲骨是集中储存的。

6. 记事刻辞所用文字都非常简练，最简单的只有一个字，如“雨”。所用材料和部位也比卜骨差一个等级，如甲桥、甲尾、骨臼或骨面下部。

(五) 反复使用

殷周王室专门置史官制作、管理文书，严格制度，分门别类地典藏文籍，目的还是有效地使用这些文籍，并非只藏不用，只不过使用范围限于王室贵族和史官。

1. 反复使用历书。由于一切祭祀、朝觐、会盟、征战等军国大事，均先由史官占卜吉凶，这就需要制定完善历法，经常使用历书。从甲骨文反映出的天文、历法资料来看，商朝的历法是比较先进的，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据卜辞可知，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个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加起来只有354天，所以要采用闰月调和一年的天数。在早期卜辞中叫“十三月”，为“年终置闰”法，在晚期卜辞里，就改进为“年中置闰”法，与现在的农历一样了。

见过甲骨卜辞的人都知道其特点是开头用干支纪日，其实一条完整的卜辞，都记有月份，一般记在卜辞最后，少数将月份记在卜辞当中，纪年月用数字，纪日用干支。

干支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60个单位，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用来纪日，一直使用到近现代。甲骨文中有一完整的干支表，不是卜辞而是备查的“历书”，是史官们占卜时刻辞查日期用的工具书。历书的使用在卜辞中处处可见。

2. 频繁省视验证。殷商的统治者对甲骨的利用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灵，事事都要通过占卜来预测凶吉，不断地祈求祖先们保佑。商王有时与史官一起作判断，事后也经常亲自省视卜辞记录，加以验证，然后在骨臼处刻上省视者、日期及验证结果。一个完整的卜辞包括验辞。商王、周王十分重视应验与否，应验的

卜辞内容正是其治理天下的依据，这就是殷周王室利用甲骨文重视甲骨文的原因。《尚书·盘庚》是商王盘庚动员贵族必须迁殷的文告，其中提到先王迁徙的史实，就是利用了记载先王事迹的甲骨文献。

3. 查阅参考引用。因为史官掌管图书典章及占卜之辞，所以王室诸侯遇有大事，或亲自查阅文书，或询诸史官，史官或当时回答，或经过查阅典籍，引经据典，谏君诫臣。周代史伯是位很有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称得上是有预见的政论和史论。《尚书·金縢》载，周公作册毕，“乃纳册于金縢之匮（柜）中”，周成王发金縢之匮，察周公之册，知周公有盛德。周代已有王室宗庙藏书、太史府藏书与盟府藏书三类。王室宗庙收藏的是《大训》、《河图》等重要文献，供周王专用。太史府藏书依周代的史官制度分类保管，据《周礼》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典，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式、军事事务、法律条文、手工建筑，分类收藏，各自保管，总的由大史掌管，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也按各自职责分工收藏有关的文献资料。盟府藏书则分别由王朝与诸侯两级收藏有关盟约等专门文书档案。若要查阅，则需要开府库。《左传·定公元年》载晋国会集诸侯国代表于狄泉打算增筑成周城墙，当意见不统一时，都以“践土之盟”来作证辩论。负责施工的晋国官员对宋国大夫说：“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当视诸故府。”意为：晋国管此工程者新上任，你可先接受任务，待我回去，到原来的盟府查阅一下有关文件，以便搞清情况再作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经过整理加工、集中保存、以备查考的殷代典册虽然具有书籍的某些功能，但多数还不是正式的图书，因其内容主要是占卜的记录，即档案原件，多数未经复制，也不向公众传播，故只能归为档案编辑活动。殷周时期也有早期的史书和诗书的编辑与编纂活动，参与其事的是一些史官、采诗官、乐官等文化官员，载体材料以竹木简牍为主，但由于商周“学术

统于王室”，著书、编书、藏书以及利用书的权利把持在少数王室诸侯史官等贵族手中，范围极为有限，所以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只能称之为原始的编辑活动。

第四节　早期史官与原始的编辑出版活动

甲骨虽然是殷商时期最为重要的传媒形态，却并非是唯一的。甲骨文中即有作为当时书籍的“册”字，象征着一捆竹简。它有时加一“示”旁，便有用作祭祀之意。甲骨文中有“工典”一辞，指的是贡献典册于神主之前，而举行祭祀。作为象形字之“册”与作为会意字之“策”应不尽相同。“策”指竹简无疑，“册”则可能还包括甲骨册、玉册在内。甲骨也曾以“册”的方式编连。显然，不仅在周代，殷初史官们已经用简牍作为正式公文、祝祷和档案了[1]。除甲骨文外，本节主要谈谈商周时期原始编辑活动的主体——史官。

【1】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60 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年。

我国早期的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甲骨文、金文和早期典籍中，“史”字出现频率相当高。如卜辞中就有“贞，令我史步”、“才南土，告史”、“方祸象取乎御史”、“利令、佳太史察令”等。作为职官，三代之际，史也有人数增多、分工更细的发展过程。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史、太史、内史、贞人、卿史、作册，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究竟“史”为何意？作为职官，其职责包括哪些方面呢？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史”是个象形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解释，清代吴大澂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筴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干说是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就是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

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说：“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

书之人。史职专以藏书，读作书以为事。”[1]章炳麟认为：

> 中，本册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云：“治中，谓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吏计弊狱讼，升中于天府。”《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犹登中，谓献民数政要之籍也。《尧典》“允执厥中”，谓握图籍也。[2]

徐复观认为：“史则将祷告之词，先书之于册，当着鬼神面前念出，念完后，宝藏起来以便传之将来。……由此可以断定，史字之原形……从口，与祝之从口同。……将所写之册，由口告知于神，故右手所执之笔由手直通向口。”[3]“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王国维对“史”的解释在先秦的典籍中不难找到大量旁证。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多处记载了“史”和“太史”的活动，如《金縢》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降，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其他典籍谈到史的还有《礼记·曲礼上》：“史载笔。”《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为书。”《国语·周语上》：“史献书。”《周礼·天官·冢宰》：“史掌官书赞治。”《礼记·月令》：“太史守典奉法。”《国语·楚语上》：“史不失书。”

综上不难看出，史官职掌秉笔、执简、掌书、为书、献书、守典、奉法、决狱、册祝等事务。据《周礼》、《礼记》等书所记：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由此可见，史官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是掌管图书档案之专职人员。他们既要记录帝王言行

[1] 王国维：《观堂集林》，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 章炳麟：《文始》九卷，民国三年浙江图书馆影印本。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135—1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和军国大事，又要从事宗教祭祀占卜活动，还要兼管奉法决狱事务，甚至还要到民间去采风，收集诗歌和音乐，回来后进行整理加工。他们积累掌握了大量文字资料，修史编书的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他们最早参与了图书编辑或编纂活动。《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之土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可见在周朝时，史官有时与典籍一起，被当作封赐物的一种。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在我国早期文献中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7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所以站在史官立场上，斥责统治者迷惑淫乱。这种逃亡大都有携带图书情报弃暗投明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斗争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编纂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户籍等投奔新朝，既反映了人心向背，也加速了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

上古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图书编辑家一是周宣王的史官太史籀，另一位则是东周初年宋国的大夫正考父，是孔子七世祖。《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本《诗经·商颂》仅存《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仍以《那》为首。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对晋大夫籍谈说："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因籍谈的九世祖为晋大夫，掌管晋国的典籍，他的后人便因官而姓籍氏，籍谈虽然继承

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周王室赏赐晋国的史实，受到了周天子的责问。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出处。

第五节　商周时期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特点

一、编辑出版活动以纵向传播为主，与祭祀活动紧密联系

一是人鬼间的传播。古代记载有“商人尚鬼”的话。正如现代人对科技深信不疑，商人确信鬼的存在和威力。他们认为鬼充斥于人们四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墨子·明鬼》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疑脱‘有’字），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殷商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礼记·丧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尊神事鬼、崇信上帝鬼神、迷信巫祝贞卜之术，正是商代社会的特点。在商代，神权巫术与王权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主要表征，而实际是借助“率民以事神”来取得对商民和其他方国的有效统治。《礼记·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可见天子处理朝政时，尽管有十分明确的打算，但是不敢独断专行，要以龟甲占卜来听取神鬼的心意、看法。人们设想鬼神都是识字的，因而在祭祀中以文字代替口头祷告。而祷告所用的字句必须是精心组织、并要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之上的，于是就产生了对编辑出版活动的原始需求。虽然我们认为鬼神并不存在，但考虑到人鬼交通在原始初民心目中及原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视其为“合法”的传播活动。

二是现世与后世间的传播。这同样是出于对文化的敬畏。由

于识字的人不多（多为贵族和巫、觋），所以横向传播极不发达。除了人鬼交通外，对后世的传播就构成了原始传播活动的另一主要分支。《墨子·兼爱》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并未提及甲骨文，可能是他未能亲见实物之故。

二、审美意识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发现，原始人类已经有了对美的追求，有了装饰自己的欲望。在距今两万年左右的水洞沟遗址就发现了一件用鸵鸟蛋壳穿孔刺成的装饰品，四周边缘有磨平的痕迹。而到了商代，"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为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一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头发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只，多的几十只；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1]。从中可以看出：一、此时古人已有了明确的审美意识；二、当时的制骨技术已相当发达，制作甲骨应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将这种审美意识用于文字记录，便使得甲骨和青铜器上的许多文字呈现出对称、整齐的分布格局，使得甲骨文和金文的排列顺序和内容逐渐趋于规范。在内容上，也出现了富于文学意味的文辞。可以说，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甲骨文的作者都已经表现出了鲜明的审美意识。

[1] 张荫麟：《中国史纲》，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三、早期编辑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部分原始编辑活动都属于统治集团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不少巫祝贞人出身的官吏，都已达到首辅大臣的重要职位，如巫咸、巫贤、傅说等。"史"作为人鬼交通的中介者，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其活动明显地带有国家政治的色彩。出于对文化的，其实是对鬼神的敬畏，这一时期，人们给原始编辑者以很高的地位。由于一切重大政治与社会活动对占卜活动的依

赖，编辑活动在当时已成为统治集团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辑者亦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总之，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还非常的原始。虽然原始，但是它为以后出版活动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是出版活动发展和成熟所不可跨越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至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由此进入一个风云动荡的历史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因诸侯争霸、战争频仍称为“战国”时期。这个时代被称为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Age）[1]。这一时期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在出版史上同样是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出版活动也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竹木简牍的广泛使用与王官之学的下移互为表里，为下一阶段出版活动的发展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

【1】这一说法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他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版环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它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精神，属于文化层面的出版活动，更多地受到时代文化背景与社会潮流的影响，并反过来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竹木简牍与人本主义之间，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

这一时期，出版活动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的逐步繁荣。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则源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宗法制度的破产，以及由此引起的天下大变、群雄并起的局面。井田制与宗法制度是维系西周以来静止的、封闭的社会文化

环境的主要政治、经济手段，以土地公有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维护社会的稳定。土地制度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人们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这些都为学术的普及、士阶层的出现，最后到出版的发展做着铺垫。宗法制度的破产更是撕破了社会表面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导致知识的被重视，然后就带来了出版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井田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变以及宗法制度的瓦解

土地制度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的一个最重要的缘由。井田制是商朝与西周时期，按照一定的亩数规整划分耕地的一种土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归国家所有而不能成为私人财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正因为土地国（王）有，所以“田里不鬻”（《礼记·王制》），不得自由买卖和交换。农业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公社成员，而不是奴隶：“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这种土地制度“实际上是为全体贵族所公有的土地国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而是由国家分配的”[1]。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句子，“协”字的甲骨文看起来像三耒并耕，正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真实写照。《诗经》里也多次出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等字句，说明这种集体耕种公田的形式在当时十分普遍。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由于王室力量的削弱、诸侯势力的增强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有贵族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开垦私田，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到商鞅时，更是“废井田，开阡陌”，“任

【1】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1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民所耕，不限多少”，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因为它动摇了殷、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1] 进而在政治、经济、社会风气、思想等领域引起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为学术下移与出版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1] 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1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土地私有制出现的直接后果是宗法制度的解体。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代已经出现了宗法制的萌芽。“宗”为象形字，本意为在房间里祭祀祖先或神灵。“宗法”一词最早见于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一文，是对父系宗族内的宗子法的简称。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权和族权为宗族的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成一个有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而不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制度，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商代前期实行的兄终弟及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到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不严格的嫡庶制度，宗法制度初步形成。周朝实行的则是嫡子继承制与封建制，即宗子有继承一切爵位、财产乃至祭祀祖先的权力，对其他后代则采取分封领地的方式，凭借血缘关系以巩固周朝的统治。“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分封诸侯，即授予爵位、臣民与领地，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方国。分封制在商朝出现，到周初进一步“众建亲戚，以藩屏周”，实行“大封建”，使这一制度完备化。

宗法制的瓦解首先表现为周王室对分封国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诸侯国间也开始不断因土地与人口资源的利益冲突而形成对峙相攻的局面。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封建之始，地广人稀，诸侯壤地，各不相接，其后则犬牙相错矣。封建之始，种族错杂，所与竞者，率多异族，其后则皆伯叔甥舅矣。国与家，大利之所在也。以大利之所在，徒临之以宗子之空名，而望其不争，岂不难哉？此诸侯卿大夫之间所以日寻干戈也。”[2]

[2] 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

其次表现为“社”的私有化，即各国国君将“社”赠送给他国或赏赐给本国贵族作为他们的采邑。春秋初齐桓公一次赏赐给

管仲三百社（《荀子·仲尼》）。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将莒国境西的一千社赠送给鲁昭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还赠送鲁国国君山阴数百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国还曾送给卫国济水以西五百社（《左传·哀公十五年》）。随着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大集体生产已不再必要，小家庭或个体生产已成为可能，随着剥削关系的发展和个体农民的出现，这种社组织就必然走向解体。

第三，国君的位置已经由原来的有序继承变为无序竞争，礼法的约束逐渐减弱，实力的分化日益明显。即使国君能够保住位置，也不见得就能够行使权力。鲁国就曾经出现了大夫季氏的家臣阳虎一度专鲁国之政的情况，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政治秩序的混乱可见一斑。

传统政治秩序的混乱，礼乐约束力的消失，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各种以富民、强国、救世、一统为目的的思想崭露头角，相互争论，为这一时期出版活动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

二、工商业的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使得一部分人有充足的时间与物力以学术为业，也必然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在物质材料与人才培养方面，工商业的兴起与学校教育一样，对出版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一时期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为都市的兴起、商人的活跃和“工商食官制”的打破几个方面。

都市的兴起是工商业繁荣的首要条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已经颇具规模，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如齐国的临淄，居民就有七万户，苏秦曾形容道：“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1] 又如吴国的都城，“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越绝书》卷2）。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城市

[1]《战国策·齐策》。

规模的扩大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可能，居民的富足为知识的学习提供了保障。知识阶层的兴起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否则天天忙于生计，哪里有时间读书求学呢？

《周礼·冬官·考工记》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是对国都布局的概述，说明城邑中已经有固定的商业区——市。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各国都城中市的存在已经相当普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述：楚人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文公十八年"记述：鲁夫人哀姜被赶回娘家，将要离开鲁国时"哭而过市……市人皆哭"。"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昭公三年"：齐国大臣晏婴住的"宅近于市"。"昭公十八年"：郑国大火，"三日哭，国不市"。"哀公十六年"：楚国"市南有熊宜僚者"。《国语·吴语》也记载："吴国市无赤米。"除都城外，大夫的邑中也有市。如鲁国臧会逃到郈邑（今山东东平），郈邑大夫鲂假让他做郈市的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城邑以外的农村似也有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谈到井田制时，何休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如这记载确实的话，当时农村应有临时集市。[1] 集市不仅是物资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场所，是一个活动的"文化场"。

[1]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248—2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商人已经活跃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人，我们在《左传》、《战国策》、《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如越之范蠡、郑之弦高、周之白圭、赵之卓氏、梁之孔氏、鲁之猗顿、邯郸之郭纵等都是当时的豪商巨贾。大约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新兴的商人就已经在秦国夺取了政权。手工业的分工也更加明显，孟子就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荀子也说："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墨子·节用》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梓、匠，使各从

事其所能。”人们已经可以在集市买到较为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属货币。不知道这时有没有以书籍买卖为业的商人出现，文献上没有相关记载。

与“学在官府”一样，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也以官府手工业为主，实行“工商食官”制。《国语·晋语四》“工商食官”韦昭注：“工，百工。……食官，官廪之。”就是说手工业者由官府来供养。《国语·齐语》记载：“处工就官府。”就是说手工业由官府直接控制。《周礼·冬官·考工记》对当时的手工业组织、分工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书中说国有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百工系六职之一，分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植之工六部分，共有30个工种。《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肆，谓官府造作之处。致，极也。工不居肆，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官养的手工业者有时被当做封赏物的一种。《国语·晋语七》记载：“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楚伐鲁，鲁臣“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

到春秋后期，这种“工商食官”制逐渐被打破。其实早在孔子时，就有私人作坊出现。《论语·乡党》就有“沽酒市脯不食”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里面的一段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自由贸易的出现：

>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

再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木匠公输班,他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手工业者的代表了。

“工商食官”制的打破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这一时期王室力量衰弱、阶级力量与社会思潮发生变化的典型表现。

三、王室势力的衰弱与大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后,国力日衰,在公元前770—前707年间主要依靠晋国与郑国的力量才勉强维持着天子的尊严,所谓“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到春秋初年,全国已经是四分五裂,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达到140多个。四周的夷狄逐渐强大,不断入侵中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犬戎占据西方关中地区,东方的山戎、北戎则不断侵扰燕、齐、郑等国,山东、淮北一带的东夷、淮夷也把触角伸向中原地区。诸侯国受到夷狄的侵袭时,往往要向邻国求救,周天子已经失去保护属国的能力,反倒要依赖属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才能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

王室衰弱的同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增强,最后终于无视“共主”周天子的存在,开始相互攻伐,甚至向周王室发难。春秋后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一些诸侯国适应这种新情况,实行政治改革,打击旧贵族,发展生产力,以求富国强兵,从此开始了“礼堕而修耕战”、“以富兼人”、“以力兼人”的新局面。据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统计,在长达242年的春秋史中,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

凡450次，共933次。先由郑庄公繻葛之战大败周桓王，直接挑战周王室权威，一度形成郑国独强的形势。接着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首先称霸；继齐之后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形成了晋国的霸业；自此晋楚开始了争夺，到楚庄王胜晋，成为第三个霸主。晋灭狄后国势恢复，晋楚于是长期相对峙，中原维持暂时和平的局面。随着北方政局的缓和，南方吴、越进行混战，并先后北上争霸。据《左传》记载，晋文公在位期间，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楚国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秦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到战国时，小国灭绝殆尽，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大国。大国之间的战争规模更大，往往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据记载，战国时代，248年里，共发生战争222次。战国末年还出现了以秦国为中心的“连横”运动和其他六国联合起来抵制秦国的“合纵”运动。战争形势错综复杂，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重大变异。

四、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士阶层的壮大

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战争的频仍、社会的动荡、务实作风的盛行使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各个阶层都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社会结构进行重新洗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贵族的没落、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士阶层的崛起。

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带来了爵位等级的紊乱。这时的周天子其实已经沦为诸侯霸主的附庸，传统的等级关系已经从上层开始打破，“王臣公，公臣大夫”的等级从属关系已经大打折扣了。加上新兴地主及商人的兴起、奴隶纷纷逃亡、手工业者先后起义、“国人”不断暴动，原来西周宝塔式的统治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皂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殷商、西周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的时代一去不再，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的边缘阶层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心，政出大夫、陪臣执

【1】《论语·季氏》:“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掌国命、士人奔走天下固不为奇，甚至平民也可因军功而暴发凌上，真可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晋、齐、鲁、宋、郑等国自下而上执政，秦、楚、吴、越等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新旧贵族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为封建的新政权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西周时期建立在统治宗族公社基础上、内部又有严密宗族关系的世袭宗族贵族，到春秋时代因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而逐渐分化，出现了新的以私有土地制为基础的封建地主，他们逐步控制了各国政权，形成新的封建贵族”[2]。

【1】《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殷商西周时，士是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给予食地，地位仅高于平民和奴隶。到春秋时，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国语·晋语四》），“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仍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靠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左传·襄公九年》楚国大臣子囊谈到春秋时晋国政治状况时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可见士人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到战国时已出现无田无土之士，所谓“士无田则不祭”，“士无土则不君”，这些人或擅长射、御等武术而成为武士，充任下级军官，如孔丘的父亲叔梁纥即为武士；或见长于礼、乐、书、数等文术而成为文士，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孔丘曾任委吏。此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他们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已经逐步淡化，庶众皂隶因“积文学，正身行”（《荀子·王制》）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如淳于髡便由赘婿而为“稷下学宫”的名士；虞卿原为平民，后来成为赵国上卿。士作为一个阶层，其影响愈来愈大，并为公卿大夫所借重。齐桓公等春秋霸主都以招贤纳士著称，战国时公卿大夫更竞相争取士人，形成所谓“养士”之风。最著名的“养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四公子”门下豢养食客数千，多为精于某种技艺的士人。而士的向背，确乎关系列国盛衰，故有士“入楚楚重，出

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篇》）之说。

不少人在游说之余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也经过弟子的传播和发扬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社会思潮与礼乐制度的变迁

殷商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重鬼尚巫”的天道观；西周表现为“尊天敬德”，处于一个转折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则进一步摆脱了殷商的神权巫风虚置神格，注重民意，“重民轻神”的人道观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主要的文化精神与社会思潮。《尚书》、《诗经》、《国语》等许多先秦文献中都有这种思潮的具体体现。

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这种社会思潮。《左传》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不和，神不享矣。”“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的民本思想，重点放在摆脱“神”的桎梏，肯定“民”的作用；而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则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强调“保民而王”。《孟子·尽心下》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老子则主张“道”为万物本原，并提出了人性异化的问题，是对人道观的另一层面的发展：“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无疑是对春秋战国时代现状的反省与批判。尽管各家观点不同，但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民的关注，对民的力量的重视。《左传》记载的龟卜据统计有55例，主要是征伐、政事、祭祀、男仕女嫁、生老病死，其中征伐最多，有20例；政事（合命官、立储、营建）次之，15例；卜祭共8例，且都在鲁国。如果把征伐和政事都视为“政”，则“政”大大多于“祀”[1]。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礼仪制度被打破，“吉、凶、

【1】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2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宾、军、嘉”五礼均已起了巨大变化。周郑交质、齐楚窥鼎，原来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被颠倒，下级僭越上级礼制的情况普遍发生。已经出土的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周王室和王室大臣所制作的占了绝大多数，属于诸侯国的为数甚少。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出土的王室、王臣的礼器非常少，取而代之的是各诸侯国、卿大夫甚至他们的家臣私自铸造的器物。考古发掘出的地下遗址和丧葬礼俗说明，“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

顾炎武将此种变化集中归于春秋战国之际的133年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

【1】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第二节　出版活动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在文化上反映为诸多原创性、奠基性作品的出现与流布，出版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各类图书的撰写、编辑、收藏活动普遍展开。竹木简牍和帛书的普遍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图书的传播。文献的考辨活动出现，史书、诸子书、科技书籍等的出现标志着图书类型的不断丰富。已经有了编辑家和初步的编辑思想和出版标准。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出版活动已经摆脱了商周时期的原始形态，开始了新的发展。诗、书、易、春秋及三传的编辑活动，诸子学说的编辑与传播，《考工记》等科技书籍的出现，表明文献编辑是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特点。春秋时期出版活动的标志性事件是孔子的编辑活动，战国时期出版活动的标志性事件则是百家著作的蜂起与传播。

一、诸子学说的编辑与传播

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已，五霸、七国相与争雄，政治形势可谓风云激荡。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参与意识，当时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著书立说，纵论天下大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为国家利益计，励精图治的各国君主和知识阶层都非常重视民意向背和舆论指向，这就为文化的繁荣与出版的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关于“子产不毁乡校”的论述，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开明人士对公众舆论的态度。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广招门徒，积极奔走于国与国之间。当时最著名的有十大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

面对乱世，儒家希望通过恢复周朝礼仪制度来使国家达到统一安定的状态。其代表文献有《论语》、《孟子》、《荀子》等。《论语》是孔子弟子作的关于孔子对弟子的答问记录。孔子去世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用400多个“子曰”辗转传述、记录整理成书。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父子、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从《论语》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记载看，孔门弟子确有一边听课一边作笔记的习惯，而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论语》的编辑同样是集体活动。从郭店竹简中包含的原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4种论语类书籍看，孔子门人汇集成册的这类语录式书籍为数不少，内容也有所不同。《论语》之外的那些《论语》类文献并没有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在现存西汉以前的文献中，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这就是《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其史料价值与

《论语》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孝经》、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等。现在《缁衣》出土于战国楚墓，说明这种论断是可靠的。"[1]

《孟子》是一部记录孟子言行及其与弟子、门人相互问答的书，是孟子政治学说、哲学思想的反映。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孟子曾历经20余载，周游齐、滕、鲁、梁等国，宣扬自己的学说，并广招弟子。由于不被诸侯见用，最后回到家乡，"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由孟子与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语录体，各篇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庸》一书，相传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孟子》7篇，为孟子去世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依据平常所记孟子的言论编辑而成，虽仍是语录体，但已经有了很多长篇的论辩，篇幅较长。《汉书·艺文志》载《孟子》11篇，其中有外书4篇，经考证是伪作。

荀子名况，赵人，也称作荀卿。《荀子》一书32篇，大部分为荀子自作，只有《大略》、《有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儒效》、《议兵》、《强国》等篇疑为后人所作。

道家主要文献有《老子》、《庄子》。道家创始人为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楚国曲仁里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吏。道家在政治上宣传无为，主张小国寡民，思想中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老子》又名《道德经》，分上、下两篇，计81章。今存《老子》"道经"在上，"德经"在下，与先秦时顺序相反，可见《老子》曾经过后人的润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

【1】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23—2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又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又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1] 后人对《老子》一书的完成时间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此书当系老聃所作，成书在《论语》之前；有人以为此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应在《论语》、《孟子》之后，甚至还要晚于《庄子》；更有人以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先秦典籍中，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描述过与老子学说内容相似的观点，并且《老子》较《论语》的体系性更强，文风也更加前后一致，其文风又和《孙子兵法》相似，所以《老子》的成书年代可能晚于《论语》。

[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为庄周的作品。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蒙人，曾为漆园吏，大概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2篇，今存33篇，计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老子》相传为老子自著，《庄子》则应非一人一时之作，应像其他许多文献一样，为后人追加、编辑而成。自宋代苏轼怀疑《庄子》中有伪作以后，经历代学者考证，一般认为《庄子》内篇思想连贯、风格一致，思想体系完整，应当是庄子思想的反映，而外篇、杂篇则有可能出于庄子后学或门人之手。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宋国大夫。代表作为《墨子》一书。该书约成于战国初期，采用

当时通行的语录体写就，但是思想比《论语》、《孟子》都要集中，是散文发展的重要标志。《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今存53篇，其中《亲士》至《三辨》7篇，及《经》上下至《小取》6篇，经考证为后人伪作，其他各篇也有可疑之处。只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乃墨子弟子将墨子的言行辑录而成，与墨子思想最为接近。墨家学派当时是与儒家并列的显学之一，秦亡以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法家主张以刑法治理国家，同时还应该加强国君的权势。代表作品是《管子》、《韩非子》。《管子》，相传为齐国管仲所撰。管仲字夷吾，曾相齐桓公。刘向校书时存86篇，今存75篇，计《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9篇、《区言》5篇、《杂篇》11篇、《管子解》5篇、《管子轻重》19篇，其中大部分其实非管仲个人所作。

《韩非子》大部分为韩非本人所作，秦始皇就是看到了他的书籍才召他到秦国去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他的学说代表了先秦法家的最高成就："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对其行文风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云："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汉书·艺文志》著录55篇，今皆存。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战国策》及当代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这一学派的主要著作。

杂家是较晚出现的一个学派，其观点"兼儒、墨，合名、法"而不主一家。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也自成一家。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

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一百多年后，《汉书·艺文志》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派集大成之作为《吕氏春秋》，由秦相国吕不韦组织宾客集体撰写。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26篇。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残缺、散乱，是先秦诸子书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

【1】《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考工记》等科技书籍的出现

在秦汉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有关著作也应不少。目前可见的最早科技著作是《考工记》。《考工记》是战国时期齐人编著的一部独特的科技类著作，可以称得上我国第一部工业百科全书，书中主要记述了有关百工之事，分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植之工六个部分，分别对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诸器的制作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

《考工记》的发现在汉朝，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搜求古籍，为购求《周礼》的《冬官司空》，曾花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太平广记》卷第389记载：“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青丝编简，盗以火自照，王僧虔见十余简，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阙文。’”可见书籍是用古文写就的。

全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今天的总目、总论，主要述说了“百工”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和技术条件。第二部分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工艺规范。可谓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我国第一部

百科全书《管子》中有关农学、水利学、植物生态学、物理学等篇章，被公认为相应学科领域最早的学术论文，而《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文献，它单独记述有关百工之事，把百工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相提并论，是六职之一。该书对公元前5世纪末中国一些器物的规格和制造工艺作了介绍，也反映出当时的工艺管理水平。

《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工艺技术和实际操作经验的综合，是对中国自上古到战国初期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总结。“工商食官”制在战国时已被打破，市集上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加上礼崩乐坏，大国争霸，务实的思想非常流行，人们开始普遍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要进一步组织和指导生产，就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考工记》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科技典籍，而且还是当时科技最高水平的体现。《考工记》的内容虽然以手工业工艺、技术为主，但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如物理学方面就涉及了力学、声学、磁学等；有关力学方面的惯性原理、声学方面的振动学规律的记载也是世界最早的；数学方面，则大量记载了分数、倍数以及割圆、弧度等知识，并且最早探索了角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考工记·冶氏》中还记载了勾股定理的最早实例。此外还有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与理论。

《黄帝内经》是先秦最重要的医学书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间，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约14万字。它托名于“黄帝”，实则是古代许多医学家的劳动成果，是祖国医学中最宝贵、最光辉的遗产。全书以问答的形式写成。《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祖国医学对于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针灸、治疗等各方面的见解，对临床实践从理、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确立了祖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疗原则。同时，也涉及当时天

文、物候、历法、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十分丰富。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与情志存在着整体联系，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总结诊断治疗的一般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都是起源于内脏的功能，经络是人体内部运行气血的通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各部器官组织联成一个整体。提倡预防疾病，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1]的主张，要求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1]《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由于秦朝的焚书不涉及医学书籍，所以《黄帝内经》得以在民间流传，流传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不断有新的内容增加进来，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两千多年来的医疗实践证明，《黄帝内经》一书的价值甚高，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医家所重视，而且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高度注意，一些国际针灸组织，还把它列为必读的参考书。现在，《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许多国家。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独特的古代著作，可以称为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包含了历史、地理、宗教、生物、水利、民族、神话、医学、矿产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西晋郭璞非常推崇《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很可信的地理文献。其实，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历代说法不一，争论较大。例如《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东汉班固则将其列入术数类，而刘向和刘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明代的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并把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也把此书列入小说类。到了近代，鲁迅先生认为此书是巫觋、方士之书。然而大多数论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尤以《五藏山经》地理价值最高。《五藏山经》，在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但比例不

大。它无疑是一部早期地理书。《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比早些时代的《禹贡》丰富，其记载山岳共15 000字，其篇幅之长，相当于《禹贡》导山部分的14倍。《禹贡》所记山岳仅4列，而《山海经》则发展成26列。

《山海经》以山为纲，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分叙时把有关地理知识附加上去。全文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经纬，有条不紊。在叙述每列山岳时还记述山的位置、高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及其面积大小，并注意两山之间的相互关连，有的还涉及植被覆盖密度、雨雪情况等，显然已具备了山脉的初步概念，堪称我国最早的山岳地理书。在叙述河流时，必言其发源与流向，还注意到河流的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的情况以及盐池、湖泊、井泉的记载。《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省；《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古、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古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山海经》记载了众多的原始地理知识，如南方岩溶洞穴，北方河水季节性变化，不同气候带的地理景观与动植物分布的特点。《山海经》在物质资源分布的篇幅中，对于矿产的记载尤其详细，提及矿物产地300余处，有用矿物达七八十种，并把它们分成金、玉、石、土四类。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在公元前371—前286年所著《石头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质文献，但它记载的矿物仅16种，把这些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而与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山海经》所记的矿物种类是它的5倍，分类更细。《山海经》还注意到矿物的共生现象，并据其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构造、敲击声、医药性等识别矿物的方法，详细记述动植物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因此《山海经》在矿物学分

类上有突出贡献。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李约瑟说："《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同样是众说纷纭。出现最早、流传时间也长的说法是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提出的，他认为，《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系夏禹、伯益所作。此后《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等书皆从其说。然而，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已经发现，《山海经》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开始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根据《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认为绝非是夏禹、伯益所作。《隋书·经籍志》也认为不会作于三代以上。此后随着考古学与辨伪学的发展，夏禹、伯益之说日趋被否定。

当代较一致的看法是，《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但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以《山经》成书年代最早，为战国时作品；《海经》为西汉时期作品；《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作品。有的学者以《山海经》中《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结论是《山经》所载山川于周秦河汉间最详最合，故作者当是这一地区的人。至于时代当在《禹贡》之后，战国后期。

历代对《山海经》的地学价值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东汉时，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从治汴入手治河，临行，明帝赠送给他的参考书中就有《山海经》。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引用《山海经》达80余处。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王尧臣《崇文总目》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书。明清时代是《山海经》地学价值被贬时期，被说成"多杂以神怪"、"道里山川难考据"。近世顾颉刚作《五藏山经试探》，发表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使人们重新认识

到《山海经》的科学价值。其后，谭其骧又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利用《山海经》中丰富的河道资料，将《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梳理，并加以排比，考证出一条最古的黄河故道。此文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山海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地理学上的科学地位。

《山海经》的今传本为18卷39篇，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5卷，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共21 000字，占全书的2/3。《海内经》、《海外经》8卷，4 200字。《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5卷，5 300字。晋郭璞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有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较为流行。

此外，《墨子》一书中也保存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以及资料，被许多人看做是先秦的一部科技著作。

三、文献的编辑整理

春秋战国时期，著书立说之风盛行，学者们首先遇到的是对前代的文献如何继承和利用的问题。但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抄，抄写在竹木上的文字难免不发生散失错乱，不仅文字需要校正，内容上的错误也需加以考辨，因为造成典籍内容失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文字产生之初形成的典籍里，一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历史写进书中，以致一讹再讹。

其次，朝代的更替，后朝对前朝往往极力诋毁，有意歪曲历史真相。孔子的学生子贡看到周初的文献，就提出质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再次，当时人们好古的思想十分浓厚，把远古社会描绘成最理想的黄金时代，这显然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战国时代的韩非就对“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的做法持不同的见解。他说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然而尧舜之道已是3 000年前的事，孔、墨之无文献可据，谁能确定儒、墨所托的尧舜是真是假。因此，韩非指

出对于古书古说一定要质之以据，然后才可以相信。如果未经过调查研究，又没有可靠的证据，就确定尧舜之道，这是愚的举动；如果不能确定就轻易相信，就是一种欺骗行为了。韩非主张调查研究，强调要以经过验证的资料为依据，反对主观臆测，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西周末期，就已经出现了文献校勘活动。我国历史上可考的最早的校雠家是西周末东周初年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正考父为孔子的七世祖，他的先世原是商王朝的贵族，后来有几代就在宋国做高官。《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在《毛诗》"商颂谱"及"那小序"中也有类似记载。经正考父校雠编辑的12篇《商颂》至孔子时只保存了五篇，现收录于《诗经》中。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书之事"始于孔子子夏"。他认为我国真正的校书活动，开始于孔子和子夏。据说《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即传自子夏。《后汉书·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后三传至大毛公，大毛公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可见毛派《诗经》实为子夏所传。汉代流行的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再二传至荀子，荀子传大毛公。其源头也是子夏。另据何新在《子夏与变法经世的"西河学派"》一文里考证，韩诗也是子夏所传。子夏尤精于《春秋》历史之学。汉代讲授《春秋》经义有三种主要版本，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传述《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公羊高与谷梁赤，均为子夏门人。子夏在讲授历史文献时，对文献的校雠、考据就成为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了。子夏提倡校书要"择善而从"，不泥古，不迷信，对文本中的差错应该有所发现和改正。据《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己亥本是干支纪日，在先秦的

古文字中，“己”与“三”、“亥”与“豕”形体相近，易致混淆。卫人所读史记（即史书），就是把“己亥”误作“三豕”的误本。子夏通晓文字形体及史书记日体例，故能发现问题而加以校正。然而他又不满足于此，到晋国后，又进一步考察史实，准确无误，始成定论。这一事例，是我国校雠史上以灵活性见长的“活校法”的最早记载。

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诸子书基本上都是先师去世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的，其内容一般都是弟子对先师言谈的记录，为语录型著作。如《论语》，每章几乎都是以“子曰”开始的。这种语录型著作每句话即为一章，章与章之间不相连贯，并无必然联系，每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分篇是由于竹简的长度不够，并非人为的归纳，因而其篇目往往以文章开始的几个字命名，并不能概括其内容。

到了战国初期和中期，诸子书基本上仍是先师去世后由其弟子编辑成书。较初期不同的是，在编辑成书之前，诸子已将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初步加工，这就使得每篇的内容颇具连贯性，已不像初期那样只是只言片语了。如《孟子》，其《梁惠王》篇共由23章组成，每章都是通过互相问答对某个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但这时分篇似乎仍然只是限于长度，而未进行有意识的归纳，因而篇名仍暂用每篇开始的几个字。

到战国中后期，诸子大多在生前即将其作品以篇为单位进行编辑传播，待去世后再由其弟子将单行的篇什编辑成书，其性质颇似于后世编纂的大全集。如《韩非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由于以篇为单位独立传播，因而一篇往往只有一个主题，整个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同时开始对篇加以归纳，归纳出的主题词便是这一篇的篇名。

在战国诸子书中普遍存在着伪作问题，几乎每一部子书都或

多或少有伪作窜入。从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书籍编辑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传抄者不断地进行编辑，因为诸子书的最初编辑者几乎都是其弟子，他们不可能将与先师观点相悖的文章编入先师的著作中。伪作的窜入很可能是有意识进行的，其目的可能是将自己的观点放到别家学派的经典内，以便将来辩论时对自己有利。大约到战国中期以后，伪作开始由个别篇章的窜入演变为整书的作伪。如《山海经》一书，托名为夏禹及伯益所撰，经学者考证，其实是战国中期以后秦以前的人，综合《庄子》、《列子》、《离骚》等书，加以扩充而成。

四、编辑出版的特点

如果说商周是编辑出版的萌芽时期，那么春秋战国可以说是编辑出版的自觉期。编辑出版活动随着文化的勃兴与普及，从自发走向自觉，开始真正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发挥出强大的文化感染力，担负起推动历史进步和维系文化传承的重任。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务实的编辑目的、初步的编辑标准、觉醒的编辑意识、编辑活动走向民间四个方面。

（一）务实的编辑目的

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变革激烈，社会情势纷繁芜杂；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剧变，传统的宗教迷信思想被打破，人本主义得到提倡与发展。面对乱世，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纷纷从社会现实出发，探讨治国之策，寻求发展大计。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带有鲜明的务实作风，有明确的现实的目的在其中。

孔子在整理前世文献时，就反映出他希望通过恢复周礼（克己复礼）达到社会大治、国家一统的理想，以及对鬼神等虚幻世界的忽视，对平民、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关于如何为政、如何王天下的问题，孔子多有论述。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 时，就是在讲如何王天下的哲学。对现实的深刻关注如《论语·先进》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1】《论语·为政》。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他所推崇的"周礼"虽然有"敬鬼神"的成分，但是他把"敬鬼神"，把丧礼和祭礼，完全看成是人的良心问题，是"崇德报功"而不是迷信，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而不是"物"的问题[1]。他思想上的"复礼"、"正名"、"正乐"观念在"六经"里都有充分的表现，对《春秋》的修订亦明显带有济世倾向。孔子希望通过重新诠释《诗》、《书》、礼、乐，肯定和弘扬这些传统观念的人文价值，并以此作为精神的原动力，来建立符合人道精神的理想王国。如前所述，《吕氏春秋》也是本着这一务实思想进行编写的。主要由工匠、教师、士兵组成的墨家更加重视对实用技术的掌握与应用。法家则将这种实用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完全抛却了历史与文化传统，将目光紧紧盯住现世。其他学派的学说及作品编辑同样透露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1】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2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二）初步的编辑标准

编辑标准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简其语，齐其句，谐其言"就是此时编辑活动的一个准则。前面说过，为了达到统治的长治久安，统治者推出了一整套采诗制度，由专人到民间选择、收集资料，然后将收集到的民歌民谣加以分类、选择，用整齐、谐律的文字表达出来，有的还配以音乐。为了便于记忆，编辑人员还将这些原始资料编成韵语，这就形成了初始的编辑标准："上古之世，地旷人稀，既无文字以同声气……隔离稍远，必赖传达。词繁意琐，则传言者或失其真，故必简其语，齐其句，谐其言，而后传之者便矣。"[2] 通过编辑加工，这些早期的文学作品就更易于在不识字的民众中传播，而听者也会有一种美的享受。不仅诗歌，先秦诸子的散文同样是用词准确，文字凝练，结构严谨，容量丰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令后人难望其项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书写受到已有的诗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书写材料的难得和书籍制作程序的复杂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种编辑标准

【2】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73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的产生。可见当时传媒技术的落后既是文化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形成当时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觉醒的编辑意识

编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编辑活动的逐步独立与编辑主体性的发挥。

这一时期私人著述丰富，编辑作为著述方式之一种，竹帛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传媒形态，为古代文化的整合、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论语》、《孟子》、《老子》等诸子百家书籍，多是由其弟子集体汇集编辑而成。整理、编辑老师的思想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造的主要方式。另外，编辑而成的书籍成为不同于公文传递的第二条信息传播通道，编辑出版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增加，并打破了官府对知识的垄断。至此，编辑终于获得了独立性，传媒也逐步摆脱了政府公文以及政治教化的狭小圈子，开始向民间渗透，编辑出版活动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商周时期，编辑对统治阶层的依附造成了编辑主体性的缺失与编辑人格的不健全。有时，史官甚至被当作封赐物的一种。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到春秋战国时期，编辑主体性得到张扬，对独立文化品格的追求得到肯定。以史官为例，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太史均为周天子所分派，而不臣于诸侯[1]。如《春秋》记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史官称"其君"而不称"君"，且秉笔直书。崔杼把当时齐国的史官杀了，于是这个史官的弟弟便接替兄长的职位照样记载"齐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位弟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无可奈何，才不得不停止杀戮了。而在齐国还有一位"南史氏"，听了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而兄弟接连被杀，就捧着笔墨赶来，准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戮，乃止。在中国历史上，为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而进行的这种斗争实在是可歌可泣！

【1】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四）编辑活动走向民间

编辑活动走向民间，一方面表现为官府对编辑活动的垄断被打破，私人著述、编辑活动频繁；另一方面表现为藏书现象的大量出现。如前所述，各个学派的弟子往往会把先师的思想、理论通过著述编辑的方式保存下来，这就使编辑活动与学术传播走向民间，而这一时期藏书活动的大量出现也是编辑出版活动繁盛的直接结果。首先，编辑活动向民间的转移是与周代的“嫡长继承制”紧密相连的。嫡长继承制把君主庶子的后裔逐渐推向社会下层，而这有助于平民地位的提高。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末，畿内原邑的人民便会以“夫谁非王之姻亲”自夸[1]。随着贵族后裔逐渐投入平民阶层，贵族所专有的教育和知识渐渐渗入民间。这为孔子时代教育的繁荣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传播工具的革新、传媒形态的演进造成了诸子百家时代学术的繁荣和文化向民间的渗透。蒋伯潜在《诸子通考·诸子兴替的原因》中说：“简牍刀漆进化为纸帛笔墨，由官学变为私人之师儒，由官学变为私人之著述。”[2] 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也说：“在春秋时，只政府有力作文书者，到战国初年，民间学者也可以著书了……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3]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的，是私人藏书的增加。这些藏书一般用作教学和写作。名家惠施，有书五车；“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国语》记载，公元前600年前后，楚太子箴（楚恭王）所习的课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等。梁启超指出：“当时书籍传写方法，似甚发达。……书籍已甚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富。既研究有资，且相观而善，足以促成学术勃兴之机运。”[4]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已经走出了萌芽状态与自发时期，具有了自觉的编辑出版意识，编辑出版的逐步独立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革新开始显示出强大的动力，编辑出版标准的初步形成、编辑主体性的发挥、书籍的出现同时昭示着出版活动的核心要素已经初具规模，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开始真正产生。

【1】张荫麟：《中国史纲》，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蒋伯潜：《诸子通考》，南京，中正书局，1948年。

【3】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五）编辑出版工作以汇编整理为主，一本书的编撰一般出于众人之手，历经较长时间始得完成。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者，编辑出版工作与著述工作很多时候由一人或几人兼任，著述与编辑尚难以分离。许多著名的图书作者，本人也参与了实际的编辑与整理工作。专门的编纂与出版机构仍然没有出现，当然这与当时文化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

第三节　编辑出版活动取得发展的原因

一、史官学术垄断制度的打破

古时的编辑活动与知识阶层有着密切联系，是由被称为“史”的特权阶层加以具体施行的。其中大史、作册的地位尤高。斯维至在《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中说：“大史古实崇职，王国维已论之甚详。番生簋毛公鼎均以卿事寮太史寮并称，余谓西周时期实为两寮共同执政。”[1]《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云：“作册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人，是各种礼仪的参与者，是各种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政治的、宗教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他们。所以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处于非常尊荣的地位，经常受到各种优厚的赏赐。”[2]早在夏、商、西周三代，图书文献刚刚产生的时候，掌管书籍编写、收藏、使用的权力就集中在史官手中，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一体。不少巫祝贞人出身的官吏当时都已达到首辅大臣的重要职位，如巫咸、巫贤、傅说等。“史”作为人鬼交通的中介者，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其活动明显地带有国家政治的色彩。

“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编辑出版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徐复观指出：“我国古代文化，由宗教转化而为人文的展开，是通过古代史职的展开而展开的。文化的进步，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是古代

[1] 斯维至:《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线装书局,1947年。

[2]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35—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文化由宗教走向人文的一道桥梁，一条通路。黄帝之史仓颉造字，不过是一种传说。但史因记录的要求，因而发明文字，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大篆出于宣王太史籀，小篆除李斯赵高外，有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文字与古代之史不可分，也是无可怀疑的。史由文字的记录与保管，而得到历史知识，由历史知识而得到人类行为的经验教训，由此以开出有关人文方面一切学问，也是很自然而合理的。《汉书·艺文志》以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乃依稀仿佛之谈。欲为中国学术探源索本，应当说中国一切学问皆出于史。”[1]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3，230—2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早期文献的内容也是图书与档案混在一起，内容以鬼神术数为主，多为卜辞及帝王的言行记录，传播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到了春秋战国之世，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学术思想都有根本的变革。所谓井田制度已渐趋破坏，建立在井田制之上的贵族政治也随之崩溃，农奴与商人都在这个时期抬起头来，社会关系也发生不小的变革。史官制度的崩溃、教育制度的变迁、学术重心的下移及学术思想的解放都是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在这一时期形成和草创的重要原因。

王国维认为“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书籍的官吏。“太史”是文案的高级掌管人，他的地位和一般大臣相当。史官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作册”，他们受雇于诸侯，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史实。由于史官隶属于天子或诸侯，编辑活动就更多地受到特权阶层利益的影响，就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王事”，倾向于“政治”，所以史的编辑活动的范围就限定在记录王室贵胄的言行、功臣大将的伟业和国家确立的文学经典，以及必需的历书、医书等。先秦诸子中提及的古圣先王，即常常以竹帛作永恒的记载。《吴越春秋》卷10记载勾践灭吴后，乐师颂之，谓其“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另外，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太史要立刻加以记录，“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简所记录的是原始资料，而策则是经

过了史官的选择和编辑加工后，整理而成的史料。“君举必书”这一传统就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其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古代著名的史籍《左传》和《国语》相传为鲁国太史左丘明所编纂。战国时魏国史官石申，编著《天文》八卷，齐国史官甘德根据观测记录，编著《天文星占》八卷。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这些史官及其著述成为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早期的杰出篇章。

周代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开始是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后，王室衰微，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他们注意选用当时有学识的人担任。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三兄弟和南史氏也是不畏强暴、坚持直笔、一身正气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1]。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2]。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3]。

春秋时代后期，宗法世袭的社会制度被打乱了，一些弱小国家相继被大国吞并而灭亡。许多史官已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他们掌管的图籍文献也逐渐流散在外。例如畴人，原来是世世代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史记·历书》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论语·微子》记载了鲁国乐官四处流散的情况：“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打鼓的方叔逃到黄河岸边，摇小鼓的武逃到了汉水流域，少师阳和

【1】《国语·楚语下》。

【2】《韩诗外传》卷7。

【3】《国语·晋语》。

击磬的襄则一直跑到大海之滨。《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向郯国的国君请教过一些历史知识，回来后向别人说：我听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看来果然如此。

史官学术垄断制度的打破是私学勃兴、学术下移、思想解放的前提条件与推动力，从此，编辑出版活动开始摆脱对官府的单纯依赖，开始在民间寻找落脚点，并为民智的开启、社会的进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出版主体意识的张扬也才成为可能。

二、私学的勃兴与思想解放

春秋战国以前，学在官府，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决定了当时只有王室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范围非常狭窄，学习内容也都离不开政治。我国是世界上形成教育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原始状态的教育可以上溯到文字发明以前，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耒耕作等反映了早期教育活动的某些合理成分，其内容以传授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生产生活经验为主，没有特定组织与形式，尚未形成制度，而与生产等结合较紧。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文字和书籍的产生，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他们属奴隶主贵族，有足够的财富和时间、精力专门培养贵族子弟，教育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校产生于夏代。《孟子·滕文公上》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王制》云：“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目前有文物可证实的最早学校见于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中有庠、序、学、宗等文字，并有关于送弟子上学的记载。“教”字在甲骨文中构字形状是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头上已有被打的两个符号，说明教的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所以《说文解字·教

部》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周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教育，《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构成比较完备的学制体系，实行高度垄断。"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依然不变。国学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按年龄和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教员由官吏兼任，大乐正总其事，下设若干官员分掌各职。乡学只有小学一级，包括塾、庠、序三级。《礼记·学记》云："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教员由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大司徒总其成，并聘用退职的大夫任教师，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以培养治术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诗书礼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国学又分大学与小学。天子所设立的大学由辟雍、成均、上庠、东胶、西雍五学组成，辟雍最尊贵，居中央，其他四学环绕四周。辟通璧，因辟雍建于四面环水的土丘上，状若玉璧而得名，又因天子常常来这里射箭、划船，亦名"射庐"、"大池"。大学里的课程以诗、书、礼、乐为主，《礼记·文王世子》云："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这一局面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换，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然发生转变，集中表现为官学的衰落、私学的兴起。官学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王室、诸侯都在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学校。《诗·郑风·子衿》就是"刺学校废也"的诗篇，表明"乱世则学校不修"。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上没落，丧失了进取精神，只迷恋于腐朽奢侈的享乐，失掉了学习的志趣。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载："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

焉，与之语，不说（悦）学。”他们甚至公然宣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

官学的衰落不等于教育的中断，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勃兴，开辟了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表明私人讲学之风已起，私学遍及四方各地。孔子是首倡私学、开创私人讲学的第一位大教育家，他从事教学实践近50年，弟子有3 000人之多，对教育问题有十分全面的见解和论述。孔门弟子将其言行汇编为《论语》一书，记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在中外教育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据载，与孔子同时代的少正卯也创办了私学，竟使孔门私学“三盈三虚”。继之而起的墨子也曾创办私学，并创立了代表手工业劳动者的墨家学派，在当时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并称显学。他在科技教育、逻辑思维的培养和道德意志锻炼方面有突出贡献。《墨子》一书保存了他的教育思想资料，这部书也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教育遗产。孔子后学如子思、孟子、荀子及墨子的后学如禽滑厘、孟胜等也都聚徒讲学。其他各家如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也都从事私人讲学，弟子多至数千人，少者亦有数十人。

近人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概括晚周的这一转折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孔子以后，官学与私学并重，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双轨制。到了战国时代，私学更加繁盛。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中牟之人弃其四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少人弃商贾而学为士已成一种社会风气。私学发展到一定规模，教学管理也逐步完善。如齐宣王在都城设置的“稷下学宫”，名似官学，实为私学联合体，各派私学大师会聚于此，当时就读的文学游说之士达数千人，他们在学宫议论讲学，发表不同的意见。为了管理和组织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学宫设有祭酒等领导人员。所谓祭酒，是古代食必祭先、酒必敬长的意思，后用为官名，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荀子当时就任这个学宫的祭酒，他所作的《劝学篇》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业论文。到齐湣王前期，学宫的知识开

始向平民普及，战国后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发展高潮。

与私学的勃兴相应的是思想的大解放。这一方面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各个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生存，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教育与学术；并且思想的开明也对笼络民心有益，所以从征服民心和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思想、学术、言论基本上采取了撒手不管、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时他们还鼓励这种倾向，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增强政权的向心力。加上当时不具备秦汉一统天下后钳制思想的条件，所以就由政治的多元化促生了思想的多元化。正如《汉书·艺文志》上所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例如，齐桓公曾“设庭燎”，“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并设“啧室之议”(啧是喧哗的意思)，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齐后期更是设立稷下学宫，礼贤下士，海纳百川，充分发挥学术自由，造就了齐国文化的大繁荣。另一方面，这也是西周流传下来的传统。周公曾经三番五次地告诫周成王，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 成王也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2] 西周在王宫外面设置了“肺石”，有不平事的平民可以坐在上面申诉；在内朝树立“路鼓”，有怨情者可以击鼓鸣冤。《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肺石达穷民”；又《夏官·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另外还有采风观政的政策。春秋战国很自然承续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将其发扬，从而共同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

【1】《尚书·召诰》。

【2】《尚书·蔡仲之命》。

三、学术下移与士阶层的崛起

私学的勃兴导致学术的下移。没落的贵族以及从平民、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阶层的结合，使原来的“士”人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并以此

说服他人，争取民众。这些士人纷纷著书立说，于是私人著作兴起。在这些士人当中，有的由于过去掌管过档案和文书，在他们自己著书立说时，就使古代统于王室的学术文化向外传播，知识被少数人保存和垄断的现象被打破了，教育向平民普及，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下移”。

前面已经说过，百家之学皆出于王官。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掌管户籍和授田），道家出于史官（负责记录史实和保管档案），名家出于礼官（掌仪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掌宗庙），法家出于理官（掌刑狱），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掌观象授时），杂家出于议官（掌谏议），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掌农事），小说家出于稗官（一种小官）。王室衰微以后，官学凋敝，掌管这些王事的官员流落民间，带动了文化的普及。李学勤指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还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在西周时期，文化知识本来是少数统治者专有的，当时的教育仅限于王室和贵胄子弟。在王官外，没有其他掌握知识的人。……进入东周之后，贵族政治的衰败，使知识普及的范围大为扩大，出现了所谓私学，而诸侯的分立，又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增长，各诸侯国都出现了尊贤礼士的风气。”[1]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到其先祖“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7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士阶层迅速崛起并受到政治家的重视，所以当时诸侯争雄、公卿执政，皆争相招士、养士，以至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说的“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的现象。战国时候，士的归附与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策开明程度和国力强弱与否的重要指数。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士阶层本着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在为实现自身理想的同时，开启民智也成为他们非常关心的话题，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编辑事业的发展。

第四节　战国时代的简牍及其形制

一、战国简牍出土情况

这一时期出版物的形制以“简牍制度”为主，竹木简牍是主要的知识载体。竹木简牍，就是把文字写在经过整治的竹片和木板上，一根竹片称“简”，将许多根简编连在一起称“策”(册)，合称简策。加工后没有写字的木片称“版”，写了字的称“牍”，细一些的木条称“木简”，木质的合称“版牍”，竹木合称为“简牍”。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竹木简牍的通行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而且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书籍制度，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辑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写在简策上的。秦汉时，简牍继续盛行，秦始皇批阅竹简奏章，一天要看120斤，不看完不休息。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用3 000根简写奏议，由两个大力士抬上殿。西汉末刘向等整理编辑政府藏书，多数也是写在竹木简牍上。我国造纸术发明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竹简、帛书与纸并行。三国时，已有纸书帛书，但是官府的文书还大量采用竹简和木牍。东晋时，官府文书开始使用藤纸。东晋末，大量生产用旧麻布为原料的麻纸，经过防蠹入潢后，称黄纸。《初学记》卷21引《桓玄伪事》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废晋安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其时为公元404年。从上古至此，简牍使用应有两千年之久，但其盛行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约1 000年的时间。

新中国建立以来出土的简策，其内容可分为祭祷记录、遣策和书籍三大类。

1961年江陵望山1号墓和1981年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简策属祭祷和卜筮文，其内容又可细分为三：一是墓主贞问“侍王”

是否顺利；一是贞问忧患、疾病的吉凶；一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能定居长久。这些简策的发现为研究楚国的卜筮情况，揭示当时贵族阶层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1978年随县擂鼓墩出土的简策为遣策——即殉葬器物的目录，详细记录丧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简文中还反映了当时楚曾两国的关系。有关曾国的情况，历史文献缺少记载，所以这批简策十分珍贵。遣策在出土简策中较为常见。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的简策内容是书籍。书籍在历史上有多次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西汉时的鲁壁藏书，一是晋太康年间的"汲冢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人不凖盗挖魏国墓（一说魏襄王墓，另一说魏安釐王墓），发现了先秦竹简书籍数十车。当时盗墓者点燃简策作火把来照取宝物，致使简烬札断，文残句缺，损毁严重。太康二年（281年）政府将这批简收归官有，藏于秘府，派荀勖、束皙等人进行整理研究，得古书75篇，统称"汲冢书"。其中重要的有魏国编年史，记事上起夏朝，下至魏安釐王二十年，被命名为《竹书纪年》；还有叙述周穆王巡行的《穆天子传》。其余各篇在《晋书·束皙传》中均有记载。

此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中还提到当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为楚王墓，大获宝物的同时还有青丝编的竹简书，王僧虔以所得十余简断定是蝌蚪文《考工记》。

2000年，我国有关部门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一批罕见的战国竹简，共1 200多枚，35 000多字，其中最长的竹简为57.1厘米，最短的24.6厘米，涉及80多种先秦古籍，涵盖了儒家、道家、法家、杂家、兵家等诸多学派，多数为今已不传的古佚书。其中《易经》部分为现存版本中最古老者，还有关于孔子论诗的内容。这批竹简目前正由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学者整理。

二、战国简牍的形制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的书籍制度，对后世出版物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出土的竹简中，最早为战国竹简。

没有书写文字的简牍有自己独特的名称：用来制作木牍的半成品叫做“椠”；没有写字的简牍则称为“札”或者“两行”；制作木牍的材料叫做“方”、“板”或“版”。《仪礼·聘礼》“百名以下者书于方”，贾疏云：“方若今之祝板，不假连编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简牍一般在一面或者正反两面书写，但是也有多面的，叫做“柧”或者“觚”，《说文解字》释为“棱”，《急就篇》师古注：“觚，其形成六面，或八面，皆可书。”

简牍可以重复使用。书写新内容之前，要用刀刮掉原有的字迹，被削去的木片，叫做“肺”，多有出土。因记录内容、使用材料、书写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简牍的长度有不同的规格。一般长度为14—88厘米，用于书写典籍和文书的简牍一般在23—28厘米之间，尤以23厘米者为常见。以出土的战国简牍为例，长沙五里牌楚简长13.2厘米，长沙仰天湖楚简长22厘米，江陵纪南城楚简长64厘米，江陵包山楚简长62—72.6厘米，曾侯乙简长度为70—72厘米。

编连方法亦不同。有的是先编连竹简再写字，这种竹简编绳处上下两个字的距离一般较大，这是因为在书写的时候要避开绳子；有的是书写完毕以后，再以绳子进行编连，由于写字的时候没有为绳子预留空间，所以不少字会被绳子遮盖。这两种竹简都有所发现。

在简牍上，除了文字以外，还发现了多种符号，其作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标点符号和编辑符号，对文字的表达功能起到辅助和强化的作用。[1] 按照大致的分类，这些符号有句读符号、重叠符、界隔符、提示符、勾校符等等。从这些符号可以判断当时的编辑工作已经趋于规范，有了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

不少简牍的上下端留有空白，分别称为“天头”、“地尾”，

【1】李均明：《古代简牍》，14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和今天的出版物非常相似。如果竹简是以两道绳子编连，那么一般不留天地；三道以上绳子编连，则一般都留出空白。有些简牍中还有局部空白的现象，主要是为了特定目的而人为地设置的，如底稿、原稿空出人名、时间等等。一些简牍还会分栏书写，对后世的纸质媒体版式也有影响。如果不小心写错了，则有两种解决方法，其一是削去错字，在原位置重新书写；其二则是以墨涂去错别字，在下面继续书写。

第四章　秦朝的出版活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四海，从而结束了漫长的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此诞生。但是战乱的结束带来的不是文化的更加繁荣，而是百家争鸣时代学术繁盛景象的一去不返。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便于对这一庞大帝国进行统治，秦始皇一方面推行整齐划一的政治与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字的统一为以后出版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着力推行法家的治国思想，禁绝诗书，以吏为师，对出版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文化教育事业备受摧残。而项羽于公元前206年焚烧咸阳宫殿，更使无数珍贵的上古文献灰飞烟灭，对出版与文化事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秦始皇的“焚书”行为。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较之于战国时期，确实是步入了一个低潮期，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举对以后文化与出版事业的繁荣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对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也应该重新认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破坏与建设并存的时代。

第一节　秦朝的文字统一工作

秦始皇统一六合、振策宇内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经营与巩固自己得来不易的庞大帝国。虽然秦国在战国时期地处偏

远，文化落后，但是它采取了积极的吸纳人才的开明政策，大大促进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来自别国的许多优秀人才在秦国的改革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商鞅、韩非、李斯等等。统一后，由于各个地区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至于秦始皇的诏令到达南方的象郡（今桂林）以后居然无人能识。



秦始皇像

各国文字的差异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化紧密相关。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化，文字的应用愈加广泛，文字的应用者也从上层社会逐渐扩散至民间，因此文字的形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裘锡圭认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而秦国由于地处偏狭，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当时的东方国家，因此其字体变化也落后半拍，由此造成了秦国文字与六国文字的巨大差异。战国时，东方各国的文字已经与西周晚期、春秋时代的通行字体迥然而异了。因此，文字学家唐兰将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与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字划分开来，称前者为秦系文字，后者为六国文字。裘锡圭指出，所谓“六国文字”，其范围实际上并不限于齐、楚、燕、三晋这六个国家的文字，而是把东方各国的文字全都包括在内的。[1]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六国文字形体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俗体字大量出现，并成为文字使用的主流，这主要是由于文字使用频率的提高与使用范围的扩大。特点之二是六国之间的文字在形体上也有巨大差异。其实这种差异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至战国时期表现更著。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六国间的文化交流，亦不利于六国与秦

[1]《吕氏春秋·不二》。

国之间的文化融合。"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1]，所以秦始皇在行政方面开始实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文字，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移民、销毁兵器、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广修驰道。其中文字统一工作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无疑最为重要。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殷商以降，文字更加普及与定型。刻在青铜器上面的金文形体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由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划地自治，各国的文字形体已经大不相同了。"在春秋时代的文字里，地方性的异体字就已经出现了。……战国时代，文字剧烈变化，而各国变化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因此地方性异体就大大增加了。不但六国文字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文字彼此间也有显著差别。"[2] 所以，秦统一中国以前，社会上就出现了要求统一文字的呼声。"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的《管子·君臣上》，在讲理想政治的时候，就提到了'书同名'这件事。"[3]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 同上书，280页。

其实据郭沫若研究发现，周代就已经进行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周朝设有专门的官员来从事此类工作，如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辅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论语·述而》也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不过当时的语言文字应用范围较为狭窄，所以很少向公众公布规范后的文字或语言，而是"藏于秘室"，这种统一工作局限于史官系统内部。到了秦朝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秦始皇已经感受到文字不统一对统治帝国的制约，所以积极向各地推行规范化的文字并以此巩固统治；另一方面秦朝经过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文化教育体系，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也有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

秦始皇命令李斯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李斯的工作以周朝的大篆为基础，大篆由一名叫籀的太史创制，所以也叫"籀文"。平王东迁后，宗周故地划归秦国，因而秦国使用的就是籀文。籀文笔画繁复，书写不易，李斯借鉴齐鲁等地通用的蝌蚪文笔画简

洁的优点，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制出了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秦篆”，又叫“小篆”。所谓“乃李斯删籀而秦篆兴”（《文心雕龙·练字》）指的就是这件事。

> 李斯统一文字之举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 简化和改进复杂的、因年代而写法各异的大篆体，使之成为称作小篆体的文字；(2) 把各地区的异体字统一为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以秦通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单一的体系（虽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3) 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可以设想，这个变化和随之在汉代进行的进一步的文字简化可能部分地由于以下的事实而促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速增长的需要。[1]

[1]〔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说文·序》这样记载秦始皇的“同文字”：“其后（孔子之后）……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认为小篆由籀文而来。裘锡圭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从相关资料来看，籀文并非秦国在一统中国前所使用的文字，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过来的，不是由籀文“省改”而来的。他说：

> 秦始皇要用秦国文字统一全中国的文字，首先需要对秦国文字本身作一番整理，拿出一种标准字体来。李斯等人撰《仓颉》等篇，应该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做的是整理、统一的工作，不是创新的工作。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里说“许叔重（许慎字叔重）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行，并非轫自他们也”。[1]

作为官方的规范文字，小篆颁布全国，得到广泛的推行与使用。为此，李斯编写了《仓颉篇》，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等识字课本，作为推广小篆的教材。直到汉朝初年，这些书籍仍然是儿童的启蒙读物。与此同时，狱吏程邈得罪入狱后，经过潜心创造，创制了一种更加简便的字体，将小篆圆转的笔画变得方正，字形趋于扁平，书写更为流畅，因为这种字体在狱官审问犯人（徒隶）的时候常常使用，所以被称为隶书。《说文解字》记载，秦始皇时定书体为八种，即：大篆、小篆、隶书、虫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从现代的观点看，后四种书体其实是根据书写目的而做出的分类，前四种才是不同的字体，其中以小篆、隶书使用最广。

秦朝文字统一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切合社会的呼声，另一方面是由于秦朝严厉的法制，使得文字统一工作迅速展开并卓有成效。文字统一以后，就不能再随意书写了，如果乱写，弄不好会受到惩罚的。《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汉武帝时候，一个叫石建的郎中令，在写奏书的时候，把“马”字下面的五笔写成了四笔，当他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吓得要死，害怕武帝治他的死罪。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提到了这件事情：“吏民上书，字谬则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即文字）也。”可见在当时，文字统一工作是一件非常认真、严肃的事情。

但文字统一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任务。这可以清楚地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上看出来。在一份秦统一前后抄写的占书上，虽然其字体基本为篆文，但仍明显使用了不少楚国的字形。帛书《老子》甲本，字体是接近篆文的早期隶书，但文中仍不乏楚国字形，而该书的抄写年代已是秦末汉初了。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广

阔帝国领域内文化交流的阻碍，还有助于整个中华帝国的政治统一，对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功不可没。对于出版而言，其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使得出版更有效地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第二节 “焚书坑儒”与秦朝文化政策

秦始皇主要是依靠法家而不是儒家来完成自己的帝国大业的，所以其治国策略就体现出了明显的法家思想。早在秦始皇之前的一个半世纪，秦孝公就曾经按照商鞅的建议“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更是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认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害）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并在《五蠹》篇里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商君书》多次提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故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正是由于对法家学说的采纳，才使得秦国国力强盛，行政效率与军事实力大大加强，所以秦始皇对法家的建议大多予以接受。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大宴群臣，席间，博士淳于越又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法先王，学古法。丞相李斯针锋相对地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制度的不同源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所以“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李斯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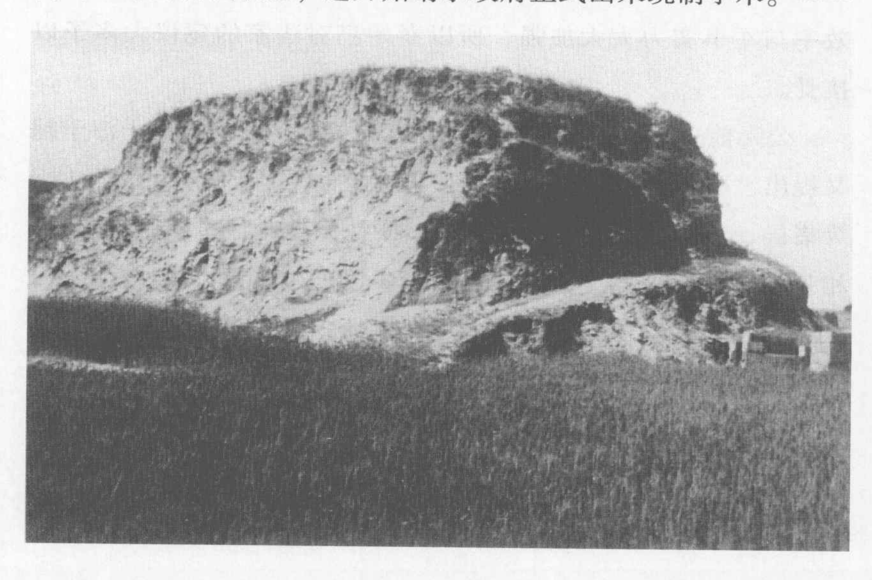
>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

> 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

[1]《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采纳李斯这一建议，一场文化浩劫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应当明确的是，秦始皇并没有下令焚烧所有书籍，《诗》、《书》、百家语仅仅是禁止私藏，博士仍然可以拥有这些文献典籍（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的科技类图书则被保存了下来；秦国的历史著作（秦记）也没有被烧毁，所以才会有司马迁的抱怨："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虽然秦始皇施行"焚书"的暴政，但是还有大量的科技著作得以传播，而汉朝在远为宽松的文化环境里，科技书籍却越来越少，不被重视，以致后世流传甚少。

钱穆认为："其实此事（焚书）在当时，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而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李斯力劝秦始皇弗从众议，而同时深感到思想言论上的庞杂情形，有碍于理想政策之推进。恰巧李斯的老师荀卿，素来主张一种智识上的贵族主义，李斯又憧憬于学术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状态，遂开始请求政府正式出来统制学术。……



陕西秦"坑儒谷"遗址

后代人用‘焚书’两字做题目，来概括这件政治大争议，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当时的真相，细读《太史公书》，便知此事原委。”[1]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98—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无疑给出版活动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它到底对出版活动造成多大的损失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颁布“焚书令”的时间是公元前213年，但是至前208年李斯死亡时秦国已经摇摇欲坠，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去料理这些事情。也就是说，“焚书令”的认真施行也许仅有五年的时间而已。其对文献的损害也许远远不如公元前206年项羽焚毁咸阳秦的宫殿造成的损害。据统计：

> 基督降生前后汉代存在的秘府书目列出了677种著作，其中不到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2]

【2】〔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但是，秦始皇的焚书之举还是贻害无穷的，最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对愚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肯定，是一种野蛮的反文化行为，虽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却影响颇大，消极作用很明显。

其次，焚书事件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使得大量古代典籍面目全非，乃至到汉代出现了大量的伪书，一种书籍又往往有多种版本，使人们不知所从，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混乱局面。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秦始皇曾经于下达“焚书令”的第二年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即所谓的“焚书坑儒”，后来人们对这一说法开始产生怀疑，不少学者认为“焚书”与“坑儒”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并开始对“坑儒”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得知他派出去寻访长生不死药的术士（韩众、徐市、侯生、卢生等人）由于无法交差而纷纷逃跑，并且侯生、卢生在交谈时，指责“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龙颜大怒，命令抓捕这些术士，术士们互相揭发，又牵引出460多人。秦始皇盛怒之下将他们处死，太子扶苏因为对此不满而被派往北方边疆监督蒙恬修造长城。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并没有“坑儒”一说，而说是“坑术士”：

>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朱渊清认为：

> 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1]

[1] 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章太炎认为，“儒”在先秦其实有三个层次，指三种不同的人，秦始皇所坑杀的儒，乃是“达名之儒”，也就是广义上的儒，是知识分子：“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上天、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

曰：'朕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才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1]

这样一讲就非常明了了。

再说秦始皇并非完全排斥儒家理论，他设置博士之位（共有70名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项制度并非肇始于秦，因为在秦征服之前，齐、鲁、魏几个国家也有养士与设博士的风气。在公元前3世纪，一些大国的君主普遍供养了一大批学者，既是为了使用，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个典型；秦国丞相吕不韦也这样做过。另外，公元前753年秦国开始专设史官纪事。

第三节 秦朝的编辑出版活动

一、秦代刻石

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受到文学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在金属器皿上刻字较为不易，且所载篇幅也不可能太长。到了秦代，石头成为秦政府宣扬政绩、铭记历史的重要载体，在石头上刻字不仅容易，而且可以承载较长的文章，所以其为后世所提供的历史记录也更为丰富。南宋学者郑樵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2] 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秦刻为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的"石鼓文"，文字刻于十个石鼓之上，内容为秦国君臣田猎游乐之事，故又称"猎碣"。石鼓文字体为大篆，制作时代有文公、穆公、

[1]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71—7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2]《通志·金石略》。

襄公、献公诸说法。石鼓文发现之后，历代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研究，韩愈、韦应物等曾对文字加以考释，终因“辞严意密读难识”而“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始皇与秦二世在国内四处巡游，并且常常刻石纪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公元前219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共有七次立碑。其中，有三块立于山东峄山、泰山、琅邪台。公元前218年，再次立两石于山东芝罘的东观和芝罘山。公元前218年，立碑于河北碣石，公元前211年最后一石立于浙江会稽。秦二世于公元前210年巡行全国，并在秦

秦代琅邪台刻石拓本



始皇所立的石碑上补刻文字。它们的文字结构除略有变异外，每行12字，每节6行，有72字，每节押一个韵。秦二世所刻的补记存13行84字，字体为小篆。碑文的内容大都是对秦始皇文治武功的赞美。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芝罘，碣石之刻，久已无传；峄山、会稽，皆出后人重摹；泰山石毁于火；琅岈台刻石，清咸、同间犹存，后亦坠于海。"[1] 琅邪刻石清代尚存于世，叶昌炽记录了琅邪刻石的保存情况："今惟琅琊台一刻，尚存诸城海祠内。琅琊刻石，在诸城县治东南百六十里海滨琅琊台上。海祠湮废，矗立风日中，石裂寸许。自陈莒斋访拓后，县令泰州宫懋让镕铁束之。后令仁寿毛澂建亭覆之。民国前十余年，为雷火毁碎，残块纷纷委地，不复可拓。远近传为已佚。丙寅五月，县人王景祥从台上捃拾散石，一一缀合复完。移嵌县中公所壁间，重为传拓，得还旧观。……"[2]

【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叶昌炽、柯昌泗:《语石 语石异同评》,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这些石刻文字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作为史料的先河。"从汉以后，碑的应用愈广，而石刻愈多，取以考证史实，为用更大。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3] 石刻的传播范围愈广，社会功效愈大，至熹平石经与三体石经而至其高潮，石刻在当时已经完全具备出版物的所有功能了。

【3】张舜徽:《中国文献学》,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二、图书编辑

图书编辑出版与教育始终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早在公元前7—前8世纪，我国就有了供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即周宣王时的太史籀用大篆编写的《史籀篇》。这也可以称为我国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教科书。

秦始皇时期，为了统一全国文字，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字的定型和规范化工作，将籀文简化，创作小篆，并参照《史籀篇》着手编写统一的识字课本。由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都用小篆书写，向全国颁布。《史籀篇》因此废读。

三、简牍文献

秦朝的严刑峻法的一个必然产物是法律文书的数量急剧增加。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公之于众，这可能是最早见诸记载的向大众公布的法律条文了。在公元前513年、公元前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 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从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秦朝的法律文书带有明显的传播意图，不仅有对法典的引用，也有进一步的说明，甚至还附有经典的案例。这非常像现在的法律教科书。竹简是从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62至前217年之间，坟墓的主人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属于秦国法典中有名称的律；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还有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阐述的推理

云梦睡虎地秦简

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发儿子，报告通奸等）。《为吏之道》共51简，位于墓主腹下，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内容主要是关于处世做官的规矩，供官吏学习，可视为当时的政府官员读本，传播应甚广。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律文书这一类型的出版物的结构、内容与形式。秦朝的其他编辑出版活动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其法律文书、科技著作的编辑出版还是有一定成绩的。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湘西里耶古城出土了36 000枚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此前，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很少，而里耶秦简的百科全书般的日志式实录，使其成为继兵马俑以后秦代考古的又一惊世发现，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李学勤在《初读里耶秦简》中，对部分秦简进行了解读，并指出：在里耶简出现以前，我们对秦的行政文书所知不多，实物材料只有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始皇二十年南郡守腾文书，但该文书可能是抄本，文书上某些细节或已略去，只是在里耶简上才能全面看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里耶简这些行政文书和过去所见秦法律文书一样，有固定成熟的格式，语言也很简练。例如有的文书用习语“敢言之”，其作用是标示文书主本的起讫，防止有人赘改。里耶秦简中还有文件邮递的记载。李学勤说，睡虎地南郡守腾文书末云：“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是该文书有两种传送方式，“以次传”即在郡内各县、道以驿传依次传送，“以邮行”则为由专门设立的邮人送达。里耶简J1⑧154记“邮人得行”，意思就是由名叫得的邮人递送。由于邮人数量不多，除一些紧急必须交邮人专办的文书，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1] 由于里耶秦简目前正在整理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期待最新的研究成果将为我们展示更多的秦代文明。

【1】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

四、图书收藏

秦代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藏书传统，政府设立“石室”以

藏书，设立“博士”以管理藏书。始皇帝虽然明令禁止私家藏书，但政府藏书并未废止。《汉书·萧何曹参传》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可知秦代的丞相御史有收藏律令图书的职能，并可见秦代藏书之丰富。汉朝建立后，萧何将秦代藏书收藏于石渠阁，并以之作为汉代的藏书机构，就是延续了秦政府藏书的制度。秦代以前，文人及官员已有以书殉葬的传统，至秦代这一风俗更盛，这一点可以从秦墓中陆续出土的秦代简牍看出。

第五章　两汉出版的历史背景与整体特征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克咸阳，秦朝覆灭。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战胜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国号汉。我国历史上继秦王朝以后的另一个强大的封建大帝国诞生了。汉代中间因王莽篡汉建立短暂的新朝（公元9—23年）而分为前后两段：从汉元年（前206年）到汉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为西汉（或称前汉），都长安；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为东汉（又称后汉），都洛阳。

汉王朝建立以后，继承秦制，沿着秦朝所开辟的历史道路，形成、确立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整合的大一统文化。汉代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当时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汉王朝以其雄浑的气象和非凡的成就奠定了汉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声威和地位。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看，两汉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两汉时期的出版事业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朝廷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建立专门的图书编校机构，多次组织学者从事大规模的图书编校和整理工作。先秦以来的图书典籍在汉代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广泛的传播。著名的图书编撰家不胜枚举，编辑修撰了大量的传世经典，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著作高峰。许多学者提出了影响数千年的编辑和著

述思想。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明和改进了造纸术，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先民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图书贸易活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开展起来，出现了从事书籍买卖活动的书肆、槐市。出版活动开始集著述、编辑、复制和流通为一体，正式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汉代在我国出版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第一节　两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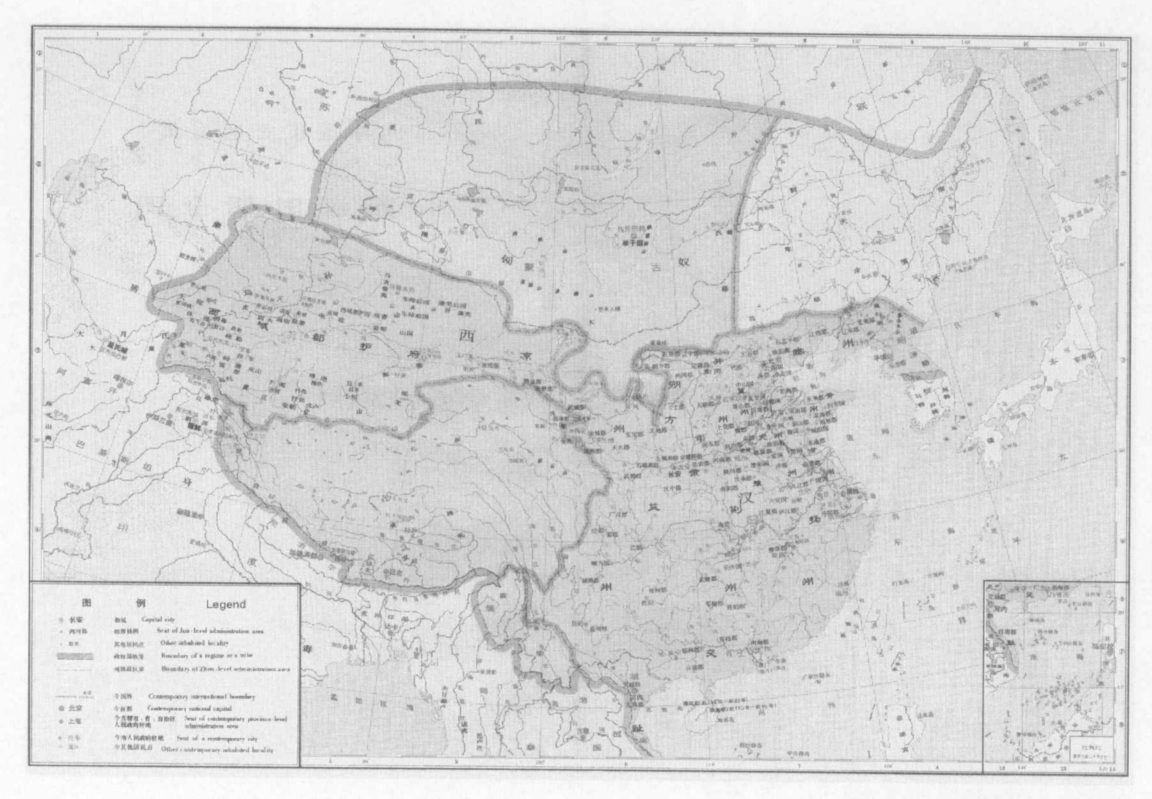
一、汉代的政治、经济概况

两汉时期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但也如所有王朝一样，经历了兴起、发展、衰亡的过程。汉代历史的发展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1. 西汉前期，即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60余年（公元前206—前141年），为汉帝国的恢复时期。西汉前期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打击各地诸侯割据势力，国家进一步统一。

2. 西汉中期，历武、昭、宣三代（公元前140—前49年），共92年，是汉帝国的发展与鼎盛时期。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通西域，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侵犯；实行盐铁官营、货币专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发展，西汉进入全盛时期。

3. 西汉后期，即元、成、哀、平四世及莽新时期（公元前48—公元25年），是汉帝国的衰败时期。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奴婢数量激增，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外戚王莽于公元8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他为了摆脱困境，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都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但皆遭失败。南北各地相继爆发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公元23年，王莽的新朝被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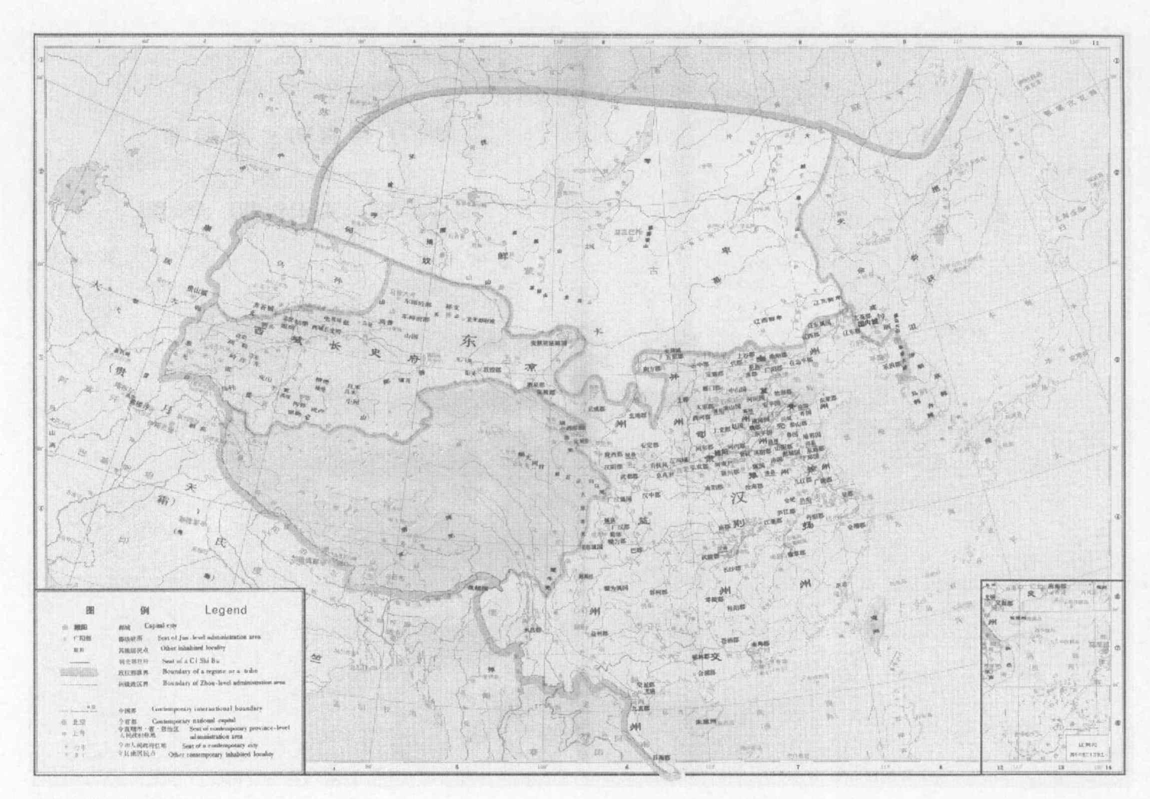


西汉时期全图
(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4. 东汉前期，即光武、明、章三代（公元25—88年），是汉帝国的复兴时期。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光武帝注意发展生产，加强中央集权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此后的明、章二帝都比较有作为，这一时期的东汉国势较为强盛。依靠豪强势力建立的东汉王朝，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

5. 东汉中后期，即从和帝到汉末（公元89—220年），是汉帝国的衰亡时期。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汉末发生了党锢之祸，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巨鹿人张角利用太平道，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于公元184年发动了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秦制，最为重要的有两



东汉时期全图
(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项：一是职官制度采用了秦制。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二是同样实行郡县制，作为全国基本的政区体制。以对居民实行编制为基础，郡辖县，县辖乡、里，而最基层的组织则是编户齐民的什伍。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实行上计制度，上报户口、垦田、赋税的统计数字，作为对郡县长官成绩的考核。郡县制保证了朝廷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汉代的疆域比起秦代有很大的拓展，全盛时期的疆域东、南至海，西南至今云南、广西和越南的北部及中部，西到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达大漠，东北到今朝鲜半岛北部。两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各族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当时除中原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族，东北的乌桓族、鲜卑族，西北的羌族和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族。通过

战争、迁徙、贸易、通婚等多种途径，各民族互相融合。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汉长信宫灯

两汉时期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经济比起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牛耕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耕作技术有显著改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各地兴修。手工业生产门类众多，冶铁、陶瓷等手工业生产取得新的成就。绚丽多彩的丝绸、精致轻巧的漆器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商业和交通比起以前更为发达。西域和南方得到了更多的开发。东汉豪强地主经营的田庄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具有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

二、汉代的文化与科技

（一）汉代的哲学与宗教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立为官学，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了解释和发挥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经学。经学在汉代极为兴盛，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主干，产生了董仲舒、刘歆、许慎、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积数年之力，撰成《论衡》一书。他在哲学问题上跳出经学的圈子，批判今文经和谶纬的弊病，否定了经学的唯心主义体系，阐发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源于巫术、神仙方术的道教在西汉后期形成，东汉时逐渐兴盛，形成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派别。道教徒开始编撰道教典籍。道教思想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于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东汉时开始译佛经、立佛寺，佛教传播渐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汉代的史学、文学、艺术

汉代是我国史学大发展的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对史书的撰写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并付诸实践，编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后世封建正史的范例。《史记》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代表两汉时期历史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所以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使纪传体的体例更为完备，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两汉时期的著名史学著作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绝书》，这两部书开后代地方志之先河。此外，还有《东观汉记》和《汉纪》两部著作。

汉代文学在辞赋、散文、诗歌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辞赋是散、骈兼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一种文体，为汉代"一代之文学"。著名的辞赋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班固、张衡等。代表作有《子虚赋》、《两都赋》等。汉代诗歌以乐府民歌成就最高，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篇名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此外还有《十五从军行》、《陌上桑》、《上邪》等名篇。东汉时期出现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被称为"五言之冠冕"。这些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汉代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除了司马迁以外，贾谊、晁错、刘向、王充等人的散文都非常著名。

汉代的绘画题材丰富，艺术风格多种多样，以写实为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情景，描绘细致，色彩绚烂，极为珍贵。汉代的雕刻技术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技法简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局部）

练，古朴浑厚，气势雄伟，很能体现汉代的时代精神。汉代的乐舞百戏比过去更为丰富多彩，从西域和中亚诸国传入了琵琶、箜篌等乐器，创造了不少新声乐曲。汉代还出现了傀儡戏，传统的角抵和跳丸之戏，至此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三）汉代的科学技术

汉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与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相辉映，使中国站在当时世界文明古国的前列。西汉时，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用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扩大原料来源，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并逐渐取代竹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汉代的天文学成就斐然，西汉时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

阳黑子和新星的记录。汉人还从星辰运行中推算出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其名称和顺序与后世通行的完全符合。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地震的地动仪。他撰写的有关天体结构的著作《灵宪》一书正确地阐述了一些天文现象。天文学的发展，使历法修订成为可能，汉武帝时组织学者修"太初历"。西汉末年，刘歆对"太初历"作了系统的解释，并调整为"三统历"，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

汉代的数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晚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大概在东汉和帝时期，《九章算术》编定，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

中国医学的完整体系，也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西汉时最后编定的《黄帝内经》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书。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著作。汉代名医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药物麻醉以进行大手术，并提倡"五禽之戏"。

两汉时期，农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出现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优秀的农学著作。

第二节　两汉的文化政策及其对出版活动的影响

出版事业属于文化事业一部分，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出版事业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往往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两汉400余年间，统治者所实施的各种文化政策，均对当时的出版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从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

西汉初年，经过战乱的摧残，社会经济、文化一片萧条，百

废待兴。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为了恢复发展生产，尽快使统治走上正轨，统治者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策略，约法省禁，薄赋敛、轻徭役，对外族也采取容忍的态度。

【1】《史记·平准书》。

在文化政策上，汉代君臣鉴于秦朝覆亡的教训，改用宽松的态度。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比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因此，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在思想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都把黄老之言当作“人君南面之术”加以利用。黄老思想笼罩朝野，当时许多重要的人物多好黄老，编著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到汉武帝时，淮南王聚集门客，编撰了一部黄老思想总结性的著作《淮南子》，意在为汉代统治者提供统治的思想学术资源，这些都是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的直接结果。

在这种“无为”政治的治理下，汉初社会的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吕后执政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到了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已呈现繁荣景象。《汉书·食货志》曰：

【2】《汉书·高后纪》。

>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文化思想领域，各家学说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在秦代最受压抑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谓“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3]，更何况其他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人著作可以看出，先秦各家，除了名、墨二家之外，在秦到汉初都有后续的作品，而且数量可

【3】《史记·儒林列传》。

观。这种景象的出现，是无为而治这一统治思想的直接结果。

汉初实行黄老之治而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潜伏了不少社会问题：一是匈奴不断侵扰，和亲政策并不能保证边境的安全。二是诸侯王骄恣，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三是社会因土地兼并而造成贫富不均，富人田连阡陌，穷人则贫无立锥之地。这种“枝强干弱”的局面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就迫切地提出了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中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1]

时势的发展要求统治者改变统治思想，大一统的国家也迫切地需要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文化专制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儒家学说对封建统治的益处逐渐为统治集团所认识。西汉的刘歆曾对汉初儒学的由衰转盛作过评述，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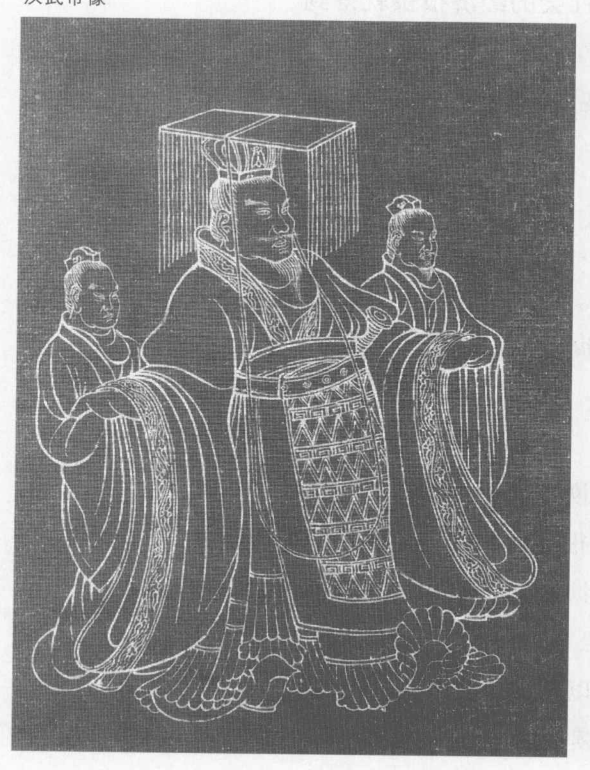
>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

在汉初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对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学进行了改造，把战国以来各家

【1】《汉书·贾谊传》。

【2】《汉书·楚元王传》。

汉武帝像



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他大力推举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相副、改制更化等思想。“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乎而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1]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执政以后，迫切需要改变以往无为而治的局面。汉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2] 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起。

【2】《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汉武帝征和二年》。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统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他说：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

【3】《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董仲舒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服务的明确主张。同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所谓“五经”即被儒家奉为传习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统治思想。元朔五年（公



董仲舒像

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太学，为博士置弟子50人，其中的学习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政府将学术研讨与仕途紧密结合起来，实质上就是利用学术大开利禄之途。这样，天下士子趋之若鹜，纷纷投身到经学学习和研讨的大潮之中，直接促使了经学的繁荣发展。对此，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主张“大一统”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了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目的。应该指出的是，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并未禁绝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还“悉延(引)百端之学”，在承认儒家思想的权威性的基础上，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说明了儒法并用的统治策略。因此，百家学说并未在汉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有些学说甚至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汉代与秦代在文化政策上很不同的一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确立标志着西汉思想文化大一统局面的确立。从此以后，“尊经崇儒”就成为汉代的基本文化路线。东汉光武中兴，崇儒之风比起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武帝少时，曾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重建东汉政权后，礼遇儒生，雅好经典，经常与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此后的明帝、章帝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明帝曾亲自主讲儒经，“诸儒执经

问难于前”、“听者盖以万计”。章帝曾亲临白虎观主持今古文经两派进行学术辩论，事后由班固执笔撰成《白虎通德论》四卷(简称《白虎通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对儒学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解释、传授、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经学在汉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学成为两汉时期学术思想的主干，其他思想学说的发展，也都要纳入到经学的研究体系中去。正如范文澜所说：

自汉武帝立学官，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1]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二、教育事业的繁荣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的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在东汉还设有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地方官学主要是指郡国学。汉代的官学制度，奠定了以后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一) 太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2]的建议，在长安城外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员。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经学的不断发展，太学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博士弟子员在武帝时仅有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200人。成帝末，增弟子至3 000人。汉末，太学大盛，增至

[2]《汉书·董仲舒传》。

30 000余人。

汉代太学的正式教师是博士，博士首领在汉代称仆射，东汉则改成博士祭酒。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武帝初设博士人数不详，至宣帝末年，五经博士增至12人。东汉初年，博士有14家，即《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在经学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其补选办法有二：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补选为受业弟子。

汉代太学并无一定的修业年限，毕业考试，按成绩高低分别授予一定的官职，其方法主要是"设科射策"，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抽签考试。中第者一般授予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郡国文学等闲散之职，以后再补为中央或地方的实职官吏。

（二）鸿都门学和宫邸学的建立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是东汉党争的产物，也与汉灵帝的个人爱好有密切关系。汉末宦官集团政治势力膨胀，太学生站在官僚集团一边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宦官集团便投灵帝所好，怂恿灵帝办鸿都门学，利用教育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鸿都门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主要是招收文学艺术人才，专以尺牍、词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即《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赐传所载"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规模曾发展到千人以上。

汉代的宫邸学有两种类型：一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一是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宫廷学校。

东汉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明帝"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

置《五经》师”，史称“四姓小侯学”。所谓四姓是指外戚樊氏、阴氏、郭氏、马氏四家，因非列侯，故称小侯。后来又扩大招生，不限于四姓子弟，其他贵族子弟也可以入学修业。当时匈奴也曾遣派子弟来此求学。安帝邓太后临朝施政时又于元初六年(119年）设立了另一所贵胄学校，诏征“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亲近子孙三十余人”[1] 入学修业，并为年幼者置配师保，邓太后亲自驾临监视，给予特殊待遇。

【1】《后汉书·邓皇后纪》。

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宫廷学校是宫邸学的另一种类型。邓太后入宫后尝从曹大家受经书、天文、算学，说明宫中早有廷师施教的实事。她临政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2]，使东观这一校书场所同时具有宫廷学校的职能。

【2】《汉书·循吏传》。

(三）地方官学的兴起

汉代的地方官学又称郡国学校，创始于汉景帝末年，首创人为蜀郡太守文翁。史载：

>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3]

【3】《汉书·循吏传·文翁》。

这便是教育史上所称颂的“文翁兴学”。汉武帝即位后，对文翁的做法十分赞赏，便令天下郡国均立郡国学校。此后，各地方官纷纷在自己的治内设立学校，地方官学便逐渐兴盛起来。汉元帝时开始在各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实行对地方官学的管理。汉平帝时颁布地方官学制度，下令郡国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立学校，郡国学校普遍设立。及至东汉，地方官学发展更为繁荣，班固《两都赋》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句子，描述了地方教育发展的盛况。

(四) 私学的昌盛与类型

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冲破“学在官府”的限制，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战国时百家争鸣，私学更盛。秦代颁挟书律，以禁私学，但仍然禁而不绝。汉代私学发展则更加繁荣，秦汉之际至汉武帝元朔五年近百年间，汉代教育全赖私学以维持；官学制度建立以后，私学未见削弱，反而与官学相互补充；东汉私学更为昌盛，规模甚至超过官学，有的私学入门弟子与著录弟子达万人之众。实为汉代学校教育发展一大特色。

汉代私学在先秦私学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始形成初步体系，即蒙学教育——书馆、经书学习——乡塾、专经传授——经馆。

1. 书馆

汉代启蒙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进行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所用字书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王充8岁即入书馆读书，附近学童入馆就读者达百人以上，可见规模不小。

2. 乡塾

经过书馆修业之后，进入乡塾，学于塾师，主要进行经书学习。教材主要使用《尔雅》、《孝经》、《论语》、《尚书》等，让学生接受儒家学说的基础部分。要求对经书粗知大义，不求有精深理解。

3. 经馆

经馆又称“精庐”或“精舍”，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与太学相比。汉代经馆出现较早，在汉武帝时就有很大发展，东汉时这种私人讲学的风气更盛，规模甚至超过官学。据粗略统计，《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的私学有20家。其中受业弟子百人以上者6家；千人以上者8家；万人以上者2家。《后汉书》中，除《儒林列传》记载以外的私学计18家，受业弟子百人以上者7家；千人以上者7家。据此，《后汉书》中记载的私家之学共计38家，受业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万人以上者2家[1]。私学传授多为一代大师或通数经的著名学者，如董仲舒、韦贤、蔡邕、马融、郑玄等人，其规模极大，受业弟子众多。精舍的建立，或在大师家乡，或在山水胜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更兼教授、学术与研习为一体。经馆对后世书院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极大影响。

[1] 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7月第2卷第3期。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最高统治者一直把兴办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国策来抓，培养的人才也主要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二是官学和私学并行发展，相辅相成，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三是教育内容以经学为主，并不旁涉杂学。除此而外，在两汉经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重视师法家法。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学，孟有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2] 就是说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师法是干，家法是枝。汉代经师各以师法、家法教授，保证了经学的继承性，为后人研究他们的学术渊流及承继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对儒家各派的定向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严守师法、家法，各欲成一家之言，弄得枝叶蔓延，门户日深，遂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繁琐的现象。

[2]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

三、积极开拓中外文化交流

西汉政权经六七十年的发展后，进入了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通过战争，南收两越，北逐匈奴，开西南夷，平西羌，西臣大宛，东定朝鲜，疆域空前广阔。这时的西汉王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仅成为当时东亚国力最强盛的国家，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盛大国。积极开拓中外文化交流也是两汉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

（一）汉朝与朝鲜、日本的交流

据考证，朝鲜与中国很早就有交流。公元前7世纪中国就出现了"朝鲜"这个名词。当时两地商人频繁来往，中国的先进文化也开始传入了古朝鲜。汉初，燕人卫满在朝鲜立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至汉武帝时候，为断匈奴"左臂"，汉发动了对卫氏王朝的战争。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朝鲜相参杀其王卫右渠来降。汉武帝遂在当地设立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将其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汉字和儒家思想开始传入朝鲜境内。汉昭帝时，废真番、临屯二郡，又置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对朝鲜半岛的开拓既有利于汉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播，又有利于中朝两地的商业交流。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朝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武帝在朝鲜设立郡治，极大地便利了汉朝与日本的交往。当时的日本境内分立百余小国，通过乐浪得与中国接触。《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列传》称："自武帝灭朝鲜，（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及至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继而东汉政府又与日本伊都国建交。汉字与汉文化也于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境内。史书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日本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钮，阴文篆书

“汉委奴国王”5个字。由此可以证明中国史籍关于汉朝与日本这一时期的交流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

（二）汉朝与越南的关系

秦朝统治时期，赵佗为龙川县令，汉初割据岭南诸郡称王，传国五世。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和其弟叛乱，杀死力主归汉的南越王、太后及汉使者。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攻破南越国国都，平灭叛乱。遂在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9郡。其中交阯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从此以后直到10世纪中叶，约有1 000年以上的岁月这一地区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汉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开始传入越南境内。史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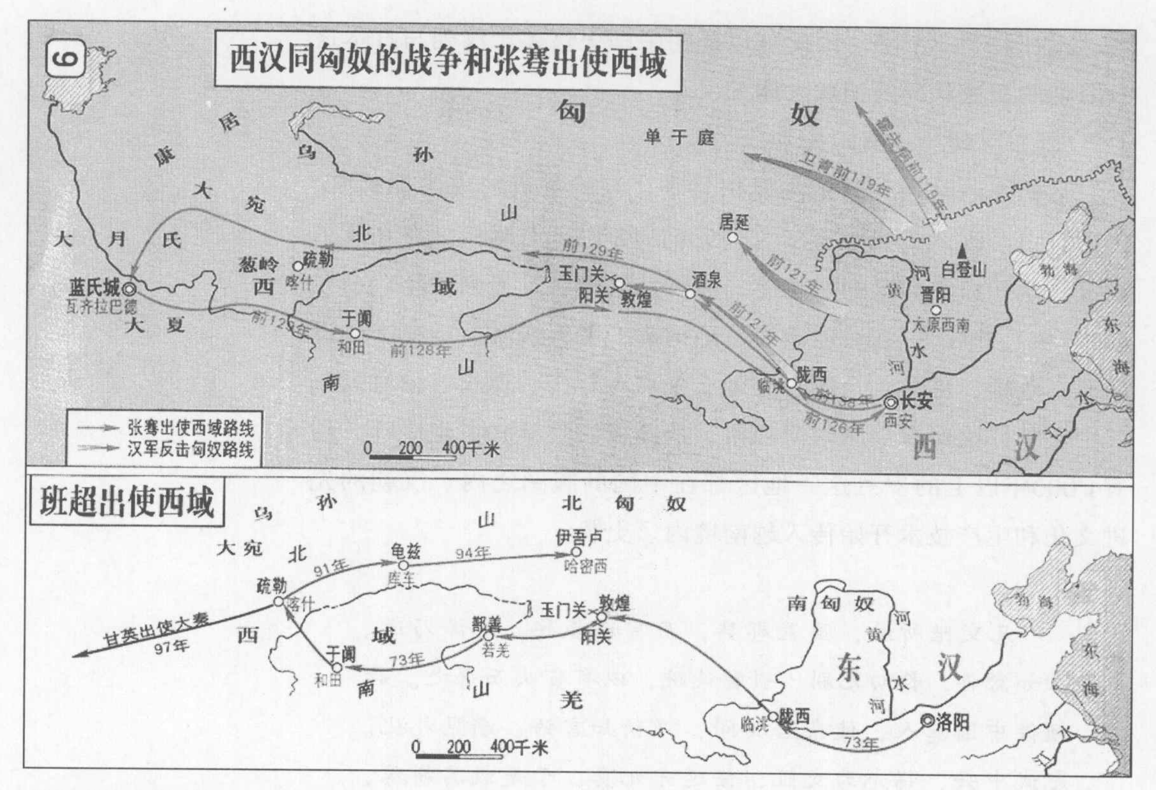
> 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

[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足证汉文化对越南影响之大。汉武帝还对岭南各郡采取不改变当地民族风俗习惯，不征收赋税等政策，并鼓励当地引进黄河、长江流域的生产技术，提高了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这一时期，还开辟了以合浦港为起点、连接东南亚和印度半岛的海外航线。该航线是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合浦港成为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汉武帝常派使者从合浦港出使海外，以金属器具、杂缯等购回明珠、琉璃、奇石等物品。

（三）汉朝与中亚诸国的交流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方，被称为西域。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与西域相邻的中亚诸国，以



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图

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国（今伊朗）和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较为强盛。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份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史称“张骞通西域”。张骞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文化，并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从此以后，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使臣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乃至中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

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1]。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西域和中亚诸国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良马、各种奇珍异兽陆续传入中原。中原地区则向西域和中亚诸国输送了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的技术传入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促进了西域和中亚诸国社会的进步。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83—184页，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

（四）中国与印度的交流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时称身毒、天竺）就已经有所交往。“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2]。这一时期，汉朝与古印度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2】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9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公元前6—前5世纪，佛教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境内创立，以后开始在古印度及今尼泊尔、巴基斯坦境内流传，又向南传入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向北传入中亚细亚。西汉末年，佛教和佛教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东汉明帝时开始遣使求佛，从此，中原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两汉文化政策对出版事业的影响

“尊经崇儒”、发展教育和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文化措施的施行，促进了汉代文化的长足发展，也对出版事业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其影响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政府重视图书的编校与出版工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由原来的思想流派之一，一跃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百家学说

中，只有儒家最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非常推崇图书典籍的教化作用，尤其是把儒家的几部经典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所谓“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1]。这种思想就必然会对统治者的文化举措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两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图书的编校与出版工作。

【1】扬雄：《法言·寡见》。

首先，建立了一批图书编校机构，组织学者在其中从事编辑和著述活动。从西汉初年到东汉灭亡，两汉政府建立的图书编校机构有天禄、石渠、麒麟、石室、延阁、广内、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辟雍、东观、兰台、仁寿阁、宣明殿、鸿都、秘书监等。数量多，规模大，同时具有典藏、编校和著述三大职能。两汉时期的很多图书编校和著述活动都是在这些机构中进行，最为著名的就是“著述东观”。众多图书编校机构的建立，保证了两汉时期图书编辑与出版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政府持续不断地编校国家藏书。在汉武帝以前，西汉政府曾从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过几次图书的征集和编校活动，但规模都不大，成果也不显著。汉武帝以后，大规模的图书编辑整理活动便逐次展开，几乎以后的每一位皇帝都曾组织官员进行图书的编校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东汉光武帝时“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又仿宣帝之例召开白虎观会议，东汉末年又在蔡邕的主持下刊刻“熹平石经”。编校次数多，整理规模大，是两汉图书编校活动的两大特点。这些编校活动具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学著作成为两汉出版物的核心

儒家学说取得独尊地位以后，儒家所遵奉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也被奉为“经”，对这五部经书的诠释和发挥则为经学。经学是汉代直至清代的官方哲学。两汉文化学术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与繁荣，表现在图书编纂与出版事业上，就是经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其最终结果就是

解经之作愈演愈繁。具体表现在数目庞大，名目繁多，篇幅冗长，内容烦琐。

仅以数量为例，《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就有93家，3 000余篇，具体言之：《易》之传有13家，294篇；《书》之传9家，凡412篇；《诗》之传6家，416篇；《礼》之传13家，555篇；《乐》之传6家，165篇；《春秋》之传23家，948篇；《论语》之传12家，229篇；《孝经》之传11家，59篇。其数目约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除此而外，民间肯定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经学著作。东汉一朝的崇儒之风更加兴盛，经学著作当更为可观，如果再把这部分著作计算在内的话，数目当会更多。这种情况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由于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并未禁绝其他学说的传授，所以，其他学派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仍能得以流传。从出版物内容来看，这一时期体现出了“儒学为主，众学为辅”的基本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著作一枝独秀，其他学说逐渐萎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图书编校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准绳

这首先体现在政府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编次和整理活动上。受到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为了“正五经异同”，避免“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从而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自武帝以后，国家组织的图书编校工作的重点几乎都放在了对经学著作的审定和整理上。

其次，还表现在对所有图书进行整理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准绳。两汉政府历来重视对图书的搜集、整理，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那就是以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为准绳，对群书进行“雠校汉家法”式的整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在评定诸家思想时，基本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东汉前期的历次整理群书，也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

第三，这一原则还对当时学者编撰图书的编辑思想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撰《史记》要上承《春秋》，褒贬皆“折中于夫子”；班固撰《汉书》，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许慎也因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而撰写《五经异议》。从汉代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基本上都能看出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

（四）教育事业与编辑出版事业相辅而行

教育事业与编辑出版事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两汉教育的兴盛对编辑出版事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教育事业的繁荣使文化人大量增加，普遍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说：

>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这正是对东汉儒生求学盛况的记述。儒生中的优秀者出而著书，使两汉时的出版物大量增加，从而出现了中国古代的第二次著述高峰。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使其中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对汉代以前的著作进行高水平的注解、阐发、编辑和整理。如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读书人增多，增加了对图书的需求量。从最基础的书馆教育到最高层次的太学教育，教材都是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这就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像《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图书才会应运而生。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整个教育界对图书的种类、载体、复制技术和流通途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造纸术的发明以及书肆的产生，从而促进了图书流通与贸易事业的大发展。

（五）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渐次开展

两汉时期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与对外交流的文化政策也对出版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书的出版与交流又在各民族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两汉统一时间近四百年，四方开拓，国威远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格局。这使得汉文化广布天下，既扩大了汉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影响与渗透，又引入了异质文化，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图书的流通与贸易。从西汉末年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印度的佛经开始被译介到中原，使中国古代出版物中多了佛经一大门类。而中原的图书典籍也会随着汉文化的广泛流传流布周边地区和国家。从此以后，中外出版事业的交流活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第三节　两汉出版的历史分期与整体特征

一、两汉出版的历史分期

两汉出版史是我国出版史继先秦和秦朝之后的第二个重要发展阶段，它在先前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有因有革，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阶段与两汉社会的发展脉络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由于出版事业还受到历史传统、文化思潮以及学术风尚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又呈现出不尽一致的发展进程。根据这一时期出版事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两汉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七个时期。

西汉出版事业分为四个时期：

（一）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60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公元前206—前141年），出版事业的恢复和草创阶段。

这一时期出版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为了政治统治之需，汉高祖组织群臣编定图书，是为汉代政府组织编

撰图书之始。（2）汉惠帝废除挟书之律，为图书的流通扫清了道路。（3）开始征召天下遗书。（4）开始设立编书与藏书机构，石渠、天禄、麒麟三阁为其代表，兼有编辑、校对、整理、典藏图书之功能。（5）地方藩王如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等亦重视征书与编书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时民间著述尚未开展起来，图书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是恢复和草创阶段。

（二）西汉中期，共92年（历武、昭、宣三代，公元前140—前49年），出版事业的持续发展和奠基时期。

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1）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视图书的征集与典藏事业，"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继续征集天下图书。（2）陆续发现古文经书，并进行初步的整理，引发此后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3）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正五经异同"，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整理经学著作的活动。（4）出现了大部头的优秀出版物，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马迁的《史记》，尤其以后者成就最为突出，标志着学者编撰图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西汉后期，共57年（历元、成、哀、平四世，公元前48—公元8年），是西汉帝国的衰败时期，却是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与鼎盛时期。

具体表现在：（1）经过前几代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积累，国家藏书出现了"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的良好效果。（2）汉成帝派陈农访求天下遗书。这是政府最后一次大规模征集天下图书。（3）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整理图书之始，也是我国古代图书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其成果为《别录》和《七略》，创立中国古代图书六分法，同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基之作。（4）长安开始出现书肆、槐市，标志着我国图书贸易活动的正式展开。（5）根据考古发现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纸张，虽然质地粗糙，但意义却十分重大。

(四) 新朝建立到东汉政府建立之前（公元9—25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朝代更迭，战乱纷争，成为文化事业上的一大浩劫。西汉一代出版事业的积累和成就大多被焚毁于战火之中，呈现出“盛极而衰”的特点。

东汉时期的出版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 东汉前期，共64年（历光武、明、章三代，公元25—88年），出版事业的恢复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皇帝多次下诏访求天下遗书，征集图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奠定了国家出版事业的基础。皇帝都比较重视儒学，雅好文章，重视对图书典籍尤其是经学著作的整理。三代皇帝都曾组织人员开展图书的整理工作，而且规模都比较大，影响比较深远。这一时期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持续征召天下遗书，并“购募以金”。（2）光武帝组织人员整理谶纬图书，并“宣布图谶于天下”。（3）设立东观，并组织学者“著作东观”，开始修撰《东观汉记》。（4）章帝仿西汉宣帝故事，召开白虎观会议，正五经之异同，会议结束后，由班固撰成《白虎通义》。(5) 班固撰《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6）佛教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土，《四十二章经》等佛教经典流布中国，开始出现译经活动。

(二) 东汉中后期，共101年（从和帝到灵帝，公元89—189年）。百年间，东汉政治逐渐腐朽，国势亦渐衰微，但图书出版事业却持续发展，并于桓、灵之世达到鼎盛时期。

其成就具体表现在：（1）皇帝普遍重视对图书的编辑整理，以“雠校汉家法”为指导思想，持续几代都进行了图书的整理工作。（2）许慎撰写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3) 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术，献给汉和帝，得到推广。(4) 汉桓帝设秘书监，专职管理图书的编写校订与典藏。（5）蔡邕等奏请刊刻“熹平石经”，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政府出版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6) 民间出现了儒学大师马融、郑玄等。尤其是郑玄，遍注群经，在经书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总结性的工作。

(7) 道教形成，《太平清领书》、《老子想尔注》等道教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布。

(三) 东汉末年的图书出版事业，即汉献帝时期。

这一时期，王室大权旁落，战乱不休，实际上已进入三国争雄时期。战乱给图书出版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毁坏，是为中国古代图书的第三次厄运。由于战乱不息，图书的编撰、出版事业无从谈起，故又体现出“盛极而衰”的特点。经历衰乱之后，图书出版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出版事业既为两汉出版史画上了句号，又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出版历史的先河。

二、汉代出版史的整体特征

从整体上看，两汉时期的出版事业有以下七方面比较突出的历史特征：

(一) 出版事业与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但也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演进特征。

由以上对两汉时期出版历史的简略分期中可以看出，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与两汉历史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如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60余年间，是西汉由草创走向初步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出版事业的恢复和草创阶段。又如西汉与东汉末年的两次战乱，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全面衰败的历史时期，图书出版事业也在这两次战乱中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这说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从宏观上决定着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但是，作为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出版历史同样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演进特征。如西汉武、昭、宣三代为西汉的全盛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出版事业并未在此时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而是在随后的元、成、哀、平时期达到了全面繁荣，而这一时期的西汉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又如东汉从和帝到灵帝的百年间，国势逐渐衰微，但图书出版事业却持续发展，并于桓、灵之世达到鼎盛时期。通观中国出版历史，

可以看出，这样的历史特征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表征方式有所不同。

（二）从事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政府，民间的编辑出版活动逐步壮大。

两汉时期大型的图书编校、出版活动基本上都由政府组织，从西汉初年组织功臣编撰群书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再从东汉初年光武帝征召天下遗书、宣布图谶于天下的举措到东汉末年蔡邕主持刊刻“熹平石经”，政府组织学者官员大规模编校、出版图书的举措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两汉政府还不断增建和完善国家编校典藏图书机构与制度，为图书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正是由于从朝廷到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才使两汉时期的图书出版事业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并取得异常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与政府的出版活动相比，民间的著述与出版活动尚处于初步勃兴时期，以莽新政府为界，西汉时期民间的图书编校、出版活动成绩并无可观之处。即便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司马迁撰《史记》这样具有私撰性质的著述活动，也主要是依托政府藏书修撰而成，其著述目的也主要是为西汉政权服务，所以这类著述活动兼有官修私撰的性质。东汉后，由于私学的兴盛和学风的改变，民间学者、文人的著述活动逐渐增多，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成果。学术与政论著作方面，王充的《论衡》，许慎的《说文解字》，王符的《潜夫论》，马融、郑玄等人的解经之作，均为其中的典范之作。文学方面，东汉时期，文人五言诗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就是民间无名文人优秀作品的结晶。

但不容否认的是，民间学者的著述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出版活动，因为个人编著的图书更多的是一种编撰活动，虽然学者们都有将图书“传之其人”、流布天下的主观愿望，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流通渠道和方式的落后，这一愿望往往很难得到实现。与之相比，政府则可以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将编定的图书广布天下，从而构成完整的出版活动，如东汉初年光武帝“宣布图谶

于天下”，东汉末年刊刻“熹平石经”，都是规模很大的出版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两汉时期从事出版活动的主体既有政府，又有民间的文人与学者，两条线索并行发展，互为补益，但出版事业的成就则主要是由政府取得的。

（三）编辑出版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和文化追求，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两汉时期的出版活动与政治统治、学术研究紧密相关，政治实用性较强，学术文化品位较高，商业性没有后世那么明显。历届政府在组织人员编辑、出版图书时，其主要目的都是为自身的政治统治服务，所以十分重视出版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对商品性则考虑不多。有时是为时下具体的政治举措服务，如西汉初年组织群臣编订礼仪、历书、律书；有时是为统一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如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带有“雠校汉家法”的政治意图。又如东汉末年刊刻“熹平石经”，表面上看是为了平定今古文学派之间长期的论争，其实质则是为了巩固东汉政权的统治。从民间学者与文人的著述与编辑活动来看，其目的虽然多种多样，但将著述视为终生大事，力图服务当时的政治统治与学术发展，则是基本的特征。如司马迁修撰《史记》、班固编修《汉书》、许慎撰《说文解字》、马融与郑玄遍注群经，均能体现这样的特征。当时的学者与文人是把著述看成一种异常严肃的事情的，他们在修撰图书时，想得更多的是经世致用与传之后世，对图书的商品性基本不作考虑，故能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正因如此，两汉时期的私人著作在思想、学术方面均能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历代文人学者著述之典范。这也是两汉时期为何出现那么多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出版物的商品属性逐步凸现，产生书肆、槐市和佣书，图书贸易活动趋于初步繁荣。

出版物政治性、学术性、思想性的突出，并不意味着全部抹杀其商品性，相反，与先秦时期的图书出版活动相比，两汉时期的图书已开始体现出较强的商品性，图书贸易活动开始出现并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汉后期，由于经济、教育与著述事业的发展，在都城长安开始出现售卖书籍的专门商店——书肆。进入东汉以后，书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史书中记载有很多学者少年时因为家贫，到书肆中读书成才的故事。书肆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图书贸易事业的正式展开，在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王莽统治时期，在长安太学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书籍集市——槐市，槐市存在的时间虽然十分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西汉图书贸易事业已初具规模。

西汉后期，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专门从事图书抄录的职业——佣书。抄书人或自抄自卖，或专门为官府和私人抄录图书以谋生，客观上促进了图书的流通与知识的普及。“佣书”的出现，也能充分说明此时的图书贸易事业已经广泛开展起来，出版物的商品性已经比较明显了。

（五）图书数量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拓宽，形制最终固定。

根据杨家骆、王余光等人的统计，我国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总著作部数为1 033部，总著作卷数为13 029卷，平均每百年出现著作138部（笔者按：西汉以前的著作基本上都经过两汉学者的编辑整理才得以存世，所以这部分著作亦可视为西汉时期的出版物）。东汉总著作部数1 100部，2 900卷，平均每百年出现著作564部，每百年的增长率为309%[1]。由于著述繁多，存佚情况复杂，实际数量比上述统计数量要更多。由此可见，仅从出版物的数量及其增长率来看，两汉时期的著作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堪称我国古代著述的一大高峰期。

【1】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4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从内容上来看，两汉时期的图书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哲学、文学、历史、科学技术、艺术、天文、宗教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性的出版物。出版物的门类较为齐备，内容异常丰富。而且在著述体裁方面具有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如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裁，许慎编撰的辞书体裁，郑玄的注经格式，都具有发凡起例的典范作用，奠定了此后正史、

辞书、经学著作的基本格式。在出版物的形制上，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制度主要为卷轴制，从制作到装帧都已经具备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序和制度。图书的目录、篇章、序跋等结构也基本固定下来，后世虽有变革，但总不出其范围。

（六）文字载体丰富多样，发明并改进造纸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两汉时期的出版物载体仍以传统的竹木、缣帛为主，间或会有金石，因其特征不同，用途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是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近年来的多项考古发现表明：西汉时期，我国的劳动人民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植物纤维纸，并初步用于书写。东汉和帝时期，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技术，并扩大了造纸所用的原料，不仅提高了纸张的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使纸张更便于使用。从此以后，纸张逐步推广和普及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图书的复制、流通和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造纸术的发明，是图书载体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出版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纸张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这一时期的图书载体仍以竹木和缣帛为主，纸张在东晋时期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这毕竟不能抹杀造纸术发明的伟大意义。所以说，两汉时期是中国图书载体多元并存的过渡时期，也是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七）产生了一批优秀图书编辑家，编撰了大量经典的传世之作。

据《全唐诗》、《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中国丛书综录》等书统计，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者有246人，而汉代多达931人[1]（笔者按：当然，其中并非所有的著作者都曾编撰过图书）。当代学者曹之总结两汉

【1】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39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图书编撰家为36位，如刘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班固、许慎、郑玄、蔡邕等，无一不是中国出版史上非常优秀的图书编辑家。他们有的整理注解前人图书，编订目录，如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班固著作东观，郑玄以一己之力，遍注群经；有的贯通古今，发凡起例，开创新体，成为后世典范，如刘安组织门客修撰图书、司马迁著作《史记》、许慎编写《说文解字》，等等。他们在长期的著述和编辑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编辑思想和经验，如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的步骤与方法，司马迁的编辑思想与技巧，许慎编写辞书的意图与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还有他们的精神与人格魅力，影响后世无数文人学者，至今仍在焕发着历史的光辉。由于这些优秀作者、编辑家和出版家的智慧创作与辛勤劳作，两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传世之作，《淮南子》、《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法言》、《论衡》、《说文解字》、《古诗十九首》等等，无不是中华典籍中的经典著作。所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出版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六章　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

第一节　两汉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

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的搜求、典藏和编校工作，设有专管官员及专门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并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对国家图书事业的控制。相较于周秦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制度，两汉时期显得更为完备，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汉代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随着国家藏书的大量聚集而逐步完善的。两汉时期的图书载体主要是竹木简牍与缣帛，体积很大，因而典藏机构众多，规模也比较庞大。据《宋书·百官志》、阮孝绪《七录序》和《三辅黄图》诸书记载，西汉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纂机构内有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石室、延阁、广内等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和理官等处。《后汉书》中诸篇记载表明东汉的政府典藏与编纂机构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宣明殿及鸿都等处。其中，石室与兰台自西汉延存至东汉。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下面分别简述之。

1. 石渠、天禄、麒麟三阁

三阁均为西汉时宫中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在未央宫内，都

是在萧何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石渠阁主要收藏汉初收集的重要图书典籍。《汉书·儒林传》引《三辅故事》:“石渠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三辅黄图》卷6载:

> 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石渠阁是西汉最早建造的国家图书典藏建筑，其设计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之所以建在水沟上，主要是为了防火。这显然对后世的藏书楼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天禄阁、麒麟阁也是萧何主持建造的。《三辅黄图》卷6载有“天禄阁，藏典籍之所”。又卷3引《汉宫殿疏》谓“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未央宫有天禄阁”。王莽时，扬雄继续校书于天禄阁。天禄阁既是藏书之府，又是编校整理图书的工作场所。

三阁的设立在中国藏书史和图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商、周至秦代各王朝尽管都设有藏书与校书处，但或者比较简陋，或者利用已有的建筑，像西汉三阁这样专门设计建造的图书典藏与编纂机构，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石渠”、“天禄”以后便成了皇家藏书之别称，直到清乾隆时期，尚有《石渠宝籍》、《天禄琳琅书目》之称谓，足见其影响之大。

更为重要的是，三阁不仅是图书的典藏机构，而且是西汉编校图书和学术研究的机构，兼有“处贤才”之功能。西汉的很多学者都曾在这里查阅资料或编校图书。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曾在这几个机构中遍阅图书。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林尊、周堪、戴圣、假仓等诸儒曾论“五经”异同于此。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又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临决。成帝

时，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的大规模校书活动也是在天禄阁进行的。班固在《西都赋》中曾对此加以描述：

> 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

从一定意义上讲，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还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图书之源，众多的图书在这里得到系统的整理，然后通过传抄复制等方式流传到民间，既普及了知识，又促进了图书的流通。

2. 石室

为两汉皇家典藏图书之机构，秦时已有，汉代因袭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称：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唐颜师古注称：“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可见，石室建于皇家宗庙之中，主要用以收藏重要档案文献，由太常主管。以石砌成，取其牢固。到东汉时，石室的功能基本仍其旧，但其中所藏天象、地情等灾变记录经逐年累积已渐趋庞杂。当时黄琼曾奏请开石室藏书，请朝廷派专人对石室内所藏汉初以来历年灾异记录文献进行整理、编排、分析。此外，石室中也藏有谶纬之类的图书。东汉末年，董卓挟持天子迁都长安，在战乱中，石室藏书也为之一空。

3. 延阁、广内、秘府

三个机构都是西汉中后期兴建的内廷藏书机构，一般外廷官吏不得入内。《汉书·艺文志》所说民间收集来的“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即指这三处。都是随着藏书量的增多而增建的，其

规模和地位显然不能和石渠、天禄、麒麟三阁以及石室相比。相关记载也比较少。《文选》李善注引刘歆《七略》云："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其中，秘府的地位较高，所以后代称宫中藏书为"秘书"、"中书"、"内书"或"中秘书"。

4. 太常、太史、博士、太卜

上述四处俱为西汉政府典藏图书之所，所藏图书大抵都与政府部门的职能相关，主要供"文史星祝"及太学生们使用。太常之名，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始定，为汉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太史、太卜皆为太常属官，博士也归太常卿兼管，所以上述四处说到底都可归之太常名下。太史属下官吏甚多，如太史令史，掌记瑞应、灾异之事；灵台待诏，掌星日天象、钟律之事，所以太史藏书范围应有上述内容。成帝时刘向等人大规模整理图书时曾利用"太常书"、"太史书"进行校雠。又桓谭《新论·正经篇》载："《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汉书·礼乐志》载："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是知太卜、理官也属典藏机构。此外，太祝、太宰等机构也可能藏有图书。总之，这些典藏场所与内廷藏书机构互为补充，规模可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5. 兰台

兰台是两汉宫内藏书及编撰图书之处，在西汉时为典藏御史台藏书之所，由御史中丞掌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又设兰台令史六人，他们除负责收藏图书外，还要负责监察劾奏百官。进入东汉后，兰台成为最主要的藏书、校书及编纂国史的机构。《通典》卷22职官四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当时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及班超、孔僖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之职，专"掌书劾奏"及"校书定字"。

兰台亦藏谶纬图书。《汉书·王莽传》称："甘忠可、夏贺良谶

书藏兰台。”《后汉书·王允传》载王允随董卓迁都时，“悉收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除了典藏图书外，兰台还兼有校书及编纂国史之功能。对此，唐杜佑《通典·职官典》陈说甚详：

>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王充《论衡·别通篇》也称：“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考之史实，可知此说不误。如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

> 〔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1]

[1]《后汉书·班固传》。

此外，班固与贾逵、傅毅等人还曾在兰台共同校理图书。

6. 东观

东观建于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位处南宫。先时，东汉官府图书多藏于石室、兰台，后来聚集渐多，无以处置，于是新建东观及仁寿阁，用以入藏新收之书。其中，东观又是主要的收藏处。章帝以后，东观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并取代兰台，成为东汉一朝国家藏书、校书及编纂国史的最主要机构。当时学者称之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2]，极为向往。在东观任职者为校书郎，又称东观郎，因其从事著述，也有称为著作郎的，如班固、贾逵、李胜等人都曾充职东观，日常以校典图书为其任。东观作为东汉重要的校书著述之所，集中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2]《后汉书·窦融传》。

（1）校定国家藏书

官府藏书制度建立后，东汉王朝依西汉故事，不断派员清理

校点图书。章帝、安帝、顺帝、灵帝时期，都曾组织人员在东观整理、校定国家藏书，而且规模都比较大，成果也比较丰富。

(2) 研究著述

东观也为著述之所。东汉的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傅毅、刘珍、蔡邕、曹褒、崔寔、边韶、延笃等，都曾先后在南宫东观尽心著述，史称"著作东观"。东观除了提供图书秘籍资料之外，官府还在人员编制、财粮供给方面，作出了妥善安排。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屡见于史书之中。如安帝永初年间：

〔刘珍〕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1]

[1]《后汉书·文苑列传上·刘珍》。

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正月，诏侍中曹褒校正西汉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诏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曹褒受命以后，于东观"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150篇，用二尺四寸简书写，于当年十二月奏上[2]。和帝即位后，曹褒又为所撰《汉礼》撰写章句。

[2]《后汉书·曹褒传》。

桓帝时，崔寔、延笃、朱穆、边韶等都曾著作东观。据《后汉书》载，延笃"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崔寔"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3]。

[3]《后汉书·崔寔传》。

当时，张奂认为《尚书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45万余言，就删减为9万言，并上奏给汉桓帝。桓帝下诏于东观平其议[4]。

[4]《后汉书·张奂传》。

灵帝时，在蔡邕等人的奏请下，于洛阳太学前立石，以正"五经"文字。当时卢植撰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深知当时《礼记》诸书过于繁冗，就上书灵帝："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

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于是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1]。

[1]《后汉书·卢植传》。

在所有的研究著述活动中，以《东观汉记》的编纂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它是东汉史官历经一百多年集体编撰的东汉全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编撰工作从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开始，直到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才完成，共历163年。期间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编撰活动，前后有20多位著名的历史学者参与。因大部分工作都在东观完成，故名《东观汉记》。

7. 仁寿阁

仁寿阁建于东汉初年，《隋书·经籍志》载：明、章二帝时，“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是东汉内廷藏书处之一，主要用以聚集新收图籍。明帝时，马严、杜抚、班固等人曾应诏命在此校定《建武注记》，可见此处同样也是国家的图书典藏与编校处所之一。

8. 宣明殿、辟雍、鸿都

这三个机构或为内廷，或为国家学府，均非专门的图书典藏机构，但又都在东汉时收藏有一定图书。《后汉书·儒林列传》“序”提及董卓移都时王允带走的图书中便包括这三处的藏书。又，桓郁曾授经明、章二帝，甚得宠幸，永平年间，曾奉诏于宣明殿校定《五家要说章句》。由此可知宣明殿也有编校图书之职能。

东汉末年，随着藏书的不断丰富以及校书、著书活动的不断增加，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东汉政府创置了我国古代中央政府中第一个主持图书校著的专门机构——秘书监。秘书监隶属于太常寺，既是机构名称，又是该机构最高长官的名称。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2]。它的设立对中国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秘书

[2]《通典·职官典》。

监(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成为历代定制，各个朝代都依例设立执掌图书的官员。唐、宋以后，虽然官职名称代有更迭，但秘书监之名一直未废，明、清时期才去其名，并入翰林院，故此名沿用历时长达1 000余年。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职能也在不断地增加和健全。总的来说，典藏、编校、著述是这些机构共有的三大职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政府的图书出版活动尚未形成体系之前，这些机构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出版机构的很多职能。编校图书、著述新作，已是出版活动的核心工作。经过整理、编次的图书又经过种种途径颁行天下（如师徒授受、赏赐臣下、刊刻石经等)，可以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这样，围绕着图书典藏与编纂机构，两汉政府的出版活动便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也是当时的政府出版机构，只不过较之后世的出版机构，其职能尚未完全具备而已。

第二节　西汉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

一、西汉初年的图书征集和编校活动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41年，是西汉图书征集与编校活动的恢复与草创时期。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秦末的农民战争，先秦的图书典籍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西汉政权建立以后，逐渐改变轻视文教事业的倾向，开始有步骤地征集图书，并根据实际需要编纂了一些图书，使得西汉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西汉政府在图书征集和编校活动中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萧何收集秦籍与群臣编定图书

早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图书搜集工作。公元前206年，刘邦军队攻入咸阳，萧何便注意收集秦朝中

央政府的藏书，史载当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这里所说的图书既有图书，又有地图档案等文献。萧何的远见卓识使得这部分图书档案避免了遭受项羽的焚毁，使秦朝为数不多的图书典籍得以保全。后来，这部分图书对刘邦夺取天下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部分图书就成为西汉政府藏书的基础，也是西汉建国以后制定政策、法律和朝仪、礼法的参考依据。

【1】《史记·萧相国世家》。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民生凋敝，社会不够稳定，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稳定新生的政权，所以还无暇顾及文教事业。汉高祖刘邦崇尚黄老之学，与民休息，对稳定政权和恢复生产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对文教事业重视不够，轻视儒学和儒生，继续实行秦代的挟书之律，致使图书事业未改建国之前的萧条景象。对此，西汉学者刘歆曾有具体的描述：

>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2]

【2】《汉书·楚元王传》。

但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汉高祖也开始组织文臣武将编撰、整理法律、兵法和仪礼方面的图书，“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3]。萧何在收集的秦朝藏书的基础上，“取其宜于时者”，制订出汉初的法律章程——《九章律》，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韩信和张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他们大量搜集兵书，共得182家，经删选、编次，最终定著为35家。张苍为西汉制定律历，“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4]。叔孙通率领

【3】《史记·太史公自序》。

【4】《汉书·张苍传》。

鲁国儒生，参照古礼及秦朝礼仪，编出了汉初的朝仪礼法，是为《汉仪》十二篇。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编撰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多由名臣名将主持编撰，二是主要根据统治者的现实需要进行，实用性很强，主要集中在法律、兵法、朝廷礼仪方面。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竹简文献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帛书文献，皆不见经书，多为兵家、法家和道家之书，有力地印证了当时图书编辑整理活动的重点之所在。由于这些图书主要为统治者服务，所以其流通范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汉高祖时期的图书编撰、整理活动还不成规模和系统，其方法也较为简略，不成体系。

2. 废除挟书之律与征召天下遗书

汉高祖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了自秦以来执行了20多年的挟书律，开始允许民间著书、藏书和讲学。挟书律的废除是西汉图书编辑出版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政策上为汉初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扫清了障碍，保证和促进了图书的正常生产和流通。挟书律从公元前213年颁布，到公元前191年废除，其间先秦典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多文献全凭民间收藏和少数儒生的记诵得以保存。如果挟书律还继续实行下去的话，很多先秦时期的图书典籍就有可能永远消失，这也会极大地影响西汉时期的图书生产和流通。史载挟书律废除以后，“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正说明了其积极的意义。其次，挟书律的废除为西汉学者研讨学术问题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发展，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隋书·经籍志》谓：“惠帝除挟书之律，儒家始以其业行于民间。”不唯儒家学说如此，诸子百家之学在这一政策的保护下也得到了发展。文化学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进

【1】《史记·吕太后本纪》。

一步发展。

继汉惠帝之后的文、景二帝都是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全国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二帝开始有意识地征集天下遗书，“诸子百家语”都在征召的范围内，儒家经典也开始受到重视。挟书律废除以后，一部分儒家著作通过儒生的口述得到流传和整理。在这种情况下，文帝开始派人学习整理儒家经传。他派晁错到山东从伏生受《尚书》，得今文《尚书》29篇。此后，他又为《诗》、《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先秦以来的儒家经典的收集和整理。在皇帝的征召下，民间也开始向朝廷献书。《汉书·艺文志》载：“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这是西汉民间向朝廷献书的最早记载。到景帝时，文化事业开始兴旺。史载当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1]。这说明朝廷征召、整理图书的措施已初见成效，国家藏书也已略具规模。

【1】《汉书·楚元王传》。

3. 藩王的征书与编书活动

西汉前期，除了中央政府征集和编校图书以外，各地的藩王也纷纷仿效朝廷征集先秦旧籍，并组织门客整理、编撰图书。他们的征集和编校活动与中央遥相呼应，互为补充，为西汉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

刘德乃景帝之子，雅好儒学，在其封地广立学官，大兴儒学之风，他征集的图书以先秦儒家著作为主。史载他好书情形：

>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

《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1]

【1】《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河间献王征集来的图书数量相当多，其规模几乎与当时的中央政府藏书不相上下。他还组织学者对这些用重金征集的“古文先秦旧书”进行了编次整理，因此当时很多图书都率先出自他的封国，影响非常大。这可以说是汉初以来第一次对儒家经典进行的比较有规模的系统整理。

与河间献王不同，淮南王刘安所征集的图书以先秦诸子百家为主，其中又以黄老之学居多，所以史称他“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他不仅对这些图书进行了整理，还在此基础上组织门客，撰文立说，编辑修撰了大量阴阳道家方面的图书，使淮南一地成为南方有名的文化中心。史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2]

【2】《汉书·淮南王传》。

这里所说的《内书》就是著名的《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这是一部以道为主，糅合儒、墨、名、法、阴阳等家的杂撰之作，是刘安为西汉王朝提出的治国安邦的理论纲领，也是对汉初数十年治政理论和实践进行的概括和总结，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淮南子》以外，刘安主持编撰的图书尚有《淮南外》三十三篇、《淮南中篇》、《离骚传》、《颂德》、《长安都国颂》等。据《汉书·艺文志》及其他史料记载，另外还有《淮南道应》、《琴颂》、《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

《淮南歌诗》、《淮南杂子星》、《淮南八公相鹤经》、《淮南王食经》、《淮南记》、《淮南变化术》、《淮南万毕术》等。这些著作大多失传，有的只留下片断。在这些图书的编撰过程中，刘安承担了主编的角色，颇类似于吕不韦组织门客撰修《吕氏春秋》之例。就其编书之多和质量之高而言，淮南王堪称是西汉初年最为优秀的图书编辑家。

4. 古文经书的发现

西汉前期，儒家经书主要依靠秦时博士的口头传授得以保存，这些经书经汉人用隶书写定以后，是为今文经书。与此同时，民间也不断发现用古文写定的经书，这些经书在文字、篇章等方面都与今文经书有很大的区别，是为古文经书。古文经书的发现，丰富了汉代的图书典籍，繁荣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也导致了此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长期论争。除了上述窦公所献的《大司乐》章以及河间献王刘德所征集的大量先秦古籍外，古文经书还有以下几次发现：

(1) 鲁国淹中（里名）所出《礼》古经。《汉书·艺文志》云：

> 《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2) 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古文《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因为这些图书是在孔宅夹壁发现的，因此被称为“鲁壁藏书”。这是两汉时期对先秦古籍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发现。此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刘歆传》、《汉书·艺文志》、《论衡·案书》和《说文解字绪》等文献，而以《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最为详细：

>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1]，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

[1] 据学者考证，“武帝”当为“景帝”之误。

《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可见当时的民间学者孔安国对这批先秦古籍进行过考订和整理，并献给朝廷。但这批古籍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列入官学。不过，这次发现对以后的今古文论争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之，经过60余年的发展，在中央政府、地方藩王及民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汉初年的图书征集和编撰工作已初见成效，为此后的编辑出版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汉中期的图书征集和编校活动

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49年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都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也由汉初黄老的“无为”转向儒家的“有为”，开始重视文化学术事业。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设置五经博士，排斥黄老刑名之言于官学之外，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一文化政策对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它对当时的编辑出版活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诸子图书数量明显减少，而儒家经传的数量却直线上升，名目和内容形形色色，致使历代的统治者和民间学者都要为整齐百家杂语、“正五经异同”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西汉王朝的全面繁荣为图书的征集和编辑整理活动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经过统治者和民间学者的努力，这一时期的图书整理和编校活动呈现出了初步繁荣的景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至武帝时，由于先世的努力和积累，国家藏书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但由于统治者长期以黄老学说治理国家，对文教事业不甚重视，认识不到图书编辑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文景之时，虽有征集，但对搜集来的图书基本上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书缺简脱，礼坏乐崩"[1]的现象。对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他一方面继承前代皇帝的做法，继续广征天下遗书，令丞相公孙弘"大会天下之书"，主持其事。具体的做法是"命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2]。不仅规模浩大，而且征集活动已经程序化，比起前代的零星征集活动已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一政策的号召下，从皇亲到民间，纷纷将藏书献归朝廷。如河间王刘德献有《乐记》、《古礼》、《毛诗训诂》等书，淮南王刘安献有《内篇》、《颂德》、《长安都国颂》等书，鲁恭王刘余呈献的是从孔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先代典籍，也有无名氏"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3]。由于这次广泛的征集活动，西汉政府的藏书量大为增长，于是"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4]，"遗文古事，靡不毕臻"[5]，颇有盛世之气象。另一方面，武帝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6]，建立专门的藏书机构，并设置了专职的图书管理官员。这些措施的实施，为西汉的图书征集和编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书的大量增加，迫切地要求政府对图书进行一次系统而全面的编辑整理，但是，由于汉武帝一直忙于"外攘四夷，内改法度"，还无暇对秘府中的图书加以整理，所以这项工作就一直付诸阙如。但为了军事之需，汉武帝令军政官杨仆收集天下遗逸的兵书，妥为校理，作《兵录》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专科目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时期的图书事业，重在收集和典藏，而对整理与编校则相对重视不够。

【1】《汉书·艺文志》。

【2】《隋书·经籍志》。

【3】刘向：《别录》。

【4】《汉书·艺文志》。

【5】《隋书·经籍志》。

【6】《汉书·艺文志》。

2. 石渠阁会议

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都继承了武帝的图书政策，屡次进

行图书征集和编校活动。自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开始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由于经学家法和师法的不同，对同一部经书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说。加之大量古文经书的出现，导致经学形成古、今文两派，师承和解说都相去甚远。这就难免会让学者不知所从，这对统治者的统治也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汉宣帝刘询便亲自出面审定经义，主持整理经书，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在石渠阁会议召开之前，宣帝先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诏令五经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评论《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异同。当时参加这次议论的《公羊》家博士有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及内侍郎许广，《谷梁》家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及内中郎王亥；另有萧望之等十一人，共计二十一人，辩论三十余事，最后由萧望之等各以经义评判，"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算是对《春秋》经传的一次系统的整理评判。

在这次评议的基础上，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下诏令诸儒讲五经之异同，宣帝亲自称制临决。这就是石渠阁会议。《汉书·儒林传》对此事亦有记载。石渠阁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亲临裁决，对五经义理进行公开评论的官方学术会议，其意义十分重大。会议先由诸儒"讲五经异同"，然后由皇帝作出裁决，对经义加以取舍，最后定于一尊。这标志着皇权对学术和思想统治的确立。这次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四家经学博士。这次会议留下的文献，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书议奏》42篇，《礼议奏》38篇，《春秋议奏》39篇，《论语议奏》18篇，《五经杂议》18篇，共155篇。这些经过整理的文献现在大都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通礼类辑有《石渠礼论》1卷。从这次会议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来看，石渠阁会议其实也是由最高统治者出面对西汉建国以来所有儒家经传进行的一次编辑整理活动。它的确起到了"正五经异同"的作用，并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3. 古文经书的继续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这一时期古文经书又有三次发现：

(1) 民间壁中得《尚书·泰誓》。刘向《别录》：

> 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

(2) 昭帝时，鲁三老所献古文《孝经》。这次发现的《孝经》到东汉光武帝时才由卫宏予以校订。

(3) 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易》、《礼》、《尚书》。《论衡·正说篇》：

> 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三、西汉后期的图书征集与编校活动

从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西汉国势逐渐衰微。政治腐败，外戚专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但在图书的征集和编校方面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方面是有前代的长期积累作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汉成帝采取了大规模征集和编校图书的举措。这一时期是西汉图书编校事业的繁荣与鼎盛时期。

为了进一步网罗天下典籍，汉成帝便派谒者陈农出使四方，"求遗书于天下"[1]。这是史料记载中西汉政府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图书。这样，国家藏书就空前地丰富起来，取得了"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2]的良好效果。从汉初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图书的征集工作，对图书也有零星的编次整理，但都不成系统。图书数量的空前增加，客观上要求由政府出面对国家藏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此外，皇权的衰微也迫切地需要用"汉家制

【1】《汉书·艺文志》。

【2】《文选》李善注引刘歆《七略》。

度”统一思想和学说，而儒家学术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需要进行一次彻底而全面的整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成帝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令由著名学者刘向统领，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这次整理活动共经20余年，当时的很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不仅对所有的图书进行了校雠，还为每本书写了书目提要，并编创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图书目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是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汉书·艺文志》记载此事说：

>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可见，刘向、刘歆父子不仅亲自编辑校对图书，而且还承担了主编的责任。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类由刘向亲自主持，兵书类由步兵校尉任宏主持，数术类由太史令尹咸主持，方技类由侍医李柱国主持。据考证，参加编辑校雠工作的，还有杜参、房凤、王龚、苏竟、卜圭、富参、萧望之、扬雄等学者，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博学之士，在各自专业内都是当时最好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参加是这次图书编辑整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各位专家学者整理完每本书后，都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切实承担了主编的责任。刘向等人校书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始，到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止，前后共进行了

21年之久。其间刘向于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去世，由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主持完成此项工作。共计整理了596家13 269卷，无论就其规模之大，还是方法之完善而言，都是空前的，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刘向等人编辑整理群书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1. 广辑众本，补缺去重。由于口耳相传的失真，或师承家法的不同，当时的同一本书可能有很多的版本。刘向等人编辑校雠图书的第一步，是先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尽量搜集起来。根据其校书的记录，他们网罗的众本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国家藏书，叙录中所提到的"中书"、"太常书"、"太史书"均属此类；二是大臣所藏的私家书，即叙录中所谓"臣向书"、"臣富参书"等；三是陈农到民间搜访的天下遗书。汇集众多的同书异本，是编辑整理群书的先决条件。当时图书大多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众本汇集起来以后，必然有异同。刘向等人则要合校众本，互相补充，并为其编定顺序。例如《管子叙录》："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列子叙录》："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复，定著八篇。"其他如《孙卿子》（即《荀子》），由322篇校定为32篇；《晏子春秋》，由30篇838章中校定为8篇215章。又如通过互相补充相关图书，将《战国策》定为33篇。经过这番补缺去重的工作，不但提高了书籍的学术价值，而且也防止了书籍单篇的散佚。

2. 校雠全文，厘正文字。在微观上，刘向等人对图书内容和文字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校雠审定。他们编辑整理文字内容的方法大致有两类，即"校"和"雠"。所谓校雠，刘向解释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1]；"一人持本，一人读析〔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2]。由于在此之前有网罗众本、补缺去重的工作，因而使得这项工作有良好的基础。古籍脱篇、倒篇、错字、衍字现象很多，使得这一工作相当繁重，而且需要编辑校对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如刘向校《尚书》时，即以内府所藏古文本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相校，结果发现，"《酒诰》

【1】《文选·左思〈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

【2】《太平御览》卷618引刘向《别传》("传"为"录"之误)。

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1]。当时不但要将众本之异一一记录下来，而且还要择善而从，厘定文字。经刘向等人编辑校定的新本质量很高，现在流传下来的整部的先秦古书几乎都是经他厘定过的新本。

[1]《汉书·艺文志·书类序》。

3. 编定目次，确定书名。图书篇章、目次混乱者皆经过重新调整。如校《说苑》、《杂事》等书，刘向把“章句相混，上下谬乱”者“一一条其篇目”，使之“以类相从”编定目次，“称为《新苑》”。当时流传下来的先秦古籍多集篇而成，大多图书有篇名而无书名，后世流传，也多不相同。刘向编辑整理图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图书的具体内容和篇章结构，为图书确定名称。如《战国策叙录》：“中书本号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所确定的书名，多为后世所因，影响十分深远。

4. 撮其指意，撰写叙录。每一部书籍在编定之后，刘向都要撰写一篇叙录，以说明本书撰者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编辑校对情况等等，其实就是后来的提要或内容简介，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两部分内容。以《晏子叙录》为例：

> 内篇谏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内篇谏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内篇问上第三凡三十章，内篇问下第四凡三十章，内篇杂上第五凡三十章，内篇杂下第六凡三十章，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
>
>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

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著者按，此下疑有阙文）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弟录。臣向昧死上。

刘向的叙录写作已具一定的程式化，依次为：（1）定本篇目；（2）校定过程（包括书稿来源、总篇数及校定篇数、文字脱误情况等）；（3）作者简介及学术渊源；（4）对本书的评价。其大要正如《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说“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以及《七录序》所说“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5. 杀青定稿，缮写上奏。刘向等人每编定一部书，由刘向撰写好序录后，都要完整地抄录到竹简和缣帛之上，作为国家的权威版本。即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在事后为每书作的叙录上几乎都有这样一句话：“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杀青”实际上是竹简加工的过程。刘向解释说：

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1]

[1]《太平御览》卷606"简"引《风俗通》。

因在烘干过程中竹简由青转黄，因而称"杀青"。在这里，杀青的意思引申为把校过的书籍写定在竹简上。"可缮写"就是将校定的书籍誊写到缣帛上去。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经刘向等人编定的书籍似乎都抄写了两部保存在宫廷中。

6. 剖判艺文，编成目录。由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刘向、刘歆不但为每部书写下了较为科学、权威的叙录，而且已将它们放在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图书编目系统中，在我国目录史上首创图书分类目录。这主要反映在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中。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卷2说："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乃后世目录之鼻祖"。《七略》所分图书类目，由"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可知，其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其分类体系大致如下：

辑略：总序；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著录图书129家，2 926篇，图1卷；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著录图书187家，4 346篇；

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20家、陆贾赋之属21家、孙卿赋之属25家、杂赋歌诗5种，著录图书106家，1 313篇；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著录图书66家，1 375篇，图44卷；

术数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种，著录图书110家，2 557卷；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著录图书36家，862卷。

共著录图书6大类、38种、634家，13 397篇，图45卷。

刘向、刘歆父子秉持宗经崇儒的思想，根据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六分法的图书分类方法，对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类，最大的特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形成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

在整理国家藏书的过程中，刘向将所撰写的叙录集合起来，形成《别录》一书，相当于编辑整理群书的学术总结和工作报告。《别录》之后，刘歆又在其基础上编成《七略》，它们之间的关系，颇近于后世的《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别录》和《七略》现在都已失传了，但从后世的辑佚本和《汉书·艺文志》中仍能窥其一斑。作为中国历史上成型的书录解题著作，这两部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既是群书目录，同时也是优秀的学术著作，是西汉以及西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系统总结，对中国千余年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当代学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对《七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1]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努力，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最终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国家藏书总数达到了1万3千余卷，整体质量也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史书称述"汉之典文，于斯为盛"[2]。这也标志着西汉图书编辑出版事业鼎盛时期的到来。东汉荀悦在其《汉纪》中对这次图书整理活动予以很高的评价："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析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陈登

【2】《隋书·牛弘传》。

原也评价说：

> 以古代著述之难，工具之拙，此数不无可惊。且其时私人藏书之业，并未发达，要籍秘典，大都聚于公府。所聚至此，自亦难得。[1]

[1]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16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四、莽新时期的图书搜集与编校活动

汉成帝以后，西汉政权更加衰微，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王室大权旁落，外戚掌握着统治实权。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至汉平帝时，西汉政权已是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王莽执掌朝政。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这一年直到公元25年东汉政权建立，西汉的图书征集和编校活动在达到短暂的极盛期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所以这一时期可称为西汉图书编校活动的盛极而衰时期。

王莽在执政期间，为了笼络知识分子，也比较重视文教事业。当时在各郡县普遍设立学官，将博士名额扩大5倍，并征召天下通古文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医学、药学等各方面的“异能之士”来京师讲学，“前后至者千数”。他还立古文经《毛诗》、《逸礼》、《尚书》、《周礼》为学官，设置博士，并将太学生名额增至上万人。随着太学生的急剧增多，王莽于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东郊大兴土木，扩建太学，能容纳万人以上。为了适应太学生的读书需要，还在太学附近设立了书籍集市——槐市。槐市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出版活动已开始走向成熟。由于一系列有利于文教事业的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图书出版事业就在西汉图书出版事业高度繁荣的基础上达到短暂的极盛期。

王莽画像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致使天

下震荡，社会动乱加剧，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入长安，“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1]。就是在这次浩劫中，西汉一代历经200余年积聚起来的图书典籍被焚毁殆尽，出现不久的槐市也如昙花一现般被荡为废墟。所以《后汉书·儒林传》曰：“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也曾说西汉一朝的图书因“王莽之乱”而被“焚烧无遗”。隋代的牛弘曾将这次图书的兵燹之灾视为继秦始皇焚书之后的又一次浩劫，足见当时损失之大。他的“书厄”之论可为西汉一代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作一言简意赅的总结：

[1]《汉书·王莽传》。

> 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2]

[2]《隋书·牛弘传》。

第三节　东汉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

西汉末年的大动乱给图书典籍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从此，汉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又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东汉的图书出版事业与西汉一朝一脉相承，虽然中间经历过20多年的混乱和战争，但这并不影响东、西两汉图书出版事业的紧密相关性；另一方面，因

时势的不同，东汉的图书出版事业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特征。具体到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也是如此。

根据东汉时期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把东汉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分为三个时期。

一、东汉前期的图书征集与编校活动

这一时期从公元25年到公元88年，历光武、明、章三帝，是东汉时期编辑出版事业的恢复发展与复兴时期。东汉一朝的皇帝普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雅好儒术，珍爱典籍，重视图书的征集与整理工作。东汉除殇、冲、质三个短命天子外，还有九代，据现存的史籍所载，其中至少有六代从事了图书的整理工作。前期的三位皇帝就是其中的典范。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使经济、文化都转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并初现繁荣景象。史称这段历史时期为“光武中兴”。此后的明、章二帝继承了光武帝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在图书的征集和编校方面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东汉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开始呈现出“复兴”的迹象。

1. 诏求亡佚，购募以金

西汉末年的战乱使天下“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图书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东汉政权建立以后，最高统治者便不遗余力地征集散佚的图书。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即爱好经术，他20岁时入长安太学，受《尚书》，深明大义，博览多识。以后在征战中，虽“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1]。在持节河北、开基立业时，就注意收罗在战乱中遗散的图书。

廓清四海以后，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网罗天下儒生博士的举

【1】《资治通鉴·汉殇帝延平元年》。

汉光武帝画像



措。一方面，重建毁坏于战乱中的太学，并访求儒雅之士，为置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另一方面则"诏求亡佚，购募以金"，以重金征集图书。并重建石室、兰台等藏书校书机构。《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

学士云集京师，成为统治阶层中的重要力量，促进了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而且，由于这些"四方学士"皆"怀协图书"，"抱负坟策"，他们的到来，也为东汉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使东汉初年的国家藏书得以充实。除了这些学士携带的图书之外，民间在"购募以金"政策的吸引下，也纷纷将图书献归朝廷。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迁都洛阳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1]，经过不断的努力，朝廷的藏书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1】《后汉书·儒林列传》。

光武帝以后，继位的明、章二帝尤其笃好文雅。明帝幼而好学，10岁便通《春秋》，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继位后，便重建三雍，并为功臣子孙、四姓小侯子弟开设学校，置五经师。他还亲自讲论经书，使儒生问难于前。他继续征集图书，并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东观和仁寿阁，作为朝廷收集、编纂、校勘和著述图书的官府机构，并命班固、傅毅等人典掌其事。继明帝之后的章帝少而宽容，雅好儒术。又依宣帝石渠阁故事，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的异同。明、章二帝的做法深得人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隋书·经籍志》述其事曰：

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

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通过明、章二帝的努力，东汉政府的藏书量进一步增加，而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促进了东汉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也对当时的编辑出版事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2. 宣布图谶于天下

西汉末年，在王莽的提倡下，谶纬之学甚嚣尘上。刘秀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也利用图谶造势。因此，等他即位以后，就十分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甚至用人行政，也要以是否通谶纬之学为重要标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还命"博通经记"的学者尹敏和"善说灾异谶纬"的薛汉整理图谶书籍[1]，删去为王莽制造舆论的内容，编定为81篇，并于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2]。其中包括河图、洛书45篇，七纬36篇。这就意味着使谶纬书籍定型化，并且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讲，则是一次政府的出版活动，出版物就是谶纬书籍。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拉开了东汉图书出版事业的序幕。在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兴盛一时，谶纬图书也遍布天下，学术思想领域一片乌烟瘴气。《后汉书·方术列传》说：

> 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

光武帝之后，明、章二帝亦重谶纬之学，甚至以谶纬学说评定儒家经传。《后汉书·张衡传》说：

[1]《后汉书·儒林列传》。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隋书·经籍志·谶纬》载汉明帝时情形：

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谶纬之学的兴盛，对东汉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形式上说，谶纬图书是东汉一代特有的出版物；从数量上讲，其泛滥程度可想而知；从思想内容上讲，诸儒不仅对谶纬图书自身"骋驰穿凿"，而且还以其为标准正定五经章句，被后人批评为"妖妄"而"乱中庸之典"，对其他出版物的内容也大有影响。究其兴盛的根源，主要在于东汉初期几位皇帝的大力提倡和广为宣布。

3. 编校图书，组织学者"著作东观"

在图书编校方面，东汉初年，儒家章句之学的繁复琐碎程度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传注解说之词，动辄数十万言，甚至百余万言，以至"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1]。删减章句以利学者研读势在必行。面对这种情形，光武帝也深感有删省的必要。史载他于"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2]。但由于种种原因，竟未能付诸实施。

光武帝以后，明、章二帝开始组织人马编校图书。明帝时建东观和仁寿阁，并命专人负责掌管典藏与著述之事。其中，东观是东汉一朝国家藏书、校书及编纂国史的最主要机构。东汉一代的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傅毅、刘珍、蔡邕、曹褒、崔寔、边韶、延笃等，都曾在东观从事过图书的编辑、校对工作，有的还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尽心著述，写就了很多著名的篇章，史称

【1】《汉书·楚元王传》。

【2】《后汉书·章帝纪》。

"东观著作"。明帝时的贾逵"与班固并校秘书"[1]，整理编校国家藏书，前后时间达20余年，直到章帝时才结束。在这次图书整理过程中，史学家班固还附带编制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这也是现存第一部完整的书目。《汉书·艺文志》系在《七略》基础上增删编撰而成，它概览性地反映了我国上古至西汉国家藏书的源流、传授、变迁，具有珍存前史、启迪后来之功，同时也是研究东汉以前图书出版史的重要史学资料。此外，东汉著名的当代史学著作《东观汉记》也于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开始编纂，班固、尹敏、孟异等学者都从事了这项大型的编纂活动。

[1]《后汉书·贾逵传》。

除了"东观著述"以外，明帝时，马严、杜抚、班固等人还曾应诏命在仁寿阁校定《建武注记》。永平年间，桓郁曾奉诏于宣明殿校定《五家要说章句》。只不过其规模远不如"东观著述"。

4. 召开白虎观会议，正五经异同

除了上述零星的编校活动以外，汉章帝依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论五经异同，并以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对儒家经传进行了又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裁决。这就是著名的白虎观经学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校书郎杨终提议召开的，他向章帝奏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2] 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下诏付诸实践，其诏曰：

[2]《后汉书·杨终传》。

>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

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1]

【1】《后汉书·章帝纪》。

于是，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2]。

【2】《后汉书·章帝纪》。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数十人，其中最著名的经学家有丁鸿、成封、桓郁、楼望、贾逵、李育、班固等。《后汉书·儒林列传》亦曰：“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会议结束以后，章帝令班固根据诸臣的议奏撰集为《白虎通义》。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之久和参加人数之多来看，其规模远盛于之前的石渠阁会议。

章帝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首在减省章句，纠正经学烦琐的弊病；其次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共正经义”，改变“章句之徒，破坏大体”的现象。从这次会议的结果《白虎通义》的内容来看，这两个目的都已基本达到。《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白虎通义》以简明精确的语言集中论述了43个专题，几乎包括了封建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妻这个封建伦常的核心，对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进行全面的总结，同时又博采众说，把各家各派能发挥的封建宗法思想提炼成为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正经义’的目的，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3]。

【3】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12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白虎观会议是继宣帝石渠阁会议之后由皇帝亲自出面对儒家经传进行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整理活动，它对此后的儒家经传图书

的编撰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东汉图书编校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过光武、明、章三帝的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东汉的图书典藏机构逐步健全，官府藏书也逐步丰富起来，并为当朝学者称道。时称藏书机构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1]。在图书编校方面，这一时期着重在对儒家经传之作进行清点和订正，并取得了具有总结性的成果，这是与东汉初年的政治需要相符合的。所以，这一时期为东汉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恢复发展和复兴时期。

[1]《后汉书·窦融传》。

二、东汉中后期的图书编校活动

这一时期从公元89年到189年，历和、殇、安、顺、冲、质、桓、灵八代，为东汉中后期。百年之间，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政治逐渐腐朽糜烂不可言，国势也趋于衰微。但图书的编校、出版事业却持续发展，并于桓、灵之世达到鼎盛时期。因此这是东汉图书出版事业的持续繁荣与鼎盛时期。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 继续不断地“雠校汉家法”

这一时期的执政者普遍重视图书事业，持续几代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编校工作。关于政府组织人员编校国家藏书的记载屡屡见于史书之中。安帝即位后，邓太后临朝听政，十分重视图书的编校工作。邓太后名邓绥，6岁读史书，12岁通《诗》、《论语》，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她为皇后以后，史载：

> 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2]

[2]《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

这次校书共组织了50余人，编校对象主要为“传记”之书，

【1】《后汉书·安帝纪》。

【2】《后汉书·蔡伦传》。

【3】《后汉书·伏湛传》。

目的在于使其符合汉代“典章”的要求，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她先于永初四年（110年）令刘珍、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后来又在元初四年（117年）因“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并命造纸术的改进者蔡伦（时任长乐太仆）监典此事[2]。这一时期参与国家图书编校的官员、学者中，刘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刘珍（？—126）字秋孙，南阳蔡阳人，历任谒者仆射、侍中、越骑校尉等职。任职期间，除多次受诏校理图书外，还参与了官修史书的编撰工作。永宁元年（120年）奉诏续撰《东观汉记》，分著《建武以来名臣传》以及光武帝至安帝的帝纪、年表等。

安帝之后，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又诏命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等图书[3]。元嘉中（151—153年），桓帝复诏伏无忌、黄景、崔寔等共撰《东观汉记》。伏无忌，琅玡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其先祖西汉济南伏生、高密太傅伏理，均为当时名儒。伏无忌博学多识，继承家学，传习儒业。他于校书撰书之余，博采古今史料，删繁著要，上自黄帝，下讫汉质帝，成《伏侯注》8卷。

灵帝建宁三年（170年），著名学者蔡邕受任郎中，“校书东观”。以后又主持刊刻“熹平石经”。

这一时期的图书整理和编校活动，多是对国家藏书的全面整理，涉及面甚广。与前期相比，并不局限于儒家经传之文，除了五经文字以外，还有诸子百家、传记、艺术等图书。这是图书大量增加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这些编校活动的目的也比较明确，除了“整齐脱误，是正文字”以外，还带有“雠校家法”的目的，即看经文的文字和内容，是否符合东汉政府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图书编校活动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

2. 刊刻“熹平石经”

自和帝以后，东汉经学开始走向衰微。《后汉书·儒林列传》叙其衰败之迹曰：

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桓帝以后：

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说明自和帝之后，经学已急剧衰微。其表现之一就是不依章句，不尊师法，致使经学错乱，典籍散落。和帝时，司空徐防上疏指出：

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1]

[1]《后汉书·徐防传》。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中期几代皇帝虽对经传之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整理，但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经学错乱、典籍散落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由于今、古文经学之间争论更加激烈，又加以谶纬之学的泛滥，以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2]。这样，由政府出面对儒家经典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校正，就成为势在必然之事。恰好在这时候，在党人相争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私贿兰台令史，偷改漆书经文事件。汉代既然将儒经立为官学，就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原始依据，这就是藏在皇家藏书楼——兰台里的漆书写本，称为"兰台漆书"，可是博

[2]《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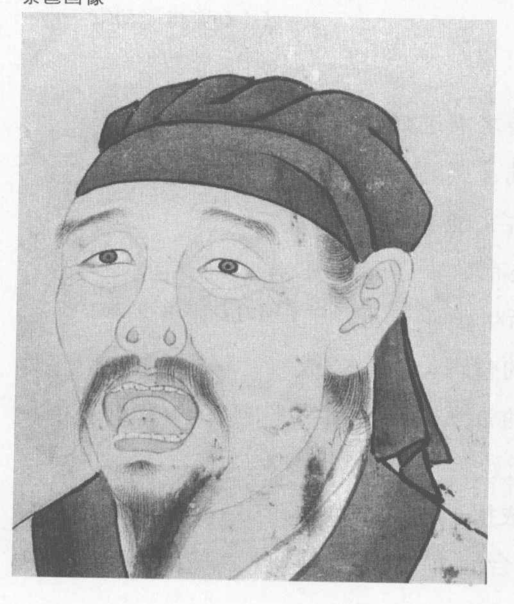
士官及其门徒手中的经书经过辗转传抄，文字已大有差异，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打击对方，“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上述情况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他们便奏请灵帝下令正定六经文字。其中以蔡邕最为积极。蔡邕（132—192），东汉后期著名的学者和辞赋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音律，擅长辞赋。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于东观，迁议郎。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向汉灵帝提出了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据《后汉书·蔡邕传》：

>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蔡邕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书法精妙，尤以隶书见长。他“自书丹于碑”，足见他对石经刊刻工作的认真负责。这部石经因始刻于熹平四年（175年），故称熹平石经，至光和六年（183年）刻成，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有《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字体一律采用今文隶书，故又谓“一体石经”、“一字石经”。《后汉书》对“熹平石经”的记载十分详细，但《儒林传》说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则显然不对。后来的很多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欧阳棐的《集古录目》都以误传误。从现有的出土原物看，足以证明熹平石经只有一种隶书，此后的曹魏石经才是“三体石经”。

蔡邕画像



"熹平石经"的刊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政府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大规模校正活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政府编辑出版活动，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熹平石经"的刊刻是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它是东汉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出版的概念考察，"熹平石经"的刊刻已基本具备了出版活动的三要素：选编作品、传抄复制、广泛传播，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选编作品自然不用说，石经的底本是从汉代许多版本里精选而来，将最佳的本子刻为正文，而附以他本的异文。如《诗》用鲁诗，而附有齐诗、韩诗异文；《公羊传》用严氏本，而附颜氏异文；《论语》后附毛、包、周诸家异字。在刊刻过程中，还有专人进行校对和监督，可以考证者至少有25人。至于传抄复制和广泛传播，则是通过阅读和传抄石经的人们来完成的。史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1]。正是通过这种"观视及摹写"的方式，石经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今日网络出版中的"下载"。从石经自身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也已基本具备图书的要素，而且是一部很有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丛书。只不过载体材料是石头，不同于以往的竹木简牍与此后的纸张，它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书"，是一种形制比较特殊的出版物。虽然在"熹平石经"之前，东汉朝廷一直对儒家经典进行"整齐脱误，是正文字"的雠校工作，但要论持续时间之长，整理范围之广，校雠质量之高，影响程度之大，以前的图书编校工作都无法与"熹平石经"相比。"熹平石经"的刊刻与当时民间学者马融、郑玄等人的编辑整理活动相映成辉，标志着东汉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繁荣时期的到来。

【1】《后汉书·蔡邕传》。

其次，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标准本教材，在经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东汉政府校正经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扼制弊端，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和规范性。采用当时盛行的刻石方式，又有其展示性和永久性。铭刻于石，公之于众，既不易再被改篡，又能广为众人阅读摹写，立石者更希

望其传之久远。“熹平石经”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刻石者的预期目的，后生学者，都以石经为权威的儒家经典著作。由于熹平石经是政府立于官学的儒家经典的官定本，它的颁布，很快平息了当时极为激烈的纷争，对几部重要经典进行了一次较为认真彻底的订误正伪工作，这在儒风渐衰、章句渐疏、弊陋多端、文字多谬的东汉末年，无疑是非常及时地保证了儒家经典的准确性。不仅当时的太学博士在传经时要以碑校对、防止疏漏，而且较大范围地满足了广大读书人的迫切需求。就是在石碑毁损后，残碑拓片也发挥了校误订伪的作用。所以说熹平石经在中国经学史和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正如马衡先生所云：

> 熹平刊立石经之用意，为正误订伪，树立准则，使学者有所取正。其后历代之继踵，亦同此意。是则在教育上之意义，固甚显著。既收效于当时，亦冀以垂示于久远。盖六经为儒家学说之渊源，章句文字之异同，关乎思想之纯驳，是故经学家对历代石经，虽片言只字，亦皆视为瑰宝。唐以后之石经与今本经籍异者尚少，然顾炎武尚据唐石经以补万历北监本《仪礼》之脱文若干处，则汉魏石经之有裨经学更无论矣。[1]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6《石经》。

第三，“熹平石经”开我国历代石经刊刻之先河，促使了我国古代石经书籍林的形成。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写本时代，立石经作标准，是校正错讹、整齐脱误、是正文字、促进图书流通的好办法。自熹平石经以后，历代仿效者不绝如缕。马衡先生云：

> 当熹平之立石经也，只就立于学官之五经，各刻其一家之章句，而以诸家异同列为校记，刻于各经之后。此所谓诸家者，即学官所立之十四博士，皆今文也。其时古文经虽未得立，但其说已盛行，传今文者多兼通古文，故至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经于石，以应学者之需求，

与“熹平石经”并立于太学。古文不易识，则以篆隶二体列于古文之下以诠释之，世谓之“三体石经”。又以正始中立，谓之“正始石经”。……自是之后，唐有“开成石经”，后蜀有“广政石经”，宋有“嘉祐石经”，清有“乾隆石经”，皆准熹平故事，踵而行之。[1]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6《石经》。

再加上南宋高宗御书石经，则历代总共有7次大规模的儒家石经刊刻活动。其他六部石经的刊刻活动，也无疑都是成规模的编辑出版活动。由此可见“熹平石经”影响之大。不仅如此，以“熹平石经”为滥觞的儒家石经还同佛教石经、道教石经、书目石经、格言石经、法书石经等共同构成我国独有的、极为丰富的石刻书籍林，成为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珍贵的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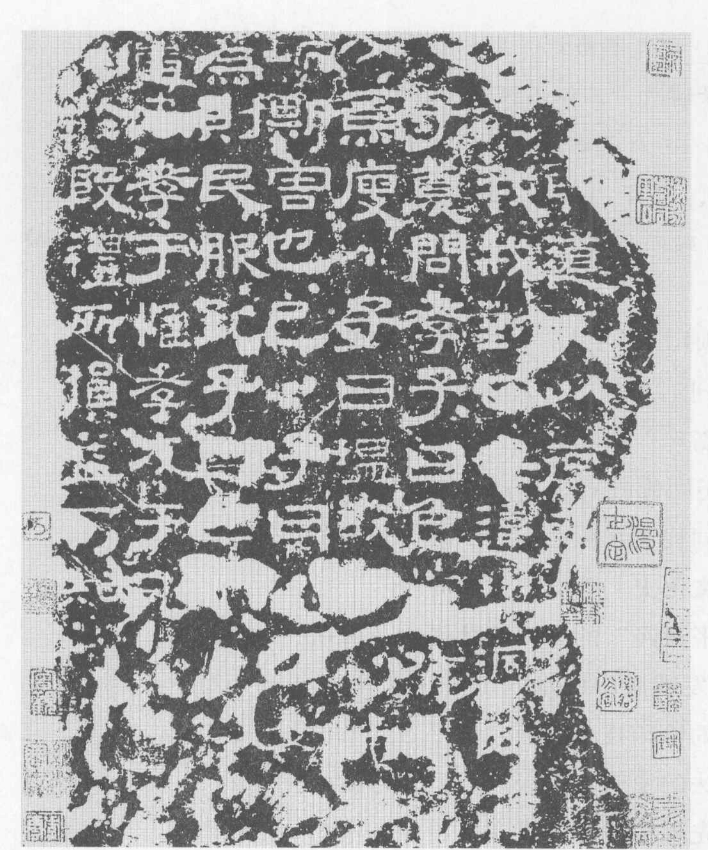
第四，从技术角度讲，“熹平石经”的刊刻间接影响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般都认为，启发雕版印刷术的主要技术有二：一是石刻的捶拓技术，一是印玺的钤印技术。而“熹平石经”的刊刻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所以说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的影响。范文澜先生曾说：“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2]一语道破石经、拓本与雕版印刷术之间的关系。钱存训先生也说“石经不仅恒久而统一地保存了儒家经典的正统经文，同时也导致了后来以木板雕刻儒经，成为官府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先河”[3]。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3] 钱存训：《书于竹帛》，58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此外，“熹平石经”在中国书法史上还具有很高的地位。作为当时的官方巨制，“熹平石经”主要由蔡邕书丹。其字方圆兼备，刚柔相济，雍容典雅，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极深至远。所以说，“熹平石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熹平石经”刊刻不久，即遭战乱，以后每经战乱，便总有损失。今天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由地下发掘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残石。现存较大的一块是1934年在洛阳出土的《公羊传》残石，正面长49厘米，宽48厘米，反面长48厘米，宽47厘米，正反两面共



熹平石经拓片

存624字。20世纪60年代，又在河南偃师县汉太学遗址发现两块《尚书》残石，存200余字，经文之后刻有石经序。1980年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发现，共获残石600余块，其中有字者96块，共存366字，内容以《仪礼》为多，也有《春秋》、《鲁诗》、《论语》的文字以及《仪礼》、《鲁诗》的校记等。石经原物的出土，为我们考证"熹平石经"的字体、内容、格式、规模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 民间学者遍注群经

这一时期，除政府的努力外，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儒学大师，他们遍参诸家，整理注解儒家经书，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解经之作。这是民间学者对东汉以来儒家经传之作进行的系统整理，与东汉政府的编校活动互为补益，共同促进了经学图书编辑事业的繁荣。

东汉时期，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一直未能列入学官。随着今文经学的日渐衰落，古文经学却日益兴盛。所以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基本都是古文经学家。这一时期的注经活动的参与者也主要以古文经学家为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今文经学家中只有何休一人值得称述。许慎、郑玄的注经活动可见其他章节，下面重点介绍马融、服虔、卢植和何休。

马融（公元79—166），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从著名学者班固、挚恂问学，博通经籍。曾任校书

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他才高博洽，世称通儒，从其问学者常有千数。卢植、郑玄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

【1】《后汉书·马融传》。

马融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古文经大师，著述十分丰富。他以精博之学，先后为《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书作注。可见他涉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他本打算为《左氏春秋》作注，但见了贾逵和郑众的注以后，感慨道：“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于是只著《三传异同说》。马融注解经书，固守古文经门户，不用今文经学，壁垒分明。马融的撰述，标志着东汉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马融还著有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诗、琴歌、对策、遗令等21篇。

服虔生卒年代不详，初名重，字子慎。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人。其活动年代大约与何休、郑玄相当。中平（184—189年）末，曾任九江太守。服虔颇有才气，信守古文经学，撰有《春秋左氏传解谊》，曾以《左传》驳难今文经学家何休。他的《春秋左氏传解谊》成就最高，对后世颇有影响。东晋元帝时，服氏《左传》曾立博士。南北朝时，北方盛行服虔注，南方用杜预注。

卢植（？—192），字子干，涿郡涿（今河北涿州）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经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学毕辞归，以教授为业。他性刚毅而有大节，常怀济世之志，不好辞赋；兼文武之才，历任九江、庐江太守，后拜北中郎将。曾率军破黄巾军。其经学著作有《尚书章句》和《三礼解诂》。灵帝时在太学立石经，以正“五经”文字。卢植上书请为《毛诗》、《左传》、《周礼》立学官。之后不久，又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在东观整理编校中书“五经”经传，并补续《东观

汉记》。卢植在身前身后都享誉甚高，曹操曾称颂他说“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何休（128—182），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济宁）人。他为人质朴口讷，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没有能与之比肩者。他是东汉末年的今文经学大师。他以今文经学之义注解群经，又亲撰著作，批驳古文经学之非。党锢之祸时，何休受牵连而遭废锢，于是闭门作《春秋公羊解诂》，17年不出门户。又注训《孝经》、《论语》等，“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1]。他还根据《春秋》大义驳汉事600余条，深得《公羊》本意。他追述《公羊》学大师李育之意，以非难《左氏春秋》与《谷梁春秋》二传，乃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在何休的所有著述中，以《春秋公羊解诂》最为有名，他在本书中归纳《春秋》的文例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赞”。他又从“所见”、“所闻”、“所传闻”中引出“三世”之说，对后世今文经学家的影响很大。何休的撰述，是对东汉今文经学的总结和提高，在经学编撰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东汉经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127—200），他先学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为汉代最大的“通儒”。他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学说，遍注群经。他的解经之作，成为后世取法的经典。在注解群经的过程中，郑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校勘整理准则，成为注经的典范。今古文经学在学术上的长期分歧和争斗，经过他的努力而趋于融合了。自此以后，“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2]。郑玄的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总体来说，经过政府和民间学者的共同努力，汉代四百多年的经学著述在东汉后期得以全面的清点和整理。这既是学风趋于融合的表现，同时也是长期整理、编校儒家经传的必然结果。

【1】《后汉书·何休传》。

【2】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

三、东汉末年图书典籍的破坏

经过政府和民间学者的共同努力，东汉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在东汉后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期。但这种繁荣景象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东汉政权的衰亡，东汉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也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悲惨命运。

公元189年，刘协继立为帝，是为汉献帝。从这时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历史开始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雄，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社会动荡不安，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东汉政府的图书典藏也在战乱中损失殆尽。

先是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移至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1]。图书典籍也在这场浩劫中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后汉书·儒林列传》曰：

> 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

后是兴平二年（195年），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扰乱长安。在这次动乱中，不但“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2]，残存的典籍也全被焚毁。经过这次长安之乱后，东汉一代的图书典籍“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3]。隋代牛弘称这次浩劫是古代图书的第三次“厄运”，实为确论。

东汉末年的浩劫为两汉四百余年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划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历史句号。两汉图书两聚两散，两盛两衰，都与时事紧密相连，世盛则聚，世衰则散，承平时则显盛况，战乱

[1]《后汉书·董卓传》。

[2]《后汉书·董卓传》。

[3]《后汉书·儒林列传》。

时则遭焚毁，说明国家治乱与图书聚散、编校活动息息相关。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

先秦时期，很少有图书买卖的记载，图书贸易活动尚未萌芽，而图书的商品性也无从体现。进入两汉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途径多种多样，互为补益，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图书的商品性逐渐凸现，书籍买卖活动也渐次开展起来，书籍逐渐以商品形式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终于在西汉末年出现了买卖书籍的专门场所：书肆和槐市。随着图书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书肆在东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依靠传抄复制图书来谋生的专门职业：佣书。这些既是两汉图书出版事业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过来促进了两汉图书的生产和流通。

一、图书商品贸易的萌芽

秦始皇焚书和长期的战乱使国家与民间藏书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西汉政权建立不久，就重视图书的收集和编校工作。尤其是自汉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之后，朝廷和地方藩王的征书活动便逐渐展开，图书贸易也在征书活动中渐露萌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1]。此外，“汉时有李氏得《周官》。盖《周官》，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2]。这是西汉时期地方藩王用重金向民间购求图书的最早记载。一方献书，一方赐以金帛，这说明图书的商品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认。汉武帝时期，广开献书之路，“大收天下篇籍”，献书者由朝廷赐赠金帛。有时甚至还以帝王之尊求购图书。“汉武帝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3]。这些都是早期统治者以金帛奖励购求

【1】《汉书·汉景十三王传》。

【2】《隋书·经籍志》。

【3】《汉书·张安世传》。

书籍之事，尚不属于纯粹商品交换的范围，但已孕育着图书出版业进入商品流通的萌芽。武帝以后，朝廷征召图书的活动并未中断，汉成帝时期，还曾派谒者陈农出使四方，访求天下遗书。东汉政府建立以后，光武帝也曾“诏求亡佚，购募以金”[1]，大规模地搜求天下遗书。通过这种征求方式，民间流通的图书汇集成国家藏书，政府又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员进行编次校正，整理后的图书又通过各种方式流传民间，这对于传播普及文化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这种由民间到政府，再由政府到民间的循环过程也就成为两汉时期图书流通的重要模式。

【1】《论衡·佚文篇》。

二、书肆的出现与发展

（一）书肆产生的时间和历史因缘

两汉时期图书贸易正式开展起来的标志是书肆的出现。西汉扬雄在他所著的《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对这句话解释道：

> 市陈列百物以待贾，故即谓之肆。卖书之市，杂然并陈，更无去处，博览而不知折中于圣人，则群出杂列，无异于商贾之谓也。

大体就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书肆的记载。《法言》一书写定于汉哀帝时期（公元前6—公元前1年），由此可以断定我国的书肆最晚应出现于汉成帝时期的长安城中。书肆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它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因缘的。

首先，西汉城市商业的繁荣发展催生了售书行业的产生。

西汉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由于商业是最为方便快捷的致富途径，正如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2]，所以商人用各种手段逃

【2】《史记·货殖列传》。

【1】《汉书·食货志上》。

【2】《史记·货殖列传》。

避限制，法令近于一纸空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的势力蒸蒸日上。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1] 因此，从事商业的人与日俱增，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汉商业的繁荣发展。

汉武帝时期，国家开始重视商业，认识到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商不出则宝货绝，宝货绝则财用乏"，于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当时全国已形成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商业都市。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商业城市，《汉书·食货志上》载，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长安是关中的交换中心，户80 000余，口246 000，周围65里，有9市、16桥、12门。其中，9市是专门从事商业经营的场所，均在长安城北部，以洛城门外的杜门大道为界，道东设3市，为东市；道西设6市，为西市，凡4里为一市。在每个市中，商人都列肆经营，如《汉书·食货志上》所云："开肆市以通之"。并设有专人管理、监督商品的交易活动。在这种商业繁荣的大背景下，书肆作为一种行业率先出现在长安也就成为必然。

除了长安以外，全国著名的大城市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这些城市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都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继长安之后，也有可能出现书肆。

其次，西汉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使人们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多。这是书肆产生的客观要求。

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后，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的封建官学教育系统，教育事业逐日繁盛。官学而外，西汉的私学也比较发达，儒学大师自办私学，讲学授徒，蔚然成风。这样就在西汉末年出现了"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大师众至千余人"的局面。教育事业繁荣发展大大刺激了官方和民间对图书的需求。不难想见，当时使用和购求儒家经传的人比比皆是。教育事

业的持续发展培养拓展了图书市场，现实的客观需求召唤着书肆的产生。

第三，图书数量的增多为书肆贩卖书籍提供了货源，这是书肆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

西汉初期以来，国家就多次征集天下图书，并组织人员编次整理国家藏书。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取得了“书积如丘山”的良好效果。国家藏书的数量、质量都十分可观。此外，西汉时期的很多学者也从事著述，使得图书编纂领域不断扩大，著述数量迅速增多。流行于西汉时期的图书数量，仅《汉书·艺文志》就著录596家，13 269卷。这些图书通过传抄复制的方式流传到民间，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为图书贸易的产生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货源。一方面社会上对图书的需求量很大，一方面图书的货源充足，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便导致了书肆的产生。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促进下，书肆便出现在西汉后期的长安城中。历史文献中关于西汉末年书肆的记载并不多，这也说明，书肆虽然已经产生，但尚处于零星分布状态，还不是很普遍。进入东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二）书肆在东汉的进一步发展和特点

汉光武帝中兴不久，商业逐步繁荣，尤以都城洛阳最为发达。洛阳城内，“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伪巧，充盈都邑……商业翼翼，四方是极”[1]。文教事业也随之蓬勃兴起，班固《东都赋》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也能反映当时文教事业兴盛，识字人口增多的现实情况。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2]。东汉孝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仅游太学者便有“三万余生”。民间教育事业已较普及，一个书馆“小童百人以上”。至于民间经师“著录”的生徒，少者数百，多者数千，有的达万人。随着商业的繁荣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为适应需要，

【1】《后汉书·王符传》。

【2】《后汉书·儒林列传》。

城市里的书肆已不是个别的了。

书肆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和利用。历史文献就记载着不少生徒到书肆上去看书和卖书。如《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约卒于和帝九年（公元97年），从这段记载里可以了解东汉前期的书肆情况。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148—209），年轻时也因"家贫无书，每至市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忆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1]。又如桓帝时期（147—167年）任尚书郎的山东宁阳人刘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2]。

【1】《后汉书·荀悦传》。

【2】《后汉书·刘梁传》。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书肆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多出现在商业比较繁荣、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西汉如长安，东汉如洛阳都是书肆的集中之地；二是由民间书贩组成，以谋取利润为目的，销售的书籍品种丰富，既卖儒家典籍，又卖诸子各家的书籍，这也说明书肆已具备了一定的商品经营色彩，只要有货源和需求，什么书都可以陈列于市；三是经营方法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既可招揽读者，又利于贫困知识分子求知自学的需要，客观上起着当时还不存在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因而受到社会上各类读者的欢迎。总之，书肆是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书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图书贸易事业的正式开展，在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最早出现的书籍集市——槐市

西汉末年（公元1—8年）和王莽的新朝时期（公元9—23年），中央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太学生的数量也空前增多。在这种环境下，在长安太学附近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书籍集市。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出于夺取政权的需要，他采取了一系

列网罗知识分子的措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天子所设之大学）、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5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1]。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聚集，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于是，在太学近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

【1】《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四年》。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三辅黄图·明堂》对槐市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 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为博士舍三十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予买卖，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宫门寺。南出，治令丞吏诘奸究理讼词，五博士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学生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学中有市有狱。光武东迁，学乃废。

由此可见，设槐市既是王莽文教政策的措施之一，也是太学事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民间贩卖者经营的书肆不同，槐市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定期举行，集市每半月一次；二是参与主体身份比较集中，都是长安太学生；三是买卖物品并不局限于图书，而是包括了“笙磬乐器”以及各地特产等物品；四是有交往论学的功能，所谓“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论议槐下”；五是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和监督，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槐市。总之，槐市并非是纯粹的商业交易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有着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就这样，成千上万读书人云集在一起，一方面进行了学术思想交流，一方面买卖“经传书记”等物

品，不仅对当时的官方教育起了积极作用，更促进了图书流通和贸易的发展。

槐市的盛况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所部攻陷长安，王莽政权崩溃，长安太学在战乱中解散，槐市也随之消失。虽然它仅仅存在了20多年，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后代文人学士吟诗作赋，经常提到槐市，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加以吟颂。北周文学家庾信有诗云："璧池寒水落，学市旧槐疏。"南朝梁萧统作《讲学碑》提到："晬玉容而经槐市。"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骆宾王、刘禹锡等人的诗篇中都曾提到槐市。

四、图书传抄复制者——"佣书"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的书籍全靠人工抄写，抄写复制过程既是书籍生产过程的继续，也是书籍流通的表现方式。抄写复制是两汉图书传播和流通中普遍使用的方式。汉武帝时期曾置写书之官，其工作就是抄录复制图书。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在用重金购求天下遗书的同时，也曾让佣书人为他们抄写复制。此后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国家藏书时，最后也曾抄录成几种复本。在对图书需求渐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以传抄复制图书为职业的人。只不过文献中对西汉时期的佣书人鲜有记载。

及至东汉，由于读书人的需求日增，从事抄书之业的人也日渐增多，抄录图书成为一种足以谋生的专门职业，史称"佣书"。东汉一代，因传抄图书而成名者大有人在。东汉名将班超早年就曾以佣书为业，"投笔从戎"的典故就出自他的佣书故事。《后汉书·班超传》载：

> 永平五年，兄固（编者按：指班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

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

班超因家贫而“为官佣书”，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图书需求量的增多，政府开始设置专门的抄书岗位，招聘大量的“书佣”来从事图书的复制工作；二是“为官写书”在当时是一种文化人借以谋生的手段，收入还比较可观。

除了像班超这样依靠为官府抄书而谋生的“书佣”以外，还有专门以“佣书”为业、自抄自卖的例子。如安帝时的王溥竟以佣书而致富，他年轻时：

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后以一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1]

[1] 王嘉：《拾遗记》卷6。

还有一些入仕无门的读书人，只好回乡务农，同时把佣书作为谋生的副业。如东汉末期的陈长次，“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2]。赁书，即抄书出售。

[2] 虞世南：《北堂书钞·写书》。

随着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日益增加，书籍的商品流通不断扩大，抄书逐渐成为专业，人数也不断增加，为市场提供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书贩受到商业利润的刺激，还经常携带图书“远出荒郊”，前往儒生聚集的地方销售，以至形成书市。《后汉书·张楷传》记载，名儒张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

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

可以推测，由于居住在“公超市”周围的人多是学者，所以市场上书肆也会不少。后世的庾信曾言，“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出荒郊”[1]，就反映了当时都市之外的“荒郊”书肆众多的情况。

【1】庾信：《答移市教》，《初学记》卷24。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从事“佣书”事业的人大都出身贫寒，但都有一定的书法和文词基础知识。他们为了谋生，或受雇于官府，或在市场上代人抄写书籍，或在家抄写后直接在市场上销售。为数众多的抄书人的“佣书”活动，提高了当时图书的再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流通和贸易事业的发展，在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又佣书活动是手写复制书籍的出版现象，其写书不是为了自己研习，而是为了销售获利，以求生计。这与后来出版者已无本质的区别。所以佣书人的出现，应视为古代图书出版的一大进步，对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应该看出，抄录图书毕竟是一种效率比较低的图书复制方式，加之两汉时期图书主要以竹木简牍为载体，携带和收藏多有不便。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图书流通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虽然两汉时期已经出现书肆、槐市以及佣书，但复制技术的落后使得图书的流通还是十分缓慢和有限。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地需要发明一种高效率的复制技术。下面的这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王充传》：

>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之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王充为明、章二帝时期的著名学者，蔡邕是灵帝时人，中间

相距将近百年，而中土尚无王充之《论衡》。王朗比蔡邕更晚，也要到会稽才能看到《论衡》。当时书籍流通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后，这一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五、图书的其他流通方式

除了上述商品性较强的图书流通方式以外，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方式还有口耳相传、师徒授受、征召天下、皇帝赐赠、颁行天下、宣示公众、互相借阅等方式。与书肆、槐市买卖相比，这些流通途径基本没有商品色彩，但在图书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方面也功不可没。

1. 口耳相传与师徒授受

口耳相传是一种原始的知识传播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是一种图书流通的重要方式。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和秦末的农民战争，先秦典籍亡佚情况十分严重。大量的图书文献只能靠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如《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1]。所谓“讽诵”，即口耳相传。事实上，“五经”之中，除《周易》是占卜之书，未遭禁绝之外，其他几部经书都靠秦代学者的记诵和口授才得以保存和流传。如《尚书》在汉代的流传主要归功于伏生的记诵。《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生平曰：

>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

【1】《汉书·艺文志》。

颜师古注曰：

> 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所谓"传言"，就是口头传授，可见伏生是以口授的方式将今文《尚书》传给朝错（晁错）的。

又如《公羊传》，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

> 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可见《公羊传》一书，从子夏到公羊寿，共历五世，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最后才"著于竹帛"。

上述《尚书》和《公羊传》的流传方式并非个别，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籍）在从秦朝到汉代的流传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最终写定于竹帛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书籍还原的过程。在这个还原过程中，还带有后学的附益和完善。

进入汉代以后，口耳相传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图书流通方式，具体的表现就是师徒之间的口授。汉代经学发达，经学大师"众至千余人"。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的传授，都是以经师的口授为主。弟子在学习过程中，要进行"写录"。当时的师徒授受过程包括了口耳相传和记录整理两个环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条件下，师徒之间的传授其实就意味着经学著作的传承流播，虽然传授的结果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图书。另外，汉代经学传授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师法和家法，师之所传，弟子不敢

有一字之出入。经师去世以后，门徒往往会聚集一起，将先师生前的言行编辑整理成书。如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去世后，其门人子弟“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论语》作《郑志》八篇”。这其实也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为什么口耳相传在汉代的经学传授中比较通行呢？清人皮锡瑞曾有具体的分析，他说：

> 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而载也。[1]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

可见，经学的繁盛和书籍的缺乏是主要的原因。

2. 征召天下与皇帝赐赠

汉代在建国不久就开始向民间征集图书，持续时间很长。有时是以免费的形式收集，有时会“加金帛赐以招之”，方式不外乎这两种。这种做法为历代统治者所仿效。这是图书从下至上的一种流通方式。前文对此已有论述。

赐赠即帝王把书籍赏赐给臣民，与朝廷向民间征召图书不同，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流通方式。在两汉时期，图书制作不易，统治者又特别看重图书的作用，所以在赐赠图书方面很谨慎。西汉时期，很少有皇帝向大臣赏赐图书的记载。而且，《汉书·宣元六王传》中还记载了一件请求赐书却被拒绝的事例。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曾上疏朝廷，请求成帝赏赐他诸子图书和《太史公书》。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回答说：

> 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成帝听从了王凤的建议，训斥东平思王道：

“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

成帝拒绝了东平思王的请求。这一方面说明最高统治者对臣下有防范之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汉朝廷对图书的控制是十分严密的。

进入东汉以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后汉书》多次记载皇帝赐赠图书的事例。如《后汉书·窦融传》载，光武帝赐窦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窦融为外戚世家，光武帝所赐，都与其家世有关，有一定的关联性。此后的明帝因王景治理黄河“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1]。章帝时，曾赐刘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2]，以示恩宠。这些赐赠活动的流通范围比较狭小，仅限于帝王与臣下，但也不排除臣下得到图书后广泛流传的可能性。赐赠的图书数量也十分有限，从内容上看，多与被赐者的身份、职业和爱好有关。虽然与西汉相比，东汉帝王在这一方面要大方得多，但与后世相比，仍显得十分有限。总之，两汉时期，朝廷征集者多，赐赠者少，从图书流通的角度来看，则反映了当时图书的珍贵和流通量的稀少。

【1】《后汉书·王景传》。

【2】《后汉书·刘苍传》。

3. 颁行天下，宣示公众

这其实是政府正式发行图书的活动。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的教化作用。他们在征集图书的同时，也对图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编次整理。他们还选择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图书予以公布颁行，从理论上证明其统治的合法化。如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令大臣编辑整理谶纬图书，并将编辑成型的图书宣布天下。这种图书流布方式有似于后世的图书发行工作。另，两汉时期今古文相争十分激烈，经学派别甚多，纷争迭起，解说不同，“正五经异

同”一直是统治者所关注的工作。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统治者便采用颁行定本的方式来平息纷争。这就是东汉末年刊刻“熹平石经”的举措。“熹平石经”的刊刻是东汉末年一次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同时也是政府向天下颁行定本的活动。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图书流通方式。

六、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

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广泛开展，当时的汉政府与朝鲜、日本、越南、中亚诸国都有广泛的交流。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外图书出版交流也逐渐开展起来了。这一时期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古印度北部及中部的恒河流域，其创始人为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佛教创立后，开始在古印度及今尼泊尔、巴基斯坦境内流传，以后向南传入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向北传入中亚细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通常认为，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刘宋时裴松之《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上有记载，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后，这种说法被很多书引用，但略有差异。如《魏书·释老志》载：“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受经人的名字有所不同。后世的征引文字中还有作秦景或景匿的。如果上述说法可信的话，那么，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就已传入中土。

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始于东汉明帝时。据《魏书·释老志》所载：

> 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

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帝感梦遣使、传入佛法之事。由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佛经传入中土，而且还颇受皇帝的重视，被收藏于"兰台石室"之中。引文中所提的白马寺是中土建造的第一个佛寺，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教译经的场所。

佛教传入中土初期，主要为帝王贵族所信奉，并且把佛当成一种祭祀，近于神仙方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楚王刘英。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从这段资料看，当时佛教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皇帝对佛教也有所了解，明确地说祭祀佛祖为"仁祠"。终东汉一代，佛教始终在统治阶层中比较流行，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桓、灵时期。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中说汉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襄楷在给桓帝的上疏中也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足见当时佛教对帝王影响之大。

佛教自明帝以后，就开始以京城洛阳为中心，广泛流传民间各地，波及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

诸省。而佛教的传播，又是与讲经、译经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逐渐被传教者重视起来。所以说，佛教传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佛经数量的增多和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步繁荣。

东汉初期，佛经汉译大概只有口授的《浮屠经》与《四十二章经》。其中以后者最为有名。《四十二章经》的译者，佛教界通常认为是迦叶摩腾或与竺法兰合译，而学术界则无定论。不过，此书在东汉时即已译出，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看，它并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而是辑录、抄撮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而成的，俗称“经济抄”。《四十二章经》由42段不长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短促，世界变化无常，只有抓紧修道，抛弃各种欲念，才能求得解脱，获取阿罗汉道。从内容上看，《四十二章经》神话成分较多，说法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尽管如此，它还是标志着佛、法、僧的初步完备。由于这是第一部正式汉译的佛经，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因而颇受后世重视。

东汉后期，尤其是桓帝、灵帝时期，许多印度及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从事佛教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译出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据《开元释教录》统计，此期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著名的翻译者有安息人安世高、安玄，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天竺人竺佛朔，康居人康巨、康孟详等，其中尤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成果最丰，成就最高。

安世高，名清，被认为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原为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识，“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笃信佛教，持戒甚严，经常讲经说法。当轮到即王位的时候，他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他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辗转来到中国洛阳，不久即通晓华语。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相当长的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信徒。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到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年），

【1】慧皎：《高僧传》。

译事大致结束。随后，他游历了江南的豫章、浔阳、会稽等地，后来各地就流传有关于他的神奇故事。他晚年的踪迹不详，在华活动前后约30年。

安世高在华译出的佛典，因为当时没有记载，确实的部数已不可考。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译本，加以著录，共有35部、41卷。南朝梁时慧皎著《高僧传》中记载安世高所译佛经数目为39部。可见，后世记载也多有不同。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部、26卷。主要内容是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安世高的汉译佛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有特色。就内容说，他能很纯粹地译述出他所专精的一切。譬如，译籍的范围始终不出声闻乘，而又有目的地从大部《阿含经》中选择一些经典，且都是和止观法门有联系的。至于译文形式，因为他通晓华语，所以其译文能将原意比较准确地传达出来，做到"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支娄迦谶，又作支谶，是第一个把佛教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支谶原是月氏人，通晓汉语，学问广博，"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1]。他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来到洛阳。其译经年代集中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比安世高稍迟。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一、《般若道行经》10卷（光和二年，即179年译）。二、《般若三昧经》2卷（现存本3卷，译年同上）。三、《首楞严经》2卷（中平二年，即185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同时还有《阿阇世王经》、《宝积经》等十余部佛经。从内容上看，支谶所译佛经基本上都属于佛典，是大乘佛教典籍在中土翻译的开始。其译文比较顺畅，但有时为了保全原本的面目，往往多用音译，译文过于简略，以致好多义理都使人难以彻底了解。

在这个时期，一些中国本土信奉佛教的知识分子，如严佛调、孟元士、张少安、子碧、孙和等也都参与或部分参与了译经

[1] 慧皎：《高僧传》。

工作，不过，他们大多居于配角地位，或笔受记录，或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等。总体来说，东汉时期的译经活动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译经工作处于初级的开创阶段，虽然成绩可观，但尚未形成系统，比较零散，不够全面；

(2) 译经人员以外来僧人为主，中国僧人或居士只担任辅助工作；

(3) 译经工作以洛阳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

(4) 翻译技巧尚在摸索之中，多以直译、音译为主，无法保证所译经书的质量；

(5) 译经著作中，以翻译作品为主，尚未见到注疏和研究佛经的著作。

两汉时期总共译出多少佛经，当时并无明文记载。以《开元释教录》的著录为基准的话，两汉时期的汉译佛经很可能有200多部。加上当时已传入中土，但尚未翻译成汉文的佛经，两汉时期的佛经数量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翻译事业的开展，使中国古代出版物中多了佛经一大门类，开启了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的大门，促进了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原的图书典籍也会随着汉文化的广泛流传流布周边地区和国家。从此以后，中外图书出版事业的交流活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第七章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

两汉时期是一个文化整合、汇通的伟大时代，也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繁荣气象表现在图书出版事业方面，就是图书数量大幅度增多，编纂领域不断扩大，优秀著作大量涌现。

西汉末年刘歆编纂的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共分6大类，38小类，634家，总共著录图书13 397篇，图45卷。班固《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把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类，范围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先秦与西汉时期的著作总数应为13 000余卷，数量相当可观。从《汉书·艺文志》之著录情况看，西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种类仍有“百花齐放”的气象。

清代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4卷，将东汉一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附佛、道二录，实为六大部。共著录东汉图书1 100余部，2 900卷。考虑到图书的亡佚等因素，东汉时期的图书数量很可能不止这个数目。从《后汉艺文志》著录中可以看出，东汉一代的图书，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比西汉丰富，并且有以下特点：（1）经书数量急剧增加，这是东汉经学大盛在图书目录上的直接反映；（2）史书大量出现，且种类增多；（3）佛学书籍产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类图书，是新学科产生的结果。

根据图书目录记载，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至少有2 200余

部16 000余卷。考虑到图书亡佚等原因，实际图书数量要远多于这个数量。正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

> 凡汉人之著作，与其所研究者，不尽传于后，观《汉书·艺文志》及钱大昕《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书之亡逸者夥矣……故就著于世者，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是可知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非如后之言汉学者，第以经义训诂为一朝之学也。[1]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31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前人图书目录中所著录的两汉时期的图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先秦时期已写定的图书，但大多数都经过两汉学者的编辑整理；二是汉代人对先秦古籍（尤其是儒、道两家图书）的注解阐释之作；三是汉代时人的其他著作。从数量上讲，后二者远远大于第一类；从内容上讲，后二者中有相当多的图书都具有“发凡起例”的开拓性质。所以说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兼有总结前代和开启后世的两重功能，确实具有继往开来之特征。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文化学术事业的高度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印证了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撰、出版活动的繁荣景象。

第一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哲学著作

一、经学出版物

两汉学术主流是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由原来的思想流派之一，一跃而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诗》、《书》、《礼》、《易》和《春秋》等五部典籍也被奉为“经”，对这五部经书的诠释和发挥则为经学。“经”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当代学者周予同曾作过解释，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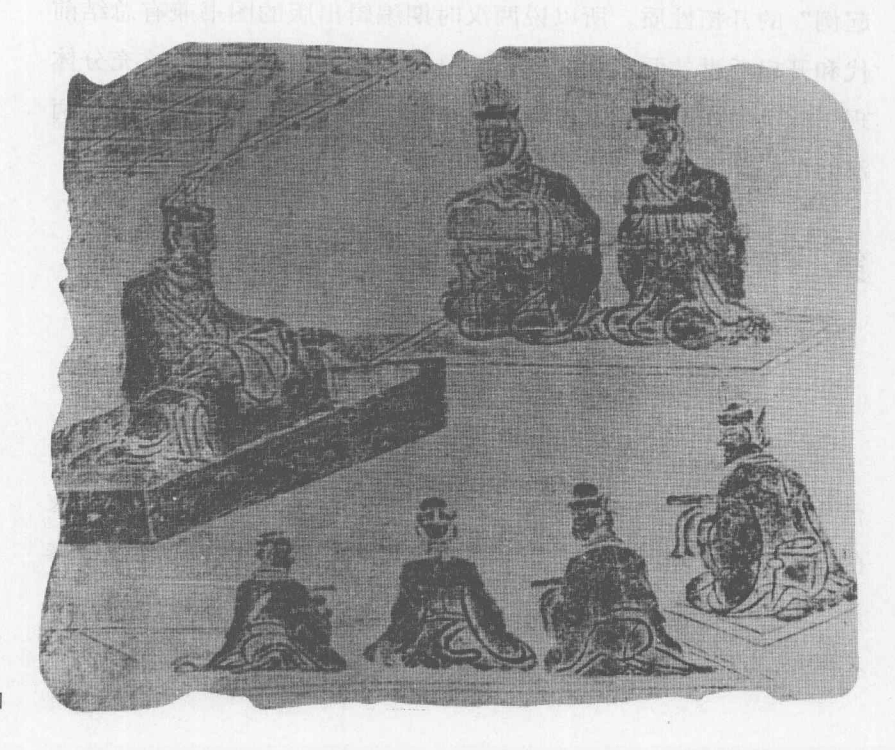
经与经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所谓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1]

【1】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6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两汉时期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与繁荣，表现在图书编纂与出版事业上，就是经学著作的大量涌现。

经学著作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与学术风尚紧密相关的。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员，传授儒家经典。博士弟子员中学习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政府将学术研讨与仕途紧密结合起来，实质上就是利用学术大开利禄之途。这样，天下便靡然风向，趋之若鹜，攻读经学。正所谓"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2]。这样就势必导致解经

【2】《汉书·儒林传》。



东汉画像石讲经图

之作愈来愈多，也愈演愈繁。

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今文与古文两派。西汉初年，儒家经典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受到很大损失，当时极少存世。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之时，秦代的博士还有的活在世上，经典的大部分内容依靠他们的记忆记录流传下来。由于这些经典是用当时流行的隶字记录下来的，故称作“今文经”。此外，还有一些经过秦代“书同文”的改革和后来篆文隶书化的改写而用隶书写定的经书，均归为“今文经”。西汉立于官学者均为“今文经”。其学术特点，主要是申明“五经”大义，探讨发掘经书中蕴含的深奥道理，而对于经文本身的章节、字句的考订，却很少下工夫。其流弊表现为牵强附会或借题发挥，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而且，从业者都比较保守，一味讲究遵循“师法”，缺乏创见。

古文经大致上指以篆文和六国古文写的古文经书，其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或征求于民间，或发现于墙壁，其面貌比较接近先秦旧籍。古文经书的代表是“鲁壁藏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展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故居。结果在其夹墙内发现了一批用先秦古文（时称蝌蚪文）写定的《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这些藏书即被称为“古文经”。它们与当时流传的今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这就成为今、古文两个流派相争的导火线。王莽时期，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礼》（《逸礼》）39篇、《尚书》（古文《尚书》）16篇，并上书皇帝，要求把这些书也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便正式形成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个流派。“古文经学”从考订文字入手，以此来探讨经文的本意，删定错讹之处。其学术特点是注重经书的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订，进而解释经文的真正含义。但由于局限于烦琐的字句考订，反而受到经文的拘束，不切于实用。

两汉时期，官方比较推崇今文经学，官方学术机构基本上是被今文家把持。古文经学多在民间流传，立于官学的机会很少，但在学术上，古文经并没有被压服消亡，在私学中很有势力。今

文经学独盛于西汉，衰败于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则于东汉崛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学者。两派长期相争，各执一端，势成水火，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件著名的学术公案。表面上看，两派之争，主要在于文字篇章之多寡，治学方法之异同，但实际上，则主要是两派之间的利益之争。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当时博士经生之争今古文者，其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置博士弟子，非真学术之争也。"[1] 但不论两派争论的焦点如何，一个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就是：在长期的纷争中，陈说已见，批驳对方的最好方法就是著书立说。所以说，两汉时期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论也是促使经学著作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1】钱穆:《国学概论》,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利禄之途的诱导，今古文经学的纷争，虽有一定的弊端，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汉经学的繁荣发展。其最终结果就是解经之作愈演愈繁。具体表现在数目庞大，名目繁多，篇幅冗长，内容烦琐。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对汉代经学著作进行精确的统计。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其中"六艺略"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就有93家，3 000余篇，具体言之：《易》之传有13家，294篇；《书》之传9家，412篇；《诗》之传6家，416篇；《礼》之传13家，555篇；《乐》6家，165篇；《春秋》23家，948篇；《论语》12家，229篇；《孝经》11家，59篇。其数目约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除此而外，民间肯定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经学著作。

两汉经学著作的名目十分繁杂，略举其端，则有"传"、"内传"、"外传"、"故"、"解故"、"解诂"、"说"、"说义"、"记"、"章句"、"注"、"笺"、"释"、"解"、"解说"、"条例"、"训旨"、"同异"、"训诂"、"微"、"通论"、"异义"等等，不一而足。其名目虽然繁多，但其内容都不脱对儒学经典的传注解释。可见当时学者在经学著作的名目上是如何大做文章的。

两汉经学著作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篇幅冗长，内容烦琐，引申演绎和牵强附会的成分很多。刘歆曾斥责这一情况说："缀学之

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1]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对烦琐经学产生的原因与结果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当时学者对经典的传注解说之作，动辄可达数十万言。如桓谭《新论》所记："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2]。景鸾"著述凡五十余万言"[3]。郑玄"所注凡百余万言"[4]。真可谓是叠床架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莽时期，为了改变经学著作烦琐冗沓、废话连篇的状况，便开始有意识地删节"五经"章句。于是"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5]，可见删减工作之不易。即便是经过删节的著作，字数仍然很多。光武帝即位后，也曾颁布诏书，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6]，但未见其果。东汉时期的很多著名学者也力图跳出章句之学的藩篱，博综兼览，兼通数家。一些博士弟子员也不为师法、家法所拘囿，对章句进行删减。如桓荣从朱普受《欧阳尚书》四十万言，因其繁复，删减为二十二万，其子桓郁又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二万。虽然如此，东汉一代，终未能改变经学著作内容烦琐的局面。

二、谶纬图书

从广义上说来，汉代学者的经学著作还包括谶纬图书，因为这类图书也是围绕着儒家经典而产生的。但由于其"妖妄，乱中庸之典"，迷信与神学色彩十分浓厚，又属于特殊时代的产物，

[1]《汉书·楚元王传》。

[2]《后汉书·周防传》。

[3]《后汉书·景鸾传》。

[4]《后汉书·郑玄传》。

[5]《论衡·效力篇》。

[6]《后汉书·章帝纪》。

因此历来学者都不将谶纬图书划归一般意义上的解经之作，而是将其看成一个特殊的图书类型。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 盖汉儒说经，其功力所注，厥有两途：一曰谶纬，一曰传注。谶纬杂于方士，传注限于师法。二者皆利禄之途也。[1]

[1] 钱穆：《国学概论》，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历来都将“谶纬”连称，但在很多学者看来，谶与纬并不相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案语云：

>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之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

清人皮锡瑞亦言：

> 纬与谶有别。……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以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驳。故纬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2]

[2] 皮锡瑞：《经学历史》。

上述两种说法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两汉时期特定

的政治和文化学术环境下，大量的预言打着“圣人”的旗号出现，而用于解经的纬书也大量引用谶作为立论的根据时，谶和纬实际上也就合二而一了，越是到后来，二者合流的趋势就越明显。这样，也就难怪后世学者将谶纬视为同种书籍。顾颉刚先生说：

> 谶纬的著作，他们说是孔子编成了“六经”之后，深恐经文深奥，将来的人不能洞悉他的意思，所以别立纬和谶，讲说得通俗一点；又说有许多是黄帝、文王等九个圣人传下来的。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经是直的死的，所以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没有什么大区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1]

【1】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11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由于谶纬图书有图有书，故又有“图书”、“图纬”、“图谶”、“符命”、“谶记”等名称。谶纬图书最早产生于先秦时期，后至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和祥瑞灾异演说《公羊春秋》，撰《春秋繁露》，就已开西汉谶纬之学的先河。后来，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危机加深，时局动荡不安，谶纬图书遂风靡一时。西汉哀平之世，王莽利用谶纬图书为其夺取西汉政权大造声势，直接导致了谶纬图书的泛滥。史载：

> （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2]

【2】《汉书·王莽传》。

这里所说的符命就是谶纬一类的图书。其中有许多是方术之士或无行之士为了取得高官显宦而特意制造出来的图谶，意在投王莽之好。王莽即皇帝位以后，便“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

《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1]。经过这次整理，此前流行的一些零星的谶语，便汇成篇籍，流布天下。

[1]《汉书·王莽传》。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深好谶纬之学，在他起兵平定天下时，就利用谶纬符命粉饰其政权的合法性。他因图谶兴起，即位以后，就特别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他先后命学者薛汉、尹敏等人校订图谶，删去为王莽制造舆论的内容，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在他的提倡下，东汉研习谶纬之学便形成一股风气。《后汉书·张衡传》说：

>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东汉王朝，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政府和学者都以内学为重，并尊为"秘经"，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因之，汉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2]。樊宏"以谶记正'五经'异说"[3]。自此以后，谶纬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凡是善于附会图谶的就能加官进爵，反对图谶的就会贬黜得罪。范晔评价说：

[2]《隋书·经籍志》。

[3]《后汉书·樊宏传》。

> 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4]

[4]《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所以，终东汉之世，整个社会文化与学术思潮都在谶纬的笼罩之下。当时的经学家，不论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都与谶纬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还为之作注。

谶纬图书的根本宗旨是为统治者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神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持，虚妄迷信的色彩十分浓厚，其学术和思想价值远

不如一般的经学著作。其内容相当庞杂，“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中国经学史》一书总结说：

> 既有宇宙生成演化的哲学思想，也有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感生受命的传说及王朝的演进和序代，举凡儒家经义、礼乐制度、天官星历、灾异感应、谶语符命、驱鬼镇邪、神仙方术，乃至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科技知识、文字训诂，无所不包。它把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迷信杂糅在一起，既有精致深刻的理性，又有卑劣粗俗的伪造，光怪陆离，无奇不有。[1]

【1】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9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谶纬图书的数目，经过东汉前期的整理被确定下来，当时的人们往往称有“八十一篇”或“河洛六艺”，有时又说“河洛五九，六艺四九”[2]。“河洛五九”，是指与传说河图洛书相关的谶纬图书45篇，“六艺四九”是指与六经有关的纬书共36篇，合起来正好81篇。实际上，六经应为七经，而与七经有关的纬书数也应该为35篇。为显示纬书的大致面貌，现将“七经纬”35篇篇目简示如下表：

【2】《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

“七经纬”35篇篇目简表

一、易纬（六篇）	1.《稽览图》2.《乾凿度》3.《坤灵图》4.《通卦验》 5.《是类谋》6.《辨终备》
二、书纬（五篇）	1.《璇玑钤》2.《考灵耀》3.《刑德放》4.《帝命验》 5.《运期授》
三、诗纬（三篇）	1.《推度灾》2.《汜历枢》3.《含神雾》
四、礼纬（三篇）	1.《含文嘉》2.《稽命徵》3.《斗威仪》
五、乐纬（三篇）	1.《动声仪》2.《稽耀嘉》3.《汁图徵》
六、春秋纬（十三篇）	1.《演孔图》2.《元命包》3.《文耀钩》4.《运斗枢》 5.《感精符》6.《合诚图》7.《考异邮》8.《保乾图》 9.《汉含孳》10.《佐助期》11.《握诚图》 12.《潜潭巴》13.《说题辞》
七、孝经纬（二篇）	1.《援神契》2.《钩命决》

虽然自西汉末年以后，谶纬图书的数目甚多，地位甚高，在社会上也广泛流传，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著录一篇。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纬书论》认为这是“纬在太史，不在秘书”的缘故。谶纬图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发达，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诸多的因素决定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图书出版史的角度来看，谶纬图书当是两汉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出版物。

谶纬图书在魏晋以后，往往被历代野心家利用作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正因为图谶很容易成为窃国篡权的工具，所以夺取政权之后的帝王，都深知其中弊病。为了防止再有人故技重演，魏晋以后，历代帝王都严厉禁绝谶纬之学。

> 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编者案：指隋文帝杨坚〕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1]

[1]《隋书·经籍志》。

隋唐以后，谶纬图书便大量散失，谶纬之学也几乎成为绝学。《隋书·经籍志》将遗存于世的谶纬图书独立成类，也只有13部92卷。到了新旧《唐书》仅存郑玄、宋均二家所注谶纬9部84种。到了宋末，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里唯存部分《易纬》和《礼纬·含文嘉》1种，其余亡佚殆尽。今日可见者仅有《易纬·乾凿度》。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录。

三、两汉时人的代表性哲学与政治学著作

两汉学者撰写的哲学与政治学图书为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十分有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太玄》、桓谭的《新论》、班固受命整理

的《白虎通义》、王符的《潜夫论》、王充的《论衡》、荀悦的《申鉴》等。上述图书，兼有哲学思想与政论性，为论述之便，统一归入哲学类出版物中。下面重点介绍几种。

1.《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著，是汉代儒学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全书17卷，82篇，7万余字。董仲舒（公元前170—前104），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大儒，著述颇丰，多为春秋经注疏之作。早年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阐述了以“天”为核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伦理、教育观点，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繁露》是董仲舒集中阐述其儒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繁露》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17篇，第17篇相当于跋。全书推重公羊学，阐发“尊王攘夷，春秋大一统”的宗旨，并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的比附。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先秦以来的宗教神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又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即“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性三品”等伦理学说，为加强封建中央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其理论主要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副”说，春秋大一统说，改制更化说，并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阐发的学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学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他的思想既把皇权神秘化了，又把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改造了。

2.《盐铁论》

《盐铁论》是西汉一部记述盐铁会议的重要典籍。撰者桓宽，汝南（今河南汝南）人，字次公，对《公羊春秋》颇有研究。宣帝时，被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他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又善于写作。他利用盐铁会议的记录，加以组织整理，即“推衍”和“增广”，编写成数万字的《盐铁论》，打算借此阐发国家治乱兴衰的道理，成一家之言。早在汉武帝时，西汉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增加财政收入，抗击匈奴的攻掠，巩固中央集权，

曾经实行盐铁官营、榷酤、平准、均输以及统一币制等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政策，但由于与下层官僚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以问民间所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等60余人到长安举行会议，就盐铁官营等政策与这些政策的主要制定、执行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进行辩论。双方以盐铁官营等政策是否应当继续执行为辩论主题，兼论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到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盐铁论》一书。全书约6万字，分10卷60篇，各篇立标题，但内容仍互相连贯。自第1篇至第41篇是写盐铁会议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第59篇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全书的后记。全书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辩论的情景，充分反映了双方各自在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为研究当时社会矛盾、思想斗争和桑弘羊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此书不仅保留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而且在文体上也很有创造性，它还是一部处理经济问题的对话体历史小说。其价值自古就为知识分子所肯定，把它列为学者经世济民必读之书，历代著作多有记载和引用。

3.《白虎通义》

又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班固撰，是东汉前期白虎观会议内容的集结成果。自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以来，经学愈演愈繁，今古文相争持续不断，以致出现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各家都有烦琐的章句，多者达数十百万言。至东汉前期，“正五经异同”已经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仿西汉宣帝故事，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班固以史官身份担任记录工作。最后由汉章帝亲自裁决，做出结论，会议决定的内容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道理。会后，章帝命班固将

会议结论加以编辑，统一整理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是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在汉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白虎通义》以今文经学为主，但亦兼采古文经说和谶纬学说。至此儒家独尊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不过此时的儒学已明显被神学化和谶纬化了。

《白虎通义》4卷，共分43目，详细记录了白虎观经学辩论的情况。此书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全书还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理论。《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不许怀疑和批判。它既是经学的统一，也是经学在汉代走向神学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虎通义》是两汉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4.《论衡》

东汉王充（公元27—97）著，约成书于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论衡》一书是他的精心之作。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被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要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的。《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

論衡卷第九

問孔篇　王充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與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论衡》书影

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即“气”之运动产生万物。自然界之“灾异”，是“气”变化之结果，与人事无关。又以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1]。人之生命与精神，均以“精气”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不承认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其说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谴告、鬼神迷信进行了抨击。又有《问孔篇》和《刺孟篇》等，反对将儒家经典变为教条。论文章则强调内容，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并提倡通俗，反对崇古、模拟和“浮华虚伪之语”。正因为如此，《论衡》被视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建立起了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产生了不

【1】王充《论衡·谴告篇》。

同程度的影响。

下面再对其他几部著作和著者略作介绍。《新语》也称《陆子》，西汉初年陆贾著。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楚人，政治家、辞赋家，常向刘邦说《诗》、《书》。提出“(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问题，刘邦乃令其“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这就是《新语》一书的由来。《新语》一书2卷12篇，为西汉早期一部论述君臣政治得失的政论性著作。

【1】《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书》，又名《贾子》、《贾子新书》，西汉初年贾谊著。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洛阳人，著名儒家学者、政论家、文学家。贾谊18岁即以能诵《诗》《书》、通诸子百家言、善属文而闻名于郡中。后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文帝想迁升贾谊任公卿，但遭到了权臣周勃、灌婴、张相如（东阳侯）、冯敬等人的妒嫉和反对，旋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因梁怀王坠马而亡，自伤失职，抑郁而死，卒年仅33岁。作者以当时人论当时事，颇具新见解，因名《新书》。今本《新书》，10卷58篇，约5万字。前半部分为政论文章，后半部分为贾谊与弟子的问答，是著名的政论哲学著作，所论以儒家思想为主，也夹杂道、法之道，大体可分为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新书》提供了研究汉初社会和贾谊思想的丰富资料，名篇《过秦论》即出自此书。

《新论》，东汉桓谭著，现存1卷，属儒学类政论著作。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字君山。东汉沛国相（今淮北）人。年少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常与刘歆、扬雄等著名经学家辨析疑义。擅长音乐，喜弹琴。王莽时任掌乐大夫。汉光武帝即位，谭受大司空宋弘举荐，拜议郎给事中。因反对谶讳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几遭处斩。后免死罪，出任六安郡丞，途中病死，时年70余岁。其哲学思想对后世无神论思想发展较有影响。《新论》是桓谭效法《春秋》，受刘向《新序》、陆贾《新语》启发而撰写的。褒贬世事，力排俗议，不同

于众，故称为新。内容较为庞杂，以儒家思想为宗。

《潜夫论》，王符著。王符（约公元85—162），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末年思想家、哲学家。《后汉书·王符传》载："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原有13卷，现存10卷36篇，约20余万字。内容指陈时政得失，历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弊政，对研究东汉末政治、社会、思想史有很大价值。

《申鉴》，5篇，约1.2万字，东汉末年荀悦著，是一部政论性著作。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阳人，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除《申鉴》外，还著有《汉纪》一书。《申鉴》一书内容以儒术谈政治，写书目的是阐述政见以兴利除弊，因以《申鉴》名书。主张德刑并用，实行国有土地佃农制，对谶纬学说有所驳斥。其思想学说对曹魏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文学著作

两汉时期，国力增强，社会进步，统治者调整了文化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先后设立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乐府、兰台、东观等文化机构，在人才选拔上注重文才取士，加之汉代宾客之风盛行，诸侯王如汉初的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等皆以文才召集诸多门人，为文人群体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两汉时期的文学呈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出版物，其中尤以汉赋、汉乐府及文人五言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代表汉代文学的成就。

一、汉赋

汉赋是汉代"一代之文学"，它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是在楚辞骚体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骈散并用的文学体裁，又称辞赋、古赋。汉赋是把诗体形式拓展开来，用主客答问的方式引起下文，借以说理叙事，而于说理叙事中，常以夸张的方式作绘声绘色的描写。虽讲求押韵，但多杂有散文句法。赋的兴盛是与汉朝鼎盛繁荣的社会背景相一致的，或描绘游猎盛况，或歌咏建筑华美，或歌功颂德，极尽铺排之能事，十分壮观。汉赋以其直言、不歌而颂、句式整齐、铺陈文采的特点而享誉文坛。同时，还用夸张渲染的手法，在文章中堆砌丰富的词汇和华丽的辞藻，网罗众多的典故，行文又多变化，讲究结构、用词、音韵，对后代文学影响极大。

《汉书·艺文志》按照体裁将诗赋分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四家赋为：一、屈原赋类20家，361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3论屈原赋类说："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为第一篇。"二、陆贾赋类21家，274篇。"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故区为第二篇"。三、荀卿赋类25家，136篇。"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故又区为第三篇"。四、杂赋类12家，233篇。"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1]。大致来说，第一种主抒情，第二种主说辞，第三种主效物，第四种多杂诙谐。《汉书·艺文志》所收辞赋数量有限，东汉一代的辞赋基本未能收入，但其分类能大体反映辞赋的体裁之别。从数量上来看，西汉辞赋已近千篇，若加上东汉辞赋，数量当更为可观。据《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统计，留存至今的汉代诗赋的作者就有58人，汉赋有1 000多篇。

汉赋的发展，按时间先后，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汉初（高

[1]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

祖至武帝初年）骚体赋时期；西汉中后期，汉大赋全盛时期；东汉前期（以和帝末为界），抒情小赋初起时期；东汉后期，抒情小赋成熟时期。

骚体赋是以骚体句式写成的赋。汉初赋体尚未大盛，文人多依傍楚辞体制写作。这一时期的作家有陆贾、贾谊、枚乘、严忌、淮南王刘安及门客。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首数贾谊和枚乘。

贾谊既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赋7篇，包括《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各一篇。其中《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被学者公认为汉初赋的代表之作。学者认为贾谊的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于汉赋实有开创之功。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曾为吴王濞郎中，以善辞赋著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据学者考证，今所存枚乘赋3篇，唯《七发》可信。《七发》是赋中的名篇，是汉大赋由骚体赋演化形成的第一个里程碑。学者认为仅凭《七发》一篇，已经足以奠定枚乘在赋史中的地位。在贾谊和司马相如之间，枚乘独树一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司马相如等诸多汉赋大家的创作受到枚乘《七发》很大的影响。

西汉中后期是汉赋的全盛时期，又称汉大赋时期。汉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达，国力充实。武帝好大喜功，对外拓展疆土，开通商路，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物质享受之余，尚须文学侍从之臣为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赋最能适应这一要求，故得统治者提倡。汉有献赋考赋制度，优者可以得官受赐，故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吏亦时时间作。《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辞赋约千篇，十之九是中后期的作品，而武帝时期就占半数以上。这一时期著名的赋作家有数十人，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

司马相如（？—前117）字长卿，成都人，西汉著名的小学家、赋家，汉赋的集大成者。《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赋29篇，其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还有《哀

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等，其中《梨赋》、《鱼菹赋》今不存。一般认为，直至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出现，汉赋的形式才臻于成熟，此后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品，无不取式于《天子游猎赋》。

王褒（生卒无考）字子渊，蜀人，他所处的时代比司马相如稍靠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了王褒赋16篇，最具代表性的赋作是《九怀》和《洞箫赋》。学者认为王褒在赋的修辞上堪称后世的楷模，也是六朝骈赋的开端，同时他的《洞箫赋》兼有屈荀两家的风格，是魏晋六朝赋的远祖。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成都人，被誉为司马相如的继承者，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扬雄赋12篇，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最为著名，其他的还有《蜀都赋》、《反离骚》、《广骚》、《畔牢愁》、《解嘲》、《太玄赋》、《酒赋》、《逐贫赋》等，其中《广赋》和《畔牢愁》今不存。学者认为扬雄的赋有很明显的模仿司马相如的痕迹，但是他的学者身份仍然使他的赋呈现了与司马相如不同的风貌。他的赋特点是思维缜密，气态沉雄，学理深邃，在赋的形式上也更加严密，但在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并不多。

东汉前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汉帝国声威重振，这就使为帝王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再度兴盛成为可能。这一时期，著名的辞赋作家有班固、杜笃、傅毅、班昭、梁鸿等，其辞赋多模仿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作，体制缺乏创新，但已与鼎盛期的汉大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来。这些赋作都为抒情小赋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当时成就最高的是班固与张衡，他们二人与司马相如、扬雄被合称为“汉赋四大家”。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陕西咸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两都赋》就是早期的京都赋中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在前面的序言中他说明了写作的目的：“以极众人

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他把东都、西都的选择，人们的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在形式上采取了宾主问答的写法，虚拟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人物，两个人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通过“西都宾”之口，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又通过“东都主人”之口，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京都理想，描述和赞颂了后汉的制度之美，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除此之外，班固的赋作还有《幽通赋》、《终南山赋》、《览海赋》、《竹扇赋》等，但是后三篇赋都没有全本传世。

张衡（公元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代表作包括《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拟班固《两都赋》而作的，在谋篇布局上完全模仿《两都赋》，因其铺陈规模的宏大而被称为京都赋的极致；《思玄赋》与班固的《幽通赋》多有相似，但是不像后者那样晦涩，其修辞更加顺畅通达；《归田赋》是在赋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篇短赋，它打破了“自来以骚体抒情”的传统，以短赋抒一己之怀，是魏晋六朝短赋作品的发端之作。张衡的其他赋作有《定情赋》、《鸿赋》、《羽猎赋》、《观舞赋》、《扇赋》、《天象赋》、《温泉赋》、《南都赋》、《思归赋》、《骷髅赋》、《冢赋》等，其中前五篇没有全本传世。

从张衡开始，抒情小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渐成辞赋创作的主流。至东汉末年，君主昏聩，宦官左右朝政，吏制腐败，社会一片黑暗。有识之士屈抑沉沦，故伤时感怀，疾世抒愤之赋渐多。这一时期，著名的赋家有蔡邕、赵壹、祢衡、王粲等。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郡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是东汉文坛的重要人物。蔡邕的赋作很多，有学者根据各种史料统计有18篇，但是其中保存完整的不多，仅有《汉津赋》、《述行赋》、《青衣赋》、《弹棋赋》、《伤故栗赋》、《短人赋》及《霖雨赋》是至今仍然保存完整的。他的赋作特点是感情真挚，不事雕琢，而且以小赋居多，学者认为他的小赋开六朝小赋文风

之先，在转变汉赋的艺术形式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在赋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著有《解摈》及《穷鸟赋》。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名作为《鹦鹉赋》。王粲（177—217）字仲宣，东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王粲生有异才，为蔡邕所重，为"建安七子"中的首要人物。一生作赋可考者20余篇。《登楼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抒情小赋中最杰出的作品。

除以上述及之代表人物和作品之外，两汉时期重要的赋作还有西汉淮南王刘安的《屏风赋》、东方朔的《七谏》、刘向的《九叹》、东汉班彪的《北征赋》、冯衍的《显志赋》、班昭的《东征赋》、马融的《长笛赋》、王逸的《九思》、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两汉辞赋之兴盛，真可谓洋洋大观。辞赋在当时的流传范围比较广，是两汉时期典型的文学出版物。

二、乐府诗集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者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原指汉代为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所建立的机关，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机关所采集的民间诗歌称作乐府或汉乐府。汉代另有一类用于郊庙祭祀的诗歌，也称乐府或汉乐府。文献表明，早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乐府"部门的建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

由上述记载可知，秦代"乐府"是乐官的名称，隶属于少府，职责是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舞乐。

乐府在汉代仍然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和秦代一样，西汉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职能上有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乐府主管的不是传统古乐，而是流行曲调。乐府在汉武帝时期得到扩充和发展。据《汉书·礼乐志》载：

>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又据《汉书·艺文志》载：

>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上述史料可知：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期得到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之外，还广泛搜集各地的歌谣，从而使许多民间歌谣得以保存了下来。这段史料还说明，到武帝时期，以前由太乐主办的“郊祀之礼”，已经转由乐府主管，这也是乐府的地位提高的证明。采集民间歌谣的举措，可以看做是由政府出面对民间诗歌谣谚的征集、编辑和整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乐府可以被看成是两汉时期诗歌谣谚作品的编辑、出版机构。

武帝到成帝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至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乐府开始由盛转衰。而到了东

汉，由承华令主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功能近似于乐府。

一般认为，关于汉乐府诗的最早的书目文献应该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七略》中已列“诗赋略”，应当包括了关于汉乐府诗的著录，但是《七略》今已不存，而现存最早的著录汉乐府的文献，当属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专门列有“歌诗”一节，著录了汉兴以来歌诗28家，314篇。

汉乐府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郊祀宗庙乐歌和文人乐歌；一类是“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即民间歌谣。其中可以认定是西汉作品的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的乐府诗都作于东汉。下面介绍这些乐府诗作品。

《安世房中歌》17章，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汉高祖妃唐山夫人，但也有人认为是叔孙通所作。这是一组祭神敬祖的乐歌，“房”，本意是古人宗庙陈主之所，而此乐在陈主之所演奏，所以称之为“房中歌”。关于《安世房中歌》的章数，存在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还是按照《汉书·礼乐志》所著录的为准，把它分为17章。它的第1、第2章是迎神之曲，第3至第8章相当于待祭，第9至第11章相当于初祭，第12章相当于中祭，第13至17章相当于终祭，与《汉书·礼乐志》所叙述的叔孙通制定的行祭礼次是对应的。

《郊祀歌》19章，根据《汉书·礼乐志》和《汉书·李延年传》的记载，实际是李延年对司马相如等创作的诗赋经过“弦歌”之后创作而成的。其作者除了司马相如之外，还包括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董仲舒、萧望之、邹阳等人。汉武帝始定郊祀之礼并立乐府，主要祭祀太一之神及后土之神。因而《郊祀歌》19章绝大部分都是用作郊祀祭祀的祭歌，比如《练时日》是迎神之曲，《帝临》是祀中央黄帝之曲，《青阳》是祀东方青帝之曲，《东明》是祀南方赤帝之曲等等。

《铙歌》18曲，原见于《宋书·乐志》，据学者考证，实际应

为22曲，除《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四篇无辞之外，其余18首有诗意可全解者，如《战城南》、《上邪》、《有所思》、《巫山高》等；有诗意可半解者，如《朱鹭》、《思悲翁》、《芳树》等；有全不可解者，如《雉子斑》、《石留》等。因为文字讹误多，加之内容庞杂，所以很难解，研究起来也很困难。

东汉乐府自成一体，明帝时，定乐为四品，学者蔡邕著《礼乐志》，对东汉乐府加以分类，使东汉乐府有四品的分类正式定型。据蔡邕《乐意》记载：

> 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雅颂乐》……三曰《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

《大予乐》是东汉的第一品乐，据《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东汉所谓的《大予乐》，就是郊庙乐的别称，掌管《大予乐》的官员称"大予乐官"，据《汉官仪》："太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

《雅颂乐》，据《东观汉记·乐志》载："二曰《周雅颂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这段史料证明了《雅颂乐》原是周代的《雅颂乐》，而非两汉的《雅颂乐》。

《黄门鼓吹乐》，"黄门"，是侍奉帝后的官署的名称，鼓吹，是两种不同的乐器。据史料载，《黄门鼓吹乐》是天子宴会群臣时使用的。具有雅乐的性质。

《短箫铙歌》，《隋书·音乐志》说它是"军中之所用焉"，但据学者研究，"短箫铙歌"当为东汉第三品乐《黄门鼓吹》乐中的一部分。

不过汉乐府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民间歌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略去了郊祀宗庙乐歌和文人乐歌，而重点介绍的是"代赵之讴，秦楚之风"，认为它们"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充分肯定了它们的价值。除了《汉

书·艺文志》之外，收录了汉乐府诗的文集还有：南朝陈人徐陵所著《玉台新咏》，唐人吴兢所著的《乐府古题要解》，宋人郑樵所著《通志·乐略》以及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等。这些著作都对汉乐府提出了各种分类，也收录了大量民间乐府诗。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郭茂倩所编的专书《乐府诗集》。郭茂倩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其中包含有汉乐府的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这四类。"郊庙"一类中都是由文人制作的朝廷典礼乐章，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杂曲"这三类中，尤以"相和"类中为多。"相和"是一种"丝竹相和"的管弦乐曲，也是汉代民间的主要乐曲；"鼓吹曲"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而形成的军乐；"杂曲"是原来音乐归类已经失传的作品。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有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相逢行》、《薤露》、《蒿里》以及《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

汉乐府在内容上包罗万象，充分反映了两汉时期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汉乐府民歌以叙事诗为主，它们往往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所写的人物有其个性，而这种个性又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示的；语言朴素而又带有感情。在形式上也创造了灵活多变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句式有两言的，三言的，四言的，也有五言、六言、七言的，如《东门行》一诗，由一言到七言的多种句式组成，呈现了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汉乐府创造的五言、杂言等诗体，特别是五言新诗体，为后来的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三、文人诗

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学出版物还有文人创作的诗歌。当汉代四言诗和骚体诗走向衰落的时候，在民间开始兴起五言、七言诗创作，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较早的五言

诗据说是汉武帝时期流传的一首《紫宫谚》："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新兴的民间歌谣引起了文人的关注，他们开始仿作，特别是进入东汉之后，文人五言、七言诗逐渐流行起来，最后获得蓬勃的发展。下面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人诗作者及其作品。

班固的《咏史》及《竹扇赋》。前者是现存的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的五言诗，内容是西汉的缇萦救父之事。学者认为班固以纪传体史书手法写作了《咏史》，风格比较质朴。而他在五言诗的写作上还处于模仿的阶段，技巧上并不是很成熟。《竹扇赋》原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今仅存残篇。

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同声歌》是别具一格的五言诗作，假托新婚女子的口气自述而作，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四愁诗》是骚体整齐化之后的七言诗，学者认为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张衡的文人诗已经朝着抒情和华美的方向发展，学者认为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言、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被誉为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描写作者秦嘉和其妻徐淑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被学者公认为艺术成就很高的抒情诗。

郦炎的《见志诗》二首。作者生活在东汉灵帝时期，其作品也与初期班固、张衡等的诗作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具有了更加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见志诗》二首就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慨。

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诗。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激烈地抨击权贵和时弊，体现了文人的率直敢言的个性。

蔡邕的《翠鸟诗》。托物言志，是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乱世文人的身世和心态的写照，反映了身处乱世文人的惶恐之心，也是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

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巅峰之作，当推《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

选》。大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无主名且无诗题的五言抒情诗，被笼统称作“古诗”，这批诗歌到梁初尚存五十九首，萧统从中选取十九首编入《文选》，并加上了《古诗十九首》的题目。《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约都是东汉末年中下层文人，诗歌表达的两大主题是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怨之情。它展现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同时又以通俗质朴的语言传达了复杂的人生况味和生活哲理，因此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代的很多文学家例如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都模仿《古诗十九首》进行过创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五言抒情诗已经成熟，它对建安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历代评价很高，梁代钟嵘《诗品》将它列入上品，云：“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四、刘向与《楚辞》的编定

两汉文学出版物中的一大类别还有楚辞，它与辞赋略有不同。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楚辞的地方色彩十分浓厚，多用方言，叙述描写楚地风土物产，大量运用浪漫主义、比兴等创作手法，在句式上以六字句、五字句居多，并运用“兮”助词，极富特色。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进入汉代以后，文人多仿效楚辞进行创作，涌现出一大批作品，蔚为大观。据《汉书·地理志》载：

>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

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但《楚辞》作为一部书的出现，则要归功于刘向的编辑整理。刘向（公元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是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及编辑家。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理国家藏书，在整理群书的过程中，他集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他自己的作品编成辞赋作品集，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根据《汉书·艺文志》统计，《楚辞》中收录了屈原的赋作25篇，宋玉12篇，贾谊1篇，刘向9篇，王褒1篇，严忌1篇。

《楚辞》在编辑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1）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楚辞》是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的问世可以说填补了南方诗歌集在编纂上的空白。此前北方诗歌的大部分都系统地收录在《诗经》里面，而南方诗歌却一直缺少一部总集，因此《楚辞》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2）收录了不同时期的作者的作品，但这些作者基本属于一个流派，具有集大成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楚辞》中的辞赋作品都属于骚赋，屈原是这个流派的师祖，宋玉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的继承人，而刘向、贾谊、王褒、严忌等西汉文人则延续和发展了这个传统。这个流派具有鲜明的特色，区别于赋史中其他的派别。《楚辞》的编辑成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与《诗经》相提并论的元典，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两汉时期的文学出版物呈现出数量增多、异彩纷呈的态势。除了上面介绍的四类出版物之外，还有散文作品，比如贾谊的政论文，《汉书·艺文志》载其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的《淮

南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述；此外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也是散文史上的名篇。另外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是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集。而东汉时期赵晔的《吴越春秋》、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第三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史学著作

两汉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史学大家，史学著作不但在数量上较前代有显著增长，而且在编纂体例上也有许多改变和创新，对后世的史学编纂影响十分深远。

相较而言，西汉时期的史学领域尚未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史学出版物数量比较少，史书的地位也不是很高。这一点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中得到印证。《汉书·艺文志》将东汉以前的国家藏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史学著作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西汉时人的史学著作如《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即《史记》）、《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都一律附于六艺类的《春秋》之后。这充分说明了西汉史学著述还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不过，司马迁《史记》的出现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所创用的纪传体在此后二千余年一直沿用不替，而且被作为正史而成为中国史学著作中最权威的体裁。《史记》的非凡成就和巨大影响足以让西汉的史学领域光彩顿生，光照千秋。

进入东汉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学出版领域开始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家辈出，远比前代数量为多，诸如班彪、班固、刘珍、蔡邕、荀悦、应劭等，都堪称一代史学名家；二是史书类别较先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

注、载记、史抄、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其中有很多体裁具有首创之功，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三是史籍数量也很可观，仅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拾补》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196部，而且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优秀之作，其中以《汉书》和《东观汉记》最具代表性。东汉史学著述的繁荣使得史书地位迅速提高，在其后魏晋时期的目录书里，它已从经书的附属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经书的一大部类。

虽然两汉时期的史学出版物数量不少，但历经劫难，亡佚者亦不在少数，今天能够看到的仅是当时众多著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所存者也往往不是原来面貌。为展示两汉史学出版物的大致面貌，兹将其中的12部代表性著作列表如下：

两汉时期代表性史学出版物简表

书名	体裁	作者	卷数	成书时间
楚汉春秋	杂史	陆贾	9篇	汉高祖时期（公元前206—前195年）
史记	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	130卷	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新序	杂史	刘向	30卷	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
说苑	杂史	刘向	20卷	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
别录	杂史	刘向	20卷	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
列女传	杂史	刘向	8篇	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
汉书	纪传体断代史	班彪、班固、班昭等	100卷	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
越绝书	杂史	袁康	16卷	汉光武帝二十六年（公元50年）
吴越春秋	杂史	赵晔	12卷	汉明、章时期（公元58—88年）
东观汉记	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蔡邕等二十余名学者	143卷	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
前汉纪	编年体	荀悦	30卷	建安五年（200年）
风俗通义	杂史	应劭	32卷	东汉灵、献时期（168—220年）

以下择要述之（《史记》、《汉书》已见“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辑家”一节）：

1.《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东汉史官集体编撰的东汉一代国史，记事起于光武，终于灵帝，是承袭《史记》、《汉书》后又一部重要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因修撰工作主要在东观完成，故名《东观汉记》。在隋、唐代以前，此书颇受统治者推崇，与《史记》、《汉书》并列为“三史”。

《东观汉记》的编著起于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终于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历时163年。先后有2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部史学巨著的编撰工作。其编撰过程可分五次：东汉明帝时，诏班固、尹敏、孟异等，共成《世祖本纪》，班固又作列传、载记28篇。安帝时，又诏刘珍、李尤等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此后又命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及《单于西羌传》、《地理志》等。桓帝时，复命边韶、朱穆、延笃等作《顺烈皇后传》、《百官表》、《顺帝功臣传》，共114篇，号曰《汉纪》。灵帝熹平年间，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等又补撰列传42篇，蔡邕独撰10志，杨彪又补撰《灵帝、献帝纪》，直至公元225年杨彪去世时全部工作才告结束。

《东观汉记》分本纪、年表、志、列传、载记等五个部分，是继《汉书》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材料十分丰富，实为东汉一代史料的汇总，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者，主要素材都取自《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最后定稿时究竟是多少卷，史无明文记载，《隋书·经籍志》记有143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记为127卷，足见此书在唐时已有损失，后历经宋、元、明三代，均有散佚。至清乾隆修撰《四库全书》时，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共得24卷，即为今日所能看到的《东观汉记》残遗。

2.《前汉纪》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纪》相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著者为东汉著名学者荀悦。荀悦（147—209）字仲豫，颍阳（今河南许昌）人。自幼好学，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年12岁即能讲解《春秋》。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隐居不仕，献帝时被曹操征召，先后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在汉献帝宫中侍讲文学史事。生平著作除《前汉纪》30卷以外，还有《申鉴》5篇。

《前汉纪》的编撰与汉献帝刘协有直接的关系。刘协素喜历史书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1]。荀悦受命以后，就依照《汉书》材料，"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阙，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结"[2]。由此可知，荀悦所做工作就是把纪传体的《汉书》大事精简以后，改造为编年体的《汉纪》，以供汉献帝阅读。这项工作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历时3年。

【1】《后汉书·荀悦传》。

【2】《前汉纪·高祖纪》。

《前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刘邦称汉王，止于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29年的历史。《前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融于各卷帝纪之中，故名《汉纪》。全书仅18万余字，约为《汉书》四分之一的篇幅，真正做到了"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3]。

【3】《汉纪目录》。

荀悦在编撰《前汉纪》时，有明确的编撰目的，并提出五条原则。他说：

>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

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世济其轨，不损其业。[1]

[1]《前汉纪·高祖纪》。

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包含16个方面，即所谓：

>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2]

[2]《前汉纪·自序》。

以上就是著名的五志十六例的史学方法。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荀悦的确是实践了他的史学理论，这使得《前汉纪》在叙事、年代和编排方面，都比它所依赖的范本《左传》更系统更完整。

《前汉纪》虽然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其成就和影响却非同寻常。刘知几评价此书说："荀悦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3] 洵为的评。更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两汉时期史书的主要形式，编年体史书竟显式微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荀悦不仅恢复了编年体史书，而且还使得这一古老的史学编撰形式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在《前汉纪》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很多史学家都私人撰修编年体史书。甚至到北宋司马光主持编著《资治通鉴》时，仍能看到《前汉纪》的影响。

[3]《史通·二体》。

《前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3.《新序》、《说苑》

《新序》为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抄录古史"而成的一部史书。《隋书·经籍志》记为30卷，到北宋时亡佚20卷，《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均记为10卷，可证。据《七略别录》说："《新序》总一百八十三章，阳朔元年二月癸卯上。"又据《汉书·刘向传》

说：“（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以助观览。”可见，原本《新序》的篇幅也是很长的，内容也比较丰富。至于该书内容，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舜、禹以来迄于周，嘉言善行，往往在焉，其书最为近古”；《崇文总目》则说“采载战国、秦、汉间事为三十卷”，可见所涉范围甚广。今本10卷，乃经宋人曾巩校正缀辑而成，从其内容看，也与前人所记相符。《新序》的史料价值很大，尤以记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最多，可补《国语》、《左传》、《战国策》及《史记》之不足。

《说苑》亦为刘向所著，系记述古代逸闻轶事的杂史，内容与《新序》相似，成书时间也大致相同，但取材标准多不相同。据《七略别录》载：

> 所校《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鸿嘉四年三月己亥上。

宋刊本《说苑》书影


說苑卷第十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

由此可见，在刘向校理群书前，内廷藏书中已有《说苑》一类的史书，刘向拿自己所藏图书与民间图书参照校订，先成《新序》。再将所剩材料“以类相从”，编次整理，编成《新苑》，即《说苑》一书。从史料价值讲，《说苑》正可补正史之不足。又该书在编撰方法上“以类相从”，便于读者翻阅查考。

由上述可知，《说苑》原本为20篇，784章，篇幅相当可观。《隋书》、《新唐书·艺文志》均记为20卷。到北宋编《崇文总目》时，官府藏书只剩5篇，亡佚情况十分严重。后曾巩从民间得书，与官府藏本相互参校，又成20篇，面貌与原本肯定有所出入。今本《说苑》即为曾巩整理之本。

4.《列女传》

此书也是刘向在校理群书时编撰而成的，他说："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屏风四堵。"[1] 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2] 是知，此书为刘向在古书基础上编次整理而成。至于篇幅，一说7篇，一说8篇，其实并不矛盾。原书原有《传》7篇，《颂》1篇，分则为8篇，合则为7篇。《列女传》下面又有一段颂义，并绘图陈列，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此书篇幅虽仅有8篇，政治教化的寓意却十分浓厚，因此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后，历代史书中便多有专记妇女活动的专栏。

[1] 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

[2]《汉书·楚元王传》。

5.《越绝书》

又名《越绝记》，作者为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书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书成时曾经同郡人吴平校定。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史学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有《经》有《传》，有《内传》，有《外传》，《隋书·经籍志》记为16卷，与今本符合。这16卷共分19篇，首篇是说明编著大意，末篇为《自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类似。中间的17篇都是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的史事，特别注重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这些内容可以和《左传》、《国语》及《史记》互相印证，补充其不足。

6.《吴越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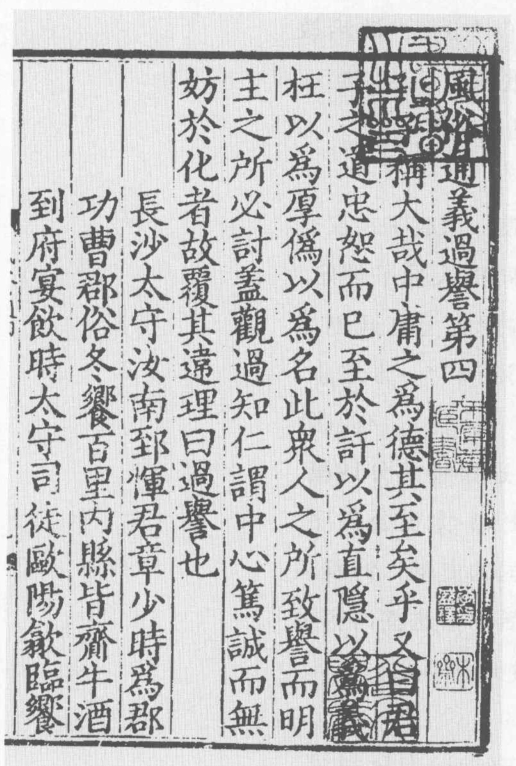
《吴越春秋》是继《越绝书》之后的又一部专记春秋时吴、

越地区史事的地方史书。撰者为东汉前期会稽山阴人赵晔。《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由此可见，赵晔在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学者，他的《诗细历神渊》竟得蔡邕称赞，足见学识之不凡。据后人考证，赵晔大约生活在东汉明、章二帝时期，生平著述颇丰，除了《吴越春秋》12卷、《诗细历神渊》1卷外，还有《韩诗谱》2卷，《诗道微》11篇。

元刻《风俗通义》书影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
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
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
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
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
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内縣皆齎牛酒
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

《吴越春秋》属于“钞撮古史”的著作，记吴国自太伯以至夫差，记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特别注重于吴、越争霸的叙述。作者能把古史上有关吴越地区的史事钞集起来，加以系统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吴越春秋》原本《隋书·经籍志》记为12卷，《宋史·艺文志》记为10卷，可见至宋代时已亡佚2卷。今存本为10卷，与宋时面貌相去不远。

7.《风俗通义》

著者为东汉末年著名学者应劭。应劭是东汉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大概生于桓帝建和年间，卒于献帝建安年间。他博学多闻，生平著述除了《风俗通义》32卷外，还

有《汉官仪》10卷，《汉书集解》24卷及《中汉辑序》等书。可见，他的著述多与史学相关。

关于《风俗通义》的写作缘起，应劭在《风俗通义·自序》中曾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 至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1]，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

[1]"一十卷"应是后人所改。

在东汉末年谶纬之学兴盛、学风渐疏的氛围里，应劭不为流俗所蔽，对于耳闻目见的事情，进行了客观的记述，并给以比较近情的解释，是有一定的思想价值的。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该书说："其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义》，纠正流俗类《论衡》，不名一体，故列之于《杂说》。"今天，《风俗通义》还被视为我国民俗学研究的首创之作。

《风俗通义》原本32卷，其中正文31卷，目录1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记无缺，至宋代《书录解题》及《中兴书目》，才记为10卷，可见在北宋时已亡佚了22卷。剩余的10卷保存至今，史料依旧十分丰富。

第四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科技著作

两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高于前代，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农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之而来的，也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出版物。两汉时期的科技出版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两汉以前就已存在的图书，在两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编次整理，其中凝结着两汉学者的心血；二是两汉学者自己著述、编撰的科技出版物。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一批科技图书，在秦始皇发布的焚书令当中，曾明言医药、占卜、种树之书不在禁毁之列，所以相对而言，这些图书留存到汉代的就比较多，这就为汉代科技书籍的大量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可以看到，刘向、刘歆校书时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其中两类都与科技有关，即数术和方技。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共著录100多家，2 500多卷。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共有36家860多卷。这两类图书中包含了不少西汉的科技书籍。这两类图书由于历来不受统治者重视，所以亡佚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在当时却相当流行。这从近年来出土的竹简、帛书的内容中可以得到印证。东汉时期科技图书的数目如何，因为当初没有明文记载，所以不能确切估计。从东汉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科技著作也应该很多，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科技水平的著述。虽然两汉时期的科技出版物中具有一些迷信的神学色彩，有时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们的科学光辉。下面分领域择要介绍其中的代表性出版物。

一、数学图书

两汉时期，我国在数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数学著作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近年考古发现的《算数书》，其中尤以《九章算术》最为有名。

1.《许商算术》与《杜忠算术》

《许商算术》，26卷，作者许商（公元前32—公元8），字长伯，长安人，曾任将作大匠、大司农等官，精通历法，善于计算。《杜忠算术》，16卷，作者杜忠所处的时代与许商相近。由此可以推断二书的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这两本书都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想来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流传下来。

2.《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最晚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它本是解释“盖天说”和四分历法的一本天文历算著作，但在数学方面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书中包含了矩（一种量直角、画矩形的工具）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定理等数学内容。最为重要的是，《周髀算经》中以问答的形式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总结出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也称为商高定理或陈方定理。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在《周髀算经》中还提到“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前一句话的意思是固定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那么它的直角顶点的轨迹是一个圆。此外，《周髀算经》中还有开平方的问题，等差级数的问题，以及应用于古代的“四分历”计算的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可见，这部著作已经涉及很多数学方面的基本问题。

宋刻本《周髀算经》

3.《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一部数学著作。它不仅记录了秦汉时代的数学成就，同时也反映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典章制度和社会情况。此书是一部出于众手、经过长期修改和补充而成的著作，它的最后定型，当在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年）。该书共有246道应用题，均是从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每道题都列出解法，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数学定理和公式。全书按数学性质分成九章，这九章分别是：方田（即田积）、粟米（比例）、衰分（比例配分）、少广（开方）、商功（体积）、均输（税率）、盈不足（盈亏与比例）、方程（多元一次方程）和勾股。在解决问题中，

《九章算术》应用了分数计算方法、比例计算方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还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等等。这些均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关于一元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早1500多年。《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开启了我国古代数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此后的数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的价值可以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相媲美，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三国魏人刘徽于公元263年前后，作《九章算术注》，对《九章算术》中的全部公式和定理都给出了证明，对一些重要概念也作了较严格的定义，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经过刘徽的注解和整理，《九章算术》最终成为我国数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4.《算数书》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期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汉墓里发现了一批西汉早期竹简，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算数书》残卷，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数学著作。由墓葬的年代可以推断出《算数书》最晚成书于西汉初年。《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它将算术题分门别类地归纳在60多个小标题下，标题之下列有算题，题下有答，答下有术，内容以性质命名，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编辑方法与《九章算术》十分相似，部分内容还有重合之处。如《少广》一节，与成书《九章算术》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而《算数书·钱息》有一问与《九章算术·衰分》第二十问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推断，《九章算术》在编撰过程中曾吸收过《算数书》的部分内容，而《算数书》乃是《九章算术》的母本之一。

二、医药图书

两汉时期，我国的医药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在医药图书的编撰方面，一些前代流传的古医药书，经过两汉学者的搜集、纠正和补充，最终成为流行于世的定本。与此同时，两汉时期的一些著名医学家也在长期的实践和

研究中，将积累的宝贵经验形诸文字，撰写了一批著名的医药学著作。这两方面的努力使得两汉时期的医药学图书蔚为大观。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与经方就有18家，将近500卷。在众多的医书中，现存的经典著作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治百病方》和《伤寒杂病论》。

1.《黄帝八十一难经》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于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腧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疑难问题。涉及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症候、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此书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的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神农本草经》

又称《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神农”为其托名。在长期的辗转传抄中，《神农本草经》还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正经》等不同的称谓。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南朝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从该书的内容可以推定，该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最后定稿应在东汉时期。

由于经后人辗转传抄有所增订，因而很难考证《神农本草

经》成书时的编撰体例。今本《神农本草经》是清代学者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分为序例（或称“序录”）1卷，本文3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材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涉及病症170多种，包括内、外、妇、儿等科疾病。该书根据功用毒性的不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所收载的大多数药物沿用至今，其功效已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书中提出的药物学理论和用药原则大多正确，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该书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世药物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学习中医药的重要参考书。

3.《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了92枚手写医方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经研究鉴定，出土的墓葬主人可能是一位医者，其生活的年代当在东汉初期，由此可以推定，《治百病方》也可能写定于东汉初年。《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血瘀、目疾、齿痛、耳聋、溃疡、出血、久泄和不孕症等诸多病症的病因、病理以及症候。所载药物一百种，其中植物类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类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该书的编撰体例是一病一方，每一条都列有方名、病名、药名、份量、泡制方式、服药方法、禁忌及反应等，除针灸禁忌部分外，关于医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很少，很可能是当时某部医书的读书笔记和医疗实践记录。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内容也比较朴实简明，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继《治百病方》之后，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又发现3篇西汉医药方面的帛书，上面记载着经脉和灸法。这应该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医书。

4.《伤寒杂病论》

此书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

合的临床诊疗专著。著者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机。张机，字仲景，河南南阳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151—154年），卒于建安后期（约215—219年），曾任长沙太守。因医术高明，且颇有医德，被后世称为“医圣”。汉末建安年间，南阳一带疾疫流行，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

>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1]

[1] 张机：《伤寒杂病论集序》。

可见，此书撰成时为16卷。可惜，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才得以流传后世。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最终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两书。《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对伤寒病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症的理、法、方、药等。

今日已无从知晓《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之前的面貌，不过，合《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两书，可以看出《伤寒杂病论》一书的主要内容。该书为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后人曾有四五百家对《伤寒杂病论》进行探索，留下近千种专著、专论，形成独特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其影响远及国外。

除了上述医学著作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也曾撰有医学著作。华佗，沛人，“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

[1]《后汉书·华佗传》。

[2]《后汉书·华佗传》。

称量。针灸不过数处"[1]，尤精于外科。创麻醉剂"麻沸散"，为病人实施外科手术，并提倡"五禽之戏"。行医各地，声名显著，被人称为神医。后为曹操所害，临刑前，"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2]。所出之书即为华佗于狱中所著医书《青囊经》3卷。除此而外，华佗应该还有其他医学著作，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四、天文学图书

两汉时期，我国的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东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张衡是东汉杰出的天文学家，还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反谶纬的思想家，在历法方面也有研究。他在天文学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制浑天仪，造地动仪。他撰有关于天体结构的著作《灵宪》一书，并且根据天象画了一份《灵宪图》，可惜《灵宪图》现已失传。在造成浑天仪以后，他还专为此写成《浑天仪图注》一书。这样，《灵宪》与《浑天仪图注》就成为两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天文学著作。

《灵宪》是我国第一部天文学理论著作，这是一部阐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和它们的运动的天文理论著作，代表了张衡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该书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课题，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使我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还是提出了不少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独到见解。如他明确提出在"天球"之外还有空间。他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他在书中还指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他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此外，张衡还算出了日、月的角直径，记录了在中原洛阳观察到的恒星二千五百颗，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的结果是相近的。

《浑天仪图注》一书是为介绍浑天仪而作。这本书让我们在

今日仍能仿造出浑天仪的模型来。而且，在这本书中，张衡还记录了很多理论发明。如他测定出地球绕太阳一年所需的时间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和近代天文学家所测量的时间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字十分接近，说明张衡对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五、农学图书

两汉时期，在农业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农学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农学著作9种114篇，其中《董安国》16篇，《氾胜之书》18篇，《蔡癸》1篇可以确定是西汉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成书于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东汉时期的农学著作也应不少，现存比较有名的是东汉末年崔寔的《四民月令》。

1.《氾胜之书》

著者氾胜之，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时任议郎，后迁为御史。曾以轻车使者名义，在三辅（关中平原）“教田”，并“督三辅种麦”[1]，关中一带因此而丰收。他概括总结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著成《氾胜之书》一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书中根据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主要内容有：综合栽培技术；整地改土技术；选种育种技术；施肥技术；中耕除草与嫁接技术；轮作、间作与混作技术。《氾胜之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18篇，到《新唐书·艺文志》时，已成2卷，可见编撰形式已有所变化。今天该书仅存3 000余字。从这遗存的文字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西汉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氾胜之书》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其他四部分别为《齐民要术》、《陈甫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

[1]《晋书·食货志》。

2.《四民月令》

著者崔寔（？—约170），字子真，河北涿县人。《后汉书·崔

寔传》记他："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骃、父亲崔瑗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崔寔曾著《政论》，为当时所称。《四民月令》一书是崔寔任五原太守时，为教民耕织而作的一部农学著作。此书内容主要是地主经营田庄的月历，但是所记农业技术经验也很丰富，为后人所取法。因此《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这部书列入农家著作。《四民月令》在流传中也有亡佚，至唐代时只存1卷，今有辑本。

第五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字书和工具书

两汉时期，在经学昌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字学、训诂学的学科体系开始确立。与此同时，我国字书的编辑出版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文字之学在汉代被称为小学，《汉书·艺文志》将它归在经学范围内，属于经学的一部分。汉代学者之所以把文字学归入经学类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 为了阐释儒家经典，阐发经书的微言大义，当时学者普遍重视"说文解字"。当时社会上说解文字之风十分盛行，上至硕学鸿儒，下至俗人鄙夫，都喜欢分析文字，甚至"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2]。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许多学者也纷纷撰写文字学方面的著述，是为字书。另外，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启发童蒙，两汉时期的学者也编撰了大量的童蒙教科书，类似于今天的识字课本。这些图书在今天看来，其编撰体例与内容都接近于字书，所以这里也将其归入字书出版物中。除了两汉时人的著作以外，两汉学者还对前代流传的字书进行了新的加工整理，这些图书也理应属于两汉时期的出版物。

两汉时期的字书数量究竟为多少，至今尚无明确的统计数字。《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小学图书有10家45篇，数目虽然不多，学术价值却很高，在编撰体例上也颇多创新。另外，我

[1] 许慎:《说文解字·序》。

[2] 许慎:《说文解字·序》。

国第一部以训释字义和词义为主要内容的词典——《尔雅》编定于此时。西汉后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东汉一代在字书的编撰方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分析字形、探讨字体结构源流为主要内容的字典——《说文解字》，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以下重点介绍两汉时期字书编撰出版的重要成果（《说文解字》详见“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家”一节）。

1.《仓颉篇》及其注本

图书编辑出版与教育始终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早在公元前9—前8世纪，我国就有了供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即周宣王时的太史籀用大篆编写的《史籀篇》。这也可以称为我国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秦始皇时期，为了统一全国文字，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字的定型和规范化工作，将籀文简化，创作小篆，并参照《史籀篇》着手编写统一的识字课本。由丞相李斯作《仓颉篇》7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6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7章，都用小篆书写，向全国颁布。《史籀篇》自此废读。

秦始皇统治时期不长，李斯等人编写的识字课本使用时间也很短。因为汉字的字体由秦时的篆体开始向隶书体转变，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也为了授受之便，西汉时期的“闾里书师”便将秦时使用的课本进行了重新的编次加工，“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1]。经过改编的《仓颉篇》共有3 300字，用隶书书写，成为汉代闾里通行的识字课本。以后历代史书均见记载，到《宋史·艺文志》才不见著录，估计《仓颉篇》在南宋时期已失传了。

【1】《汉书·艺文志》。

根据近年来几次发掘出土的《仓颉篇》，综合起来，可以了解到这部两千多年前的识字课本在编写上的一些特点。

(1) 四字一句，采用押韵方式。《仓颉篇》基本上二句一韵，有的章内还有一韵用到底的情况。如第一章开头两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所押的是之韵，集之部字。第五章几乎全

押之韵，也都取之部字。这种采用句短押韵的编写方法，要经过一番精心选字编句，以适于学童朗读，便于背诵。

（2）将形近的字编在一起，采用部首相同排字方法。如“开闭门间”，都属“门”部，形近，而字义又都同门字有关。这样编写，便于识读、理解和记忆。

（3）注意到词义相近的字，采用归类编排。如：“囷窌廪仓”。囷是圜廪，窌是地窖，廪是藏谷的，仓是藏米的。这些都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把近义的（或反义的）字排列成句，增强学童对周围事物的理解，符合教材编写原则。

（4）不属于近形、近义的，则按词性同类编排。如“而乃之于”都是虚词，编成一句，从教学角度来看，便于教者讲解，也便于学者理会。这样的编排，使实词与虚词分开，说明汉代在学童学习阶段，已要求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和文字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秦代和汉初所作的《仓颉篇》，到了汉宣帝时，就已经需要请专家来解释了。因为许多古字、古音已不太为西汉中后期的人所识，解释古字音义的工作是十分重要和非常严肃的事，也是汉代学术界的一大特点和贡献。

这种解释工作又称“训诂”，根据《毛诗正义》的说法，“训”的意思是“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即用形容或描述的方法解释需说明的字辞。“诂”的意思是“古也，古今异意，通之使人知也”，也就是用现代通行的语言解释古代文字。为了解释《仓颉篇》中的古字，汉代学者杜林、扬雄等把读音和含义注在正文之下，分别编写了《仓颉训纂》和《训纂篇》，这两部书也早已亡佚了，但清代学者从古籍中辑出片段，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内容，如：“餔，夕食也；谓申时食也。”“驶，速疾也。字从马，史声。”“圂，豕所居也。字从囗，豕在其中也。”“贸，换易也；交易货为贸也。字从贝、卯。”当把这类注释抄集在一起时，就成了专门的字书。

2.《急就篇》

除了《仓颉篇》外，汉代学者还编出一批识字课本，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1篇，史游的《急就篇》1篇，李长作的《元尚篇》等。其中流传时间最久，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其他的识字课本早已亡佚无存，清人孙星衍、任大椿、顾震福、马国翰等分别从各种古籍的引文中辑录出一些片段，多少能知道一点情况，但无从见到原书面貌。

《急就篇》的著者史游在西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曾为黄门令，余无考。所以此书的编定时间约在公元前40年。关于“急就”两个字的意思，宋人晁公武是这样解释的：“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1]

[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急就篇》，全书共2 144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128字是东汉人补加的。就前边的2 016字来看，《急就篇》的编撰方法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不加注释，使之成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尽可能避免重复字，同时尽可能使每句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借此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多少教给儿童一些常识。如它开头的几句话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日用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这几句可以看做是全书的前言。全书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一是“服器百物”，1 100多字；一是“文学法理”，440多字[2]。

[2] 据明代王应麟补注《急就篇》的跋语。

第一部分用三言，如：

宋延年　郑子方　卫益寿　史步昌

二、三两部分用七言，如：

稻黍秫稷粟麻秔　饼饵麦饭甘豆羹

治礼掌故砥砺身　智能通达多见闻

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如：

汉地广大　无不容盛　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

比较起来，《仓颉训纂》更像字典，它的说解字形，可以说是《说文解字》的先声。而《急就篇》和不带注释的《仓颉篇》不过是生词表，但它仍然具有字典尤其是辞典的某些特征，至少它把词目列了出来。而其所列名物，如"鸟喙附子椒芫华"、"款冬贝母姜狼牙"，则与《尔雅·释草》有某些相似之处。

《急就篇》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顾炎武说：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1]

【1】顾炎武:《日知录》卷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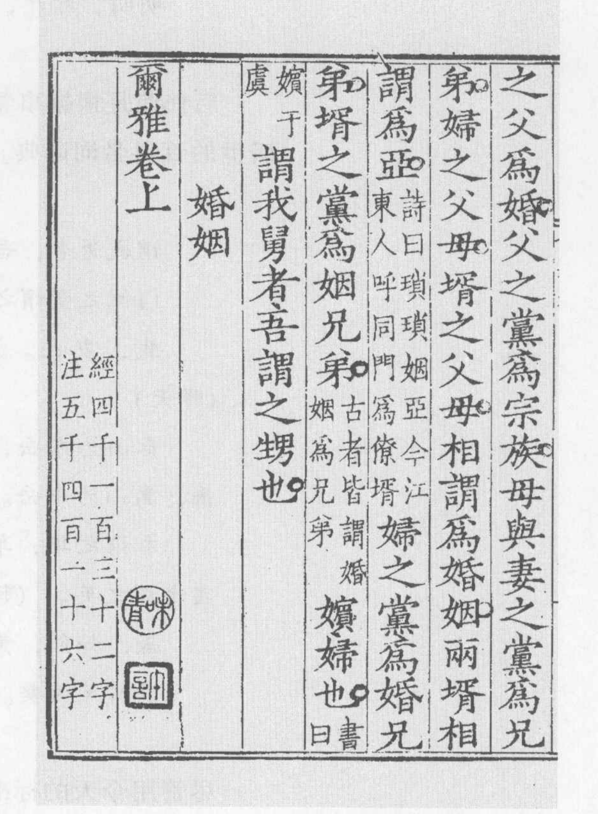
唐代以后，《急就篇》逐渐被新起的识字课本所代替，但是这本书还是保存流传了下来，并且对后世识字课本和字书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后世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诸多韵语读物，都是继承了《急就篇》的经验和体例而有所发展的。

3.《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作为书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

《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尔雅》为周公、孔子等所作或所增，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解释六艺五经的训诂，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秦汉间学《诗》的人纂集的《诗经》博士的训诂之书，第四种观点则以为《尔雅》“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1]。最后一种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此书既非一时所作，又非一人所作，而是从春秋战国时就开始纂辑，后经不少人的增补和整理，到汉代才定型。但《尔雅》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


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
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
謂爲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婦之黨爲婚兄
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嬪婦也書曰嬪于
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婚姻
爾雅卷上 經四千一百三十二字 注五千四百一十六字

明吴元恭私人仿宋刻本《尔雅》

【1】《四库全书目录》。

《尔雅》原为20篇，今存19篇，佚《序篇》1篇。全书收词语4 300多个，分为2 091个条目。从其内容来看，又可分为如下六类：

第一类是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有《释诂》、《释言》、《释训》3篇，《释诂》是解说古字的，《释言》是释秦汉间文字的，《释训》是解释叠词的；第二类是有关人事和生活器用名称的，即《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第三类是有关天文的，有《释天》；第四类是有关地理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第五类是有关动物的，有《释鸟》、《释兽》、《释畜》；第六类是有关植物的，有《释草》、《释木》。

从整体上看，《尔雅》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3篇为一部分，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例如：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释诂）

克，能也。（释言）

明明，斤斤，察也。（释训）

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类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例如：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释亲）

门侧之堂谓之塾。（释宫）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虞曰载。（释天）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释山）

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释草）

罴，如熊，黄白文。（释兽）

狗四尺为獒。（释畜）

尽管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尔雅》的知识容量相当有限，但是在古代已经非常可观了。因此，《尔雅》还可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辞典。

在历史上，《尔雅》备受推崇，从西汉开始，就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也不是某一部经书的附庸，而是一本独立的词典。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尔雅》首创的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辞书、类书的出现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辞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

被称为“雅学”。

4.《方言》

《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简称为《别国方言》或《方言》。輶轩是一种轻车的名称，古代天子使者都乘輶轩，故将使者称为“輶轩使者”。周秦时，天子常于八月派輶轩使者往各地访求搜集方言、习俗、民歌民谣，回来后加以整理，藏于秘室之中。其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以《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为书名，说明他是亲自调查搜集过各地方言材料的。除了亲自调查以外，扬雄还访求来京的各郡国孝廉及卫士，然后进行补充增订，积27年之久从不间断。《方言》还有一部分资料来自前人的各种著述。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方言》的编纂体例，有以下特点：

（1）篇章体例，《方言》虽没有标明门类，但实际上是按《尔雅》模式编排的，如卷4释衣着，卷5释器物，卷6释人及感觉行为，卷8释鸟兽，卷9释兵车船，卷10释虫，其他各卷释动词、名词及形容词。

（2）释词方式，其一是先举出一个词，作为话题，然后逐一说明其各地的不同称谓，如卷8释“猪”云：“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其二，先举出一组同义词，作一共同释义，然后分别辨析，指出何字为何地方言。如卷1：“悼、惄、悴、慭，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汝谓之惄，秦谓之悼，宋谓之悴，楚颍之间谓之慭。”

（3）说解术语，对普通话和古今方言都有专称。“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等表示不受地域限制的西汉通行的普通话和官方语言；“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是表示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某地某地之间通语”表示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古今语”、“古雅

之别语”，表示古代不同的方言；“转语”、“代语”，表示因时地迁移、声音转变而产生的语言。此书所记包括了十分广阔复杂的大大小小的方言区，有古国如秦、晋、吴、越，有州郡县如幽、汝、南、颍，有山川如岱、江，有民族如朝鲜。

《方言》一书是第一次以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和图书编辑出版史上都是一种创举，而且其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方言》和《尔雅》是古代最早的两部同义词词典，《尔雅》汇其同而略其异，《方言》既明其同又辨其异，主要是辨其空间之异及时间之异，视野比《尔雅》广阔得多。在训诂上的价值，可使人们据之以解古代方言之义，对于阅读先秦两汉古书和证释诂训也是很重要的。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言辞典，《方言》的成就是非凡的，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宗教著作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两汉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出版物：佛经与道经。这是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与两汉以前的出版物不同，宗教出版物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式出版物，它的出现与广泛传播不唯在图书出版领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也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关佛经的编辑出版活动详见下文，这里主要论述道教的形成与道教著作的编辑出版情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宗教。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

特的教理、教义与修行体系，并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与文献资料，最终形成了卷帙浩繁的道教出版物总集——《道藏》，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道教正式产生于东汉顺帝时代。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道教出版物的产生相伴而行的。据《后汉书·襄楷传》所载，在顺帝时，就已出现了道教的第一部正式典籍——《太平清领书》。当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1]。

[1]《后汉书·襄楷传》。

《太平清领书》后世也称《太平经》。干吉又称于吉、干室，东汉末年方士，是最早撰写、传布《太平经》的创教者。

起先，《太平清领书》被认为是“妖妄不经”，故“收藏之”，未能引起重视。桓帝时，襄楷再次向皇帝举荐此书，并称：

> 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2]

[2]《后汉书·襄楷传》。

该书在朝廷不受重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太平经》共170卷，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17卷，今存57卷，收于后世《道藏》之中。《太平经》构筑了道教简单的道教神系，将“道”称为“无极之经”，视为万物本源，最高主宰，推尊图谶，多以阴阳学说解释治国之道。书中还表达了劝人行善、男女平等、救穷周急的主张，反映了农民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太平理想和愿望，因此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灵帝时，河北钜鹿人张角奉《太平清领经》，在冀州传教，建立太平道。他自称“大贤良师”，以符水救治病人，并派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3]，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3]《后汉书·皇甫嵩传》。

的口号，利用太平道发动和组织了黄巾起义，推动了太平道迅速广泛地在全国各地传播。后因黄巾起义遭到镇压，太平道也受到沉重打击，但其教义的影响仍不绝于世。《太平经》的出现和传布，标志着道教的初步形成和道教第一部正式经典的诞生。

在太平道形成和传布的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张道陵在蜀地鹄鸣山中学道，造作符书以招致信徒，信道者出五斗米即能加入组织，有病则令自首其过。这就是五斗米道。张道陵亦称张陵。五斗米道亦源于黄老道，尊崇黄帝、老子并以神仙崇拜及方术为教义特征，与巫道相融合，尤重于宗教礼仪。张陵死后，子张衡、孙张鲁世传其道。张鲁一代，五斗米道得到壮大和发展，在巴蜀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鲁归降曹操，拜将封侯，五斗米道(后更名为天师道，也即正一道）遂得合法传播，影响日增。

当时的五斗米道不仅有自己的教义教规和组织体系，还有自己的出版物。据《隶续》卷3《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文中说，当时有《微经》12卷，现已亡佚。另有《太平洞极经》，与《太平清领书》名称虽然不同，但基本内容却相似，为五斗米道尊奉的主要经典之一。除此而外，五斗米道还奉持张鲁所定的《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老子五千文》的注解本）、《天宫章本》、《灵宝经》、《正一经》、《黄书》和《老子变化经》等。其中以《老子想尔注》最为重要。

《老子想尔注》，全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2卷。作者不详，后世多认为是由张陵开始编撰，并由其孙张鲁补充而成的。《老子想尔注》既与《老子》有内在联系，又是对《老子》的改造和发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敦煌遗书中有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今藏伦敦博物馆。残卷保存了道德经的部分注文，从中可以看出是借题发挥，用浅近的语言来改造《老子》，以适合道教的教义。《老子想尔注》的思想多与《太平经》相同，并汲取河上公解《道德经》的某些内容。书中将太上老君尊为最高之神，并

首次提出道教的名称。

除了《太平清领书》和《老子想尔注》两部重要的著作以外，早期的道教著作中还有《周易参同契》一书。这三部书的出现被认为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周易参同契》的成书时间与《太平经》大致同时，主要讲炼丹术。作者为东汉末年著名的炼丹家魏伯阳。魏伯阳一说名翱，自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高门望族。世袭簪缨，但他生性好道，不肯仕宦。《周易参同契》全书共3卷，是流传至今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论著作。该书思想主要来源于《周易》的部分学说，并参考古炼丹术及炼丹古书，假借爻象，以论炼丹之意。作者由于"恐泄天之符（天机）"，故行文多恍惚之辞、类比之喻，文字古奥难懂，不易捉摸。该书奠定了道教丹鼎学说的理论基础，被后世奉为"千古丹经之鼻祖"。

由于宗教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所以东汉时期的道教出版物也主要在民间教徒中传播流布。随着道教的发展，出版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流通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遂形成后世蔚为壮观的道教出版物总集——《道藏》。在道教的图书出版活动中，东汉时期的道教出版物无疑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后世《道藏》所收两汉时期的出版物，数量远远超过上述图书。这是因为道教涵盖的内容十分广博，甚至有泛滥之嫌。《道藏》所收图书也是兼收并蓄，甚至也收入一些儒家和佛教的图书，因此颇显庞杂。以《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为例，其中被后世列入道教范围的图书计有171家，3867卷，其中道家37家，993卷；房中8家，186卷；神仙10家，205卷；方技36家，868卷；杂占18家，313卷；蓍龟15家，401卷；五行31家，652卷；阴阳16家，249卷[1]。这些图书在汉代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出版物，它们与《太平清领书》、《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等图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只不过其内容与后来的道教教义相关，所以才被列入《道藏》之中。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中编,41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八章　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与文字载体

第一节　竹木简牍与缣帛

两汉时期的出版物载体仍以竹木和缣帛为主，间或会有金石等材料。汉代虽然发明了造纸术，并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改进，但造纸术在当时尚未普及。将纸张广泛应用于书写还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形式仍以简牍和帛书为主。

在《别录》、《论衡》、《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用简牍与缣帛著书。如刘向在《别录》中说："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扬雄答刘歆书，谓其编撰《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东汉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曾写道："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许慎《说文解字叙》曰："著于竹帛谓之书。"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有"篇"与"卷"之别。一般学者都认为，以"篇"著录者为竹简，以"卷"著录者为缣帛。上述文献记载，都能说明竹帛为两汉时期的通行书写材料。

两汉时期简牍与帛书的出土，在19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也多有记载，但实物都早已无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外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断的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一大批竹木简牍和帛书。这些实物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在中国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出版史研究上其意义也不可低估。简牍与帛书的出土，不仅丰富了两汉典籍的内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两汉时期出版物的丰富内容，同时也让我们对两汉出版物的载体和形制有了客观、感性的认识和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及特点

(一) 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

我国古代简牍的出土发掘，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汉代简牍都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下面将每个阶段发现的部分两汉简牍略作介绍。

第一阶段，东汉灭亡至19世纪以前，时间跨度大约1 700年，但出土次数却很少。出土情况主要见诸文献记载，当时实物已无处可觅，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略知大概。其中有两次发现比较重要。

(1) 北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录》卷27记宋崇宁初（1102—1106年）在天都（甘肃）发现装有木简札的瓦器，为东汉时期的遗物。

(2) 北宋黄伯思撰《东观余记》卷上记政和中（1111—1118年），在今陕西出土了一批东汉古简，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安帝永初二年（108年）的讨羌檄文。

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发现时代”，也是汉代简牍发现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外国人曾多次在我国边疆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先后获得大批简牍。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进行比较科学的考古发掘，并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当时发现的简牍，与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以及明清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的四大考古发现。其中，关于两汉简牍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次：

（1）楼兰汉简。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发现汉晋木简120多枚。

（2）敦煌汉简。有三次发现。1906年至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外长城故垒得汉代木简705枚，其中100多枚可以确切考定具体年代。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的第一次发掘。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又获得汉代木简84枚，在酒泉得105枚。酒泉所得汉简，或称酒泉汉简。斯坦因几次发掘的汉晋木简，均被运往英国，现保存于伦敦英国博物馆。1944年夏鼐在敦煌县小方盘城等汉代遗址获简48枚，现藏我国台湾。

（3）罗布淖尔汉简。1930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西北获得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71枚，木简出土地在汉代属于西域都护辖地，靠近楼兰遗址，因此也称西域汉简、楼兰汉简或罗布淖尔汉简。

居延出土的西汉永元兵器簿木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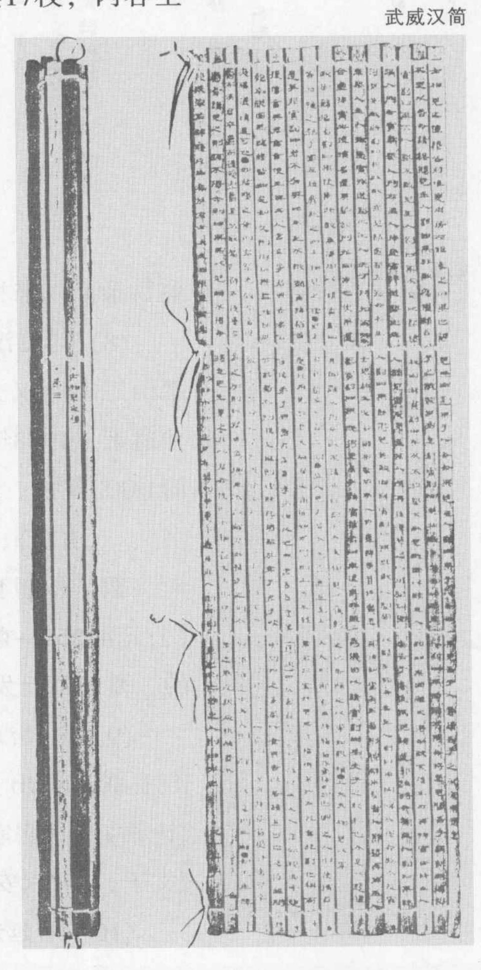
（4）居延旧简。1930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0 000多枚。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因要与当地解放后发现的汉简相区别，所以又被称为居延旧简。这是1949年前古简出土最多的一次，内容丰富，闻名中外。其中有一份由77根木简编连成册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器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批古简于1931年运至北京，抗日战争前夕运往香港，后又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现存我国台湾省。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

工作者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发掘，简牍实物出土日渐增多，堪称是汉代简牍的“大发现时代”。国家对出土古简十分重视，对每次的发掘成果，总要组织专家进行整理、考释，并向社会公布，供科学工作者研究利用。1949年以前，简牍的出土地点多在西北边疆一带，大多属于边塞汉简；解放后，除上述地方外，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山东等广大地区也多有发现，这些地方出土的汉代简牍，多为墓葬汉简。1949年以来，汉代简牍的出土主要有以下几次：

（1）长沙汉简。总共有两次发现。1951年至1952年，在湖南长沙徐家湾、杨家大山出土汉木简10枚。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出土竹简905枚，木牍17枚，内容主要是遣策和医书。

武威汉简



（2）刘家渠汉简。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木简2枚。

（3）武威汉简。有两次发现。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发现竹木简514枚。内容有《仪礼》抄本7篇，约抄于西汉末到王莽时期，简长54—58厘米，是现今发现最长的简策实物。它的发现，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1964年甘肃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编著了《武威汉简》一书，公布了此次发现的全部内容及其考证和研究结果。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前期墓中发现医简92枚，记载药物约100种，其中20余种为本草书中所无，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医学文献。

（4）海州汉简。有三次发现。1962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汉墓出土木简2枚。1973年，在江苏连云港西汉霍贺墓出土木简7枚。同年，又在连云港海州西汉时期墓中出土木简2枚。

（5）盐城汉简。1963年，在江苏盐城三羊

墩发现汉木简1枚。

（6）云梦汉简。1972年，在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木简1枚。

（7）银雀山汉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竹简将近5 000枚。墓葬时代为汉武帝时期。1号墓出土4 942枚，2号墓出土32枚。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古书，有失传的古佚书，也有传世古书的古本。其中大部分是古代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还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2号汉墓中有武帝元光元年的历谱，被命名为《元光元年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完整历谱，能纠正《通鉴目录》以来相关诸书的错误。

银雀山汉简

（8）江陵汉简。有两次发现。1973年至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三座西汉文、景时期墓中出土简牍500多枚，主要内容是随葬遣策。1983年，从湖北江陵张家湾地区西汉初期墓葬中获得竹简1 000多枚。内容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西汉法律、军事、医学、数学等重要文献。其中有两份历谱，一为高祖到吕后期间（公元前206—前180年）的，一为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的，是我国已发现的历书中最早的。

（9）定县汉简。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中山王墓）中出土一大批竹简，残碎严重，经整理得古籍八种：《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者·占卜》等。

（10）居延新简。有两次发现。1973年至1974年，甘肃省博

物馆在额济纳河原居延汉简出土遗址再次进行发掘，获简牍19 000余枚，是此前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大多为木简，少数是竹简。内容有政策、法令、屯戍活动、纪年简、书简资料等。形式有简(札)、两行、牍、检、符、觚、削衣，以及70多个完整的册。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又获汉简164枚。这两次发现的汉简，习惯上被称为居延新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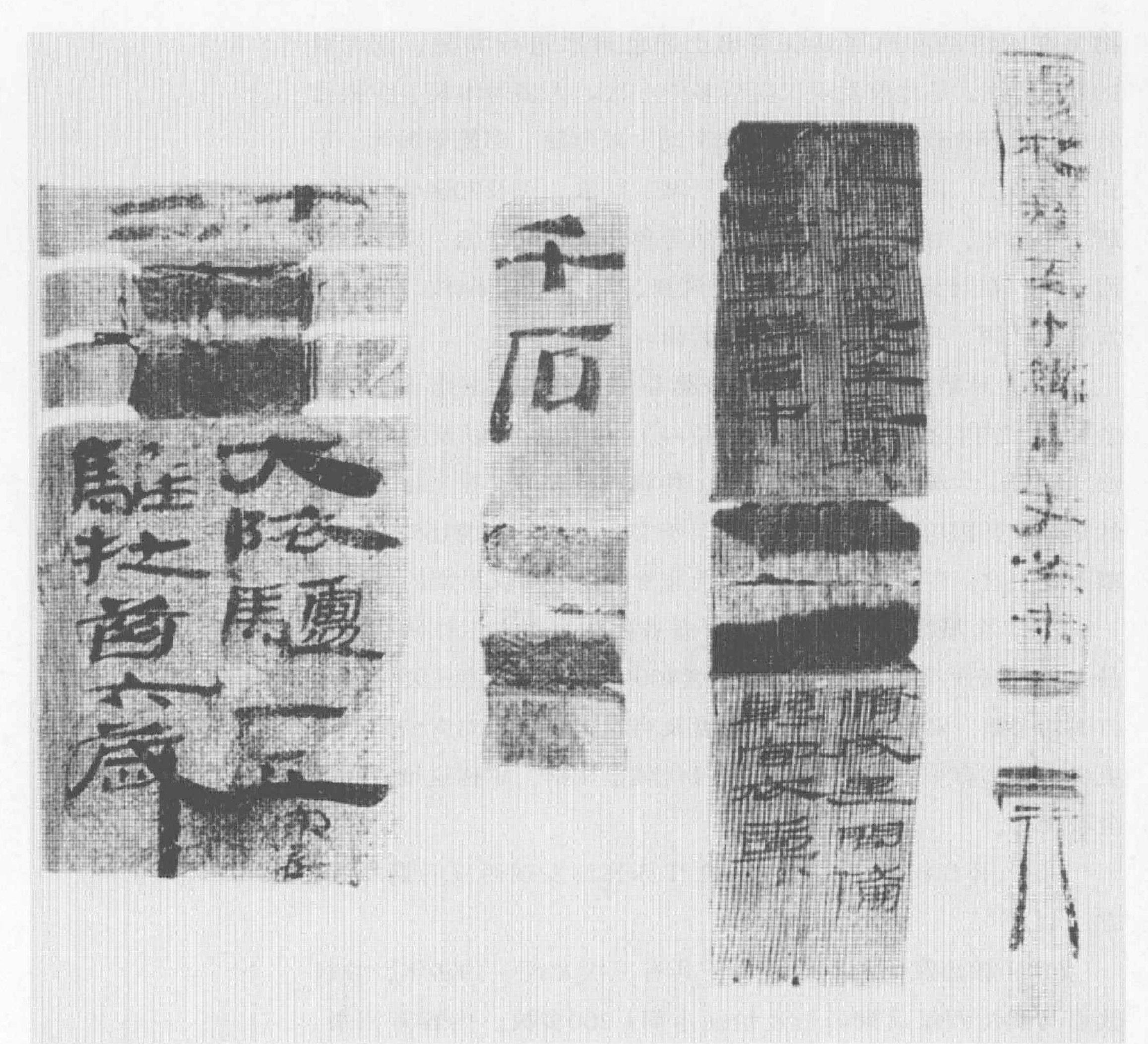
（11）阜阳汉简。1977年，安徽阜阳汉夏侯灶墓出土竹书10余种。其内容有《仓颉篇》、《诗经》、《周易》以及辞赋、刑法、年表、大事记、日书、杂方、相狗经，等等。据考证，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此墓不晚于这一年。因此，这是一批非常珍贵的西汉早期的典籍。

（12）金城汉简。1978年，青海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内发现简牍400多枚。其内容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书籍。对研究古代军事制度及当时中央政府对青海地区的屯戍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大通在汉代属金城郡，故称这批简牍为金城汉简。

（13）邗江汉简。1979年，在江苏邗江发现西汉后期木牍1方。

（14）敦煌汉简的重新发现。共有三次发现。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西汉后期烽燧遗址获木简1 200多枚。内容有诏书、奏记、律令、檄、品约、牒书、历谱、术数、医药等。此次发掘还发现了西汉古纸，对研究我国造纸术的起始提供了珍贵的物证。1981年敦煌文化馆在敦煌县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获简76枚。1990至1992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对敦煌西北64公里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发掘，获简35 000余枚，其中有字简达23 000余件。主要是红柳木简，完整或相对完整者约40册。内容主要为汉代诏书、律令、檄文、簿籍、信札、医方、历谱、术数，以及《论语》、《相马经》等典籍。其中有大量邮驿文书，史料价值极高。

（15）尹湾汉墓简牍。1993年江苏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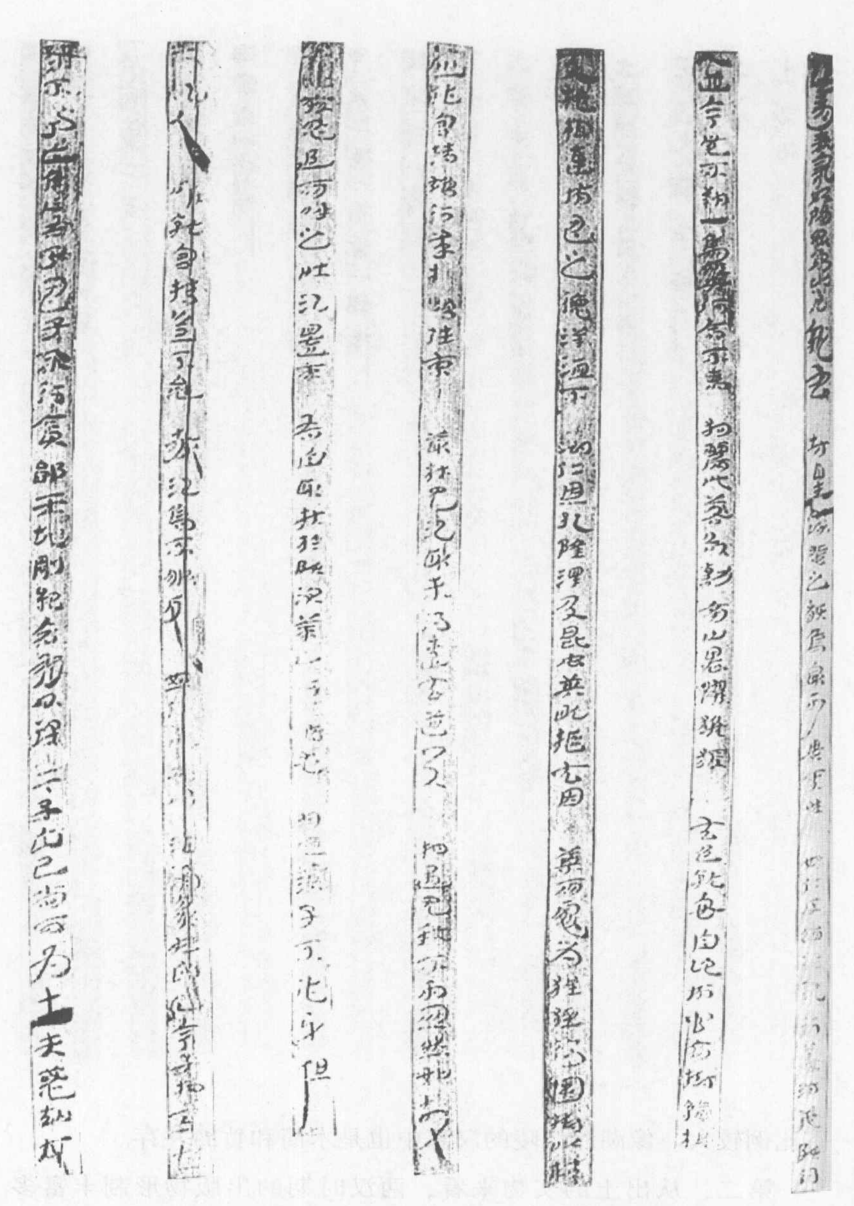


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汉代封检

汉墓出土。2号墓出土木牍一方；6号墓出土木牍23方、竹简133枚，保存基本完好。时代为西汉晚期。6号墓主为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简牍内容为东海郡上计集簿、吏官簿、长史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兵车器集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遣策、名谒、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得道吉凶、《神乌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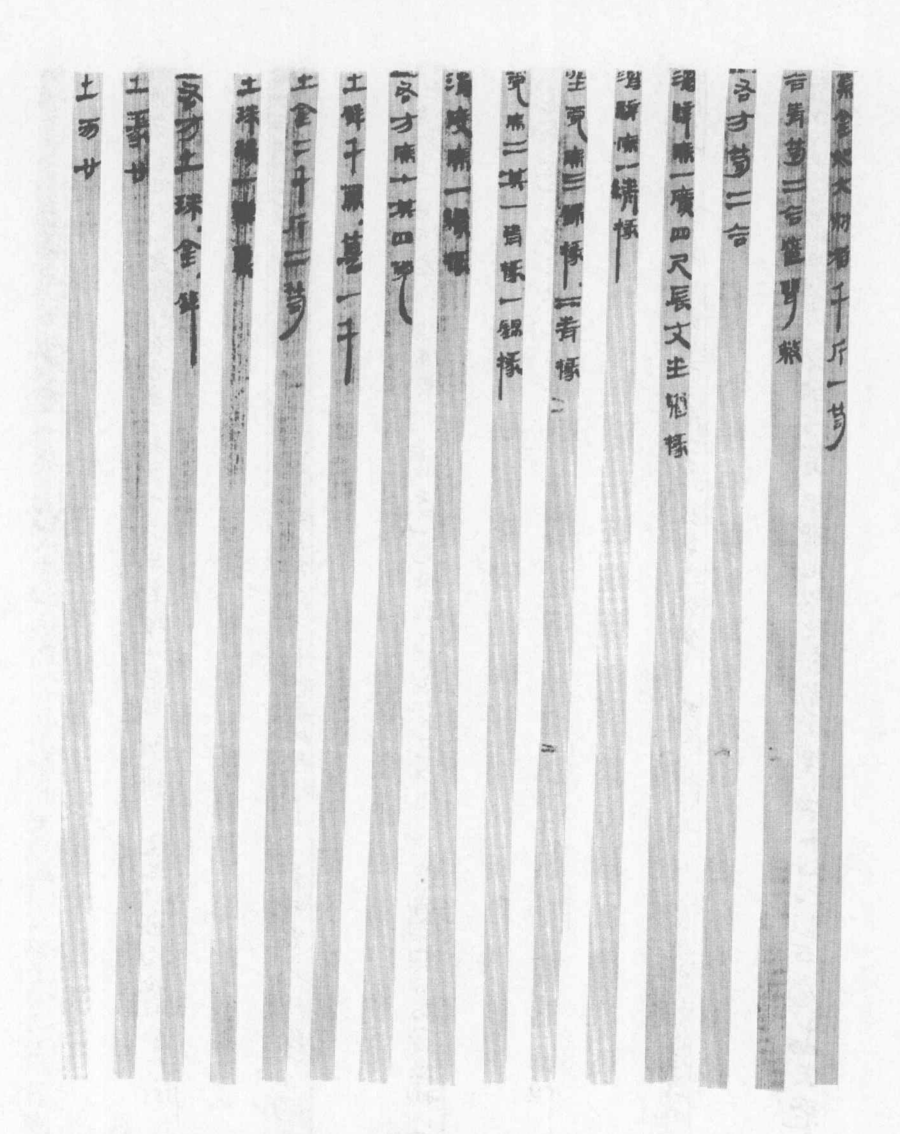
（二）两汉简牍的特点

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简牍实物，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出版物载体和形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东海县尹湾汉木简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汉代，与竹简同样呈细长薄片状的木简也非常流行。竹木并行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地区会因取材的便捷与否有所变化。在敦煌、居延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简，绝大部分都是木质的，只有极少量竹简；而新疆各地发现的简均为木质，乃取材于当地生长的胡杨、红柳等树木。即使是在盛产竹子的南方，也是竹木并行，只不过竹简所



马王堆汉简中的遣策

占比例较大。像湖北江陵的汉墓中也是木简和竹简并存。

第二，从出土的实物来看，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除了简以外，还有牍、札、策、检、方、两行、觚、椠、符、削衣、笺、檄等。它们都以竹、木为原料，在形状上略有不同，用途也略有区别。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有些并不属于图书，仅仅是一些随葬的遣策、文书、历谱、药方等，但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了解当时书籍制度的实物线索。大致看来，当时通行的主要是简、册和牍。简的容量有限，必须编连成册，才能容纳

较多的文字信息。牍多用木材做成，容量比单个简要大，一般可以书写短篇文字，记录同类事项。既无须编连，又无脱简或错简之虞，还便于查检，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木牍由于面积较大，还可以用来绘图。在纸发明以前，绘图材料要么用绢帛，要么用牍。牍虽然比较笨重，但取材方便，代价不大，而且结实耐用。



简牍上的私人书信

第三，根据文献记载，在汉代，简册的长度会因出版物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示等级之不同。一般情况下，书写法律文书都用三尺简，称“三尺法”或“三尺律令”；儒家经典用二尺四寸简；皇帝诏书用一尺一寸简，称“尺一诏”或“尺一”；普通书籍用一尺简，称“尺书”或“短书”。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有一部分与这些规定相符合，如上文提到的写有诏令目录的居延汉简属于法律文书类书籍，长67.5厘米，正合汉尺三尺之数；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东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册，长56厘米左右，与汉尺二尺四寸正相符合。但是，也有一些简牍的长短与上述规定不相符合，或长或短，并无规律可寻。这些都说明，汉人关于简册制度的记载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三) 竹木简牍的形制

从上古到造纸术发明前是竹帛并行时期，通行的是简牍制度。一部简牍书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大致如下：

(1) 刮削整治。用竹木制简牍，首先要经过整治刮削，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就是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修成狭长条的简片。“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1]。新竹脱水叫“汗青”、“刋简”，也叫“杀青”。整治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后来人们将写定的书稿，也称为“杀青”。

[1]《论衡·量知篇》。

在西北干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做简。多取白杨木、柳木、松木为原料，因其色白，质软，易吸墨汁。木简的长短宽窄与竹简相似。较为宽长的木板称“椠”，还有的较宽板称“方”，小木片称“札”，削治成多面柱状体称“觚”。

(2) 编简成册。单根竹片为“简”，编连诸简为“策”，也就是“册”。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考订：古《孙子》用缥丝绳编，《穆天子传》用素丝绳编，《考工记》用青丝绳编。考古发现的实物有用麻线或帛带编连的。如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永元器物簿》就是用二道麻线从右向左把77根木简编在一起。出土时，绳子还没有朽烂。编绳盖在文字上，说明是先写后编的。也有先编后写的竹木简册，编绳已朽坏，但编痕处留有空白。河南辉县战国墓中发现50枚一束的玉简，上面尚未写字，都是先编后写的物证。至今尚未发现用熟皮条编的竹简。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或用漆书写简。现已出土的简牍上的文字，均为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刻简漆书恐是商周早期简策的记录方式。至于与简策同时出土的铜锯、锛、刀是刮削制简的工具，还有一种小刀，称“书刀”或“削刀”，是删改简牍的工具，类似今日之橡皮，所谓“刊削”即改动简上文字的错谬。

简上文字，多少不一，少的只有几个，甚至一二字，多的数十，有的写两行，有60—80字，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如后世图书的天头地脚。有的则写满文字。当写定删削后，为了美观，还要等齐。因竹简长短不一，天头一端蹾齐后，再把下端用刀锯截齐。最后以一根简为轴，从左往右收卷，成为一束。首简上写篇名，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题）在下。也有的简册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简少受磨损。

(3) 长度内容。简册的长度，与所载内容相关，长短有所区别。据王国维、马衡等考证，汉简最长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合战国尺三尺，用以写六经、国史、礼书、法令，故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说；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相当于战国尺一尺半，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

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又有“诸子短书”、“尺牍短书”之语。这些长短制度，只是大体存在，并非十分严格。

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二尺之牍，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牍多为传信公文；一尺牍多用于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牍”；五寸牍多为通行证，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此外，汉代天子诏书，还喜欢用一尺一寸之牍，所以汉代文献中常有“尺一板”、“尺一诏”、“尺一”等语。古代的地图常常画在版牍上，后来人们称标明国家领土区域的地图为“版图”。大臣向天子奏禀事由，为了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比牍狭小的长方形小木板上，汉人称“奏”或“奏牍”，后来演化成一种玉石或象牙制成的装饰物——“笏板”，并不在上面记事。就像策试、策论、政策等词的原义，也都是由古代考试时皇帝把题目出在一个竹片上引申而来的。

木牍用作书信或是诏令公文，要送传外地，就要加上封缄。上面一块较小的盖板，叫做“检”。其上写收件人地址、姓名等，叫“署”。再把两块木板用麻绳或蒲草捆扎起来，在绳结处加块粘土，摁上印章，叫“封”，这块有印记的粘土就是“封泥”。有时盖板的背部隆起，上刻扎绳的槽口，再在绳上加封泥、用印，即为汉人所称的“斗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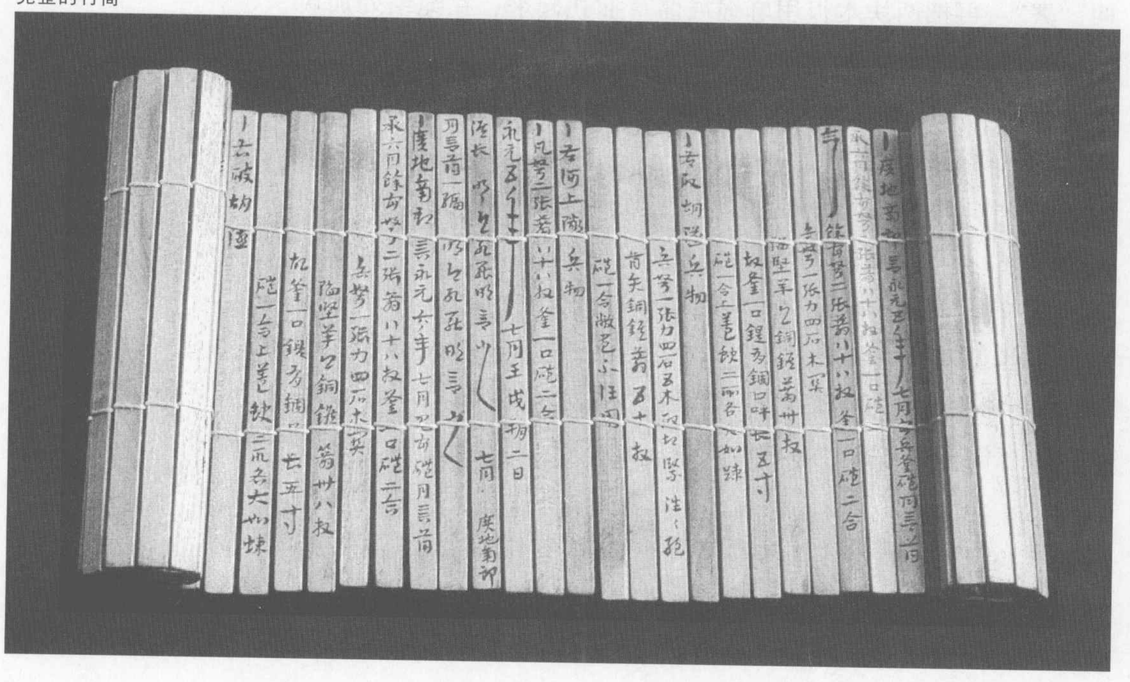
（4）书写字体。每一简上所写字数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只有一二字，多则十几字，甚至几十字。每根简只写一行，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行或多行。版牍用以书写短文、文告，一版即可容纳。一尺见方的版也称“方”，“百名以上书于策，不足百名书于方”。湖北随县战国楚墓及四川青川战国木牍两面书写，特殊情况也有横用直书的，如居延简中一份历谱，即横用，自右向左直写。

简上的字体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先秦古简，多用古文、篆字。秦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书写便利，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字。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均以隶字书写。

汉代沿用隶书，汉简上的字体也多为隶体字。简上的字是用毛笔蘸上墨书写的，写错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字。日常书写习字，发现错字，随时用水涂抹掉，再重新写上去，而不用书刀刮削。武威《仪礼》简上就留有用这种方法处理错字的痕迹。

（5）收卷。编连成策的简可以折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实物除散乱者外，多为卷起的策子，即以最后一根尾简为中轴，向前舒卷，像卷竹帘一样，卷成一卷，然后存放起来。做完这一道工序，才算完成了制作简牍书籍的全部过程。《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保持原来卷简成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医简，有的已散乱，有的还保持卷的形式。其中一尾简写有“有治百病方”，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这正是因为卷成卷后，它在中心，受到了外面简的保护。武威《仪礼》最后一简的末尾出现“毋自”二字的反写墨迹，这是前一简上的字墨迹未干，立即卷卷，被印上去的。《仪礼》简每一篇题和篇次并写于第一、二简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最外边。收卷之后，需用包裹包起，或盛以筐箧，

完整的竹简



以免散乱。居延简中有“书箧一”的记载。《后汉书·贾谊传》说：“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筐箧相当于书帙，一般十卷为一帙。帙一直沿用到纸写本时期。

二、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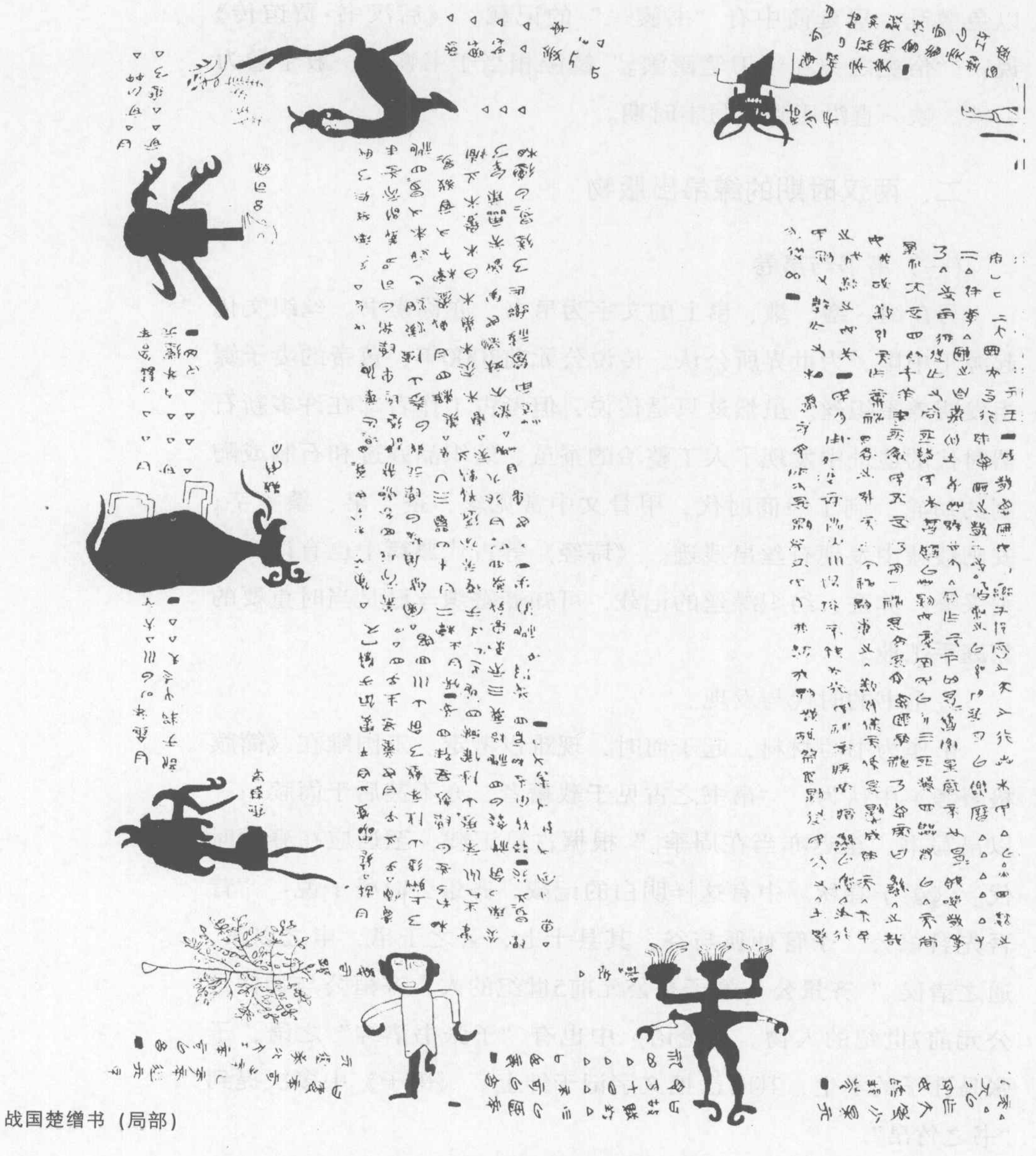
(一) 帛书与帛卷

写在绢、缯、缣、帛上的文字为帛书，亦称素书。丝织文化起源于中国，为世界所公认。传说公元前3000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织丝。虽然这只是传说，但考古工作者却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迹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常见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发现有丝帛残迹。《诗经》等古代典籍中也有许多有关采桑、养蚕、纺织缥丝的记载，可知养蚕织丝已是当时重要的家庭手工业。

1. 帛书的时代与发现

帛作为书写材料，起于何时，现难以考定。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根据古籍记载，至迟应在春秋时代。《晏子春秋》中有这样明白的记载，齐景公时晏子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齐景公与晏子是公元前5世纪的人，齐桓公与管仲是公元前7世纪的人物。《论语》中也有“子张书诸绅”之语，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其时已把文字记于绅上。《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之竹帛”。

现在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是战国中晚期之交的遗物，即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缯书”。这件帛书是被盗掘出土的，其出土时间有1934年和1942年两说，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帛书长38.7厘米，宽47厘米，出土时放在漆盒内，呈深褐色，图文已漫漶不清，经复原看出当中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有文750字。四周有彩色绘图并标有说



战国楚缯书（局部）

明文字254个，其中有帝名、神名、四季名称，用白、黑、青、朱四色绘制，书的四周有12神像，每边3个，代表12个月，每像下注明神名、职司及该月宜禁忌，所画月名与《尔雅》所载大致相同，是一部与禁忌有关的月历书。原件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在子弹库楚墓遗址再次发掘，又获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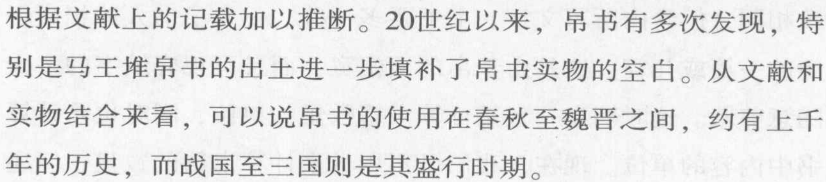
帛画一件。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上是一身穿长袍、手拥长剑、乘风御龙的男子，龙下有鱼，尾上有鹤。有的学者认为画上人物是墓主的肖像，画的主题是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天。



帛画《龙凤仕女图》

1949年2月在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古帛画，高28厘米，宽20厘米，画一侧面蜂腰妇人图像，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合掌作祈祷状，其头顶有一鸟及一兽相搏。郭沫若认为鸟是凤，兽是夔，凤是生命、婚姻、幸福之象，而夔是死亡、饥饿、邪恶之征。该帛画内容象征生命与死亡、善与恶的斗争。

由于丝织品极易朽烂，难于保存，所以古代遗留下来的帛书实物很少见到。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帛书的认识只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推断。20世纪以来，帛书有多次发现，特别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进一步填补了帛书实物的空白。从文献和实物结合来看，可以说帛书的使用在春秋至魏晋之间，约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战国至三国则是其盛行时期。



2. 帛书的种类及形式

帛，是丝织物的通称。清代江士铎《释帛》中，谓缣帛原有60余种，但其中可供书写者仅有数种：平实无华的白帛，称为“素”，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素”是由生丝造成，不经漂染。生丝造成的“绢”，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纨”亦是生丝所制，洁白轻薄，极似“绢”。由粗丝加工织成的“缯”，可能是野蚕丝的成品，厚而暗，但较其他各种素帛经久耐用。与“缯”类似的“缣”，由双丝织成，色黄，质较绢精美细致，且不透水，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更为昂贵。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残帛，上有文字和日期，内容被断定为信件，质料为缣。后

人以“缣帛”作为用于书写的丝织品的通称。

帛书与简牍虽然材料不同，但在形制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实物证明，帛书在版牍的影响下，形成帛卷，其后向卷轴制度过渡，到纸写本时达到完善。

（1）行格。用来做书写之用的丝帛，一般都在上面先画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叫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之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都是用朱砂或黑墨画浅色行格。整幅帛书行格宽7.8毫米，半幅的行格为2.3毫米。每一行书写6—70字不等。行长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的方式也与简书相同。马王堆帛书凡有题记的都写在每篇末行空白的地方。如《老子》乙本的题记：“道，二千四百计六”，与山东临沂竹简《孙膑兵法》末行之后记明数字的形式完全一致。

（2）尺寸。帛为二尺二寸宽，简长二尺四寸，把帛与简的卷轴放在一起相差不多。当然，一卷帛书与一卷简书相比，体积大致相同，但卷内所写文字，帛书要多一些。一卷帛书大体相当于简的一篇或几篇。这是由于帛的面幅宽，而且可视容纳字的多少随意剪裁。这时期卷一直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同时也是计算书中内容的单位。现在，我们已不用卷来计算书籍的数量，但还用它来区分书的内容。

（3）收卷与折叠。写好了的一篇帛书，从后面向前舒卷，成为一束，与简牍卷简成卷完全一样。今所见实物，成卷之外，尚有折叠的方式。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整幅帛上面的，没有卷卷，而是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一个漆奁内。另一种是写在半幅上的，则在2.3厘米宽的竹条上卷成帛卷。这正是缣帛的特点使帛书形成折叠式。竹木比缣帛坚硬、直挺，编连成策再卷起，比较合乎习惯。这样既便于保存，又可减少占据的空间。《后汉书·襄楷传》记：“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这是有关帛卷的较完备的描述

了，也可称为精装帛书。

3.帛书的特殊用途

竹帛并行，同用于书写，但因两者质料和价格的差异，在使用上也有所不同。

竹简常用来起草稿，缣帛用于最后写定本。应劭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1] 盖因竹木价廉易于修改之故。竹木有时亦用于写定本，但两者在内容上有所区别。通过古代目录可看得较为清楚。《汉书·艺文志》中有四分之一称"卷"，为帛书。四分之三称"篇"，为竹书。除一部分儒家经典外，全部的天文、历法、医药、卜筮著作为帛书，祭祀祖先及神灵、占卜星相之书，通常多著缣帛。《周礼·春官·占人》载："凡占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杜子春注："系币者，以帛书其占，系之于龟也。"汉代的谶纬一类书籍，也大都是帛书。

【1】《太平御览》卷606引《风俗通义》。

帛书多用来记录有纪念意义的文字或重要事件，以示郑重和珍贵。《晏子春秋》中所记齐桓公对管子的封赏，正式记载写在缣帛上，而通知诸侯国时是用竹简。《越绝书》载越王勾践与范蠡讨论政事，范蠡建议越王承效先王的高瞻远瞩，如此则饥荒之年，子民亦不至冻馁。勾践说："善哉，以丹书于帛，置于枕中，以为国宝。"

除上述差别外，帛书的特殊用途还有以下几点：

（1）丝帛多用以绘画。竹木制作的单简宽度有限，只能容纳一行文字，单简编连之后，简与简之间留有缝隙，在简上画画，很不方便，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幅宽面广而又轻软的缣帛用来绘画比简有很大的优越性。前边介绍的几件战国、西汉时期的帛画，就可说明缣帛是极好的绘画材料。

（2）丝帛还可用来绘制地图。古代的地图，多画在木板上，这样的地图很笨重，使用不便。用缣帛取代笨重的木板来绘制地图，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过三幅地图，都是用缣帛绘制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和

艺术价值。

（3）绘制简书中的附图。《汉书·艺文志》所收兵书790篇，皆是竹书，而附图43卷，则全是帛书。如《孙子兵法》83篇，有图7卷；《齐孙子》89篇，有图4卷。显然因简牍面积有限，不宜于绘图，而缣帛则有足够宽广的面积，适于此用。

（4）练书法。竹简较窄，只适于书写较为扁宽的隶书。而汉代后期出现的各种草书，多是在缣帛上练就的。《金壶记》中有“萧何用退笔书囊”的记载。东汉蔡邕入嵩山写书，“于石室内得素书”，今草的发明人东汉张芝为练出一手龙飞凤舞的草书，“凡家中之衣帛，皆书而后练”[1]。后世的王献之、张旭、怀素等都有在衣服、被褥上写字的掌故。

【1】张怀瓘：《书断》。

4. 帛书的优点及影响

缣帛之用于书写，有许多胜于竹木之处。其一是质地轻软，书写、舒卷、收藏、携带、阅读都十分方便；其二是体积小、容量大，还可据内容长短随意剪裁；其三是表面洁白，比竹木更吸收墨汁，可使内容清晰。最主要的是克服了竹木简牍笨重的缺点，是书写材料的一大飞跃。但它最主要的缺点是成本高价格昂贵。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丝帛是高级消费品，除贵族外，一般人是用不起也不准用的。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品。西汉桓宽《盐铁论》载：当时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价值几万钱的货物。就是丝织品的产量增多后，价格也不低。据考证，当时一匹帛的价值可购720斤大米，绝非一般寻常人家所能常用，故有“贫不及素”之说。所以竹帛书写得以并行于世。但帛书的最大功绩是启发了人们的思路，如何能制造出一种新的书写载体，既具备帛书的所有优点，又价格低廉，不那么昂贵。经过多年探索，终于在漂丝和沤麻的基础上，发明了造纸术。

（二）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及其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两汉时期，我国丝织品的生产技术已

大大提高，丝织品的种类和产量日渐增多。这就有可能为书写和绘画提供更多的缣帛材料。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远多于前代，在国家的典藏机构中，缣帛图书几乎可以和简牍图书平分秋色。西汉末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可知当时稿本用竹简，定本用缣帛，而以帛书为贵。刘向父子整理图书合计一万三千多卷，可知帛书数量不少。东汉时期，缣帛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古乐府·上山采蘼芜》载：“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东汉前期，班固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国家藏书，图画载体基本都是缣帛，即近人商承祚在《战国楚帛书述略》中所云：

> 唯图绘之作，竹简窄小，不适于用，实以缣帛为宜，然则《志》于原目曰“篇”者，竹简；于图则曰“卷”者，缣帛也。[1]

[1] 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及至东汉末年，帛书数量更为可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 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

东汉初“秘书”主要是“经牒”，虽遭兵燹仍有二千余辆；东汉末“图书”主要是“缣帛”，乱离之际，“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足见当时帛书之多，大小形态也多不相同。

由于缣帛材料不如金石竹木那样易于保存，在战乱中毁坏者又多，因而在历来的考古发掘中罕有发现。不过，从一些珍贵的出土实物中，我们也可以大致窥见两汉时期缣帛图书的形

态和特征。

两汉缣帛文献早在20世纪初即有发现。1908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保存完美的缣帛书信。二信为私人信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某人的信。二信虽不注明日期，但据同时出土的文物考察，当是王莽天凤二年至刘秀中元元年（公元15—56年）之间的实物。

在敦煌附近，斯坦因还发现一片素帛。一面印有黑墨图章，另一面有一行28字，其文曰："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据此可以考定中国古代缣帛的标准长度为4丈。据钱存训先生考证，此书信当为公元1世纪即东汉前中期实物。

帛书《老子》甲（左）、乙（右）本

1930年，考古工作者还在罗布淖尔古墓中发现一件丝帛残片，为公元2世纪即东汉中后期之物。其右角上有10个佉卢文字。

这几次零星发现的缣帛实物都是信件、文书一类的文献，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帛书。它们的发现只能说明当时的缣帛材料可用于书写，用途比较广泛。

两汉缣帛出版物最重要的发现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意义之重大都是前所未有的。1973年底到1974年初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据研究是汉初长沙相国利苍的儿子的墓葬，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经过整理共得28件，总计12万余字。大部分

用朱丝栏墨书，字体有小篆、秦隶、汉隶和草书。据书体、避讳字和帛书上出现的纪年内容，可推定帛书的书写年代早的可到秦代，晚的属于汉文帝时期。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马王堆帛书出土时大都无书名，在整理时据内容拟定了书名。现在知道出土的这批帛书共有28件。李学勤依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将其分为以下各项：

六艺：（一）《周易》
（二）《丧服图》
（三）《春秋事语》
（四）《战国策》
诸子：（五）《老子》甲本，附佚书三种
（六）《九主图》
（七）《黄帝书》和《老子》乙本
兵书：（八）《刑德》甲种
（九）《刑德》乙种
（十）《刑德》丙种
数术：（十一）《篆书阴阳五行》
（十二）《隶书阴阳五行》
（十三）《五星占》
（十四）《天文气象杂占》
（十五）《出行占》
（十六）《木人占》
（十七）《符箓》
（十八）《神图》
（十九）《筑城图》
（二十）《园寝图》
（二一）《相马图》
方术：（二二）《五十二病方》，附佚书四种

(二三)《胎产书》

(二四)《养生方》

(二五)《杂疗方》

(二六)《导引图》,附佚书二种

其他:(二七)《长沙国南部图》

(二八)《驻军图》[1]

[1]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262—2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马王堆帛书包括了历史、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多个学科。其中《老子》的甲、乙两种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上下篇的次序和今本正好相反。甲本不避刘邦讳,大概抄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刘邦讳,估计抄于文帝初。甲本、乙本的佚文,是研究儒家五行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还有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未标书名,字体在篆隶之间,写在半幅的帛上,11 000多字,其中60%不见于《战国策》、《史记》,显然是司马迁都不曾见过的,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战争的重要史料,对旧有文献如《史记》、《竹书纪年》大有订误补阙之功。还有《周易》及卷后佚书五种,比今本多4 000余字。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众多的帛书以外,马王堆3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3幅地图,分别为:《长沙国南部图》,经复原为长宽各96厘米的正方形,具有鸟瞰图性质,全图用黑、青、棕三色绘制;《驻军图》,经复原为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长方形,用朱、青、黑三色绘制;《城邑图》,长40厘米、宽45厘米,用彩色描绘城市分布概貌。三幅帛书地图均清晰可见,无文字

说明，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术。

墓中出土的帛书和地图，分卷轴和折叠两种形式放置。用整幅抄写者折成长方形，用半幅抄写者卷在一块做轴的竹木条上，同放在一具漆奁中。三幅地图均以折叠形式放在漆盒中。

马王堆帛书和地图的出土在我国图书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我们了解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的内容、形制和用途都提供了珍贵的实证。钱存训评价说：

> 这些古籍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不仅篇章完整，也为帛书的形制提供了实证，尤其古帛地图更属前所未有。这一批帛书的出土，实较20世纪初年以来简牍的发现同样重要，为中国图书史加添了最辉煌的一章。[1]

【1】钱存训：《书于竹帛》，98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除了帛书与古帛地图的出土以外，20世纪70年代还出土了几幅珍贵的帛画，它们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汉代缣帛出版物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972年，在发掘马王堆1号汉墓（此墓为西汉利苍妻之墓）时，出土了大量品种不同的丝织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覆盖在主棺上的“非衣”（或称“画幡”）。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呈T形。顶上横一根竹竿并系以丝带，下部四角，各缀一条20厘米长的麻穗。帛画整个内容紧紧围绕引魂升天的主题，大致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描绘了天堂、人间和地狱的景物。整幅画色彩绚烂，堪称我国汉代遗存的绘画文物中的佼佼者。

1973年底在同地的另一汉墓中，又发现了彩绘帛画4幅。1976年，在山东金雀山9号汉墓中，出土西汉早期帛画一幅，长200厘米，宽42厘米，内容主要反映墓主及亲朋好友歌舞、生产、游戏等生活场景。

结合上述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较之前代，数量可观，种类繁多。

其次，地位比简牍尊贵，一般用于一些重要的文献的书写。如刘向校书，定本才用帛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春秋》等，都用帛书，以示郑重和珍贵。

第三，形式主要有折叠和卷轴两种，这可以从马王堆帛书得到印证。又《后汉书·襄楷传》说：

>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

这一方面说明教徒为显示《太平清领书》的尊贵和神秘，才用帛书，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帛书的形制提供了文献资料。《太平清领书》外部为卷轴制，内部有界行，且以不同颜色区分，这说明了当时的帛书已很重视装帧形式。

第四，长短随意，大小篇幅没有一定的规格。正如唐人徐坚所云：

> 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1]

【1】徐坚：《初学记》卷21。

出土的实物也能说明这一点。

第五，主要应用于书写和绘图，尤其在绘图方面，具有当时其他一切载体不能胜任的优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帛书中，绘画占很大部分。如“兵书略”著录《楚兵法》7篇，原注：“图四篇”；“数术略”著录《耿昌月行帛图》232卷。清人姚明辉认为：《汉书·艺文志》“所录耿昌之图，多至二百数十卷，盖有总图，有分图，有未题之图，有未成之图，聚而束之，遂形繁重耳”。

这是所著录的篇幅最大的帛书，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帛书

才能胜任。

第六，帛书价格偏贵，使用者主要为官府和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读书人都使用不起。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据考证，在汉代，一匹粗缣（2.2×40汉尺）值600余钱，一匹白素值800余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一匹缣相当于六石（720斤）米的价格[1]。价格的昂贵限制了帛书的使用范围，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史书所说，“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2]，它们的缺点制约着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现实的需要就促使人们去创造一种既有缣帛之便又有竹木之廉的书写材料。这样就直接催生了造纸术的发明。除了价格昂贵以外，缣帛基本具备了纸张的所有优点，所以，在启发造纸术发明方面，缣帛的作用尤为重要。

[1]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86、9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2]《后汉书·蔡伦传》。

三、两汉简牍与缣帛出版物的计量单位

传世文献的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让我们对这一时期出版物的计量单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致说来，两汉时期竹帛出版物的计量单位主要有册、篇、卷。

至今我国的图书文章仍以册、篇、卷为计量单位，这几个名词均来自竹帛并行时期。用竹片写书，一根竹片称简，把若干根简用丝绳或麻绳编起来即为册，也称策。通常一策就是一编，也为一篇，所以简牍时期册、编、篇是等量的。先秦以至西汉初期的图书出版物多以篇行，所以《史记》提到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往往称篇名，如《说难》、《孤愤》、《牧民》、《山高》之类，不说《韩非子》、《管子》。近世出土的简帛文献往往有篇题，而有书名的较少，可以证实古书多以篇行的现象。

“卷”被认为是缣帛的计量单位。后世学者多从文字本身入手探讨其本来意义。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

> 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非有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

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

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说，根据之一就是古代书目中计量文献，卷大于篇的居多，也有卷等于篇的，而卷小于篇的甚少。因缣帛的容量比竹简大，故刘向等人编书时，合数篇以成一卷。

随着两汉竹简与帛书的出土，有人提出“卷”并不始于帛书，许多竹书出土时成卷状，而马王堆帛书的存放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将帛书折叠成若干幅长方形放置在漆奁下层；一种是将其卷在竹木条上，故认为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帛书并未形成卷轴，只能说是卷轴制度的发轫阶段。缣帛称卷也沿于简策，卷不是帛书的唯一形式，所以卷与篇的区别不是由载体材料决定，而在于篇是指书的内容和结构，而卷是指书的形式。

我们认为，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出土实物来看，第一种观点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帛书产生的年代并不晚于春秋之时，经过长期的演变，至战国时期完全有可能形成卷轴。又马王堆的帛书实物仅仅是一例证，孤证不立，不能仅凭这一条物证就推出西汉前期尚未形成卷轴的结论。从实际的记载中看，早期图书多称篇，从竹简；后来多称卷，从缣帛，其产生年代与帛书的通行年代大致相同。只不过到汉代时，竹帛并行，二者几乎没有严格的区别。《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或称篇，或称卷，二者在当时几乎是同义词。清人卢文弨在《钟山札记》卷1中对此曾有论说：

> 篇即卷也。《汉志》：《易》皆言篇，《诗》皆言卷。其余一类之中，或篇或卷不一，至末总其数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即“卷”乎！

所以，在两汉时期，出版物的载体是以竹帛并行，而计量单位也是“篇”、“卷”并用，并行不废。

四、两汉时期出版物的其他载体

除了竹木简牍与缣帛以外，两汉时期的文字载体还有兽骨与金石等材料。较之竹帛文书，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在出版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石刻文字，在知识的传播方面，其公开性和广泛性更是竹帛文书所不能企及的。从遗存文献和出土实物来看，两汉时期以兽骨、金石为载体的文献多不能被称为图书，它们大多属于档案文书或歌功颂德的碑铭。但若揆之以出版概念，两汉时期的一些兽骨和金石文书未尝不可以称为出版物，如刊刻于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如果再考虑纸张发明于西汉、改进于东汉的史实，我们就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出版物材料以竹木、缣帛为主，以兽骨、金石和纸张为辅，杂然并陈，共同承担了记载、积累、传播和传承知识的历史责任。下面重点介绍未央宫骨签书和两汉石刻。

1. 未央宫骨签书

将兽骨作为书写材料，在两汉时期并不多见，在文献中也鲜有记载。但未央宫骨签书的出土却证实了这一事实。1986—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汉代未央宫内官署遗址区发掘出土了3万余片骨签书（签为一种小形简牍），数量之多，可以和居延汉简相比。骨签书出土的地点在未央宫前殿西北部，这个方位恰恰是石渠阁的所在。所以骨签书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石渠阁所藏。

骨签书制作主要以牛骨为原料，体积比较小，便于集中收藏。制作工艺比较高，表面整齐、光洁。骨签上的文字系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体现了优良的书法功力。这批骨签书的总字数达数十万，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大部分骨签上都记载着当时皇帝的年号，即从汉武帝到汉平帝各朝的准确时间，一些无年号的骨签当为武帝以前诸帝时实物，这样就大致涵盖了整个西汉一代。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整个西汉王朝中央与地方、中央政府与皇室的经济机构设置、财政收入，以及手工业行业分布与生产水平等，许多材料在《汉书》等史籍中没有记载

或是记载很简单。从内容上看，这批骨签书应属于西汉中央级的档案文书；从制作工艺上看，其档次显然要高于竹木简牍。骨签书的出土，为我们全面了解两汉时期文字载体的形式、内容和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

2. 两汉石刻

刻石纪事，在两汉之前已比较多见。进入汉代以后，刻石之风逐渐大盛，刻石技巧渐趋于成熟，石刻形制多种多样，有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画像石题字，可谓诸体兼备。

相对而言，西汉一代石刻文字并不多见，西汉及新（莽）时期现存石刻仅发现16块。盖因西汉初期统治者均好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无浮华好名之习气。中期以后，学校制度又由官方设立的太学博士来传授学术文化，不注重树碑立传，所以终西汉一代，刻石树碑之风始终不兴。从为数不多的遗留实物看，西汉刻石类别较杂，形制不固定，尚未形成后世固定形制的“碑”制；石质粗砺，刻石不精。至新莽时期，墓葬渐讲豪华，墓室内有画像石装饰，石工技艺向精细方向发展。

汉隶乙瑛碑拓片



到东汉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汉的统治者崇扬儒学，提倡名节孝道。知识分子也多以名节孝廉相砥砺。社会上树碑立传、崇尚厚葬蔚为风气。到桓、灵时期，奢侈好名与厚葬、重宗庙祭祀之风大炽，树碑刊石以歌功颂德的社会风气形成澎湃之势，既靡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又增长了伪饰浮夸的风气，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有碍，但却铸成了东汉时期蔚为大观的刻石体系。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正反映了当时

刻石之风大盛的实际情况。

东汉石刻作品数量之多，几乎难以估计，仅存世者就多达400多种，形制也多种多样。有墓志、石阙铭文、画像石题字、石经、摩崖和碑刻，等等。内容多为颂扬功德，其矫饰虚浮可知。虽然如此，东汉石刻却在文字学和书法史上的地位甚高，其著名者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在文献和史料上价值不高，却是书法作品中的精品。后世书家为了学习书法，必然要临摹前人书法。在临摹石刻文字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明了捶拓技术，而捶拓技术又直接启发了后世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汉时期的绝大多数石刻作品虽然并不属于出版物，但在出版史上却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更何况，在这蔚为大观的刻石体系中，还出现了“熹平石经”这样颇具代表性的出版物，它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更值得大书而特书。

第二节　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伟大成就，它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出版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纸发明以前，我国先民曾尝试以龟甲、兽骨、金石、竹木、缣帛等材料作为文字的载体，因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定的出版物形态和书籍制度。但是这些载体自身都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活动的发展。随着文化教育事业和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进步，人们就迫切地需要用一种新式的文字载体来记录和传播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终于在西汉时期发明了纸张，

并在东汉时期经过蔡伦的改进，使造纸术逐渐得到推广。纸的出现，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此后纸张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对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形成、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纸的概念及其演变

纸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着的。现代意义上的纸的概念经过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说文解字》中对纸作了如下的解释："纸，絮一笘也。从纟，氏声。""絮"就是粗的丝绵。笘是一种竹席。早期的纸就是在水中漂丝时，附粘在竹席上的粗丝绵干了以后，揭下来的一种薄丝绵片。最初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这种物品而加以利用的，后来才有意识地加工成一种漂丝的副产品。根据汉字造字的规律，因为这种副产品与丝有关，故从"纟"旁，又因其平滑如砥石，故从"氏"声。这样就出现了"纸"这个词。

这种丝质纸既可用来包裹东西，又可用来写字，用途是很广泛的。作为一种书写材料，它光滑、轻便，较之笨重的简和昂贵的帛，一定是大受人们欢迎的。但是，它本身毕竟是一种副产品，而且原料（蚕丝）又很珍贵，其数量也不会多，除了少数贵族人家可以使用，在民众中是很难普及的。所以，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寻找性质相似而又较易取得的原料来制作纸。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还发现某些植物表皮在撕剥的时候可以拉出一根根的丝絮，而某些苔藓类植物经风化水泡后变成纤维状，被水冲到岩石上后，相互交聚、粘附，晒干后也形成了类似纸的薄片。在这些自然现象的启发之下，结合漂絮、沤麻的经验，人们产生了将植物纤维浸入水中，使纤维疏解，然后经过制浆、抄造、干燥后，制成一种新型纸的设想。经过长期的试验和不断总结，一种用植物纤维作原料的新型纸张终于制作成功。这一成就，是纸的制作历史上的飞跃性进步。植物纤维制作的纸，从用料、制作方法及其使用的普遍性来看，与丝质纸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纸已经完全不同于许慎解释的纸了。这种纸以植

物纤维（在我国古代，最早主要是麻纤维）作原料，是经过切截、沤制、蒸煮等物理和化学方法的处理之后，制成的一种新产品。现代的纸张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已经具有了现代纸的概念了。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的绪论中为纸所下的定义是：

> 传统上所谓的纸是植物纤维原料经人工的机械、化学作用而得到提纯的分散纤维与水制成浆液，经漏水的模子滤水，使纤维素在模子上交织成为湿纸膜，再经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由纤维素靠氢键缔合交织成的薄片，作为书写、印刷、包裹等用途的物质。[1]

【1】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这种解释是比较科学和易懂的。时代在前进，造纸术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已经试制出用矿物或其他化学合成纤维造的纸。纸的原料已经不限于植物纤维，纸的制造方法正在向着现代化的更高水平迈进。纸的概念，随着纸的发展变化也在不断变化着。因此，现代科学字典中对纸有了新的解释："以任何一种纤维通过排水作用所粘成的一种薄页。"

通过以上对纸的概念演变的叙述，我们可略知纸的起源和发展的简单过程。

二、西汉发明造纸术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公认植物纤维纸是由东汉的蔡伦发明的。《后汉书·蔡伦传》中写道：

>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

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这是对造纸术发明人和发明时间的最为明确的记载。在早于《后汉书》大约300年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观汉记》卷20载：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暴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

上述记载就是东汉发明说的主要依据。主张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蔡伦以前的"纸"实际是缣帛中的一种，而真正的植物纤维纸则是由蔡伦于元兴元年（105年）发明的。这是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观点。

蔡伦塑像



对于上述记载，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就认为，我国造纸术起源于西汉。其中以唐代人张怀瓘和宋代人陈櫄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即已有纸，蔡伦因而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陈櫄在《负暄野录》中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资治通鉴》卷48胡三省注引毛晃语："后汉蔡伦以鱼网、木皮为纸，俗以为纸始于蔡伦，非也。"这些观点今天看来都是十分难得的。然而他们又都认为蔡伦以前的纸为丝质纤维，即所谓

"絮纸"，而蔡伦易之为植物纤维，又与东汉发明说殊途同归了。

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依据于古代文献中关于西汉"纸"的记载。在古代典籍中，"纸"字在蔡伦前已数次出现。

(1) 晋人张澎在《三辅故事》中记载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这是"纸"字在文献中年代最早的记载。

(2)《汉书·赵皇后传》记载赵飞燕以小绿箧予宫女，"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应劭注曰："赫蹏，薄小纸也。"又引曹魏孟康注曰："染纸素令赤而书之。"由此可知，所谓"赫蹏"，应指染成红色并写有文字的薄小纸。

(3) 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谓，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冬，"汉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4)《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光武帝时，在少府设左右丞各一人，"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5)《后汉书·贾逵传》记章帝时曾"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6)《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载邓皇后年轻时即志在典籍，为皇后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以上记载，均能说明在蔡伦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又应劭在记载光武帝建武元年事时，将素、简、纸并提，可知纸与缣帛有别。这些都为西汉发明古纸提供了文献上的有力证据。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疆、甘肃、陕西等西北地区，曾多次出土西汉纸。这些西汉古纸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蔡伦造纸说，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西汉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植物纤维纸。这样就把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向前推进了约300年。

潘吉星曾将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于一张表中，并作

了分析归纳，清晰明白。谨转录如下：

[1]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第55—5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表1－1 西汉古纸历年出土情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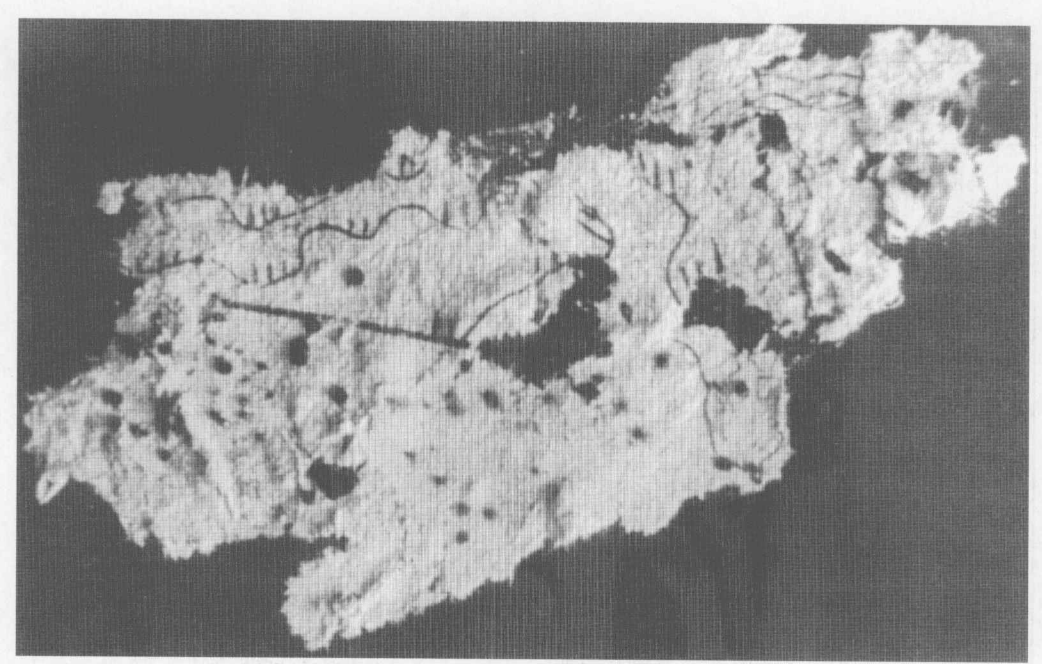
序号	纸名	纸的年代（公元）	出土年代	出土地点	尺寸（厘米）	外观描述
I		II	III	IV	V	VI
1	罗布淖尔纸	前73—前49	1933	新疆罗布淖尔（罗布泊）汉烽燧遗址	4×10	白色薄纸，质地粗糙，纸上纤维束及未打散的麻筋较多
2	查科尔帖纸	前89—后97	1942	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查科尔帖汉烽燧遗址	10×11.3	纸上有文字7行，共50字，可辨认出20字，纸黄间灰色
3	灞桥纸	前140—前87	1957	陕西西安灞桥汉代葬区	8×12，10×10	浅黄色薄纸，多层叠压在铜镜下，揭裂成88片，纤维束较多，交织不匀，纸上有铜锈绿斑
4	金关纸－I	前52	1973	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汉金关屯戍遗址	12×19	白色，柔韧，质地细，强度大，纤维束较少
5	金关纸－II	前6	1973	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汉金关屯戍遗址	9×11.5	暗黄色，质地较粗糙
6	中颜纸	公元1—5	1978	陕西扶风中颜村汉建筑遗址	6.8×7.2	白色，柔韧，纸较好，纸上可见帘纹，此纸与其他文物为窖藏品
7	马圈湾纸－I	前53—前50	1979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	32×20	黄色，较粗糙，四周有自然边缘，是最完整的一张纸，尺寸为原大
8	马圈湾纸－III	前32—1	1979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	9.5×16	共两片，原白色，污染成土黄色，个别部位仍色白，制作精细
9	马圈湾纸－IV	公元1—5	1979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	9×15.5	白色，质细，纤维束少，纸帘纹明显

续 表

序号	纸名	纸的年代（公元）	出土年代	出土地点	尺寸（厘米）	外观描述
10	马圈湾纸-V	公元8—23	1979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	17.5×18.5	白色，质细，纤维束少，强度较大
11	放马滩纸	前179—前141	1986	甘肃天水放马滩汉代墓葬区	5.6×2.6	出土时黄色，现褪成黄间浅灰色，纸薄而软，纸上绘有地图，表面有污点
12	悬泉纸-I	前86—前7	1990	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	12×10	浅黄色，质地好，稍厚
13	悬泉纸-II	公元8—23	1990	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	13.5×14.5	白色间浅黄色，纤维细，质地好，纸上有文字，纸面有帘纹，帘条纹粗0.3毫米，纸薄，厚0.286毫米
14	悬泉纸-III	公元8—23	1990	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	27.5×18	浅黄色，稍厚，纸上有文字，纸较好
15	悬泉纸-IV	公元8—23	1990	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	13.7×7	浅黄色，稍厚，有一定强度，纤维基本分散

说明：查科尔帖纸年代上限为前89年，下限为后97年，即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期。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已先后于1933、1942、1959、1973、1978、1979、1986及1990年八次分别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不同地点出土了蔡伦时代以前的古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陆续不断地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期纸已可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帖纸及悬泉纸上都写有文字，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蔡伦时代之前不但有纸，而且早已用作书写材料，其余没有留下字迹的残纸，当然亦会适用于书



画有地图的西汉古纸
(1986年甘肃放马滩出土)

写。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另一批早期字纸出土。

这八批纸的出土说明了以下问题：第一，它们有力地证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有了纸。把造纸术发明的时间提前了约300年，说明这项发明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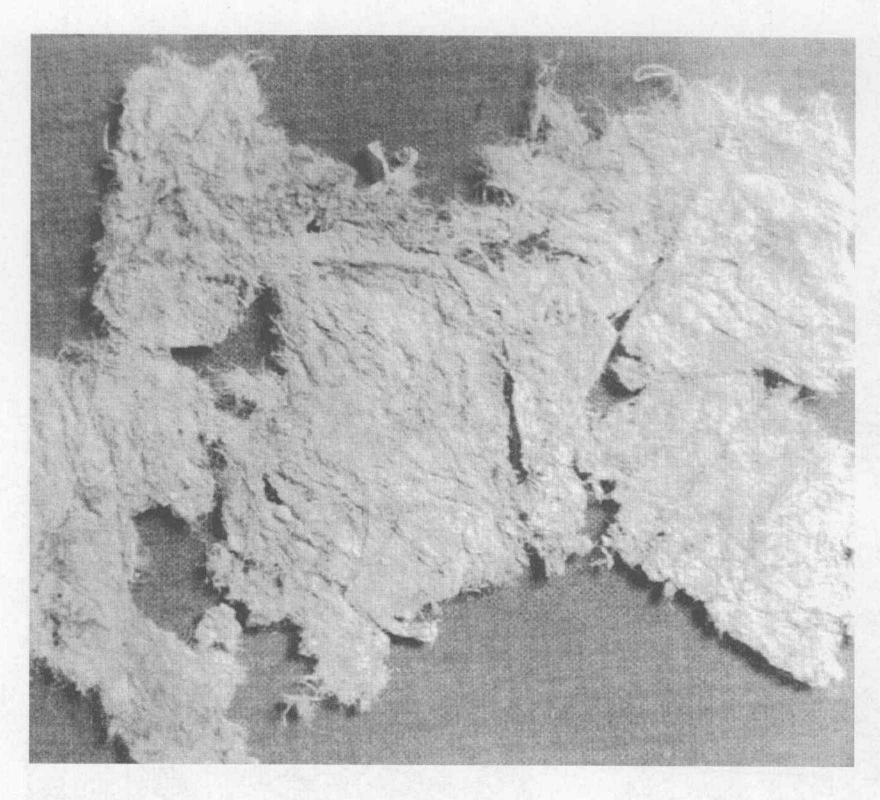
第二，证明蔡伦以前的纸既非缣帛，亦非丝质絮纸，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纤维纸。不能以蔡伦划线分为“古纸”与“今纸”，蔡伦前后麻纸无本质之别，只有精粗之分。

第三，补充了《史记》、《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之不足，澄清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的混乱，因《后汉书》多次谈到蔡伦前用纸，又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古纸还有助于对《说文解字》中纸的定义的正确理解。

第四，中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的国家，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

第五，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及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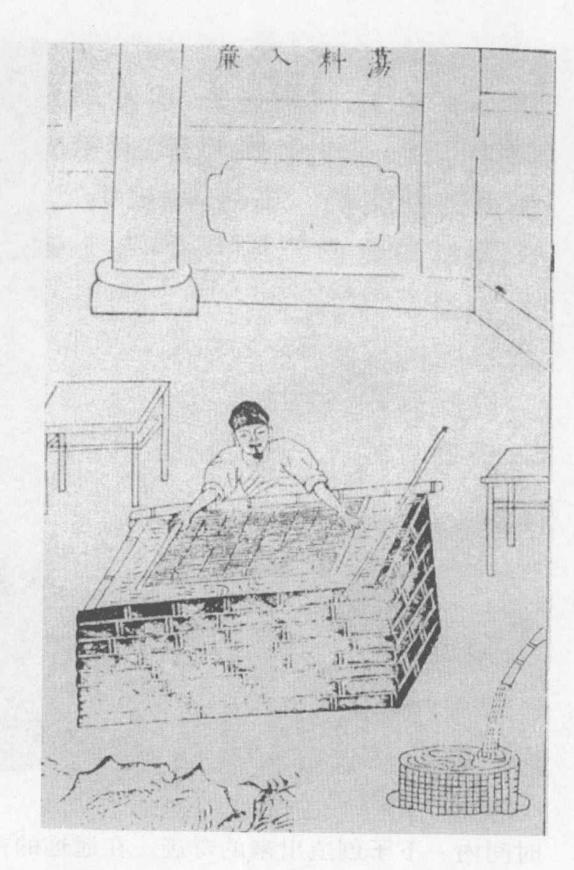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发明，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某一



西汉古纸残片（1979年敦煌马圈湾出土）

时间内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奇迹。在遥远的古代，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更非易事，它应当是经过长时间的许多人的反复试验，逐步取得成功的。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来分析，西汉时代已经试验和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是可信的。秦朝以后，文字趋于统一，其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职能加强了，文字的载体——简、帛等材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西汉时期国家政权巩固，经济繁荣，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政府公布的法令文件越来越多，教育事业也日趋发展，这都使得简帛等旧的书写材料与新的社会需要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书写材料来代替笨重的简和昂贵的帛。西汉时期的纺织业较发达，人们从中得到了启示和借鉴，开始了植物纤维造纸的试验并取得了成功，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放马滩纸等多次西汉古纸的发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然，蔡伦在造纸术的总结、改进、推广等方面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西汉发明造纸术的事实并不能否认





《天工开物》所载造纸图：斩竹漂塘（左）、荡料入帘（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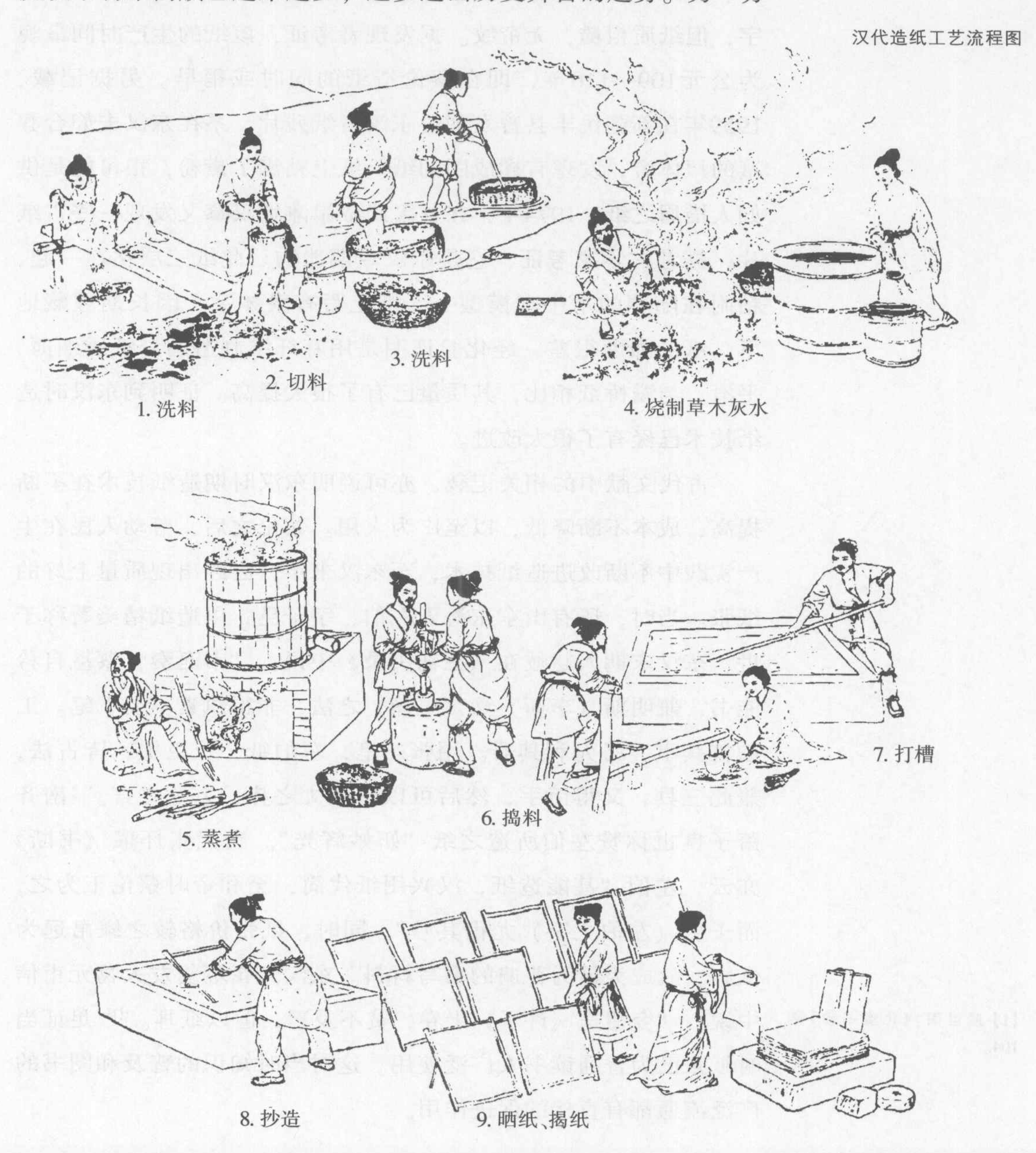
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中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匠，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纸张，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捣、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地试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为我国的造纸事业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造纸术在东汉的改进和初步普及

造纸术在西汉发明以后，由于生产技术尚不发达，原料来源也比较有限，因而只能在小范围内流行。后至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技术，并扩大了造纸所用的原料。他不

仅提高了纸张的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造纸的成本。纸张因此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并逐渐取代金石、竹木、缣帛，成为主要的文字载体和书写材料。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分的印证。一方面，近世考古发现的东汉简牍实物数目要比西汉时少，反映了竹木简牍已越来越少，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另一方

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



面，从质量上看，东汉古纸的质量已较西汉有很大的提高。20世纪以来，先后在新疆、甘肃等地区汉代遗址中发现东汉古纸。1901年，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和甘肃省敦煌地区曾出土东汉末期的纸书两片，一为诗抄，一为书信，前者两面书写。1942年，在居延古烽燧台遗址发现的植物纤维纸，上写有隶草20余字，但纸质粗糙，无帘纹。据发现者考证，该纸的生产时间最晚为公元109—110年，即在蔡伦造纸的同时或稍早。另据记载，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曾发现过东汉古纸残片。系在东汉夫妇合葬墓的尸体旁，发现有揉成团的纸。纸上粘满了黛粉，很可能是供妇人描眉之纸。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发现一些古纸片，据考古学家考证，它是东汉晚期遗物。此纸三层粘在一起，粘附在随葬的木牛车模型上，纸上写有隶体字。因长期埋藏地下，纸的强度很差，经化验证明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其质量已有了很大提高。证明到东汉时造纸技术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亦可说明东汉时期造纸技术在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以至广为人用。蔡伦之后，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造纸技术，至东汉末年，已经出现质量上好的纸张。当时，还有山东东海人左伯，字子邑，以造纸精美著称于世。东汉末期人赵岐在《三辅决录》中说："韦诞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李斯）籀（史籀）之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之言。"南齐萧子良也称赞左伯所造之纸"妍妙辉光"。唐代张怀瓘《书断》亦云，左伯"甚能造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左伯之字）尤得其妙"。同时，纸张价格较之缣帛远为低廉，故成为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东汉人崔瑗复友人葛元甫信中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1] 足证当时纸张已为普通读书人广泛使用。这对当时知识的普及和图书的广泛流通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1]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04。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纸张在东汉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但它并未能完全取代竹木和缣帛等传统的书写材料，而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两汉时期的图书载体体现出多元并存、有主有辅、逐渐更替的整体格局。钱存训分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时说：

> 旧的书写材料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所淘汰，而是逐渐被取代。在纸发明以后，竹木仍继续通行了三个世纪，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五百余年。人类的保守性，总是偏向于传统的习惯，不仅因为他们熟习这些传统的方法，且因这些方法，也常有许多优点胜于新的发明。[1]

[1] 钱存训：《书于竹帛》，156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四、造纸术向世界的传播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最先发明的，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造纸术是中华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造纸术发明的意义和作用，钱存训曾有论断：

> 一般学者都公认，在古代文化交通的各种成就中，没有一种发明是可以和造纸术及印刷术的重要相比的；二者对现代文明皆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另有其他各种传播媒介，但至今都还不能代替纸和印刷术所具有的基本功能。[2]

[2] 钱存训：《书于竹帛》，1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当我国已经使用了纸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还在使用着古老、原始的书写材料。有些国家曾把文字写在泥板上、砖石上，如两河流域的泥版书；有的写在植物茎叶上，如古埃及的莎草纸、古印度的贝叶经；有的写在动物的皮上，如欧洲羊皮书、犊皮书；有的还刻在金属上，如金书、铅书等。这些材料基本上都属于自然物的简单加工，有的过于笨重，有的过于昂贵，

有的极易损坏、不便保存。作为文字载体和书写材料，纸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有纸草之便而不易破裂，有竹木之廉而体积不大，有缣帛羊皮之柔软而无其贵，有金石之久而无其笨重，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

中国造纸术发明之后，不仅在国内得到推广，而且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然而，欧洲的某些学者曾不相信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纸这一事实。他们最初认为破布造纸是由13世纪的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发明的；当埃及发现了8世纪的古纸以后，又说纸是阿拉伯人的创造。直到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2—4世纪的麻纤维古纸被他们见到，并经化验证实之后，他们才承认植物纤维造纸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欧洲人学会造纸是经阿拉伯人从中国传去的。

据考证，中国造纸术的外传，首先是把纸和纸制品（书、信件和绘画等）传入其他国家，第二步才是造纸技术的外传。在3世纪左右，造纸术首先传入越南，在4世纪又向东传入朝鲜，并于5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7世纪左右，造纸术传入印度。造纸术向西方的传播是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2世纪前后，西域地区已经有了纸的使用。5世纪时，全中亚一带都使用了纸。8世纪，造纸术开始传入西方。751年，唐朝与大食国（阿拉伯）发生战争，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带领的唐朝军队被打败，许多中国人被俘，其中有些是造纸工人，他们把造纸术传入了西方，并首先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开设了造纸厂，于是，纸便成为阿拉伯人向西方出口的重要物品。此后，793年在巴格达，795年在大马士革，900年在埃及，1100年在摩洛哥，也相继建立了造纸厂。1150年，阿拉伯人渡海到达西班牙，在西班牙南部的萨地瓦开设了欧洲大陆上第一家造纸厂，此时距蔡伦造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当时在西班牙掌握造纸技术的也只有阿拉伯人。从8—12世纪，阿拉伯人在西方垄断造纸技术达400年之久。直到1189年，法国人建立了自己的造纸作坊，这才是基督教国家建立自己的造纸厂的开始。此后，1276年在意大利，1320年在德国，1323年在

荷兰，1460年在英国，1567年在俄国都陆续建立了造纸工厂。1575年在墨西哥，1690年在美国费城建立了美洲大陆上的造纸厂。而在澳洲，直到19世纪才在墨尔本建了造纸厂。经过一千多年，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传遍全世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九章　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辑）家

第一节　先秦著名图书编撰（辑）家

孔子行教图（拓片）



一、孔子与“六经”

（一）孔子的编辑活动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后逃到鲁国。宋是商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地，两国都保存了较多的商周文化典籍，孔子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以此为教材进行讲学。当时流传的主要文献典籍有六种，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六艺，后世又称为“六经”。

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在“疑古时期”就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钱玄同为代表，彻底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

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孔子与上古文献的关系仅止于《论语》，“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第二种意见以皮锡瑞和康有为为代表，认为所谓的“六经”皆为孔子所作。皮锡瑞认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较有据。”[2] 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3] 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又都失之偏颇。

【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2】皮锡瑞：《经学通论·序》。

【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编辑学与出版学研究逐步深入开展以后，这一问题又重新成为一时争论的焦点。否定者认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只能从直接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中寻找证据，《史记》、《汉书》、《孔子家语》中的材料是靠不住的；认为孔子编定“六经”是“历史叠加”的结果，是汉代以后的事情；认为孔子对周礼是极为崇拜的，不会妄加修改；认为孔子教育弟子的方式是口耳相传，没有特定的课本；对一些材料重新作出解释，否认孔子曾经编辑过“六经”。肯定者则认为，孔子之前虽然有《诗》、《书》等行世，但由于战乱，许多典籍都已经散乱、亡佚，出于现实与理想的需要，孔子对这些备受冷落的经典进行了编辑加工；孔子有自己的编辑标准；并从编辑概念的历史性入手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六经”虽不完全是孔子所作，但他进行了述、删、订、编等不同程度的工作，还是可信的。一味地怀疑《史记》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也有失偏颇，毕竟司马迁距离孔子的时代较我们为近。根据史料记载，在孔子创办私学前200年，《诗》、《书》等就已经广为流传与使用，当时它们是贵族学习的主要材料，是由周王室统一颁布的。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商周时代，文化由王室控制，全无私人著述。《诗》是西周时期颁行全国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西周庄园制社会的文学之集大成”，是经过孔子修订、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的前身。从当时的

文献记载看，在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诸侯们都要通过诵诗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可见当时《诗》是由国家颁布的通行全国的政治教材。作为西周时期重要文献形式的《诗》，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记载当时国家大事、社会风情的重要历史资料。

西周时，各个诸侯国要定期朝聘周天子，所谓"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1]，"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2]。各个诸侯国朝聘天子的时候，都会带来各个国家的诗篇进献给天子。与此同时，周朝还推行采诗制度，周天子会派出"行人"，又称"輶轩使"，每年到各诸侯国巡视一次，了解政治臧否，征集诗歌民谣，以观政绩。《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政府甚至发动百姓加入到了采诗队伍的行列，并且供给他们衣食，难怪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如此活跃了。各国君主和政府自己也都设有"采诗之官"，专门研究和注视舆论动态，通过诗歌"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正像《诗·关雎》小序上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随着周王室东迁，天子势力日减，逐渐开始有诸侯不来朝见，进而献诗与采诗制度逐渐废弃，所以《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末年，由于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传统典籍不再受到重视，开始渐渐散佚。到孔子46岁的时候（公元前506年），《左传》里已经见不到列国公卿赋诗的记载了。而孔子对周礼极为推崇，希望通过恢复周礼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统一，所以他就着手对这些典籍进行整理、编排，并传授给弟子。《论语·子罕》云："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关于

[1]《礼记·王制》。

[2]《孟子·告子下》。

孔子整理《诗》的可靠记载了。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空气自由，如果儒家胆敢毫无根据地说孔子编定“六经”，一定会遭到其他学派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记载。相反，《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与《诗》一样，《书》也是孔子以前的作品。它是我国上古时期誓、诰、命、谟等记言体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可能是历代集体编撰的史料，许多篇章在孔子以前已经产生。可以说，在孔子以前，《诗》与《书》是集体编辑活动的产物，内容不断变化，编辑周期漫长，后来由于周王室势力衰弱、文化荒废，才导致《诗》、《书》散乱，甚或残缺不全，所以才会有孔子的编辑活动。

《诗》等“六经”虽然早于孔子出现，但是孔子确实对它们进行了编辑。《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于孟子的这一说法，当时的其他学派并没有异议，可见是广为接受的事实。周予同也认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1] 孔子整理文献有他的指导思想，即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2] 由此可见，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其以“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诗》、《书》、《易》等中华元典最早产生于周朝的王宫内，即“学在官府”，是周朝教育贵族子弟与进行文化统治的工具。如作为商周王室文献汇编的《书》，多出自史官手笔，是由王室文化官员汇编成册的；《诗》是“行人”等文化官员所采集，由太师乐官编次而成；《易》的卦画符号和解释经文，也成于西

【1】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

周。但是“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编辑活动在那时还处于自发时期，进入晚周以后，当“士”逐渐摆脱了相对于王室的附庸地位，赢得个体自觉以后，中华元典才开始了由文化专门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的新阶段，而孔子及其弟子的编辑活动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具体来说，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深浅各不相同，须分别加以探讨。

《周易》是一部占筮书，今传《周易》包括本经和易传两部分，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易传指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旧说易传或易传中的一部分为孔子所作，近人考证，易传七种七篇作非一人，成非一时，其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晚期，故可断定皆非孔子所作。孔子晚年学过《易》，《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也有人认为该句应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易”与“亦”通。）《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其“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在《论语·子路》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其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系《周易·恒》九三爻辞，可见孔子曾给弟子讲过《周易》，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有过一些编辑加工。

《尚书》又分为今文《尚书》（33篇）和古文《尚书》两部分。古文《尚书》经后人考订为魏晋间人伪造，今文《尚书》则是传自古代的不完全的《尚书》遗篇，因为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的，故当时称“今文”。今文《尚书》又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指出孔子对《尚书》通篇作过编辑工作。在《论语》中常见到孔子教授并引用《尚书》的记载，可见此话应当是可信的。有人认为《尚书·禹贡》里记载有战国时期的疆

界，并由此断定该书没有经过孔子编辑，但我们认为，当时编辑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编辑活动的集体性与编辑内容的不断更新。不仅《尚书·禹贡》的内容会随时间的发展而更新，《诗经》里的诗篇也是不断更新的。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另有6篇有目无诗，《风》有15国风，共160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小雅》74篇，大抵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周颂》31篇，多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庙堂乐歌。《鲁颂》4篇，为鲁国贵族歌颂鲁僖公的作品。《商颂》5篇，为商之后人追颂先王、先祖的乐歌。旧说"《诗》三百"是孔子从古诗3 000多篇中删选出来的，经后人考证，《诗经》在孔子之前已具现在的规模，故此说不可信，但孔子对散乱的原本《诗》进行过修订还是可信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诗歌在其他地方被引用，而《诗经》里则没有——这是因为在孔子进行整理前，《诗经》已经散乱，孔子可能没有搜集到所有的诗篇。从《论语》上看，孔子常对《诗经》加以评论和解释，这些评论和解释对后世理解《诗经》有巨大影响。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三部书。《仪礼》为记载礼节仪式之书，今存17篇，仅限士礼，据文献记载为孔子所编定，较可信。《礼记》是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今《礼记》存49篇，又称小戴《礼记》，实为《礼记》中的一部分。又有大戴《礼记》85篇，亦取自《礼记》。《周礼》又称《周官》，它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经考证，其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与孔子关系较为疏远。

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诗、礼、乐三者关系相当密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论语》中孔子评乐的地方很多，而且相当内行，他亲自编辑整理乐典应当是可信的，可惜今已

[1]《论语·泰伯》。

无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后经孔子整理、修订，成为取其义以行褒贬的著作。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十二公，共242年。简要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当时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专修的国史，周王室所修史书以年有四时，时书春夏秋冬而通称“春秋”。各国所修史书的名称也有不同，《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杨伯峻认为：“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两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二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数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以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古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即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二字。”

孔子曾说自己见过“百二十国”的《春秋》，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史书编辑情况的普遍与繁盛。这一时期著名的史学作品有《国语》、《春秋》及“春秋三传”。“春秋三传”所载经文，《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皆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左传》则补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称“续经”。其中流传最广者为《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虽然现代学者多怀疑此说，但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作品却并无疑义。《春秋》全书约1.6万字，而《春秋左氏传》约18万字，约为《春秋》的11倍。《春秋左氏传》在依据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还经过了作者的大力剪裁连缀，这种处理史料的做法可以看做后代纪事本末体的渊源。《春秋左氏传》中许多“君子曰”以下的文字，既是对“春秋笔法”的解释，也是作者立场、

价值判断的表现，是编辑自觉意识的显现。《春秋左氏传》的影响远远大于另外两传与《春秋》。《国语》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个国家的次序来编排史料，共计21篇，记事下限为悼公十四年。书中各国史料多寡颇为悬殊，例如其中《晋语》约占全书的一半（占21篇中的9篇）。《春秋左氏传》以记事为主而兼及记言，而《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则非常简单。

（二）孔子的编辑思想与编辑特点

孔子在对“六经”进行整理的过程中，虽然宣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也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不意味着对原本典籍一字不改，而是说在传述历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去篡改、歪曲历史事实。但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没有一部史书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性，孔子编辑的“六经”同样如此，只不过他的思想是通过叙述形式体现出来的，于原本的史实并无改动。其编辑思想在其编辑特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下面一并进行分析：

1. 有明确的编辑意图

孔子进行编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发扬备受冷落的“周礼”，进而加强周王室的统治，改变“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既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又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实现自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服务。这一思想贯穿了孔子的整个编辑活动。例如孔子编选《诗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在编写《春秋》时，他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从而达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效果。

孔子对鲁国史书《春秋》的改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只截取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一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更便于宣扬其理论与学说。其次，

孔子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在不歪曲史实的前提下，用自己带有褒贬意味的语言“重新讲述”了历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孔子自己也惴惴不安，故有“《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则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不说“周襄王”而说“天王”，不说“会诸侯”而说“狩于河阳”。《左传》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解释的：“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云：“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原来因为当时天子尊严已经不存，周天子是由诸侯召至晋国的河阳的，孔子使用一个“天王”，一个“狩”，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又维护了王室尊严，反映了自己的“宗周”思想。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韩德民也指出：“哲学又不是历史，历史之成其为哲学，乃是一种转化的结果。……这种转化的中介当然只能是作为历史存在之主体的人。……没有那些敏感的生命主体深入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以其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独有体验为基础进行历史的反思，就不会有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孔子就是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对话的最伟大的中介，是在对古老传统的‘述’说中创造新的价值规范的思想家群体中的最重要的代表。”[1]

2. 充满理性的编辑思想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对他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自己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物尽量不去提及。在编辑过程中他也是这样，如《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

[1] 韩德民：《礼：从历史到哲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

孔子编辑《春秋》时不予记载，只将“雨星”改成“星陨如雨”以结尾。又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云：“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劳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忘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如《太平御览》卷79引《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尧曰：夔一足也，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孔子充满理性光芒的编辑思想一方面将“神话历史化”，是对理性的追求，对非理性的反动，是一种先进的编辑思想，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造成了我国古代神话的大量亡佚。

3. 科学的编辑方法

孔子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即多闻阙疑，无征不信。

孔子认为，在对古文献的编辑过程中应持怀疑态度。他曾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1]就是说对于史书的阙文要存疑，留给别人思考，不要凭主观臆测独断妄改。在实践中他正是这样做的，如《春秋》是鲁国史书，其中阙误较多，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有之。孔子整理时一仍其旧，而不轻改。

【1】《论语·卫灵公》。

孔子不仅主张多闻阙疑，而且还主张无征不信。《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宋人杨简解释为：“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无文策可证，无贤献能证。”也即在编辑时必须注重考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即使主观上再自信也不能下笔。在实践中孔子也是这么做的，从《仪礼》及《礼记》中有关他的言行上可以看出，他编的、讲的全是周礼，由于夏礼、商礼文献不足，虽然

他能言，但终未编辑成书。

孔子虽然出生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初始阶段，但由于其卓越的编辑实践以及对后世编辑工作的影响，他是无愧于中国最早的大编辑家的称号的。

二、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通过帮助秦庄襄王登上帝位而成为秦国丞相。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但《战国策》则云"食蓝田十二县"，疑此事或在食河南洛阳之先。庄襄王即位三年即去世，13岁的秦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权倾一时。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当时秦国已兼并巴蜀、汉中等地，占领楚地置南郡，东面有太原、河东诸郡，东界到荥阳。吕不韦此时招致宾客游士，做好并吞天下之打算。但这时秦王年少，"委国事于大臣"。据记载，吕不韦常与太后私通，后来又物色到嫪毐，并将其伪装成宦者，进献给太后，后来嫪毐甚得太后之宠信，拥有极大的权势。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王冠，带剑"，已成年的秦王对吕不韦、嫪毐专断国政非常不满，于是诛杀嫪毐，并放逐其门客党羽。第二年，吕不韦以"坐嫪毐免"。过了一年之后，秦王仍不放心，担心吕不韦会东山再起，于是下令将吕不韦与其家属迁到四川，吕不韦不久即饮鸩而死。在出土的战国铜兵器中，有吕不韦所作的铜戈，上有"三年"、"四年"、"五年"、"八年"的纪年，都应是秦王政时期，戈上都有"相邦吕不韦"的刻文。相邦即相国，汉人避刘邦之讳，故《史记》中将相邦悉改成相国。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品，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一部巨著。《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

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编写此书时距四公子已较远：孟尝君当秦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以后而卒；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平原君卒；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信陵君死；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李园杀春申君。信陵君将五国兵攻秦关外，正当庄襄王时，吕不韦已经是秦国的丞相。从这可以看出，只有信陵君和春申君与吕不韦的成书时间比较接近，但是，吕不韦成书时已经是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此时，除春申君外，其余三公子都相继死去，而春申君在楚国日子也不好过，吕不韦大可不必与之进行攀比，因吕不韦的势力大大超过他了。所以其目的不会是为了与他人争闲斗气，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是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论证。这是在韩非之前进行的一种统一思想的试验。当然也不排除他作此书有树立并炫耀自己权威的因素在内。

吕不韦将成书后的《吕氏春秋》悬挂在咸阳市门，求有能增减一字者，而无人能改。注过此书的东汉学者高诱认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这一典型事件确实反映出吕不韦当时志得意满、权倾一时的心情，同时也能看出这部书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具有一定质量的。应该说该书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代表了秦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季冬纪》之“序意”篇记载：“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明确、务实的编辑意图。《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该书编撰的目的是“欲以并天下”，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的一种探索，是对当时务实疾虚的社会风气的反映。作者虽然博采众家，但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秦国的政治现实、社

会进步服务。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出发点一个是为了献给当时的国君秦王政，作为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参考资料，从而巩固个人的权力名位；另一个出发点就是作为他个人回顾人生，带一些自我欣赏心理的大工程。这种"大杂烩"的思想体系并非如一些人所说毫无用处，而是非常实用。可以说，对于秦国，它比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都更加实用，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

二是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该书兼诸子之说而有之，超越了传统的门户之见，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据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一文统计，在该书160篇文章中，发挥法家学说的有43篇，儒家学说有26篇，道家学说17篇，兵家学说16篇，墨家和纵横家各10篇，名家学说有5篇，农家学说有4篇，小说家有1篇，还有几篇学派观点不明显，法家学说占上风。这些数据大致符合秦国学术界各派的消长情况。由于没有强行进行人为的统一，百家学说在各自篇章中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使得该书具有战国末期各派学说资料汇编的性质。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灰飞烟灭，而《吕氏春秋》独存，使得许多珍贵的先秦文化成果流传后世。《吕氏春秋》虽然是集体编撰，内容庞杂，但同时也因此为后代提供了研究先秦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的珍贵资料。例如其中的音乐史料和音乐论述就是《吕氏春秋》的一大文化遗存。"音乐"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吕氏春秋》里。《吕氏春秋》以前，谈到音乐，只有一个"乐"字，包括音乐、乐舞、享乐等意思；《吕氏春秋》之后，专门音乐意义上的"音乐"和"乐"才开始平行使用。此外，《吕氏春秋》是一项集体编辑活动，所以既不像诸子百家的著述那样排斥他说，又不像专门史书那样严谨端正，因此，许多有趣的神话传说、颇具文学意味的先秦作品得以保存下来。譬如，《本味篇》里的伊尹说汤，可能就是汉志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鲁迅先生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小说作品之一。

三是有所取舍，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该书材料丰富，但不

乏系统性，一方面全面地反映了各派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没有变成眉目不清的“大杂烩”，可以看出该书的实际主编者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学者。在编选数千食客所写的文章时，一个主导的标准就是秦国特有的务实精神，如不是简单地排斥名家言论，但反对不切实际的诡辩；收录不少墨家的学说，但不取它的鬼神之说；引用庄子、列子的宇宙观，却不采用他们那种荒诞无稽的说法。也就是说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编选文稿，不尚空言，反映编者的编纂态度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在某种意义上，《吕氏春秋》也是吕不韦个人思想体系的一次大总结。这种思想体系不同于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但是又融合了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里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精华。

四是编排有序、体系严谨、结构完整，各篇字数大体均衡，这在先秦诸子书中是十分可贵的。由于处于编辑出版的草创时期，战国时期编辑方法十分简单，有的书往往只有篇名而没有书名，即使有书名也不很统一。有的题名为某子，却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许多书不分章节。总之体例十分混乱。而《吕氏春秋》是将许多学说的文章编在一起，编辑体例非常整齐而有系统，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总共26卷；每览各有8篇，每论各有6篇，每纪各有5篇，合计160篇。有人认为，从此书的情况分析，有可能当时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编辑班子，负责将众多宾客按各自学派的观点撰写的文章经过集体讨论，然后进行筛选、归类，特别是它成功地使用两级分目法，为此后大部头书籍的编辑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参考和保证。《吕氏春秋》达到了战国时期书籍编辑的最高水平。它标志着书籍编辑正在走向成熟。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将其公之于世，使之广泛流传。这在造纸术和印刷术产生之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出版方式。先秦书籍散亡十分严重，就是保存下来的也都残缺不全或被篡改，而《吕氏春秋》历经2 000多年保存完好，一方面因此书为秦人编撰，不在秦火焚毁之列，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曾公布于咸阳门前，抄录的人很多，才得以完整保存。

如果《吕氏春秋》编成后便被锁于深宫，只有一二部，没有广泛传抄，其命运如何，就很难估量了。

第二节 两汉著名图书编撰（辑）家

“编辑”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编辑”一词既表示一种著作方式，又表示出版和其他传播专业的非著作活动。在出版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之前，我们所说的编辑更多地是指“作品编辑”，既有著述的含义，又有收集材料、编次加工、整理成书的含义。我们在论述两汉的图书编辑家时，更多地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的。两汉时期，出版活动多由政府主持进行，又因图书制作技术和流通渠道的限制，很少有人能同时从事著述、编辑、抄写复制和广泛传播图书的工作。所以，在汉代，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家尚未出现，承担出版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图书编辑家，他们所从事的编辑、著述工作是出版活动的重中之重，故有必要重点论述。

两汉时期的图书编辑家人数众多，大家辈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著作，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珍贵遗产。这些著作中，有些是著者“依自不依他”的个人创作，有的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编次整理而成，有的则兼有独创和编辑加工的性质。众多的编辑家在长期的著述、编辑活动中，形成了宝贵的编辑思想，总结出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归纳出了一系列编辑方法，成为我国出版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根据统计，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者见于文献记载的有246人，秦朝仅17人，而汉代多达931人，足见汉代著作群体之庞大。当代学者曹之总结两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图书编辑家为36位，并列为一表。兹将该表转引如下：

两汉时期著名图书编辑家简表[1]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著作举例
陆贾		楚	《新语》、《楚汉春秋》
贾谊	前200—前168	洛阳	《新书》、《贾长沙集》
刘安	前179—前122	沛郡丰	《淮南子》等
司马相如	前179—前117	成都	《司马文园集》等
董仲舒	前179—前104	广川	《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
毛亨		鲁(?)	《毛诗故训传》等
司马迁	前145—?	夏阳	《史记》等
耿寿昌			《月行帛图》、《月行度》等
褚少孙		颍川	《褚先生集》等
刘向	前77—前6	沛	《新序》、《别录》、《说苑》、《列女传》等
扬雄	前53—18	成都	《法言》、《太玄》、《方言》等
刘歆	约前53—23	沛	《七略》、《别录》、《三统历谱》等
卫宏		东海	《汉旧仪》、《毛诗序》等
桓谭	约前40—约32	相	《新论》等
王充	27—约79	上虞	《论衡》、《政务》等
韦彪		平陵	《韦卿子》等
班固	32—92	安陵	《汉书》、《班兰台集》等。
崔骃	?—92	安平	《崔亭伯集》等
贾逵	30—101	平陵	《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
王符	约85—162	临泾	《潜夫论》等
班昭	49—约120	安陵	《女诫》、《东征赋》等
刘珍	?—约126	蔡阳	《东观汉纪》、《释明》等
王逸		宜城	《楚辞章句》等
张衡	78—143	南阳西鄂	《二京赋》、《周官训诂》等
崔瑗	78—143	安平	《南阳文学官志》等
许慎	约58—约147	召陵	《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
马融	79—166	茂陵	《马季长集》等

[1]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35—3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续 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著作举例
服虔		荥阳	《春秋左氏传解》等
张机		南阳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
何休	129—182	樊	《春秋公羊解诂》、《公羊墨守》等
蔡邕	133—192	陈留圉	《蔡中郎集》等
郑玄	127—200	高密	《毛诗笺》、《三礼注》、《诗谱》等
赵岐	约 108—201	长陵	《孟子章句》、《三辅决录》等
高诱		涿郡	《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
荀悦	148—209	颍阴	《汉纪》、《申鉴》等
应劭		南顿	《风俗通义》、《汉官仪》等

因篇幅限制，以上编辑家不可能一一提到，有些已经在其他章节中有所提及，下面将选择其中一些重要的编辑家予以介绍。

一、陆贾与董仲舒

出版家与编辑家的产生，一方面固然需要自身具备一定的才学、胆识和眼光，另一方面，却也与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文化政策有关。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多年的战乱，汉代在建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文化极度贫乏的局面。加之“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统治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可想而知。而汉高祖刘邦，是一个极度讨厌儒生、憎恨文化的人，这对有汉一代的学术与文化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骂郦生为“竖儒”：

>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1】《史记·张丞相列传》。

又载：

>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在《刘敬叔孙通列传》里，刘邦又因为叔孙通穿着儒服而憎恶不已。又《汉书》记载，里中骑士对郦生说："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想要培养出优秀的学者与出版家、编辑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陆贾与董仲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实，使得汉代社会"彬彬稍进"。他们自身的出版与编辑成就或许不及同时代的诸多文坛俊才，但是他们在汉代文化史、出版史上的影响可谓巨矣，非一般的出版家、编辑家可以比拟，对出版的贡献，可以说是"功夫在诗外"。

徐复观云，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自身的文化启蒙运动，应该推始于周公；而社会上的文化启蒙运动，始于孔子。陆贾，则可说是刘氏统治集团之启蒙人。正如《新语校注》所言："其(刘邦）不好儒，可谓极矣；然终能亡秦灭楚，开炎汉数百年之基者，岂非以闻陆生之言而有惭色，及未尝不称善之故耶？然则陆生启沃之功，诚有大造于汉也。"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从陆贾始，刘邦才逐渐懂得天下可马上得之，却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开始采取一系列举措，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后来到惠帝四年，又解除了挟书令，文化气氛逐渐宽松起来。刘邦在《手敕太子文》中也承认："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对陆贾的启蒙之功，就差直接说出来了。

陆贾的编辑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

1. 明确的对象感，或曰读者意识

陆贾作品有《楚汉春秋》、《新语》等，后者得以传世。其书语言通俗易懂，文字浅显，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文化水平与理解能力。王充作《问孔》、《刺孟》等文章，对古今名家进行了思想批判，独对陆贾推崇备至，他在《论衡·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人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缺；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新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条分缕析，或许颇

近于当时的口语。陆贾自己也说："凡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浊，口不能言善恶，则所谓不能。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1]

【1】《新语·辨惑》。

2. 开放的思想体系

在《史记》与《汉书》中，陆贾均被列入儒家。但是王利器认为："陆贾者，盖兼儒、道两家，而为汉代学术思想导乎先路者也。"确实是这样。陆贾身为儒家弟子，私淑荀子，为谷梁派重要传人，竭力鼓吹儒家经艺，但他的《新语》，却兼采众家，而不拘泥于儒家一隅。《术事》篇云："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制，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起于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3. 务实而戒空谈

陆贾作《新语》之意在于启发、诱导君主推行文治，虽然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却并非为逞一时口舌之利，而总是将对君主的教育与现实联系起来，具体表现就是反对厚古薄今。《新语·术事》云："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庸。""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显然，这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陆贾之后，政府开始逐渐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文化的发展。汉初，黄老之言广为流传，在政府与民间都极有市场，因为它一方面合于战乱之后民力凋敝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暗合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愿望，合于国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奏。文、景以后，国力渐增，至汉武帝时，达到顶峰，黄老无为之术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这就亟须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它。历史将这个使命放在了方正有节的董仲舒身上，也将此后中国学术的迟滞不前归咎于他。现实是，汉武帝以后，文化面逐渐狭窄，出版活动也基本开始走进注疏儒家经典的狭小圈子里。

不管是否有意，董仲舒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与出版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焦点人物。《史记·儒林列传》载：

>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其实，在董仲舒以前，汉武帝已经作了一系列努力，推重儒术，董仲舒的出现，既是一种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董仲舒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业的。

吕思勉指出："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其为治，实亦儒法杂。"在汉武帝手中，儒家学说完成了从在野学派走向官方学术的历史进程。汉武帝先后"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并拜布衣儒生公孙弘为宰相，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支撑。这时，董仲舒以一篇《天人三策》走进了汉武帝的视野，走进了历史。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指出：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徐复观以为，董仲舒在对策中所说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话，实际是指当时流行的纵横家及法家之术而言，他的所谓“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并非禁止诸子百家流传于世。即使在两汉经学盛行的时候，知识分子也还是博采众家，例如刘向刘歆父子、班固等，皆非常崇拜董仲舒，但是在《汉书·艺文志》里却认为：“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逾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依然是一种开明态度，可见要把两千年学术不发达的罪过一起加之于一个书生身上，无疑是没有道理的，造成以后文化与出版内容狭窄、缺乏创新的罪魁祸首，应当是当时的专制体制。

二、刘安与《淮南子》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西汉前期著名的图书编辑家。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16岁。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问罪，刘安被迫自杀。

刘安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不仅善文辞，而且长于音乐，通晓天文地理、诸子学说，班固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刘安“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的才能深受武帝赏识：

>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他还爱贤若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组织门客编修了大量图书，除了著名的《淮南子》以外，尚有《淮南外》三十三篇、《淮南中篇》、《离骚传》、《颂德》、《长安都国颂》、《淮南道应》、《琴颂》、《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淮南歌诗》、《淮南杂子星》、《淮南八公相鹤经》、《淮南王食经》、《淮南记》、《淮南变化术》、《淮南万毕术》等，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可谓包罗万象。

在刘安组织编辑的图书中，以《淮南子》一书最为著名。《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1]。《淮南子》由刘安主持编修，参与其事者均为一时才俊。高诱《淮南子·叙目》中说：

[1] 高诱：《淮南子·叙目》。

> ［刘安］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即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刘安把此书作为礼品献给武帝，说明《淮南子》至迟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全书21卷，体系庞大，结构严密，以道家理论为核心，融会各家学说，形成了新道家的思想体系。

《淮南子》是西汉前期一部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它是刘安为西汉王朝提出的治国安邦的理论纲领，也是对汉初数十年治政理论和实践进行的概括和总结。他主张以道为主，兼收并蓄，扬长弃短，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和儒家的仁政学说于一炉，剖析秦朝和六国治政的成败得失，系统地提出了基本符合汉初社会实际的“无为而治”的理论。这种理论在汉初实行60余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汉武帝即位以后没有几年，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淮南王也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斗争

中，被迫自杀，《淮南子》一书也随之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不过书中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后人仍有很大影响。比刘安稍后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等人，都从中汲取进步的思想因素，融会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今天我们研究先秦和西汉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文学史，《淮南子》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

从《淮南子》一书的内容及编辑体例上，我们可以看出刘安的编辑思想和特点。

首先，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意图。刘安在《要略》中说：

>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

他还说，“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见，“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是全书的根本宗旨，这种阐述表明《淮南子》的写作本意就是站在新道家的立场上，对西汉以前的诸子百家进行批判性总结，以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整套治国纲领。

其次，兼收并蓄，广为收罗。《要略》云：

>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

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可见，刘安编辑此书，是要“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并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因此，他和门客在编写过程中要“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广为采纳，集众家学说之长，这表现了作者融汇千川万流的大海般的胸怀和超越前人的气魄，及对自己所创新的“不与世推移”的最终体系的自信。从实际情况来看，刘安等人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从全书的征引材料之多就可以得到印证。

据统计，《淮南子》直接引用的前人论著有《诗》、《周书》、《老子》、《庄子》、黄帝言论、孔子言论、《易》、《韩子》、《曾子》、《神农之法》、《慎子》、《管子》、《春秋》、《国语》、《书》、《公孙龙子》等16种。间接引用前人的论述则更多，据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粗略统计，就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吕氏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尚书》、《诗经》、《左传》、《公羊传》、《子思子》、《公孙龙子》、《尸子》、《礼记》、《楚辞》、《韩诗外传》、《邓析子》、《晏氏春秋》、《管子》、《墨子》、《战国策》、《新语》及邹衍大九州说等26种[1]。先秦流传下来的图书，基本都曾为《淮南子》一书所征引，其征引之繁博，由此可见。刘知几《史通·自序》中说《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有道理的。

复次，中心突出，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非汗漫无归。关于新道家，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简明扼要地概括过其理论特点：

>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

【1】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295—29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史记·太史公自序》。

《淮南子》一书在编写上正符合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点，它虽然收罗甚广，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类，但并不是先秦各家思想的杂凑，而是集众家之长而归于新道家。《淮南子·齐俗训》说：“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淮南子》正是站在新道家的立场上，重点继承了老庄的道家思想，但不是完全照搬因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改造，有所创新。对儒、法各家有批判有吸收，兼合采撮各家之长，使之置于新道家思想的统帅之下，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东汉高诱《淮南子·叙目》中说：

>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

这里“归之于道”即是指集众家之长于新道家。梁启超认为此书“匠心经营，极有伦脊，非漫然獭祭而已”；“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并称“《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1]。既征引繁复，兼收并蓄，又中心突出，具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而不至于汗漫无归，正是《淮南子》一书的鲜明特色。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9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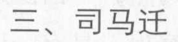
四、编排有序，结构严密。《淮南子》21卷，前20卷为主要内容，每卷都是非常精妙的专论，最后一卷《要略》则为全书的跋，详尽地说明了著书的目的、各篇的内容、写作原则与形式，相当于全书的提要。全书在编排上十分精审，《要略》言《淮南子》一书的篇章目录说：

> 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

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全书除《要略》外，以“道”为主线，依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卷1《原道训》、卷2《俶真训》，雄居全书之首，成为全书的纲领，论述道德本质特征。第二层次，包括卷3《天文训》到卷8《本经训》，处于全书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论述道与自然和人事的关系。其中前三卷论自然，后三卷论人事。第三层次，包括卷9《主术训》到卷19《修务训》，处于本书的后半部分，是道落实到人世间的各个方面，又分为五个方面。第四层次，卷20《泰族训》，处于全书后面，作为总结。最后是卷21《要略》，为全书之跋[1]。可见作者是根据全书的内容来安排篇章次第的。全书内容结构十分严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道学体系。

淮南王刘安以藩王之身，广征图书，招士著书，主持编辑了大量优秀图书，颇类似于吕不韦编修《吕氏春秋》之故事，二人的命运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显然，刘安的编辑成就远远超过了吕不韦，堪称西汉前期最为著名的图书编辑家。



三、司马迁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公元前145—?），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南），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图书编辑家。他继承父志，发凡起例，用毕生精力写就的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宋代郑樵称誉《史记》“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2]。《史记》一书代表了两汉时期史书编辑的最高成就，司

【1】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3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郑樵：《通志·总序》。

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体现出来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珍贵遗产，对后世的图书编辑尤其是史书编辑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史记》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也为后世的史书编辑树立了最杰出的典范。

（一）司马迁传略

司马迁约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夏阳龙门。其父司马谈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曾撰《论六家要旨》，立论精辟。他还立志继《春秋》之后，修撰一部"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太史公书》。这些都对司马迁的思想和人生选择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少年时期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他"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司马迁随家迁至京城，从名儒孔安国学《尚书》，从今文经大师董仲舒学《春秋》，受到了系统的儒学教育。从20岁开始，司马迁开始漫游全国各地，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被任命为郎中，并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壮阔的游历为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托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继父职为太史令。他大量阅读皇家藏书与档案；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从这时开始，司马迁为修撰《史记》作准备工作。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修成后，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并修订了其父司马谈所定的断限，准备从黄帝写起，至

于汉太初年间。自此以后，司马迁专心著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1]

【1】《汉书·司马迁传》。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朝野震动。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惹怒汉武帝，被捕入狱，判死刑。当此之时，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2] 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含辱自请宫刑。李陵之祸，给司马迁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这一方面更加坚定了他“发愤著书”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对先前的修史目的有所修正，遂将满腔激愤注入其中，使《史记》一书充满了浓郁的悲情色彩，以致被认为是一部“愤世之作”。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职位尊宠。但司马迁不以为荣，一心著作《史记》。

【2】《汉书·司马迁传》。

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致信司马迁，请司马迁利用自已的地位推荐贤才。司马迁婉言谢绝，在《报任安书》中叙述了他的苦衷，并叙述了著作《史记》的宗旨，对“发愤著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史记》一书基本上于当年完成，此后，司马迁对《史记》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和删定。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史记》大功告成，“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后世有学者推断，司马迁约死于本年。有人还认为司马迁卒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依王国维的观点，“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享年约60岁[3]。纵观司马迁一生，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盛世，这正是他修撰《史记》的历史大背景。司马迁死因不明，《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可为一说。司马迁卒后，魂返故土，葬于夏阳。其墓在今陕西韩城县南22里芝川镇南岭上，岿然矗立，与山河永存。

【3】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司马迁生前，《史记》并没有公开发表，《汉书·司马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

其书，遂宣布焉。”但当时流布并不广泛。至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史记》已亡佚10篇。对于亡佚的篇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无有定论。《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均称引张晏之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目前仍以此说为准。

后人对《史记》多有补充，如冯商、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等人，都曾续补《史记》，10篇之外，对其他部分亦多有补充。其中以褚少孙的续补最为重要。补充之外，还有伪窜部分。但整体上并不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基本风貌。

另外，《史记》一名并非原书所有。在汉代以前，“史记”原为史书共名，泛指诸侯国史而言。司马迁自定书名为《太史公书》，以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称。此外，还有《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传》、《太史公》等书名。据陈直先生考证，《史记》成为专名始于东汉桓灵之际，即东汉末年[1]。

【1】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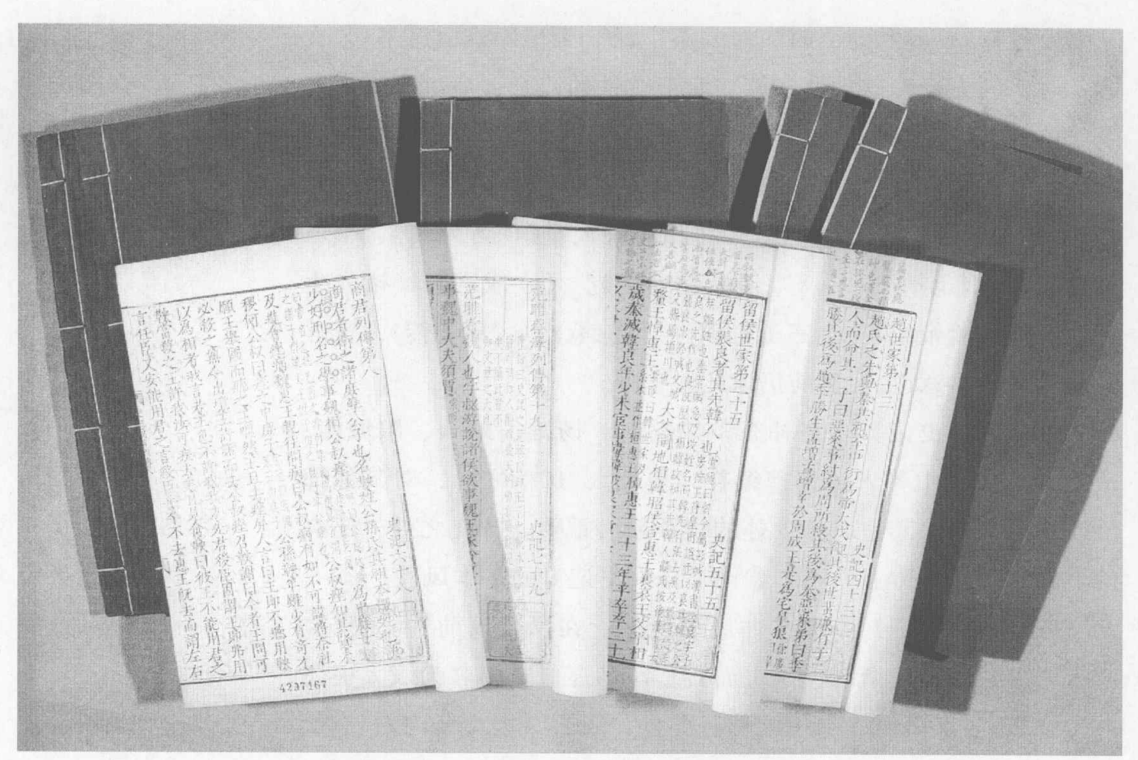
（二）《史记》的编辑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130篇，由五种体裁组成，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首创纪传体编辑史书的体例，是司马迁在图书（尤其是史书）编辑方面的最大贡献。

1. 本纪12篇，以编年形式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可分两类：一类以朝代为主，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另一类以帝王为主，像《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实际上都是编年史，大事记，相当于全书的总纲。正如张守节所解释的：“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2]

【2】《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

本纪之体，并非司马迁独创，实效法《春秋》而作。本纪之名，也是采《禹本纪》而立。《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



《史记》书影

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可以为证。

2. 表10篇，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它不仅是“本纪”、“列传”的简化，而且在史料方面也有所补充。依其内容，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年经事纬，纵横互订；另一类是人物的年表，与列传互相补充。著名人物，都有专传，其余人物，传不胜记，又不容埋没，则以表载之。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

“表”这种体裁亦有所本，实效法谱牒而为之。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曾说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清代赵翼对年表的起因和功能有较准确的评论，他说：

> 《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列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题材，莫大于是。[1]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

3. 书8篇。这是系统记述典章制度以及天文历法的体裁，也可以说是分类史，实为后世正史中"志"的前身。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司马贞解释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班氏谓之志，志，记也。"[2] 八书是司马迁的独创。赵翼曰："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3]

【2】《史记·礼书》司马贞索隐。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

4. 世家30篇。用以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如他根据实际情况将孔子和陈涉都列入世家。张守节正义曰："世家者，志曰'谓世世有禄秩之家'。案：累世有爵土封国。"[4] 世家这种体裁用于史书，为司马迁首创。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曰：用世家"以称王侯将相及圣贤名世者，与本纪列传对言，盖自史公创"[5]。

【4】张守节:《吴太伯世家正义》,《史记会注考证》。

【5】〔日〕泷川资言:《吴太伯世家考证》。

5. 列传70篇。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还包括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6] 列传有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又可分为三种：一人一传，如商鞅、苏秦等；两人或几个人一传，称为合传。合传里的人大抵时代相同，或行事相关联。第三类是类传，按人物性质合在一起，如《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等。第二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相当于后世的《四夷传》。将四方民族分插在人物列传中，等同天子臣民，这体现了四海一家的观念，表现了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

【6】《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贞索隐。

列传一体，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存在，但将其用于记载人物事迹，则是司马迁的独创。赵翼曰："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7]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

由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史记》五体有因有创，而创制多于因革。五种体裁在过去都有其名，但有意识地加以借鉴和改变，将其互相配合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显然是《史记》的天才创举。宋代郑樵评价司马迁的创举说：

>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1]

【1】郑樵：《通志·总序》。

赵翼评价云：

>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

章学诚说"迁书体圆用神"，就是指此而言。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上包天文，下括地理，总结人间一切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究天人之际，包罗万有，体大思精。从内容上讲，司马迁确立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因此纪传

体史书被颁令为正史，而《史记》也就成为后世史家学习和仿效的典范。

（三）《史记》篇章的编辑方法

在编辑方法方面，《史记》的优点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式确立了史书的论赞形式。

《史记》在每篇之末往往会有“太史公曰”云云，系仿《左传》“君子曰”而作，习惯称“赞”。十表、八书、列传的篇首也有“太史公曰”，习惯谓之“序”。《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中还夹叙夹议。这些都是司马迁对史实的评论，对正文有很大的补充。司马迁在五体之外创造的篇前作序、篇后作赞、篇中夹议等三种史论形式，是在继承前代史学著作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举。其编辑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成为后世正史的固定格式。不过司马迁并未名之曰序曰赞。刘知几《史通·论赞篇》正式论列“太史公曰”为赞，乃假借后史之名以称之。

《史记》的一百篇序赞是司马迁直接发表评论的重要形式，或考证古史，如先秦诸帝纪之赞、《三代世表》序；或叙游历所得，如《河渠书》赞；或直抒评论，如《项羽本纪》“太史公曰”、《蒙恬列传》赞等，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往往可补篇中未言之事。至于《太史公自序》更是一篇总论，明述作之旨，在全书中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首创编辑中的“互见法”。

“互见法”，又称“旁见侧出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与纪传体相适应的叙述。这种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补充。例如在《吕后本纪》中有“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有“事在吕后语中”，《萧相国世家》有“语在淮阴侯事中”，等等。这种“互见之法”，至少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重复，节省篇幅；二是可以详略分明，为刻画主要人物发挥作用。其实，互见法的首创，不仅仅是为了塑造历史人物，从本质上看，是司马迁

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反映。司马迁在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和对比，抽出人物、事件最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中心，而将枝叶蔓衍的材料互见于它篇。这一方法使《史记》这一长篇巨制中纷繁复杂的人物，跨越数千年时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有序地联系起来，从而在叙述历史和塑造人物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此种编辑方法也为后世史家所遵循和仿效。

第三，首创"寓论断于序事"的编辑方法。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6中说：

>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

顾氏此论，指出了《史记》的一种重要的编辑方法："寓论断于序事"。这种方法就是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寓论断于序事"的基本方式有四种：一是借他人之评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叔孙通列传》，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从而塑造了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应，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在《史记》的其他篇中，如《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孙子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都有类

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

二是用客观的内容即历史叙述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观点。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篇章，都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三是对比衬托以暗寓己见，如以萧何与韩信作对比，卫青与李广作对比，等等。四是细节描写的方式，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就已表达出来了，这一方面的例子在《史记》中也是俯拾皆是的。

(四) 司马迁的编辑思想

纵观《史记》一书，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有着异常丰富和深刻的编辑思想。具体而言，其编辑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 具有明确的编辑意图

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意图非常明确，他在《报任安书》中曾明确写道，他写《史记》，是为了“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根本意图，他在撰写《史记》时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从对史实的叙述中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在叙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中，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编撰出一部具有个人色彩，具有独到见解的历史巨著。司马迁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历史研究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2. 表彰六经，尊崇孔子但不拘泥于儒学教条

司马迁身处儒学独尊的时代，其思想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

染。他虽然没有像一些经学大师那样留下儒学理论著作，但他却通过《史记》，以特殊的形式表达了他尊崇孔子、表彰六经的编辑思想。

司马迁对《春秋》一书推崇备至，他认为：

>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

【1】《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在司马迁心中就是《春秋》第二，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宗旨、传统而为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此陈说甚明：

> 先人〔指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因此，司马迁写作《史记》最终目的，就是要"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补艺，司马贞索隐说："谓补六艺之阙也。"张守节正义说："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敢比经艺也。异传，谓如丘明《春秋外传》、《国语》、子夏《易传》、毛公《诗传》、韩《诗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也。"如此说来，司马迁的最终目的是将《史记》作为"经"或经学典籍来看待。

在这样的期许下，《史记》中必然要体现出尊崇儒学、表彰六经的思想。这首先表现在司马迁对孔子的尊崇上，他以传神之笔写下了《孔子世家》，全面介绍了孔子的家世、生平事迹以及政治和学术文化事业方面的业绩。将孔子传记列为"世家"，是

从形式上给予孔子以极高的地位。朱熹说："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岂不又具微意焉？"[1] 在篇末，他还深情地撰写了一篇赞语，表达了对孔子的推崇之意。《赞》曰：

[1]《朱文公集》卷72《杂学辨》。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不仅作《孔子世家》，详细地介绍孔子言行事迹和思想学说，还专门写了《仲尼弟子列传》，将"颇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35人，列名的42人，即"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都无一遗漏地写入。同时一再褒扬孔子学说具有拨乱反正、作为天下通纪和社会伦理准则的价值，将孔子推崇为"至圣"。其他任何思想家也不曾受到《史记》这种程度的重视，没有孔子这种突出的地位。

对儒学的推崇，还表现在司马迁专列《儒林列传》一篇，记述了西汉开国以来以至汉武帝时代的著名儒家学者。另外，司马迁在评判事件和人物时，也主要是以儒学尤其是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但是，司马迁并不拘泥于此，在对历史的叙述与考察中，他往往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体现出比较通达的史学观念。如他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涉列入世家，并设《货殖列传》，表彰财富，重视经济活动，等等，都说明他是在力图"成一家之言"的。正是因为他既尊经崇儒又不拘泥于教条，力图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班固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真正的高明和可贵之处。

[2]《汉书·司马迁传》。

3. 明确提出“发愤著书”并将其付诸实践

“发愤著书”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几乎就是中国图书编辑史上的一条重要规律。个人的不幸和挫折往往会成为撰写传世之作的强大动力。但系统地总结这一现象，将其理论化，并将其有意识地付诸实践的，司马迁是第一人。李陵之祸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和打击，但他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将满腔激愤和热情注入到《史记》的写作中。这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的“三不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坚韧的毅力使然。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

[1]《汉书·司马迁传》。

这段话既是司马迁对历史现象的高度概括，又是他的切身体会和亲身经历的表白，可以看做是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以后对自己的写作态度的夫子自道。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不仅使《史记》充溢着一种英雄气概和悲情色彩，从而成就了一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名著，而且对后世的中国学者产生了极为深远的

影响。后世的文人学者，当其身处困境时，常常以司马迁为其精神楷模，发愤著作，以寄托其身世之慨和理想追求。

4. 在对史料的考辨上，博综兼览，实事求是

《史记》一书取材极为广泛，凡是司马迁生前能看到的文献典籍，他大都有所涉猎。《史记》一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献，向有“六经门户，诸子渊薮”之称。司马迁在对史料的考辨和采用方面，既通达，又严谨。

其通达表现在对资料的博综兼览上，他不仅利用图书、档案等文献，还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采访，使得《史记》一书的内容显得异常丰富。在经传方面，他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兼采今古文。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三章说：“太史公书成书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其实，《史记》一书固然反映了今文经学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情况，但司马迁并不排斥古文学，也采用了不少的古文经书材料。如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曾提到：“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又如在诸子方面，《史记》在有关的列传中多述诸子之说，引其文，载其书，详其学，其叙述与评论都能体现出司马迁兼收并蓄的通达态度。

司马迁的谨慎表现在他对史料的考辨方面。他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力求质实，排斥虚妄，凡是事涉荒诞、言过其实的材料，他一概不取。如在《刺客列传》赞中，他明确说过：“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大宛列传》中也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传闻异辞，则谨慎存疑，不妄下断语。如他在《五帝本纪》赞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明显地对黄帝传说的可靠性抱怀疑态度。再如《三代世表》中所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

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诸如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处处皆在，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实事求是、科学考辨的审慎态度。班固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其实也包含着对司马迁严谨态度的肯定。

【1】《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还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我们对此不再赘述。总之，司马迁对中国古代的编辑事业贡献是巨大的，他所创立的纪传体史书体例，还有他的编辑思想和方法，都为后世的文人学者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嘉惠后世学人之功不可低估。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学识、思想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四、扬雄

扬雄画像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多有著述。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年轻时好学，无所不读，“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其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为辞赋，如《上林赋》、《河东赋》、《甘泉赋》等；语言学上的最大成就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为后世显学；在哲学上则有《太玄》一书。

扬雄对辞赋的态度，先是非常乐于写作，追摹屈原，然后又发现“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1]。于是就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2]。

[1]《汉书·扬雄传》。

[2] 扬雄：《法言·吾子》。

出版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

1. 扬雄重视书籍的传播与作用，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或曰：人各是其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3] 就是说，书籍可以绵延千年，打破了语言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可以代替圣人传播思想，是无言的老师。

[3] 扬雄：《法言·吾子》。

2. 扬雄讨论了语言与书籍传播功能的不同，认为：“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㫚㫚，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4] 认为书籍化语言之无形为有形，所以能够沟通古今，使我们知晓前世往事。

[4] 扬雄：《法言·问神》。

3. 扬雄非常重视书籍语言的修辞问题，认为文质彬彬是最好的，反对浮华与枯燥，认为：“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5] “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6]“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7]

[5] 扬雄：《法言·修身》。

[6] 扬雄：《法言·寡见》。

[7] 扬雄：《法言·吾子》。

4. 扬雄对当时压抑的出版与言论环境进行了隐晦的批评。他非常向往战国时期开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而对汉代政府的高压政策表示不满：“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

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1]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汉代出版活动的外部大环境。

【1】扬雄：《解嘲》。

5. 扬雄主张"文必艰深"。在《解难》里，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渊鉴类函·文章》引《法言》佚文说："或曰：圣人之经不可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

6. 扬雄的明道、宗经、征圣思想。扬雄对儒家经典极度推崇，自比孟子，强调明道、宗经、征圣。《法言·吾子》篇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在《法言·寡见》中又说："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他的思想仍然局限于儒家一隅，这也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反映。

扬雄以辞赋闻名，而其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最大成就则是《方

言》一书的编著。《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古代帝王的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輶轩使者”就是指乘坐这种车辆巡行的官吏，又叫做“行人”。輶轩使者主要代表天子出使各国，安抚诸侯；视察朝廷礼仪法度的实施情况；发号施令，接遇宾客；最重要的，还负责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以观政绩，所谓“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1]。刘歆在给扬雄的书信里记载輶轩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诗”；应劭《风俗通义》也有类似的说法。輶轩使者搜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藏于密室之中，所以扬雄就把书名定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

[1] 郭璞：《方言序》。

扬雄花费了27年时间搜集材料，寻找古代各种典籍中之记载，并访求来京的各郡国孝廉以及卫士，然后经过补充、修订，终于完成《方言》这部我国现存的最早方言辞典，并对后世的注疏等学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方言》的编辑特色或者说编纂体例主要在篇章体例、释词方式、说解术语三个方面。内容已见于第七章第五节，此不赘述。

《方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言辞典，其影响极大。《方言》和《尔雅》是古代最早的两部同义词典，《尔雅》“汇其同而略其异”，《方言》既明其同又辨其异，主要是别其空间之异及时间之异，视野比《尔雅》要广阔得多。在训诂上的价值，可使人们据之以解古代方言之义，对于阅读先秦两汉古书和证释诂训也是很重要的。

五、刘向、刘歆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后期著名的编辑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文学家。其传附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刘向能文善赋，通神仙方术，好言灾异。汉宣帝时曾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

中，敢直言。元帝初，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后受人陷害，被下狱。成帝即位，刘向复进用，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领校国家藏书于天禄阁。官至中垒校尉，年七十余而卒。传称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是西汉后期以淹博见称于世的大学者。他在学术上属于今文学派，但博综兼览，并不排斥古文经传。一生编著颇丰，有《洪范五行传》、《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五经通义》、《五经要义》、《春秋谷梁传说》、《别录》等，此外还著有很多单篇奏议、辞赋。

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的小儿子。传附刘向传之后，事迹又见《汉书·王莽传》。刘歆也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编辑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文学家。少时即通《诗》、《书》。成帝时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继其父职为中垒校尉。刘歆的博学深受大司马王莽的赏识。哀帝即位之初，王莽举歆为侍中大夫，迁都骑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刘歆继续领校群书，卒父前业。于是集六艺群书，在《别录》的基础上编著《七略》，为后世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本。刘歆在编次整理国家藏书时，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开始倾向于古文经学。开始，《春秋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当时学者仅传训诂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此章句义理兼备。等到哀帝重用刘歆以后，刘歆便建议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传于学官，遭到了太常博士的抵制。刘歆便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其书函《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的重要文献。结果引起了执政大臣的怨恨，“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1]。哀帝死后，王莽执政，刘

【1】《汉书·楚元王传》。

歆又一次受到重用，“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1]。王莽篡位后，刘歆被封为国师。地皇四年（公元23年），因欲劫持王莽，事泄，自杀。

[1]《汉书·楚元王传》。

刘向、刘歆父子是两汉时期著名的编辑家，是我国古代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在编辑出版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主持编辑整理了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对整理好的图书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分类和著录，又相继编撰了综合性的国家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他们的工作是对先秦以及西汉典籍存佚和学术发展情况的系统总结，是继孔子删定“六经”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全面地整理文化遗产的活动。他们的编辑整理活动，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如校雠学、目录学、辨伪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催生和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编辑图书的思想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总结和分析。

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西汉国家藏书的经过和步骤在“西汉时期的图书聚散与编校活动”一节中已有论述，这里主要论述他们的编辑思想和方法。

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校定的图书，从学科内容和品种数量上看，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古籍；从分类体系和校勘质量上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宏观上看，《七略》分类体系奠定了封建时期图书分类的思想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从微观上看，每一部分都有明确的书名、篇名、作者、目录、叙录、正文和附件，全书结构齐全、字句规范，已明显不同于初创时期的书籍。刘向等人的工作已经完全具备编辑图书的性质，所以刘向父子称得上是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奠基人。清人孙德谦著《刘向校雠学纂微》，全面总结归纳了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藏书的编辑方法和经验，总共列举了23点，每项之下皆附有例证。虽略显繁复琐屑，但也比较详尽地反映了刘向父子整理图书的客观成果。兹转录如下：

1. 备众本　2. 订脱误　3. 删重复　4. 条篇目　5. 定书名
6. 谨编次　7. 析内外　8. 待刊改　9. 分部类　10. 辨异同
11. 通学术　12. 叙源流　13. 究得失　14. 撮指意　15. 撰序录
16. 述疑似　17. 准经义　18. 征史传　19. 辟旧说　20. 增佚文
21. 考师承　22. 纪图卷　23. 存别义

刘氏父子的编辑思想和方法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下面再从三个方面加以总结和阐述：

1. 崇经尊儒、实事求是的编辑思想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文化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也逐渐有意识地用儒家经学思想来统一诸子之学，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 已是势在必行之事。汉成帝之前，已有宣帝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汉成帝诏令刘向等人编辑整理国家藏书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用经学思想来统一学术。刘向、刘歆作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领校群书时必然会有崇经尊儒的思想，但从实际的操作中看，他们的编辑思想中也有实事求是的成分。

【1】《别录·邓析子书录》。

刘氏父子崇经尊儒、实事求是的编辑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整体分类上。将“六艺略”居首，正是学术上经学中心思想的体现。同时，将诸子之学看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2]，将其纳入儒家的经学系统。这是崇经尊儒的表现。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下，附有《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等八家史书，这既是崇经尊儒的表现，同时又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选择的著录之法。因为当时史书尚少，另立一类并不现实，所以将其附于《春秋》之下。正如梁阮孝绪《七录序》所说：“刘氏之世，史书盖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同样，比如诗歌辞赋从源流上讲应附见于《诗经》之下，却另成一类，是因为从先秦至西汉时期的文学著作数量剧增，不得不根据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另立一

【2】《汉书·艺文志》。

类，亦如《七录序》所说："《七略》诗部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谓别为一略。"这些又是刘氏父子实事求是的表现。

在对各家各派学说和具体图书内容的校雠和评价上，也能体现刘氏父子的尊经崇儒、实事求是的编辑思想。他们以儒家的经学思想为准绳，对各家学术"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对于经学著作则大加推崇，而对于诸子之学中的"苟有可以加乎国家"[1]者则予以充分肯定，对于不合经义者则有所批评。如刘向在《晏子书录》中对《内篇》六书的评价是"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对《外篇》则评价为"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所言"。他评价《列子》，一方面指出其"合于六经"，同时也批评其"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在具体的校对和考辨中，刘氏父子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辨伪工作，在不能下论断时，则存疑，如《列子叙录》说："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这又反映了他们实事求是的审慎态度。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编辑原则

章学诚把校雠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其实这一要求同样适合于中国古代的其他"治书之学"，编辑学也理应如此。《校雠通义·序》说：

>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章氏认为古代学者中真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寥寥无几，而刘氏父子却是这一传统和原则的开创者，足见推崇之高。从实际情况来看，刘氏父子在编校、著录图书中，的确贯彻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这主要反映在《别录》与

《七略》二书的分类体系和评介内容上。

在刘向、刘歆之前，庄子、荀子、司马迁等都比较注意区分学派，重视学术源流。这些都对刘氏父子有一定的影响。刘氏父子将当时编辑整理的图书分为六大类，三十八种，并非出自主观定出的标准，而是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考虑到了图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评介学派和图书内容上，必分门别类，溯其渊源，析其内容，并总结特点，真正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原则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治书之学"的一大优良传统。由于刘氏父子贯彻了这一原则，从而便于"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发挥目录作为治学门径的实际效用，所以历来为学者所推崇。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按：实为《别录》、《七略》之删节），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1] 龚自珍《六经正名》说："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

3. 互著与别裁的编辑手法

为了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刘氏父子在编辑著录图书中，根据学术流派的实际情况，在编辑方法上，灵活地采取了互著和别裁的手法。所谓"互著"，又称重复互著之法，即将内容可属于若干门类的图书在有关各类中同时著录。这种著录方法的特点是不避重复，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学术流派的特点和具体图书的内容。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说：

> 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章学诚并举例说：

《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既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源流，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

所谓“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即将一书之内自为一类的内容分析著录。《校雠通义·别裁》说：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书，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者。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轻重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后世学者对刘向、刘歆是否采用了“互著”和“别裁”的编辑著录方法，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刘氏父子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著录，其编辑方法符合后世的“互著”和“别裁”之法。这也充分说明了刘氏父子编辑著录图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六、王充

王充（公元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的著作有《政务》、《讥俗节义》、《养性书》和《论衡》四种，前三种已经亡佚。《论衡》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是其中的一些篇章，例如《艺增篇》、《超奇篇》、《佚文篇》、《书解篇》、《案书篇》、《对作篇》、《自纪篇》等，都包含有他对文学、艺术、书籍等方面的观点与思想。

王充学术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大胆的怀疑精神，也就是“疾虚妄”，反对各种附会之说。在他的心目中，知识是最重要的，时人奉为经典的“五经”，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段历史知识，与当时重人伦、重教化而轻视知识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谢短篇》中，他说：

>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者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的出版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性对待书籍内容，不迷信于书，打破文字崇拜的神话。古人对文字记录大多深信不疑。在《书虚篇》里，王充认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这种态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的张扬，大胆怀疑已有的出版内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读者对新奇事物、惊世骇俗之说的关注与乐意接受，注意到了读者的心理特征，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对学术著作的推重。作为思想家，王充认为，历史著作要高于儒生的经传，政治论文又高于历史著作，哲学论文则是最高层次的著作了。在《超奇篇》里，王充比较了不同著作的作者，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儒生说名于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

3. 对出版的社会作用的强调。王充非常重视出版的社会功用，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这也是王充"疾虚妄"精神的一种体现。他认为书籍与文章必须为社会服务，有益于社会大众。《对作篇》云："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

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文章必须是因为一定的问题做的，反对空谈与奢谈。一方面，文章应该用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辨明是非，传播真理与真相；另一方面，应该通过文章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认为文章“岂图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1]

[1] 王充：《论衡·佚文篇》。

4. 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重视。形式与内容是书籍的两个构成要素，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王充有着精辟的见解。《书解篇》说：“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超奇篇》又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华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借用根株与荣华、核实与皮壳、羽毛与肢体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是王充并没有简单地否认形式的重要性。在《书解篇》中，王充认为：“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丘，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为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5. 主张创新，强调独创性。王充反对一味地袭古、仿古，主张跳出经典传注的狭小圈子，进行独创性的活动。他不认为今不如昔，认为不应该厚古薄今。这在儒术定为一尊、尊经崇古的年代里，无异于平地惊雷，被视为痴人呓语。他指出，古代作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够创新，发扬创造精神，“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自纪篇》说：“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

必相似；各所以禀，自为佳好。”又说：“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6. 主张语言的通俗易懂。王充反对艰深的文辞，认为书面文字应当是口头语言的记录，所以要言文一致，语言要通俗易懂，便于读者接受和理解。这一点与扬雄的主张针锋相对。他在《自纪篇》中说道：“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明，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遗灭，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

7. 开放的思想体系。王充对当时的博士制度表示了不满，认为所谓“师法”实际上钳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谢短篇》云：“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斯则坐守，何言师法，不颇博览之咎也。”他充分认识到了博士系统的封闭性，在《别通篇》里说：“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章句之儒，不览古今，论事不实。”又说：“或以说一经为是，何须博览？夫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颜渊曰：博我以文……颜渊之曰博者，岂徒一经哉？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视，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在《超奇篇》里面，王充把当时的读书人分为四等，并以博士系统的儒生为最下：“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缀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其相过远矣。”

七、班固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



班固画像

人。《后汉书》记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其父班彪，字叔皮，曾经续司马迁《史记》而作《后传》65篇，“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去世以后，班固继承父业，着手编撰《汉书》。结果，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而入狱，后由于其弟班超上书得以赦免，并且被任命为兰台令史，一面点校秘籍，一面编修国史。此后经过大约20年的努力，到班固去世时，《汉书》基本完成，剩下的《天文志》以及八表由妹妹班昭和马续完成。

《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起，到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止，包括王莽新朝在内的230年历史，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常常拿《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对两者的优劣进行了充分的论说。其中对《汉书》赞赏的颇多，《史记》到后来才逐渐为人们所称道。但如果仅就史学上的影响而言，《汉书》要大于《史记》。

《晋书·张辅传》里说到班固有三点不如司马迁的地方：“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之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损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班又因循，难易亦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

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实，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卷40又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诡激，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刘知几的《史通·六家》也对两书作了评价：“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常也。”其实，两者是各有所长。因为一个是通史，一个是断代史，所以不免有一些侧重，有一些不同。

同为史家，班固对司马迁也进行了评价。班固《典引序》引汉明帝的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时，非谊士也。”班固还说：“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义，亦无以加。”一方面对皇帝阿谀逢迎，另一方面，对司马迁的看法也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班固一方面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另一方面认为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以及文章有不符合儒家经典之处等，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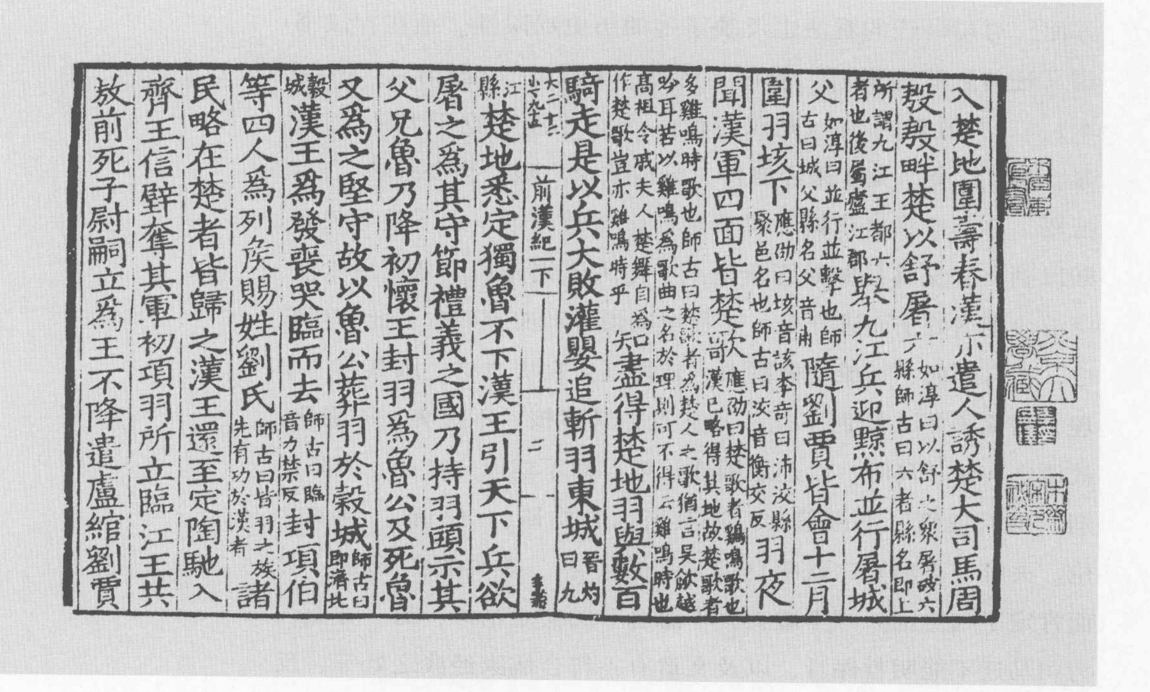
映了班固的文化保守思想。

《汉书》的编辑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尊汉思想。《汉书》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在时间上，以一个王朝的兴亡为记录的年限。客观上说，这有利于集中反映一段历史的全貌和历史规律，并随后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与传统。但是，另一方面，班固之所以要作《汉书》，是由于他的尊汉思想，因为尊汉，所以把《汉书》写成了断代史。这也可以解释他对司马迁的批评的思想根源。

《汉书·叙传》自述了班固写作《汉书》的目的："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由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

宋刻元印本《汉书》


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
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
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
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洨音衡交反）羽夜
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鷄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歌越歌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特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
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
前漢紀一下　二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
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
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
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穀城即濟北）
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
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
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
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
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

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可见班固作书的目的是为了尊汉，并非特意有断代的思想。司马迁是抱着天下为公的思想著书的，与班氏父子的天下为汉思想截然不同。“史公所面对的是人类整个的历史，汉代仅为此整个历史中之一阶段，并无亲疏厚薄可言。他著史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命运着想，历史皆在人类命运之前衡定其是非得失，绝非在汉代统治者面前，衡定其是非得失。”[1]

这里既有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写作目的不同的原因，也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司马迁生长于未立“五经博士”以前，思想广博而生动，自由而独立；并且能够四处游历，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班固则不同，出生于“五经博士”系统确立以后，“五经”的精神已经凝滞而僵化，学问、读书，不再是为了纯粹的求知，而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功利之心大增，求知欲望消退。所以，司马迁能够写出《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不尊汉，列刘邦于项羽之后，班固则认为这些都抵触经艺，有门户之见，而对汉代尊崇至极。两个人的思想境界有着极大的差异，眼界也大不相同。

2. 去世家，把本纪变为编年史。由于汉代的实际政治情况，分封的诸侯大都飘零殆尽，所以不再列世家。在《汉书》里，本纪虽然仍然以皇帝为记录的主体，但是在内容上已经从皇帝个人向国家大事上侧重，带有编年史大事记的性质，使纪传体史书纵向描述稍嫌薄弱的缺陷得到补充。

3. 把《史记》的“书”改为“志”，并加以丰富和完善。班固在《汉书》里增加了《地理志》、《食货志》和《艺文志》三志。其中，《地理志》的创建意义重大。清代的王远孙在《汉书地理志校本序》中说：“班氏孟坚，创作《地理志》，上续《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迄乎平帝元始二年，以为西汉一代之志乘。又本朱赣，条其风俗，考其山川，则行乎地者可以施其政。后世之言地理者，悉祖是书矣。”完整地介绍了西汉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地对郡县分布、人口统计

[1]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3，28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出了科学的记录。此外还有现耕田与可耕田以及不可耕田的数字，带有经济地理的意味。其成就是非常突出的。

书籍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得以传递的重要载体，是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重要材料。对书籍的保存就是对文化的保存，对历史的保存。班固取刘歆的《七略》为《汉书》所撰的《艺文志》具有保存文化的重大意义，是后世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经过班固丰富后发展的《汉书》十志，全面提供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制、刑法、天文、地理等方面兴废沿革的资料，使纪传体史书对历史发展的横向描述更加充实、完善。

八、许慎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 (今河南郾城) 人，生卒年不详。据清人考证，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 (公元58年)，卒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历任郡功曹、洨长、太尉府南阁祭酒等职。许慎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和编辑家。他年少时曾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问学，博通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汉安帝永初四年 (公元110年) 许慎曾与刘珍、马融等50余人校书东观。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已佚）、《孝经古文说》（已佚）等。其中，《五经异义》是一部罗列、比较、论断今古文经说的重要著作。许慎撰写《五经异义》是私论经义之始，具有“正五经异同”的作用，在图书编辑整理方面有一定贡献。许慎在编辑出版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说文解字》。

许慎画像



许慎撰《说文解字》大约始于永元八年（公元96年），脱稿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许慎病中，才让他的儿子许冲献给朝廷。其间共历

22年，可见用力之久，研究之深。

许慎撰《说文解字》，具有明确的编纂目的：首先是为了更正今文经学的谬误，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许慎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今文经学开始走向衰落而古文经学逐渐兴盛的时候。当时两派针锋相对，互相辩难，相持不下。许慎撰《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正确解释文字，以发扬“五经之道”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其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也说许慎撰《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担心“巧说衺辞，使学者疑”。他自己也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道：

>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

许慎撰《说文解字》的第二个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当时学者任意说解文字的混乱现象，通过考订文字之源来准确校读前代文献。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中，严格贯彻了古文经学家“考字以通经”的基本治学原则。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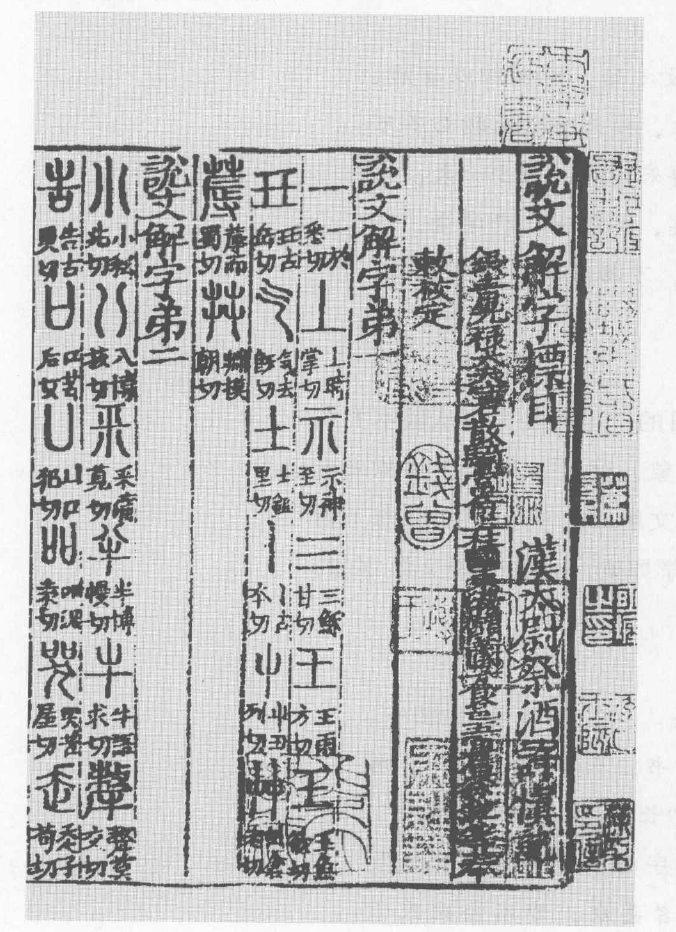
> 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

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正是为了驳斥时人尤其是今文经学家“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的谬论，许慎才发凡起例，明辨文字源流，写下了不朽的名著《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也是今古文经学论争的产物。当时学术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全面阐释汉字的形、音、义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字典。仅靠《仓颉篇》、《凡将篇》、《尔雅》这些字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编纂《说文解字》这样的字典也是时代的需要。就这样，时代的需要和许慎的努力，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字典。

宋刻元补修本《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共14篇，后有许慎的叙，“述其著书之意”。全书共收9 353字，重文1 363字，共10 516字，解说之文凡133 441字，几乎囊括了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所有常用汉字。全书按部首分类法编排，对所收的汉字的音、形、义进行全面分析和解释，是一部体大思精、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著作。它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重要成就和意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

在许慎编纂《说文解字》之前，我国字典的编纂工作一直处在萌芽状态。虽然在此之前的很多学者都编纂了大量的字书，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籀篇》，秦始皇时期的《仓颉篇》、《爰历篇》，汉代的《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滂熹篇》，等等。但这些字书都只是把汉字集中编排在一起，用韵文的形式组成句子，以便于初学者记诵。其编排体例和功能都未能脱离识字课本的功能，仅仅是字典的雏形。至于另一部重要的字书《尔雅》，虽然产生年代较早，但它不仅收字少，说解也没有《说文》详细，更没有对文字的字形和字音加以分析，所以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说文解字》则与前代的所有字书有着本质的不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第一次对当时现存的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描写，并首创部首分类法，把汉字按偏旁归纳为540个部首，按部首来编排汉字，从而编纂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文解字》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字学和字典编辑学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和辞书编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 从编辑方法上看，《说文解字》吸取了先秦以来文字研究和字书编纂的成果和经验，首创部首分类法。

《说文解字》以前，古代典籍中也有过解说文字的记录，如《论语》“政者，正也”，《孟子》“庠者，养也”等。但多是一些零星的解说，不成系统。至于字书，多是三字句、四字句或七字句的有韵识字书，对汉字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说，在编排上也没有严格的章法和体例，缺乏字典应有的检索功能。许慎吸收了前人编纂字书的经验和成果，全面研究了汉字的形、音、义，发凡起例，首创了按偏旁给汉字分类的部首编排法，意义十分重大。

《说文解字》的编纂方法是依据“六书”原则，将9 353个汉字（另重文1 363个）按540个部首编排。每一部首下统摄若干文

字。部首就是字的偏旁，就是字的形符。它是把文字的形符抽出来作部首，并把带有相同形符的文字归入部首之下。每个部首下都统摄若干个文字，每一个文字都是用小篆写成，然后用汉隶解释它的形音义。部首分类法的创立，使辨明每个汉字的字义变得较为容易。只要看到某个汉字属于某部，就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属性和类别。如部首“广”表房舍，因此可以判定库、府、庭等字都是房屋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避免误认、误读和误写。此外，部首分类法也易于检索查找，提高了人们利用字书的效率。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将这种编排方法总结为“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并对其内涵和作用予以详细的解释：

> 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许慎创造的这种“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分类编排法，对我国辞书的发展影响甚大，后世以部首分类的字典在各种分类字典中所占比例最大。直到今天，《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仍然使用部首分类法。

3. 在具体分析和解释文字中，集中、系统地阐述并应用了“六书”理论，为后来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钥匙。

我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文字学研究中，归纳出了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称“六书”。“六书”理论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汉代。不过，在许慎以前，只有“六书”和“象形”“指事”等名目，而没有具体的解说。如《汉书·艺文志》和《周礼·地官·保氏》的郑众注文中，都曾提出“六书”的具体名称，名目大体一致，并被认为是“造字之本”，但两书的作者都没有对“六书”理论做进一步的解释。至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方统一“六书”名目，而且一一下了定义，举了例子。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道：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六书说，名称、次第与前人皆不相同，比较起来，以许意最为精确。许慎还用“六书”理论具体地分析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汉字，在书中对每一个汉字都注明或“象形”或“指事”或“从某，从某”或“从某，某声”。可以这样说，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六书”理论才算成熟。《说文解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创立。

4.《说文解字》具有严格的训释体例，在字典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说文解字》在分析解释汉字的音、形、义时，具有比较严格的程序和规范。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解释其义，次训其形，后训其音，有别字或他说者则补充之。如“元”字篆文下云：“始也。从一兀声。”段玉裁注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至于征引别说，则如“祝”字下云：“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段注曰：“此字形之别说也。凡‘一曰’，有言义者，有言形者，有言声者。……凡引经传，有证义者，有证

形者，有证声者，此引《易》证形也。”《说文解字》在训释方法上，运用了形训、义训和声训三种方式，或单用其中之一，或综合运用三者来解释，在训诂学上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说文解字》的训释格式和方法，大多为后世的辞书所遵循，影响相当大。

5.《说文解字》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反映了许多古代社会历史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说文解字》中，不管是部首字还是部中字，所有字头的字体全都采用小篆。如果一个字的古文或籀文跟小篆不同，就把古文或籀文列在这个字的说解之后，并加以说明。如果一个字有或体、俗体、今文等，也作同样处理。这些特别列举出来的古文、籀文、或体、俗体、今文等，通称为“重文”。许慎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在于探求汉字的发展源流，力求得到汉字的本来意义。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保存了大量汉代以前的古文字，为后人解读先秦文献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说文解字》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可谓包罗万象。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曾述及《说文解字》的内容：

> 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今天看来，这段评价也不为过。《说文解字》中，的确蕴藏着大量有关古代社会和自然界以及天文历法、矿产冶炼、植物医药、农业手工业等多方面的资料。如书中有关书写材料的字均为竹头：简、策、篇、簿、笺、籍等，说明至许慎时纸尚未普遍应用。又如女旁所摄之字，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线索。凡是姓氏都带女旁：姜、姚、嬴、姬等，是母系氏族社会给文字打上的烙印。像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是随处可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文解字》已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字典，而且是反映汉代以前社会

面貌的“百科全书”。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研究者代不乏人。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应劭著《风俗通义》，都曾多次称引其书。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解字》。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解字》。五代、北宋时期，徐铉和徐锴兄弟精心校勘与研究《说文解字》，撰成校注本。到了清代，“汉学”兴起，许慎的地位空前提高，“说文学”也空前繁盛起来。研究者蜂起，有关《说文解字》的著作多达几百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四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也因之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直到今天，《说文解字》仍被很多学者看重，被认为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著作之一。正是《说文解字》的辉煌成就，奠定了许慎在中国文字学和编辑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

九、郑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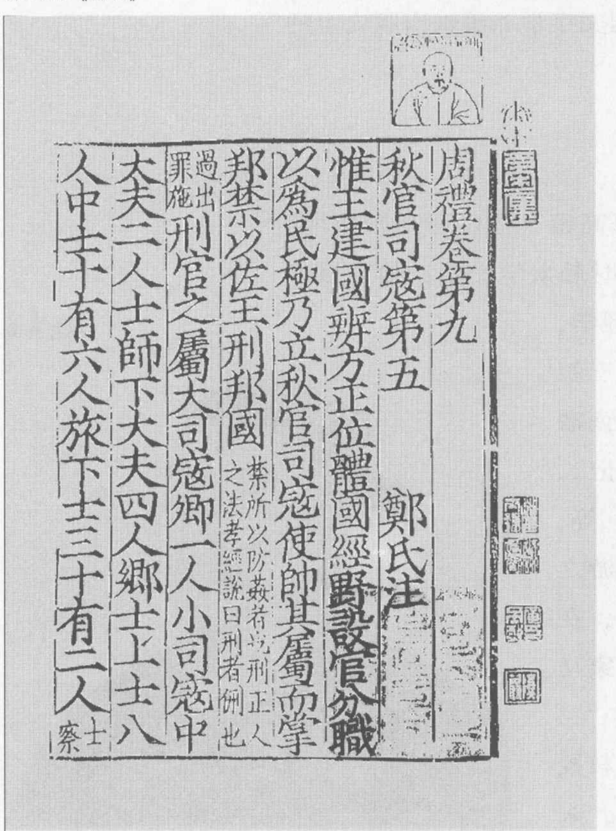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年轻时赴太学受业，师事京兆（今西安西北）人第五元先学习今文经学，“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始通古文经学。约37岁时，自以为所游之地再没有值得问学之人，就西入关中，在卢植的引荐下，师事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马融平素骄贵，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仅让自己的“高业弟子”教授郑玄。但郑玄不以为意，“日夜寻诵，未

郑玄画像



尝怠倦”。后来马融召集诸生考论图纬，听说郑玄善于天文历算，就召郑玄一起讨论。郑玄因此有机会向马融询问经书异义，问毕辞归。马融对门人感慨道：“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返回山东时，已进入不惑之年，家境贫寒，便客耕东莱，从其问学者有成百上千人。44岁时，遭党锢之祸，遂杜门不出，专修经业。当时今文经学家何休深好《公羊》学，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对此，郑玄针锋相对，“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折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东汉建立以后，范升与陈元、李育和贾逵争论今古文经学不休，经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古学遂明。可见郑玄在古文经学的发展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汉灵帝末年，“党锢”解禁，大将军何进执政，想重新起用郑玄。郑玄不就官逃归。72岁时，被征为大司农，以病为由，请求还家。建安五年病卒，享年74岁。郑玄去世以后，门生相与编撰郑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仿照《论语》作《郑志》八篇。

郑玄注《周礼》


周禮卷第九
秋官司寇第五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
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孝經説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
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
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士察

郑玄所处的时代，正是经学论争十分激烈的阶段。他一生无意于仕途，一心从事教学与著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史载，他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以及《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谛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

余万言。著书立说的成绩如此巨大，远在其师马融和两汉任何一位经学家之上。郑玄的解经之作，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四种，其中《周礼注》12卷，《仪礼注》17卷，《礼记注》20卷，都是直名其书为注，另有《毛诗笺》20卷。其他著作都已亡佚，仅有后人的辑佚。今古文经学在学术上的长期分歧和争斗，经过他的努力而趋于融合了。范晔评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说：

>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指东汉］，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

【1】《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因此，他被看成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被后世称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郑玄的成就决定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图书编辑家。他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在长期的注经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编辑整理方法，成为注经的典范，为历代学者所遵从。郑玄在注解和编撰图书方面的特点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打破今、古文经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兼综博采。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别，两派之间，壁垒森严，长期争论，形同水火。西汉时期，各派经师往往专守一经，从西汉末年以后，学者开始兼综博览，对以前的孤陋寡闻有所突破。但今、古文之间的界限仍十分清晰。皮锡瑞言当时两派各守门户的情形说：

> 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雠，不

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1]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

郑玄注解经书时，对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宗派之争有所突破。他虽然立足古文经学，但也充分吸收今文经学（包括谶纬之学）的研究成果，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自成一家之学。他的这一做法，体现出网罗众家、融贯互证的宏大气象。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的注经方式，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有比较全面的概括：

> 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案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正因为郑玄能突破门户之见，充分吸收前代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才能后来居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2. 在长期的注经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训释术语和注解体例，为后世所遵从。

郑玄注经，遵循的是古文经学家治经的普遍程序，即从文字训诂入手来探求经书的义理，用郑玄的话来说，就是“述先圣之元意”。他深通文字训诂之学，不仅校正读音，训诂名物，解释经意，还对经书中的误字、脱字、衍字和错乱都予以校对和更正。在编校过程中，他采用了丰富的训释术语。在他之前，经学家在校书时已采用了一些常见的术语。郑玄对此不仅有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另外，他还独创了很多校释术语，在古籍的校对方面贡献甚大。齐佩容《训诂学概论》第十二节“术语”中，曾将训释术语所表示的训诂种类，归纳为40种，其中郑玄注解的成果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某，某也”，“某犹某也”，“某谓某某也”，“某今谓之某”，“古谓某为某”，“古曰某今曰某”，“某若今某”，“某所以某也”，“读若”，“读为”，“当为”，等等，都在郑玄的手中得以发展和定型。对此，段玉裁在为臧琳所作的《经义杂记序》中评价说：

> 校书何放［案：“放”同“昉”，起始之意。］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成帝时刘向、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向卒，歆终其业，于是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郑君之学，不至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学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已为之补正。凡拟其音者，例曰读如、读若，音同而义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曰读为、读曰，谓易之以相近之字而一起乃瞭然也。凡审知为声相近、形相似二者之误，则曰当为，谓非六书假借而转写纰缪者也。汉人作注，皆不离此三者，惟郑君独探其本原。

在注解上，郑玄对异文或择优而从，对有把握的，“便下己意”；或同时并存，留待后人解决，如《礼记·乐记》子赣见师乙一节有错简现象，郑玄并未径改，而是因其旧文，在注中作了说明。像这样的例子在郑注中十分普遍。这充分表现了郑玄的审慎态度。对郑玄的这种做法，《仪礼·士冠礼》“布席于门中”句下贾公彦疏总结道：

> 郑注礼之时，……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

今人孙钦善解释曰：“所谓‘逐义强者从之’，即择优而从；所谓‘互换见之’，即注出异文。”郑玄的这种注解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因此常为学者所称道。

3. 对“三礼”的注解特别精湛，开创所谓的“三礼之学”。

郑玄注经，于“三礼”之学用力最深。“三礼”学是郑玄“通学”最精彩的内容，他全面注释“三礼”，融会贯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许多疑难的问题。汉代礼经有师授而无注解，马融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词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直到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后，才确定下来。而《礼记》49篇的选辑本也得以独立成书。郑玄《周官注》来源于马融；而注《仪礼》，是校读“古经”的成果；注《礼记》，则是独创的新说。从前，三种礼学经典分别相传，自郑玄“通为三礼”后才开始有所谓“三礼”之学。郑玄在“三礼”方面的努力使礼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专门之学，其影响至为深远。

此外，郑玄还撰有六经概论性的理论著作，其成绩并不限于注释和校勘，对群书和学术流派还有综论和考辨。他还撰有《天文七政论》、《鲁礼谛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论述性的著作，对经学的统一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努力，两汉经学在东汉末年最终趋于统一。后人称赞道：

> 郑君先通今文，后通古文。……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而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郑君徒党遍布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1]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

郑玄以民间学者的一己之力，遍注群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汉末年经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的混乱局面。他的著述活动，既对两汉经学著作的编辑工作有所总结和发展，同时又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在经学图书编辑史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称郑玄为两汉时期最杰出的经学图书编辑家。

第十章　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

出版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具有自身规律的体系结构。出版的发展总是与社会息息相关，既受到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因素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制约，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对社会、对出版所处的具体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社会性是出版活动最根本的属性。通过对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关系的探究与分析，不仅可以窥测到中国出版活动产生的艰难历程，更可以对当代中国出版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认识。可以说，一部先秦两汉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两汉的社会与出版关系史。本章将从先秦两汉出版的地位、出版思想及特点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节　先秦两汉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

先秦两汉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它的奠基意义与首创意义上。就奠基意义而言，这一时期是文字产生并逐步成熟，私人著作大量出现，各种思想相互撞击，图书传播活跃，文化通过私学开始普及，笔墨与纸张开始出现，甲骨、石刻、竹帛、手抄本等多种传播媒体相继出现的阶段，为以后出版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就首创意义而言，我国的第一部字典，第一部历史著作，第一部诗歌总

集，第一个出版机构，第一批书店，第一批藏书机构与藏书家，第一批编辑出版家等等均在此一时期出现，为后世出版工作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许多标准一直为后世所遵循。

先秦两汉还是中国社会、文化、民族形成的奠基时期，也是出版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关键时期。可以说，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成型时期，对后世的文化、政治、社会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以后几千年的文化史与出版史中，处处都有先秦两汉文化与出版因子的影子。先秦两汉出版因此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先秦两汉时期的积累与开辟，后世的出版工作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出版史的写作中，一定要观澜溯源，给后人展现一部完全的出版史，而不可切断各个时期的历史联系。

具体而言，关注中国出版的形成时，我们应该论及以下几点：

一、从神本到人文的社会思潮

《礼记·表记》在对比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思潮时，准确地指出了商代社会的特点："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的确如此，从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文献的记载看，商代社会有着浓重的神本主义倾向，事事祭祀，时时祭祀，甚至商代以"祀"表示"年"。他们对上帝神、祖先神与自然神进行祭祀，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周祭"制度。甲骨文中出现的祭祀方法和祭祀名称，即有上百种之多。这一时期，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史手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1]

[1] 鲁迅：《门外文谈》。

此后，人文主义思潮开始涌现，至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已经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人们渐渐认识到，神的世界并不能干涉人的现实生活，不少开明人士开始排斥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神秘因素，而开始重视"人"的力量。《荀子》中就有大量这样的言论，例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亡。""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

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而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人文精神的普及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保证，为出版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

史由于对文字的掌控、对书写权的掌握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就史所记录的内容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由神向人的转变，由宗教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转向。“我国古代文化，由宗教转化而为人文的展开，是通过古代史职的展开而展开的。文化的进步，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史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是古代文化由宗教走向人文的一道桥梁，一条通路。……欲为中国学术探本溯源，应当说中国一切学问皆出于史。”[1]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3。

二、从开放到专制的文化与出版环境

在这一时期，文化与出版环境经历了从开放到专制的历程，出版事业也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勃兴和第一次重大挫折。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有着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空间，为出版事业的第一次勃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对出版事业的重大打击，许多典籍由此灰飞烟灭。紧随其后的是楚汉之争期间项羽进入咸阳后的咸阳大火，将秦朝典藏的书籍毁于一炬，比秦始皇的焚书更为严重。汉代取消了挟书令，但是随着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以及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的官方学术思想的确立，又人为地使出版的范围狭窄化，固定化，变相地摧残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并对后世政府的图书出版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政治对出版的严重干预已经在这个时期表露无遗，这也是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

三、从记事符号方面看，已发现的最早的系统、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朝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文字可说是

人类文明中一座最为古老的纪念碑，是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前提。文字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语言传播在时空上的限制，还扩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直接推动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对出土的甲骨文的并不十分充分的研究就已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可以说，文字一产生，就已经凸现出了它的文化积累与传播功能。而文字的出现，正是出版产生的一个最为基础、最为必要的前提条件。据统计，甲骨文使用的汉字有约5 000字，而十三经使用的汉字单字数量也不过6 544个。从商代后期到周朝末年，一般使用的汉字数量，很可能一直在四五千字左右徘徊。直到现代，常用文字数量也还是四五千的样子。而根据统计，掌握了3 800个汉字，就能够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左右。掌握了5 200字，就能够阅读99.99%的书刊内容。根据另外一种统计，4 990个汉字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几乎所有的词。另外，甲骨文还具备了“六书”中所列举的构字法，可见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秦代进行了文字统一的工作，汉代文字又经过简化、规范，进一步发展。书写符号的高度成熟也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竹木是纸张发明以前使用范围最广泛的文字载体，简牍制度是最早的书籍制度

从春秋时期开始，简牍就已经开始在文化传播方面扮演起重要角色。笔墨的使用也在这个时期得到普及。大量的文化典籍通过简牍四处传播。一些人对这些出版物如此爱不释手，以至于去世以后还要在墓穴里摆放大量生前阅读过的书籍，可能是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读书的快乐吧。这些简牍的出土又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牍制度还是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之一，它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书写形式对中国以后长达两千年的书写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批从事抄书职业的“佣书”为书籍的流传作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出土的竹简最早的属于战国时期，

但是竹简的使用历史要远远早于这一时期。有关竹简保存方法的记载，直到汉代才见于典籍。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杀青是竹简防腐的主要技术手段，到了汉代才逐步完善。由此可以想见，汉代以前的竹简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大部分都没有传诸后世。

据专家测算，商朝时，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今天高出大约2度，冬季则高出3到5度，相当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从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大象等喜暖动物的遗骸来看，这种气候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当时河南的淇水流域和陕西的渭水流域都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今天河南博爱一带仍然以产竹著名。可以说，商朝的疆域内竹子茂盛，商朝人使用竹子作为文字载体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龟甲主要是从南方进贡过来的，数量不能够保证，并且龟甲、兽骨的整治程序要比竹子复杂得多。从简易性来判断，当时的人们应该更多地使用竹简，而不是甲骨来记录文字。

考古发现的一些甲骨镶嵌有宝石或其他装饰品，说明甲骨并非是完全符合实用目的的，它有一定的象征性，可能是当时地位与权势的象征。甲骨文记录内容的狭窄，说明其使用范围的有限。而迄今出土的简牍的记录内容则丰富多彩，文体与甲骨文截然不同。极少数甲骨文具有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极富有文学意味，已经颇注重语句的表达，即书写内容的形式美。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商朝绝不仅仅只有甲骨文一种文体，记录的载体也不应该仅有甲骨一种。

五、中国最早的一批文学与历史典籍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学术环境的宽松，使得大量对中国以后的文化与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元典”，如《诗经》、《尚书》等纷纷出现，这不仅

标志着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预示了出版的繁荣。而其他文献的逐渐丰富则为以后的出版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出版资源。编辑活动也随着文献的增加与流传出现了，孔子的先人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编辑者。从周朝开始一直持续到汉代的“采诗制度”也客观上促使了编辑活动的出现。这些书籍的编辑与传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又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诸多文化成果通过书籍得以保存于世，使得中华文化的基因，诸如“仁”、“礼”、“爱”等，得以遗传，造就了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依旧年轻的辉煌。《春秋》、《史记》、《汉书》的出现则为以后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榜样，也奠定了中国文化以历史研究为主的特色。先人曾言，我国以后的各种文学样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完全具备，这的确不是妄言。

六、学校作为大众教育的重要机构于这一时期出现

夏商周时期的学校主要为贵族培养子弟，平民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力。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势力衰微，学术向民间转移、扩散，不少明哲之士纷纷设立私学，延徒授学，造就了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不少人以文学求仕，而孔子明确的教育目的也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学校的兴起造成知识的普及，为后世出版的发展奠定了人才与社会基础。

七、藏书丰富，出现第一批藏书家

这一时期随着书籍数量的增加，藏书数量也多了起来，并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藏书家。《墨子·天志上》记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韩非子·五蠹》云：“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可见许多国家都有藏书。还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还

出现了惠施等一批藏书家。藏书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书籍流传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以更多的途径得以保存、流传，不至于轻易被毁灭。所以，孔子才会说“礼失而求诸野”。

八、最早的图书编撰机构出现于汉代

最早的图书编撰机构成为以后的馆阁制度的渊源，在中国出版史中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一个趋势，就是工作方式从分散到系统，工作流程从简单到复杂，工作效率从低下到高效。政府编纂与出版机构的出现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方面标志着出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系统生产的趋势，出版机构开始成为出版主体，另一方面又标志着出版活动开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出版机构出现的则是专业出版工作人员的出现，从此，出版活动开始逐步从著述活动中独立出来，走向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出版机构的出现也与秦汉帝国的文化建构、文化统治有关。

九、编辑思想与出版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

从最初的尊鬼事神、充满神秘色彩的自发的出版意识，“简其语，齐其句，谐其言”的编辑标准，到后来鉴于往事、资于政道的自觉的出版思想，考镜源流、不饰恶、不虚美、秉笔直书的编辑思想，勾勒出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大体走向与文化发展的趋势。出版物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标准，趋于规范化，形成了成熟的简牍制度，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编辑出版的理论建设上，目录学在汉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刘向、刘歆父子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七略》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

可以说，先秦两汉出版史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与启蒙作用，具有其他历史时期的出版活动不可比拟的原创地位。

第二节 先秦两汉的出版思想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出版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版"字已经频频出现，但由于出版自身的发展尚不成熟，整个社会对出版的认识水平还很有限，所以人们关于出版的论述主要还包含在有关《诗》、《书》等文献典籍的论述之中，与文学批评、美学评论、哲学思想混杂在一起，并不专门以"出版"为评论、探讨的对象。但是通过对这些思想的分析，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当时人们对出版功能、出版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因为这些典籍正是通过出版活动得以流传并发挥作用的。这一时期的出版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教化、美刺、尚用、流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个方面。

一、教化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道德伦理的重视，中国的出版与文学一样，在产生之初即非常重视自身的教化作用。诸子对此多有论述。例如荀子就这样认为：

>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
>
>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氏之璧，井田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2]

【1】《荀子·儒效》。

【2】《荀子·王制》。

《荀子·乐论》中还强调了《诗》、《书》等经典作品的出版与传播具有"移风易俗"和"感人（即教化）"的功效。

孔子对这一问题也有论述。《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阳货》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兽、鸟、木之名。”兴，《集解》引孔安国注：“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感发志意。”也就是对读者的启发、陶冶作用。观，《集解》引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云：“考见得失。”也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群，《集解》引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云：“和而不流。”也就是教化、教育功能。怨，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美刺功能了。

《诗》通过传播，可以教化人心，反映社会，使鲁莽草鄙之人成为国之列士。不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非常重视典籍的教化作用，并希望通过典籍的传播和人们的学习，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

二、美刺

与教化相对应的就是美刺思想了。教化是从上而下，而美刺则是自下而上的传播与影响。美刺思想起源较早，西周时期的诗歌里就有所反映：

>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1]
>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而心，以蓄万邦。[2]
>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3]

【1】《诗经·陈风·墓门》。

【2】《诗经·小雅·节南山》。

【3】《诗经·小雅·巷伯》。

《左传》中此类记载更多。襄公十四年记载：

>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国语·周语上》记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公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美刺的形式既可以是口头传播，又可以通过出版物进行书面传播，史官要献上"书"，士人则要"传言"，各个官员各司其职，做到下情上达。出版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了。

三、尚用

由上面两个思想，就自然生发出了尚用的出版思想。尚用就是要追求出版及出版物的实际效用，期望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期望人们通过出版物的流传与对出版物的学习来改变社会现实。《墨子·非命下》就认为：

今天下之君子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利也。

韩非子也强调实用价值，《韩非子·亡征》云：

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

孔子强调要通过对《诗》的学习，提高个人的实际能力。《论语·子路》云：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春秋战国时期《诗》的使用极其频繁，在各个场合赋诗的记录比比皆是。尚用的观点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客观总结。

四、流传

文字产生之初人们就注意到了它的向后世传播知识的作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出版物的流传非常重视，特别是纵向传播，这与当时人们的重名思想密切相关：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2]

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3]

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4]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5]

而名誉与思想的最可靠流传方式就是通过文字、通过书籍传

【1】《论语·卫灵公》。

【2】《老子·道经》。

【3】《庄子·刻意》。

【4】《墨子·修身》。

【5】司马迁：《与挚伯陵书》。

播当世，传之不得则退而求传后世，以待知音：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1]

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2]

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

这种思想一方面与当时学者的思想得不到赏识的社会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横向传播的不发达有关。而重名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五、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先秦两汉时期人们最关心、也讨论较多的问题。受到尚用、教化、美刺等作用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出版物以及文学作品的内容，即"质"：

子曰："辞达而已矣。"[4]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5]

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6]

但是仅仅有了思想、有了"质"还不够，还要有文采才能够为人接受。孔子就认为：

[1]《墨子·尚贤下》。

[2]《墨子·兼爱下》。

[3]《史记·太史公自序》。

[4]《论语·卫灵公》。

[5]《韩非子·解老》。

[6]《墨子·修身》。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

【1】《论语·雍也》。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2]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针对汉代扬雄的文必艰深的观点，王充提出了文字要易于理解、浅显易懂的观点：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人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遗灭，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蔽旨意？[3]

【3】《论衡·自纪篇》。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加、出版活动的活跃，出版理论逐步受到重视。由于出版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所以还没有独立的出版理论出现，有关出版物的论述总是与文学评论等混杂在一起，但是它们对当代出版的启发却是令人回味和值得咀嚼的。

第三节　先秦两汉出版的特点

先秦两汉的出版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与滥觞时期，所以出版活动就具有其他历史时期难以比拟的创新性：既有出版物形式的创新，也有出版思想、出版内容、出版机构等诸多开辟草莽、发凡起例的创造性活动。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从原始的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也同样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人文

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出版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出版活动的整个过程也从零散走向了系统化；而伴随着统治者对文化事业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不断加深，出版活动开始与政治生活联姻，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活动有如下特点：

一、创新性

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朝代、历史时期的出版活动都难以匹敌的。创新性成为先秦两汉出版活动最为突出的特点并非偶然。最早的成熟文字，最早的诗歌总集，最早的散文总集，最早的史籍，最早的出版家，最早的书籍制度，最早的出版机构，最早的出版经济，最早的藏书家，最早的政府藏书机构，最早的编辑活动……都草创或萌芽于这个关键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骨文奠定了汉字基本的造字方法，即“六书”，今天的文字有不少还和甲骨文有着相似的形体；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由政府编撰而成，后又经过孔子的编辑整理，成为最早的儒家经典和古代中国出版最频繁的书籍之一，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也产生于此时，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为后世的史学家立下了标杆；简牍制度成为中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其编连形式、书写方式等对后世书籍形式影响颇深……

出版的创新性源于弥漫整整一个时代的创新追求，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创新性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在理论上，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王充所言：

>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
>
> 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易事，三王不

[1]《论衡·超奇篇》。

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1]

【1】《论衡·自纪篇》。

二、从封闭到开放

出版体系的封闭与开放程度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媒介的形式、内容等都密切相关。殷商时期，“尊神事鬼”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这就决定了出版内容的狭窄与单一，题材一般局限于战争与祭祀，民间的情况得不到反映。从出版物的载体看，龟甲大部分从南方进贡而来，兽骨多是田猎所得，本身就不利于在民间传播，并且制作程序复杂，带有明显的垄断色彩。甲骨文一般只在贵族内部传播，用于与上帝鬼神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出版体系。到了周初，情况有所改变：人文精神开始抬头，神本思想逐渐暗淡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的封闭局面。但是由于知识还是为少数人所垄断，学在官府的制度决定了出版体系依然是封闭的。然而，竹木简牍的使用使出版物的传播打破了空间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体系的开放。“采诗制度”的实行也对出版体系的封闭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私学的繁荣和学术下移，广大人民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出版物的内容也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出版体系的开放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汉代的“独尊儒术”思想又一次限制了出版体系的开放性，但是随着出版经济萌芽的出现以及私家藏书的增加，出版系统同时在官府与民间得到了发展，封闭与开放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而纸张的发明、生产力的发展又为以后出版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三、从自发到自觉

原始的出版活动是自发的，是为了和虚拟世界进行交流；是

被动的，是为了通过文字为国家祈福。民本思想的发展使得出版活动逐步摆脱了宗教迷雾，开始具有理性的色彩。周朝的采诗制度其实就是自觉的出版活动的萌芽。出版活动走向自觉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天下大乱，诸侯割据一方，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各种学说也蜂拥而出，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思想，希望改变社会现实。出版的作用开始被社会承认和接受。到了汉朝，政府更是希望通过历史了解治世之道，主动加强了对出版活动的支持。出版主体性也逐步得到发扬，一批有见解的出版物得以流传后世并产生深远影响。

四、从零散到系统

出版活动在诞生之初，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出版活动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出版的各个环节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出版活动可能要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够完成。先秦两汉时期的许多出版物都是经过多人之手完成的，通常是大家通力协作：或是同门师兄弟，或是父子相继完成。通常一个人要兼有多种角色：编辑、作者甚至图书的传抄者、保存者。出版分工还不明确。《论语》一书据记载就是由孔子的众多弟子合力编撰而成的。《吕氏春秋》一书的出版过程更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到了汉代，出现了正式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各个环节联系更为紧密，分工也更加合理了。出版活动从零散逐渐走向系统，出版效率也随之提高。

附录一 先秦两汉出版大事记

远古——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30000—前771年）

远古时期

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图画、契刻等多个阶段。文字的产生可以看做是出版活动产生的前奏。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传》）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

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500—约前2000年）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文字正式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说文解字·序》）

“黄帝轩辕氏五十年秋七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竹书纪年》）

可见先民对书籍的渴望和对文字的敬畏。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基本包含了六书造字法。甲骨文的内容以祭祀活动为主，也涉及贵族生活的其他方面，是研究商代文明的重要史料。除了甲骨文以外，青铜器、

玉石、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缣帛等都是这一时期文字的载体。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可见已经出现了原始典籍。这些典籍主要储存于宗庙内，《孟子·告子下》正义："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

这个时期的史官既负责宗教祭祀活动，又是图书档案的保管人，负责著作、加工、整理、典藏等事务。

自盘庚迁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至商朝灭亡，其文字记录主要为甲骨文，且集中藏于小屯村，以"龟室"贮藏，近现代被大量发掘，被称为"殷墟甲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周王朝实行"采诗"制度，以"补察时政"，了解民情和吏治。编辑而成的《诗》是贵族子弟的教材之一，并应用于许多场合。

周朝设置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等藏书机构。其中，龟室主要收藏甲骨文献，图室主要收藏青铜器、玉石、陶器以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收藏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等；盟府收藏盟约。保管人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

《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是周朝流行的主要典籍，为官府和私人收藏、传写、传播。

西周的甲骨主要出土于周原一带，即今天的陕西岐山凤雏村。

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迄今可考的最早的编辑者，根据《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在《毛诗》"商颂谱"及"那小序"中也有类似记载。经正考父校雠编辑的12篇《商颂》至孔子时只保存了五篇，现收录于《诗经》中。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书之事"放于孔子子夏"。他认为我国真正的校书活动，开始于孔子和子夏。据《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

‘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春 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诸侯国自立史官，对周王室的典籍则“恶其害已，皆去其籍”。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表明私人讲学之风已起，私学遍及四方各地。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

平王东迁至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开始。

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年）

秦国开始设置史官，此后，鲁、齐、郑、卫、楚、虢等诸侯国纷纷效仿。史官的担任者多为有学之士。

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

《国语》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楚太子箴（楚恭王）所习的课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等。

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

国之典籍藏于官府。《左传·襄公十一年》：“国之典也，藏在盟府。”

景王三年（公元前542年）

子产不毁乡校。

景王五年（公元前540年）

晋侯使臣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国有一个史官的后人名叫籍

谈，被讥以不知自己家族的历史。周景王对籍谈说：“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等籍谈出去后，周景王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帛书的使用始于公元前5或者公元前6世纪。《韩非子·安危篇》说：“先王寄理于竹帛。”

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载书（即盟书）……藏在周府，可覆视也。”

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

鲁哀公三年，宫中失火，命急救之。其中官府藏书按照御书、礼书等次序逐类抢出。

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

孔子去世。相传孔子整理《诗》，删修《春秋》，序《诗》《书》，并向弟子传授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战　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图书的流通范围扩大，《韩非子·五蠹》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

周安王十年（公元前392年）

墨子藏书颇丰，有书三车，尝载书云游。（《墨子·贵义》）

周显王八年至三十一年（公元前361—前338年）

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禁止图书在民间的流通和收藏，是出版史上首次禁书令。

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

秦孝公三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这是出版史上目前所见记录的第一次政府焚书事件。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

《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秦始皇命令李斯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李斯以周朝的大篆为基础，大篆由一名叫籀的太史创制，所以也叫做"籀文"，籀文笔画繁复，书写不易，李斯借鉴齐鲁等地通用的蝌蚪文笔画简洁的优点，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制出了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秦篆"，又叫做"小篆"。所谓"李斯删籀而秦篆兴"（《文心雕龙·练字》）指的就是这件事。

李斯编写了《仓颉篇》，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等识字课本，作为推广小篆的教材。

在公元前219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共有七次立碑活动。其中，有三块立于山东峄山、泰山、琅邪台。公元前218年，再次立两石于山东芝罘的东观和芝罘山。公元前218年，立碑于河北碣石，公元前211年最后一石立于浙江会稽。秦二世于公元前210年巡行全国，并在秦始皇所立的石碑上补刻文字。作为历史大事的记载形式，秦代的石刻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在咸阳大宴群臣，席间，李斯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

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于下达“焚书令”的第二年又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即所谓的“焚书坑儒”。不少学者认为“焚书”与“坑儒”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得知他派出去寻访长生不死药的术士（韩众、徐市、侯生、卢生等人）由于无法交差而纷纷逃跑，并指责“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龙颜大怒，命令抓捕这些术士，术士们互相揭发，又牵引出460多人。秦始皇盛怒之下将他们处死，太子扶苏因为对此不满而被派往北方边疆监督蒙恬修造长城。

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

刘邦率军至霸上，秦王子婴降，秦朝灭亡。

刘邦入咸阳。《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项羽焚毁咸阳的秦宫殿，大火三月不灭，所藏典籍毁于一旦。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西汉王朝开始。

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

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

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约编定于是年。

贾谊生。晁错生。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刘邦过沛，歌《大风》。刘邦卒，子刘盈立，是为惠帝。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

三月，惠帝废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

文帝时（公元前179—前157年）

造纸术可能发明于这一时期。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放马滩纸”约为公元前176—前141年间实物。

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文帝以贾谊为博士。贾谊作《过秦论》。

刘安生。董仲舒生。司马相如生。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文帝求四方能通《尚书》者，闻伏胜于焚书坑儒时，将《尚书》藏于旧宅墙壁中。现存《尚书》28篇，相传即由伏胜传授而存世。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

司马迁生。一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淮南王刘安入朝，为《离骚传》，并献其主持编辑的图书《淮南子》，帝“秘爱之”。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

置五经博士，是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始。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河间献王刘德卒。德为汉景帝之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史记·汉景十三王传》）

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武帝是年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献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数十年后，书积如丘山。

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编辑家、思想家、文学家刘安因谋反事泄自杀。安为皇族，喜聚书，曾组织门客编辑图书多种。政府征书时，曾献《内篇》、《颂德》、《长安郡国颂》等书。

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广采民歌以入乐府，是西汉政府收集编辑民间歌诗谣谚之始。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武帝封禅泰山。

司马谈卒，临终嘱托其子司马迁实现著史遗愿。

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奉命创太初历，颁行天下。

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董仲舒卒。

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

李陵战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武帝怒，以迁下狱，用腐刑。

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于孔子故宅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因用古文字写成，故称“古文经”。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古文经书的发现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争”。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史记》大功告成，“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卒于是年，或曰卒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举行盐铁会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盐铁论》。

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

大编辑家刘向生。一说生于元凤四年（前77年）。

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

“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论衡·正说篇》）。

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编辑家扬雄生。

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宣帝诏群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并亲临会议，称制裁断。这是由最高统治者出面对西汉以来所有儒家经传进行的一次编辑整理活动。

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

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

洛阳等地出现书肆，有以“佣书”而谋生者，即以书法见长，抄书鬻人，换取筹资。这是中国出版贸易正式开展之标志。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

最早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产生。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

八月，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编辑整理国家藏书之始。

刘向于整理过程中撰写《别录》20卷，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被后人视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基之作。

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

刘向卒。

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

成帝卒，刘欣立，是为哀帝。有诏撤销乐府。一说事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

四月，哀帝使刘歆继承父业，典领《五经》。

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创立中国古代图书六分法之类例。《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

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

扬雄撰《太玄》。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

班彪生。

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

长安太学附近出现槐市，每逢朔望，太学生持经书互为交易，是为中国最早的书籍交易集市。

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

王莽自称皇帝，国号新。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

文学、哲学、语言学家、编辑家扬雄卒。他著的《法言·吾子篇》中，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为中国古籍中最早提到书店的记载。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

王莽被杀，刘玄恢复汉朝，号更始。

王莽败时，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图书典籍遭到极大破坏。

学者、编辑家刘歆卒于是年。

汉更始三年（公元25年）

赤眉军攻陷长安，长安城内图书典籍再遭焚毁。西汉出版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

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刘秀称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于战乱时仍不忘征集图书。即位后"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后汉书·儒林列传》）。

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

王充生。

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

班固生。

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班彪续写《史记》。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

班彪卒。

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明帝时（公元58—75年）

建东观等政府藏书与编校机构，并设兰台令史等掌管藏书及图书编校事务。又设仁寿阁、宣明殿、辟雍、鸿都等机构，命班固、傅毅等典掌。

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编校，历时20余年。班固、贾逵、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

班固始撰《汉书》。

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

班固以私修国史获罪下狱。

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

开始组织学者撰写《东观汉记》，修撰工作终于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历时163年。《东观汉记》是东汉史官集体编撰的东汉一代的国史，是承袭《史记》、《汉书》后又一部重要的纪传体史学著作。

班固除兰台令史，主持编校国家藏书。由此编制出中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

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

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

中国始见崇佛记载，明帝给楚王刘英的诏书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慈。"（《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

班固修《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

蔡愔于大月氏请得迦叶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牟尼立像一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佛经在中国大地传播之标志。

章帝时（公元76—88年）

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

张衡生。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章帝仿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临决五经异义于白虎观。

班固撰《白虎通义》。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著名史学家、图书编撰家班固卒于狱中。其撰著《汉书》中有《汉书·艺文志》，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

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

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作后叙。《说文解字》为我国第一部字典。

和帝元兴元年（105年）

张衡精思十年，作《二京赋》。

蔡伦总结前人经验，以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制成植物纤维纸，献给汉和帝，得到推广。史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

安帝时（107—125年）

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

顺帝时（126—144年）

张道陵于四川鹄鸣山中学道，"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称"五斗米道"。此为中国道教正式产生之标志。

"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太平清领书》即最早的道经，后世称《太平经》（《后汉书·襄楷传》）。

顺帝永建二年（127年）

经学大家郑玄生。玄以一己之力遍注群经，成就斐然。史

载："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

顺帝永和三年（138年）

马融为武都太守，著《易》、《书》、《诗》、《礼》诸传。

蔡邕生。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

桓帝设置秘书监，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

灵帝时（168—189年）

河北巨鹿人张角得道教书籍《太平清领书》，事奉黄老道，并派弟子分赴各地，欲以道教化天下。太平道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道教经籍遂得以广泛流传。

灵帝建宁三年（170年）

蔡邕拜郎中，校书东观。

灵帝熹平四年（175年）

蔡邕等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光和六年（183年）刻成，世称"熹平石经"。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列传》）。

灵帝中平六年（189年）

灵帝卒，刘辩立，是为少帝。

刘辩废，刘协立，是为献帝。

曹操东归，起兵讨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至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

艰远，复弃其半矣”（《后汉书·儒林列传》）。

献帝兴平二年（195年）

李傕、郭汜交战，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两汉国家典藏全部焚毁（《后汉书·董卓传》）。

献帝建安元年（196年）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4】[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5】[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7】[清]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8月。

【8】[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

【9】[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7月。

【10】[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4月。

【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12】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13】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

【14】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15】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

【1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4月。

【17】陶秋英:《汉赋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8】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20】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9月。

【21】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2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

【25】张舜徽注:《〈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26】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

【27】张永鑫:《汉乐府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8】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29】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月。

【3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

【31】何九盈、胡双全、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

【3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33】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9月。

【34】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

【35】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8月。

【36】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

【37】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

【38】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

【39】王振铎、赵运通:《编辑学原理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8月。

【40】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

【41】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篇》,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4月。

【42】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43】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44】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45】袁行霈主编,聂石樵、李炳海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46】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4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4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4月。

【49】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50】聂石樵、李炳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51】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52】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

【53】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54】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

【55】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

【56】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57】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58】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59】吴雁南、秦学欣、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60】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6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1–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62】朱渊清:《再现的文明: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

【63】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64】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7月。

【65】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66】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月。

【67】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68】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

【6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

【70】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71】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

后 记

中华民族以其悠久辉煌的文明著称于世，出版对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出版业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缩影。《中国出版通史》是由国家级出版科研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首部出版通史，力求全面、系统、综合地反映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传统和最新成果，成为最具权威性的出版通史。

作为整部通史的首卷，先秦两汉卷自有许多难点，例如汉字的产生、图书的要素及形成、出版的起源、编辑的雏形等问题，都是众说纷纭、能引发诸多争论的问题，也是出版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这一点可以成为共识：事物的发展应该从源头讲起，研究出版要从文字的产生、图书文献的要素及成型开端。先秦两汉卷讲的是出版从无到有、奠基萌芽、逐步形成的过程。出版的起源不等于出版的完善。所以，原始的出版活动是比较粗糙的、不完善的，只是具备了出版活动的一些关键环节与基本功能。用这样的观点衡量，《逸周书》中的“铭之金版”，《黄帝内经素问》中的“著之玉版”，《墨子》中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等行为，都可称为早期的出版活动。“版”的概念虽产生于木质，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作为文字的物质载体，各种质地的版如木版、玉版、石版、金版等，都曾为古人广泛采用。王国

维在《简牍检署考》中就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甲骨也，竹木也，金石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我们认为，文字产生经历了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重要阶段，契刻的主要材料是竹木，所以说竹木作为文字载体的历史比其他材料更早。研究中国出版活动的起源，应该从竹木简牍讲起，因为它们已经具备了出版活动所具有的编辑、复制等环节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并且它们较之当时的其他载体材料，使用的时间更长，应用更广，影响更大。

图书文献的产生也是编辑活动的先决条件，尽管目前见不到商周时期的竹木简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百多年来发现的甲骨文史料来分析在商代便已产生的早期编辑活动，探讨最原始的编辑工作，早期的文献编辑出版活动包括哪些内容，是如何进行的。目前所发现的甲骨大都依次排列，串连成册，刻意收藏，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了书籍的必要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字产生于夏代，编辑活动起源于商朝。

本卷的撰写者是肖东发、杨虎和仝冠军，其中肖东发负责第一、二、八章及全卷的统稿工作；仝冠军负责第三、四、十章；杨虎负责第五、六、七、九章及大事记和全卷的插图工作；于文、卞卓舟两位研究生在校对和统稿时也做了不少工作。

本课题聚集了我国出版界、教育界、图书馆界数十位专家学者，可以说有一个高层次的顾问团、编委会作为出版通史研究的学术保障，在十多次课题编撰研讨会上，他们对本卷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有的还写出书面材料，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卫研究员、天津人民出版社陈益民编审、中国书籍出版社侯仰军编审以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魏玉山、刘兰肖、徐焕生等，都为本卷的修改完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肖东发

2008年9月22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1　先秦两汉卷
作者=肖东发等著
页数=415
SS号=12211926
出版日期=2008.12